

斯特朗文集

I CHANGE WORLDS

—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

1

DE3869

斯特朗文集

换了人间

朱荣根 李家声 俞再林 王志文 译

贾宗谊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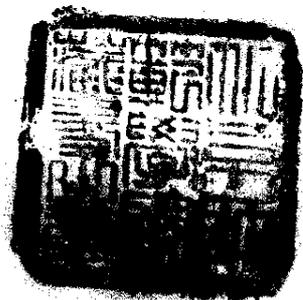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5942

1

新华出版社



1155942

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
By
Anna Louise Strong
Garden City Publishing Co., INC.
New York 1937

根据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1937年版译出

斯特朗文集(一)

换了人间

朱荣根 李家声 俞再林 王志文 译

贾宗道校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5印张 插页6张 339,000字
1988年3月第一版 1988年3月湖北第一次印刷
印数:1—2,950册

ISBN7-5011-0103-5/G·25

统一书号:7203·200 定价:4.70元

DE 38/29

出版前言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〇)是美国著名的进步记者和作家，也是中国人民的诚挚的朋友。她一生追求进步，坚持真理，以犀利的笔为武器，始终不渝地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尤其热情讴歌了苏联人民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成就。

斯特朗一八八五年生于美国中西部一个有教养的家庭，在父母的影响下，她自幼刻苦学习，年仅二十二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的学位。为了追求公正和自由，她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进步事业。斯特朗积极参加过反对美国加入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运动，参加过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参加过工人总罢工运动，创办过美国西部第一份支持十月革命的报纸。

年轻的斯特朗还是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二十多岁就出版了三部诗集和一部话剧。为了鼓动劳苦大众参加社会变革，在她编《西雅图工会记实报》时，就创造性地开辟了一个叫《安妮丝》的打油诗专栏，每天发表一首她写的诗。以诗论政，以诗讽刺社会，激励青

年，一直持续了两年，共写了六百首诗。这些诗被传抄到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斯特朗因为鼓动工人罢工而被捕了。她的一个同事是一个改良主义者，责备她说：“你的所有的老朋友都抛弃了你。有什么人站在你一边吗？”她回答说：“有！有拥有七千会员的锅炉制造工人工会，有锻工，码头工人，机械师，电机工人，和许多别的人。我们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赢得胜利。”从此以后，对她来说：不是自由主义的良心，而是群众的行动才是有希望的改变世界的动力。

斯特朗出狱后，更以旺盛的精力投入了劳工工作。她在二十年代发表的一首诗《辞旧迎新》，就宣告了她对人类新时代的春天必将到来的信念：

旧时代行将过去，
新时代定要来临。
枯萎腐烂的落叶，
终将埋入孕育新生命的沃土中。

.....

现在是奔向春天的时候了！
虽然还要经受无数严冬的风暴。
人民的力量象熊熊的火焰，
在每个民族的上空闪耀。
笼罩人间的乌云在渐渐消逝，
灿烂的光辉将慢慢把大地普照。

一九二一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斯特朗来到了列宁的俄国。她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她长期与苏联人民同过艰苦生活。在那里安家落户，结婚。她不仅写了大量作品赞美“人的新世界与新世界的人”，而且亲自组织美国专家去苏联工作，亲自募捐和运

送物品给伏尔加河灾区儿童。特别是为数万名在苏联帮助建设的美国工程师及技术人员，创办和主编了《莫斯科新闻》英文报。工作很出色。据说，她受到过列宁、斯大林的称赞。斯大林曾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请斯特朗列席，讨论她改进报纸工作的批评和建议。后来，她被错误地诬为“间谍”，被驱逐出苏联，蒙受不白之冤达六年之久，但她始终冷静思考，坚信真理，顾全大局，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通向人类彻底解放的必由之路。

斯特朗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在历史的紧要关头，她曾六次来中国访问。一九二五年她首次来华，大部分时间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中心地广州。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她见到宋庆龄和其他许多进步人士、群众领袖。一九二七年，她访问了墨西哥之后，再次来到中国。在武汉和其他一些地方，她不仅报道了日益高涨的工农运动和反对以帝国主义为后台的军阀的国内战争，也报道了由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而导致的多少人流血牺牲的革命失败。她写道：中国的未来“存在于被捣毁了的农会之中，存在于那些千千万万农民的希望和经验之中。”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斯特朗第三次来华。她专程到晋西北访问了朱德将军的司令部，继而访问了华北各战场。她英姿焕发，穿梭于斗争激烈的敌后各条战线之间。当时正在中国访问的波兰女作家伊罗娜·拉尔夫·苏埃斯对斯特朗作过这样的描述：

“她既有当年乘“五月花号”船去美洲的先驱者的坚定性，又具有一位革命历史学家的清晰头脑。在她严峻、坚毅的脸上一双冷酷的淡蓝色眼睛，使我感到敬畏。……当她谈论她感兴趣的问题——苏维埃俄国、中国、工人运动时，我们为她的激情所吸引，倾听着她如何以严密的逻辑、惊人的清晰和非凡的远见一下子就深入到一

些最复杂的问题的实质。她讲话象机关枪开火一样，客观、不动感情，而且深刻。事实和数字都说明问题。”

一九四〇年底，斯特朗第四次访华。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僵持不下的阶段。日本侵略者已占领大部分大城市，并诱使蒋介石投降。在国民党内部再次掀起反共、投降的声浪，反动派则加紧策划消灭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罪恶活动。周恩来同志在重庆向斯特朗介绍了这一形势，说明日益增长着的再一次分裂的危险，远比一九二七年那次还糟，因为民族生存受到了威胁。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斯特朗即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及时准确地揭露了国民党这一阴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立场，以及国际进步舆论和一些国家政府对蒋施加压力，才使这次危机没有进一步扩大。

一九四六年六月，斯特朗对中国进行了第五次访问。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她看到了希望，增强了信心。当时蒋介石不顾战后签订的协议，正在美国的援助下准备打全面内战。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席会见了她，发表了举世闻名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斯特朗相信这一理论是正确的，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经过她的报道，“纸老虎”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了广泛地传播。后来，她在回忆延安的文章中写道：那儿“没有奢侈豪华的东西，也很少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有的却是这样一些人，他们思想敏锐，深谋远虑，高瞻远瞩，放眼世界。我感觉到……我自己的胸襟在不断开阔……在这儿，我仿佛终于认识到人类在艰难困苦中前进的历史是可信的。”

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是一九五八年，当她七十二岁的时候，决定晚年定居中国，直至一九七〇年她安然长眠。她和翻身后的

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十二个春秋。

斯特朗热爱中国，写中国，无限信赖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斯特朗的名字，与中国革命斗争历史密切相联。她对中国人民的支持和友谊，为我国广大群众所熟悉与铭感。她同我国老一辈革命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邓颖超说：“斯特朗生于美国，死于中国，她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骄傲，又是两国人民的友谊象征。”

斯特朗八十五岁逝世。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追求真理的一生。她曾走遍世界许多地方，经历了时代的风云变幻，也经历了个人的严峻考验。但她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向往革命，从不向命运低头，对人类的进步和前途充满信心。她放弃舒适生活，不顾个人安危，哪里燃起斗争火焰，她就奔向那里，就在那里战斗。她总是站在时代的前线、险峰。她的一生，几乎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的故乡美国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度过的，三分之一的时光，是在她称之为“理想的归宿地”中国度过的。她还到过西班牙、越南、朝鲜、柬埔寨、墨西哥、波兰等许多国家，在那里，留下了她的战士的足迹。

斯特朗终生以笔为武器，用她那敏锐的洞察力，引人入胜的笔调，反映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传播各国人民的友谊。她一生孜孜不倦，直到晚年走路持杖的情况下，仍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旺盛的活力。当她七十四岁高龄的时候，为了了解西藏人民推翻农奴制后的新生活，她还坚持要求去海拔三千六百公尺的拉萨采访。由于她惊人的勤奋和智慧，一生中写了上千篇作品，出版了四十多部著作。她的作品被译成十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影响着千百万读者。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杰出的作家和

新闻记者，为了学习斯特朗一生追求真理，向往进步和不怕困难的革命精神，新华出版社决定出版《斯特朗文集》。这套文集合三卷，主要搜集了斯特朗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其内容是：

第一卷《换了人间》(I Change worlds, the Remaking of an American)。一九三七年首由纽约加登城出版公司出版。这是斯特朗于一九三五年写的一部自传体著作。本书详细描述了她的前半生(一八八五——一九三五)的生活、成长过程和在美国、中国的经历等。从中可以了解她是如何从资本主义的美国来到社会主义的苏联，如何从一个天真幼稚的姑娘成长为一名支持革命的进步记者，如何从信仰宗教转为信仰共产主义的坚强战士。这对研究斯特朗世界观的形成甚有帮助。

第二卷收有《千千万万中国人》(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 From 1927 to 1935)和《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why I came to china at the Age of 72)两部著作。

《千千万万中国人》一书，详细介绍了一九二七——一九三五年的中国革命斗争。其中主要记述了武汉革命政府蜕变成反动的军事独裁政权；记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白色恐怖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记述了中国红色政权的崛起。书中还讲述了斯特朗与引退回国的苏联顾问鲍罗廷，乘车横跨中国大西北和蒙古沙漠，最后回到莫斯科的情景。作者以纪实的方法，通过耳闻目睹的第一手材料，介绍了在中国大地上所进行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

《我为什么七十二岁来到中国》，是斯特朗于一九四七年离开延安到一九五八年重返中国的经历。主要介绍了她是如何于一九四九年在苏联被捕的，又如何以“间谍”罪名被驱逐出境的。她回

到故乡后打算与美共取得联系,但徒劳未成。后来又迁往洛杉矶,她一方面为她无故被驱逐出境进行申辩,另一方面也一天不忘对新中国进行宣传。一九五五年苏联政府为她进行平反。此时美国政府又百般阻挠斯特朗访华,她又为此与美国当局进行斗争,直至她的夙愿实现。

第三卷收有《人类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China Fight to Freedom)和《中国人征服中国》(The Chinese Conquer China)两部著作。

《人类的五分之一》是一九三七年斯特朗来华进行了大量采访活动后撰写的。作者讴歌了中国军民同仇敌忾、不屈不挠地抗击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暴行。并坚信中国抗战必胜。

《中国人征服中国》是斯特朗一九四六年六月至一九四七年三月利用“军调部的方便”,在延安、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以及东北解放区进行采访的纪实。在延安,她访问中共总部,毛泽东主席向她发表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谈话。她根据所见所闻生动地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现状。展望未来,她对中国正在进行的这场两种命运的决战充满无限的信心。她看到了革命力量正在发展,她预祝一个延安式的新中国即将在烈火中诞生。作者文笔锋利,这是一本既有重要历史价值而又饶有兴趣的书。

斯特朗和斯诺、史沫特莱一样,都是在世界上享有盛名的记者。她的作品文字优美,论理透彻,清新感人,堪称世界报告文学的巨著。作为记者,她采访深入,高瞻远瞩,具有锐敏的洞察力。她在中国的采访活动,描绘出一幅幅时代的巨大画面,闪烁动人的异彩。她的著作不仅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史料丰富,是研究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的文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出版

这套文集,不仅对新闻文化界是需要的,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很有意义的。

愿斯特朗的革命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

新华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八月

献给持有我十五年以前观点的
美国人

献给想要了解美国的
俄国共产党人

目 录

第一章	花园里的姑娘	(1)
第二章	花园里的上帝	(13)
第三章	生活的利器	(25)
第四章	我认识了世界	(40)
第五章	我失去了“我的美国”.....	(53)
第六章	来自莫斯科的信号	(65)
第七章	西雅图“革命”	(81)
第八章	改弦易辙	(97)
第九章	废墟中的理想国度	(108)
第十章	饥荒线上	(120)
第十一章	伤寒与风暴.....	(129)
第十二章	制高点	(140)
第十三章	北部边疆	(155)
第十四章	俄国早期的美国移民	(168)
第十五章	工人当家作主	(182)
第十六章	我的首次大失败	(197)

第十七章	我的伏尔加的孩子	(210)
第十八章	我成了苏联在华尔 街的代理人	(226)
第十九章	在革命的广州	(244)
第二十章	混乱中的墨西哥	(259)
第二十一章	红色汉口	(273)
第二十二章	准备新战斗	(289)
第二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的 第一个春天	(306)
第二十四章	我们创办了 《莫斯科新闻》	(324)
第二十五章	五年计划时期的 美国人	(342)
第二十六章	向斯大林呼吁	(361)
第二十七章	纷繁的日常生活	(380)
第二十八章	为面包而斗争	(389)
第二十九章	加利福尼亚解释莫斯科 ——真实问题	(404)
第三十章	圣人之死 ——平等问题	(423)
第三十一章	自由的前奏 ——意志问题	(443)
附：	林肯·斯蒂芬斯致作者	(461)
	作者致读者	(463)

第一章 花园里的姑娘

比我年纪大的美国人问我：“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去莫斯科？”比我年轻的美国人则问我：“我希望在新的天地里开拓事业，如果我去那里的话，你可以给我找到工作吗？”他们所有的人都问这问那，但是却没有胆量这样说：“那边的那个陌生世界，情况究竟如何？你一定了解那边的情况。你在那里生活了十三年以上嘛。那里的确有一些世人所殷切期望的新东西吗？若不然，也许只不过是重演生活中早就有过的失望吧？你在那里发现了什么？它使你发生了什么变化？十五年以前，你和我们是一样的啊。”

他们的问题比较深刻，我试图作出回答。为了他们，也为了我自己，我要把我从生活中学到的优良东西加以剖析。我的叙述不应当从我踏上俄国国土的一九二一年秋季开始，而要追溯得很远，远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甚至远在战争以前。我同千百万人、甚至同全世界的人们共同踏上的这次征途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记不起了。这条征途通向莫斯科，通向比莫斯科更远的地

方。如果这条征途有什么终点的话，那么，这个终点不应当是莫斯科。但是，我象其他千百万人一样，当我十五年前在西雅图迈开脚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走向何方。

我象其他人一样，在到达终点以前，并不知道我的征途的方向。别人的情况同我一样。我认为，大多数美国人都跟我一样。心理学家把我们这类人叫作动型人。意思是说，我们考虑问题时，不是诉诸视觉形象或听觉形象，也不是诉诸图表计划，而是见诸行动。也许正是我们的开拓性生活使我们变成这个样子，使我们走向一个新天地，只是不断地向它走去，既不可捉摸，也无法规划。也许是机器对我们的神经系统产生了影响吧；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不一样，我们几乎是一生下来就认识了机器。或许这一点并非是美国人所特有的，而是人类的共同特点，因为在个人身上，象在人类历史上一样，觉醒往往产生于行动上的冲突，然后才形成思想。

不管怎么样，我们是在行动。以后，如果我们生存下来，并有时间加以论证的话，我们就可以弄清楚我们行动的动机和目的了。多年以前的事浮现在我的脑海：在我读书的大学，一位受人尊敬的女校长谴责我的鲁莽行动，她说：“如果理性不是指导我们的行动的话，那么，理性又是为了什么呢？”我对她说：我的理性的全部职责是在我的行动完成以后对我的行动作出解释，它不负责任何别的事情！这并不是顶嘴，然而她当时却认为我顶撞了她。

有时，我真羡慕这样的人：他们预先设想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当他们还是风华少年的时候，他们就确定了自己要作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当我回首往事的时候，我的生活道路虽然没有遵循一个严格的计划，却也大致上有一个连贯的方向。这个方向并不是我明确意识到的，我从来没有事先的安排。我的道路是每日每

时走出来的，是“自我”（实在找不出别的字眼，姑且用这个词儿吧）漫无计划地互相作用的结果。这个“自我”是我的父母和遥远的茫茫往事所铸造成的。我的道路也受新的力量的影响，我从中汲取了适合我自己的东西。看来，我们这些看重行动的人也达到了目的地。用我国的谚语来说，何去何往，茫然无知。然而，我们象其他人一样，毕竟也踏上征途。

这倒也省掉许多筹谋规划之苦。我确信，如果我在若干年之前安排自己的道路的话，其目标无非也正是我现在全力以赴的。不过，我不能忘记，许多人象我一样，满怀喜悦地迈出第一步，然而，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头来却落得个失望。由于我对自己所走的道路没有明确的安排，多年来我迷惘徘徊，感情矛盾，虚掷了不少年华，这也是要铭记在心的。别的人也许可以从我的经历中汲取教训，少走弯路吧。因为我认为，我所走的道路正是千千万万人所走的道路。

* * *

往事如烟，难以记忆，只知道我们的祖先漂洋过海，来自一个大陆。他们原先生息在亚洲的腹地，后来不断西移，越过欧洲的平原，进入罗马、高卢和不列颠，在那里生活两千多年。接着，他们又横跨大西洋，这次不再是整个部族迁移，而是以户为单位，成批结队地迁移。他们在美洲沿海定居下来，不断向西扩展，一代接着一代深入大西部的荒凉地带。

在新的土地上，他们成为开拓者和征服者。而旧大陆则称他们为“逃亡者”！留在旧大陆上的人，胜利者趾高气扬，而被压迫者则痛苦呻吟。这些移民是由于社会大动荡而被排挤出来的。他们是历代中产阶级多余的人。他们被成批地赶出牧场，但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夺取新土地。那些破产的商人们在一个比较单纯的天地

里有能力重新开张；那些失业的工人仍然有钱作最后一次迁徙；只有在新的社会里，富有冒险精神的人才能施展其才能；理想主义者和信教的人在这里才能弃旧图新。

不论是他们的机遇，还是他们的才干，都使他们不可能成为主人，而他们又不愿当奴隶。因此，他们选择了荒无人烟之地去发挥自己的才能，因为征服土地比征服人要容易一些。他们把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留给那些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去处理。他们宁肯找一个比较简单的任务：开拓土地，自创家业。就这样，一代一代不断开拓新土地，直到周围住满人，驱使他们又向荒地进军。他们的希望就在于征服新土地，把昔日的失望置诸身后。他们把失望同自己的尸体一起埋葬在异域的坟墓，而把希望留给子孙后代。因此，他们作为西部的征服者而名垂史册。

这种生涯产生了他们的强点和弱点。他们引以自豪的是：强劲的体力、大胆的乐观主义、聪明智慧和迅速适应新环境的能力。他们欣喜的是：他们离群独处，毕竟生存下来了，他们把这叫作“独立性”；他们善于出走和变革，他们把这称作“自由”。他们是“务实的人”，不大重视理论。他们不大愿意去对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进行分析。而别人正是利用这种社会力量和经济力量对他们进行远距离控制，迫使他们走向荒凉的土地，把他们重新束缚起来。他们既没有压迫者的狡猾，也没有亡命之徒的狡猾，又缺乏团结精神，他们靠的是信心和回避矛盾。当他们离开故土，听任暴君在那里肆虐时，他们总是梦想寻找没有奴隶、没有主子的新土地。他们之中有的出身于日耳曼部族，他们的祖先曾经推翻了腐朽的罗马帝国，迎来了更威严、更强大的罗马教皇；有的是移民，他们征服了西部来修筑吉姆·希尔的铁路。他们是勇敢的、自由的和平等的，但也是容易受骗的。他们用干劲代替了思考，用乐观主义代替了分

析。他们被激烈的阶级斗争所排挤，但却不肯相信阶级的存在，仍然指望在天涯海角的某地，人们还是自由平等的。他们没有明确地分析一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美国人就是这样出现在世界上的。在征服自然方面，他们最强有力；在使用机器方面，他们最聪明；他们最乐观；在社会关系方面，他们最天真、最轻信。

* * *

年轻的约翰·斯特朗于一六三〇年来到马萨诸塞，于一六三五年在康涅狄格谷定居下来。然而，他还没有活到老，康涅狄格就人满为患。他便向北移居到北安普敦。在那里，他功成业就，建立了一个家庭和镇子。他逝世一百年以后，另一个约翰·斯特朗进一步向北发展，移居到佛蒙特的荒山之麓。他在那里呆了二十年就离开了。他带着老婆孩子十口人，迁移到俄亥俄。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镇子，用他的名字命名，叫作斯特朗镇。他就是我父亲的祖父。我母亲的祖先叫特雷西、洛德和拉塞尔。他们也是于一六三〇年来到美国的。他们也是逐渐向西推移，不过路线偏南一点。

这些充满进取精神的移民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之中既有农民、传教士、教育工作者，也有手艺人、工程师、商人、地方长官。戴维·斯特朗上尉曾参加独立战争。他的母亲萨拉·沃伦把他带回“五月花号”轮船上。托马斯·特雷西中尉创建了康涅狄格州的诺威奇。约翰·拉塞尔创建了哈德利镇，他年迈的时候，常向人们吹嘘他的功德：当英国国王的军官们搜捕英国的两名弑君者戈夫和惠利时，他曾把他们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的儿子塞缪尔·拉塞尔建立了一个图书馆，耶鲁大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拉塞尔·洛德是工程师，他建设了特拉华—赫德森运河，在洪斯代尔

建筑了美国的第一条铁路。我的祖父约翰·斯托顿·斯特朗八旬高龄的时候仍在俄亥俄一块六平方英里的荒野上放牛，而我的祖母的妹妹利齐·洛德则嫁给了哈里森总统，生活在白宫里。她们两人真是天壤之别。他们的经历反映了这块蓬勃发展的土地上的多方面生活。

我的祖先一直是向上的。这表明他们在不断前进，尽管他们的目的并不总是明确的。他们兴建城镇，修筑铁路，建立大学。后人进一步扩展了他们的事业。他们确信，人类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新事物总是好的。三百年来美国的发展不是证明了这一点吗？他们的干劲和乐观主义起了作用。

他们在思想上同样是不断进步的。五十年前，我的父亲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最先接受了达尔文主义和进化论的思想。我的母亲恐怕是世界上最早接受大学教育的女子之一。在她的青年时代，只有两所大学对妇女开放，即东部的霍利奥克大学和西部的奥伯林大学。奥伯林大学具有反奴隶制的传统，它的格言是“学习和劳动”。这所大学是学生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起来的。正是在这个大学，她遇到了我的父亲。他们的结婚遵循一种新的进步传统，这就是：妻子不仅在艰苦的创业中是自己的伴侣，而且在智力方面也是同自己平起平坐的。

一方面是由于母亲的鼓励，另一方面，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父亲自己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既定目标，他历尽千辛万苦，走过坎坷道路，终于成为符合基督教理想的人。我读过托尔斯泰的著作，但没有见过其人。我认为我父亲颇有点象托尔斯泰。他由于热爱“上帝和人”而憎恶战争。在震撼世界的那次最大的战争期间，他宣传反战思想。当他周围的整个工作、友谊链条全都垮下来时，他巍然独存，坚持奋斗。他不顾年迈，亲自到日内瓦去“看看对和平发生了

什么事”。他失望了，但并没有泄气。在我所见到的人中，只有他遵循了耶稣的信条。他宁可为信仰而死，但决不放弃理想。他以其言行教导我：为了自己的信仰，金钱、名誉和舆论都可置之不顾。虽然他未能教会我如何去分辨正确与谬误，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他似乎告诉我：正确的东西就是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虽然这一点在具体情况下并不总是适用的，但这显然是他那一代人的最高见解。他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毫不动摇地致力于他认为是美好的、正确的东西。他的这种精神使我获益良多。

我的父亲在他的家里是具有开拓精神的人。当时美国的每个家庭都有一两个这样的人。到西部去创业的是他。他在思想上也具有这种气质。他们兄弟们分家时各得了一份遗产，每户分了数千美元。有人用这笔钱购买了土地，变成了当地的殷实农户。也有人购买了银行股票，成为当地的银行家。我父亲则把这份遗产用来作了一次讲排场的结婚旅行。他是典型的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健壮的聪明的小伙子，高高兴兴地自由选择了自己的妻子。他耐心地等待了四年，直到他和我母亲完成了自己的学业。结婚之日，他们举行了应有的婚礼。然后，他们到欧洲、希腊、巴勒斯坦和埃及作了一次广泛的旅行。亲戚们是不赞成他们这种做法的。他们解释说：“在我们结为终生伴侣的第一年痛痛快快地玩一玩，永世难忘。以后，就要为工作和子女操劳了。”

他们大手大脚地吃喝玩乐，凭吊古迹，全然不象一般人那样斤斤计较财产。当他们浪迹非洲和亚洲之间的边界时，我的生命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他们横跨大西洋，返回美国几个月之后，我便在内布拉斯加大草原上的弗里恩德镇呱呱坠地了。

弗里恩德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我一点也不记得了。据老人们对我说，父亲最初是当传教士，有一间住房和一间书屋，都是用木

头搭成的简陋房子。老人们还说，当我还是一个不到两岁的婴儿时，碰到了一次大旋风，我从门前一下子被卷到了放牛的牧场，刮出去好远。当大人找到我时，我对旋风一点儿也不害怕，倒是对牛有些讨厌。显然，我继承了长辈的开拓精神，认为自然风暴比变化无常的生物还要友好一些。

我青年时代还从父母身上接受了另一个传统。当我们从弗里恩德迁移到俄亥俄的芒特弗农时，我还不满两岁。据说，在火车上，我纠正了一个妇女的语言：“妈妈说，不应当使用 ain't (am not, are not 等的鄙俗用法——译注)。”看来，我母亲使我从小就注定要当一个编辑。

我懂事以后，母亲对我进一步加强了这方面的训练。当我上床时，她总是给我读古典诗歌：《湖畔女士》、《马米昂》、圣经中的诗歌和许多古老的歌谣。我听着听着，便悠然入睡。我之所以六、七岁就开始写诗，十三岁就出版了一本诗集（德尔大叔给打字装订的），我想主要是得力于这种训练，倒不是由于我有什么非凡的天才。我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就教我读罗伯特·鲍尔的《星地》，我很入迷。这是一部供儿童阅读的描写星空的美妙读物。我早年的乐趣之一就是晚上经常熬夜观察星宿的位置。我的弟弟妹妹长大，开始学习后，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妈妈通过识字游戏，教我们学习新词及其用法、正确的读音和拼写。我之所以成为作家，大概得益于早期的这种训练。

母亲还让我们独立生活。她是具有现代思想的进步妇女，不象过去那些因循守旧的妈妈。我七岁时，我们家迁移到辛辛那提这个危险的城市。从那时起，妈妈就训练我去商业区。在一个行人拥挤的十字路口，同行的邻居听到我过马路时重复妈妈叮嘱的话：“东望望，西瞧瞧，然后赶快跑。”……俄国的成年农民在过莫斯

科的街道时，仍然需要这样的告诫！……我八岁时，家里人就让我独自一人坐火车过夜。我不知道家里人是否嘱咐过乘务员，但是我记得车票是我自己拿的，天明时在曼斯菲尔德下了车，我给脚夫付了小费，坐出租汽车到了祖母家。我得意洋洋地在那里吃了早饭。这是我独立生活的一天。

我母亲决心把我们锻炼得勇敢无畏。西部草原的雷雨是很吓人的，不但许多儿童害怕，就连一些胆小的大人也害怕。母亲则利用这些机会来练我们的胆子。作为巨大的奖励，她允许我们坐在门廊，观察下一个雷电。有一次，我在门廊坐着，看到了五次电光四射的雷电在我们家的两间房子中间打响。我清楚地知道，如果这个电闪击中我，我就一命呜呼了，可是我不仅不害怕，反而更开心，以一赏壮观的奇景为快。我认为正是这种训练使我能够在日后的生活中临危不惧；当我碰到死亡的威胁时，当我在江河湖海的小船上受到暴风雨袭击时，当我在高山上突然被暴风雪围困时，我镇定自若，更加冷静地泰然处之，甚至欣赏起大自然的威力。

我母亲是在俄亥俄北部长大的。那个地方在反对黑人奴隶制的斗争中动手最早。她就读的奥伯林大学根据人人平等的原则，不仅最早接受妇女入学，而且最早为黑人敞开大门。该校为此颇为自豪。当我们迁移到南部的城市辛辛那提时，母亲把这个传统也带到那里，并且为此而斗争。有一次，一个邻居神色不安地告诉她：她的大女儿安娜·路易斯经常同两个黑人妇女的儿童玩耍。那时我六岁。母亲对她说，也对我说：如果黑人的孩子文明礼貌、和气善良，可以同他们玩，不必介意肤色。据老人对我说，白人孩子象他们的母亲一样，态度非常傲慢，这使我很难受，我搂着洗衣女人的小崽子，抽泣着说：“我最爱黑色皮肤的人。”但是在那时，这种歧视是很流行的。

美国中产阶级过去和现在的论调是：他们的子女不应当碰到世界上的邪恶。人间大规模的战斗不应当降临他们的家庭，夺去他们子女的风华正茂的青春。不应当让儿童们碰到粗暴和不公正的事情。我比我那个时代同一阶级的儿童更多地享受到了娇生惯养的幸福。我们家庭洋溢着关心爱护和充满智慧的气氛。我的母亲长得漂亮，非常能干，对丈夫来说，她是一个好伴侣；对于子女来说，她是一个好教师；此外，她还抽暇从事那个时代所允许的社会工作，即组织妇女协会。所有这些工作，她完成得非常出色。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任何一句粗鲁或不公正的话。如果他们责备或惩罚我，总是首先调查清楚事情的原委，向我说明为什么处罚我。我长大以后，认为公正和仁慈是人们应当享有的天赋权利。如果有人对我不客气，我总是认为错在自己身上。

我还记得很清楚，当我在辛辛那提的一所公立学校遭到粗鲁对待时，我是十分震惊的。当时一位教师揪住我的耳朵，使劲儿地推搡我，原因是：我的墨水瓶干了，未经允许，我自己倒满了墨水。我母亲赶快给我想办法，以免再发生类似事件。她安排我去上私立学校。不知道究竟是由于我的聪明呢，还是由于我父亲在教会的地位或者我母亲的个人威望，我被辛辛那提一所最好的私立学校接受为借读生。在那里，我得到很好的个别辅导，在四年内完成了八个年级的学业，甚至还学了一些法语。这个学校的校长诺斯女士对我母亲说的话，我记忆犹新：

“你的女儿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显然，她是在充满爱的气氛中长大的。她总是希望人家喜欢她，认为他们的心地是善良的。甚至当女孩子们粗暴的时候，她也想方设法原谅她们，比她们自己都想得周到。”

可以看出，母亲认为这是对她的很大恭维。母亲说话的声调

使我觉得也是对我的恭维。我几乎一辈子都没有认识到：在走向生活的时候，如果认为人人都是好人，对那些明明是邪恶的行动也总是想方设法说其动机是好的，这种想法可能是危险的。

* * *

虽然我沉浸在家庭之爱中，但却也免不了感到孤独。有一天在花园里，我就陷入这种孤独感。差不多四十年来，这种情况一再出现。当我试图回答人们的问题：是什么因素促使我去莫斯科，我对苏联的印象如何时，我不禁回首往事，想起了我十一岁时，春暖花开，阳光明媚，在橡树公园牧师区紫丁香花丛附近玩耍，便开始了我有意识地寻求知识的活动。

记得当时曾经有一条狗，叫诺伊罗，由于得了瘟热病而死去。另一条狗“老虎”被我们毒死。在这以后，我们不再养狗了。我们还玩捉迷藏的游戏。但是有很长一段时间，那里没有动物。有一天，蔚蓝的天空，阳光普照，紫丁香花的芳香沁人心脾，白色的花丛和紫色的花丛交相辉映，形成了美丽的曲线，突然，我幼小的心灵觉得我自己仿佛是一个坚硬的圆东西，海阔天空的美丽春天在外头，而不在我身边。我可以看到春天，嗅到春天，我爱春天，但我没有同春天融为一体，永远不可能同它融为一体。我那个圆圆的坚硬的灵魂使得我无法同外界打成一片，我出不去，外面的东西也进不来。

我的小手臂伸出去拥抱紫丁香花丛，但紫丁香花丛高傲地不理我，它的美丽引诱着我，却又可望而不可及。我趴在地上，抓住植物的根，把脸埋在春天松软的草丛中。土地是硬的，我感到舒服，但孤独寂寞之感仍未离去。那天的陶醉仿佛是产前的阵痛，一个红润的赤条条的婴儿从此诞生了。我第一次觉察到自己是一个同世界隔离的孤单动物。我急切地要回到世界的怀抱里。

我不知道心理学家是如何分析从哲学家到诗人都亲身感到的孤独的。但是我近几年认识到：这种由于孤独而产生的痛苦，其原因可能是很简单的：人类是猴子一类的群居动物，而不是象狮子那样习惯于独处。我们的个性是局部的，变动不定的。我们称之为“我”的意识流是由不断变化的、来自群体、又返回群体的成份组成的。我们一直在谋求同群体在一起，而不是把个人同群体对立起来。我们之所以还没有做到这一点，是因为群体被争斗所分裂。这种争斗的形式因时代而异：奴隶同奴隶主的斗争、农奴同地主的斗争、工人同资本家的斗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许许多多冲突。

这样，在我们生命的鼎盛时期，我们总是力求以自己的方式，如艺术、宗教、爱国主义、爱、同志情谊或工作，把自己同更大范围的生命溶汇在一起。然而每次成功都是短暂的、局部的，因为美、国家、上帝、亲爱者或者事业吸引了我们的全部身心，又使我们同异己的美、同别人的国家或别人的上帝发生冲突。……只有当养育我们的人类群体团结一致，有意识地去控制自己的未来，个人才能安定下来。

寻求摆脱人类孤独感的途径——这个努力我几十年前在花园里就开始了。

第二章 花园里的上帝

我的童年时代是健康的，孤独感是短暂的。我很快地建立了自己的世界，弥补了生活的不足。晚上睡觉时，我给妹妹讲童话故事。随着岁月的流逝，故事的情节也越来越复杂。有些小朋友没有读过《伊利亚德》，但很喜欢这个故事，我便同他们玩烧特洛伊木马的游戏，使我有机会按照自己的设想安排故事情节。我们焚烧了特洛伊木马，穿过被草原大火烧焦了的草地去拯救海伦。我记得我是否扮演过海伦。我当时是一个比较活跃的人物。在我们那个小天地里，我是受人尊敬的、颇孚众望的。

有一段时间，我记不清究竟是持续了几个星期，还是几个月，在我创建的小天地里不断增添新内容，每天晚上睡觉以前我们也有活动。一天晚上，我的一位女友和我在夜影中切切私语，说我们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度过了很长的时间，这个世界比我们日常的生活要有趣得多，但是却不能告诉任何人。我们彼此信誓旦旦，

保证不向外人透露，她才坦白说，她想男朋友，我则承认我想天堂。我不知道哪一种思想更见不得人。我比她年纪小，所以我还没有开始想男朋友。我心里想，她真不害臊，但我认为自己更傻，竟把心头所想的事掏出来。

说实在的，我们想到一起了，我们憧憬着更广阔的、更令人神往的生活，其内容岁岁不同。作为一个传教士的女儿，整日所见的无非是教堂和主日学校的房屋，我本应把这叫作天堂。但我从小就把竖琴、王冠和天使抛在一边，而按照自己的愿望塑造了天堂。在那里，想往哪里飞，就往哪里飞；想跟谁说话，就跟谁说话。总之，那是一个有飞机和无线电的世界，而这些东西刚刚开始出现。在我的童年时代最使我醉心的，莫过于：万里征程一瞬间，天下景物任我观，王公百姓皆交谈。

随着年岁日增，天堂变得更加具体了。它应当提供亲密无间的友谊，这比世上的任何其他东西更重要。我首次同外界的接触告诉我：绝不是每个人都喜爱我。我父母教育我要善良博爱，这样，便会博得人家的爱。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至少并非人人如此。有时是年纪比我大的妇女讨厌我，有时是男人讨厌我。慢慢地我开始觉得人们普遍嫌弃我，这使我痛苦。我是指大多数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喜欢我，而实际上所有的人都不喜欢我。我的要求太苛刻了。如果他们不象我母亲那样仁慈，我便认为他们根本不喜欢我，其实是我的想法不对头。

这种奇怪的感情在几十年中反复出现而没有加以分析，直到我四十岁那年穿越帕米尔旅行的时候，它的底蕴才突然暴露出来。我对我们旅行团的负责人抱怨说：旅行团的另一位女士不喜欢我，两位先生似乎觉得我是一个累赘，因为他们必须扶我上马。态度和蔼的尼基京说：“你所希望的是什么呢？如果在我们这个十人旅

行团中，一个人喜欢你，两个人相当友好，六个人不冷不热，只有一个人不喜欢你，这难道不是一个满不错的比例吗？人类社会就是如此嘛，是不是呢？”……不错，确实是如此。然而我童年的环境使我抱这样的希望：如果我对人家好，所有的人也应当喜欢我。

我常常觉得人家讨厌我，这种想法在一生中不断出现。为了摆脱这种感情，我有两个办法，其形式不断变化。一个办法是塑造自己的上帝，另一个办法是埋头苦干，做好工作。我早期的天堂是提供友谊的，它做到了这一点。它使我在思想上颇感欣慰，语言难以形容，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如果你能向遥远天际的一个亲爱的人披沥衷肠，那是多么惬意的事啊！

母亲有一些书是禁止我们阅读的，其中有一部小说是玛丽·科雷利的《两个世界的罗曼史》。这部作品向我介绍了一种人们所不赞成的神秘主义。我们把这本书压在教科书的下面，偷偷阅读讨论。书中写的是：在茫茫的过去或遥远的未来，在千百万太阳系中的一个旋转的星球上发现了我们的“同胞”。它认为在千百万年以后，他们也不可能相会，但是杰出的人可能把他们的“同胞”穿过寥廓的太空拉下来。我们从来不相信这种事，但是那美妙的想象力是令人开心的。天狼星上的“同胞”，我们只能在梦中相见。

中学的课程要求专业化，我便放弃精神上的朋友而注重集体生活。独自一个人是愚蠢的。一个人决无法完成所有的有趣事情。我希望当一个北极探险家、飞行员、伟大的作家和一个养育十个孩子的妈妈——生一个孩子是不值得花费这样的时间的！我至少需要有十个生命才行。我知道，如果我开始考虑问题，我就会想得很多。但是所有这些生命必须同一个人联系在一起，而这个人要对他们所有的人感兴趣才行。我放弃了这个打算，它太复杂了。

我周围有组织的宗教生活很快把这些梦想接过去，变成了一种受到认可的神秘主义。这种神秘主义持续了许多年。上帝变成伟大的朋友。实际上有两种类型的上帝，不过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我的长辈所宣传的那个上帝是非常讲究实际的，他希望我善良。我恳求他给我以力量去完成我认为我应当完成的事情。我的一些朋友则要求他赐给他们以自行车和宴会。我认为我的思想境界要比他们高一些。我恳求上帝纠正我的弱点。人们教导我们检查我们的小过失。不礼貌、粗鲁、态度不好等等都应该检查。这些事情对上帝来说都是重要的。既然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我加以纠正，所以我对上帝是十分友好的。

这第一个上帝正适合我的需要，因为我正大力改进自己，要确保自己取得成功。但是另一个上帝，我更加需要。当我成功以后，我就可以独自干了。但是在一个我不大适应的世界里，我处处碰壁，遭受挫折。这时，上帝就不怎么令人理解了，我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无关紧要的。我可能破产，粉身碎骨。而上帝则是无限的。人们甚至对我说，这个上帝爱我，他爱所有的人，即使他们无所成就，他也爱他们。这使人感到安慰。甚至当我考入大学和走上工作岗位的最初几年，每逢工作不如意，我便在星光下爬上屋顶，把斗篷铺在雪上，凝望天空的星斗，以致忘记了时间，我对茫茫宇宙表示崇敬。也许，在地球上，任何人都不需要我，但是宇宙是需要我的。我从一种感情走入另一种感情，盲目地把我童年时代的那个温情世界延续到另一个比较粗暴的世界，这个世界要求我成为大人。我就是这样执着地迷恋童年时代。

我不加区别地热爱着这些上帝。我绝没有想到有人竟然畏惧宗教。我更没有想到，当我父亲年轻时碰到达尔文主义时，它对他意味着什么。他认为它同他所宣传的宗教发生了冲突，因为他信

仰的宗教是以圣经为基础的。他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集中力量宣传“耶稣的伦理学”，回避有争论的问题，因为他乐观地认为“不可避免的进化法则”将使每个人都信仰达尔文。

当我开始独立思考的时候，我父亲的乐观主义已经被证明是有根据的。在我们的周围，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我生活在一个舒适的家里，这个家庭居住在一个舒适的郊区——芝加哥附近的橡树公园。在那里，没有什么太穷的人。在美国，有千千万万这样的居住区。在这些地方，不仅住着富有的人，而且住着中等收入的人家，我们属于后者。熟练的建筑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熟练工人也都住在那里。住在这些居民区的人从来不谈论阶级差别，只议论大家都正在进入的美好社会。我们没有看到钢铁城或纺织厂的工人。

在这个郊区，各区都有自己的名称，有的叫“天主教区”，有的叫“基督教科学区”，名称虽然五花八门，但彼此情况非常相似。这个舒适的地区适应于我们的阶级和时代。地狱的观念已经消失了，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迷信《圣经》。这种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非常多，所以对他们的观点还不便于公开地、粗暴地加以谴责。他们认为，我们的世界之所以变得越来越好，是由于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上帝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各个人的生活，以及用什么方式做到这一点，是可以探讨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上帝给人以公正、慈悲，有时甚至使人兴旺。

我记得，只有一次涉及到那些令人敬畏的上帝：我跟另一个姑娘讨论了“不可饶恕的罪”。这是早几年以前的事了，那时我顶多八岁。她提出了一个颇有趣的问题：如果我知道我肯定要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逝世的话，那么，我愿意一下子死去呢，还是愿意拖一天。我想了一会儿，回答说：我要等一等，跟妈妈和朋友们告别以

后才死去，我是一个合群的人，我希望挥洒惜别之泪。而那位姑娘则宁愿一下子死去，因为她认为她并没有犯不可饶恕的罪；但是如果多活些日子，她也会犯这样的罪而下地狱的。我俩都不知道，不可饶恕的罪究竟是指什么，不过她认为她没有犯这样的罪。从她那极其高尚的灵魂看来，她似乎不可能犯这样的罪。我的父母教育我要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事情。

童年时代的习惯对我们日后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致今天对发生在我眼皮底下的坏事情，我都不能视而不见。我亲眼看到了，大吃一惊，但过后就忘记了。我的心记不住这些东西。即使我看到了人们进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我也很难相信他们是间谍和破坏分子。我还认为资本家和工人都同样地希望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我简直不敢相信世界正走向战争，尽管我了解事态的发展。我往往采取了美国流行的宗教观点：如果你心善，善自然会到来。在私人关系中，有时确实是这样。许多人是不愿使一个孩子失望的。但是也有一些家伙愚弄轻信的人。我学习着在天堂生活，但我没有学会建立天堂的方法。我的这种心理状态造成这样的结果：如果千百万人都持这样的想法，那便会使大批青年人不自觉地慢慢滑向世界大战，直到战争吞噬他们为止。

这就是我青年时代的“鸦片”所起的作用。这种作用，我仁慈的父母是绝没有想到的。这种“鸦片”使我们麻醉，看不到即将发生一次大屠杀。当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准备杀死我们时，这种“鸦片”仍使我们保持善良和礼貌。

* * *

当我发现芝加哥西区的贫穷时，我还是十几岁的姑娘。我是到那里移民区的学校教缝纫的。人们对我说，这种贫穷是由于无知而造成的。那里的人还不开化。我从来不认为他们是另一个“阶

级”的人。他们只不过是来自一个比较落后的世界，那里没有美国这么繁荣昌盛而已。只要他们到学校求学（我教的缝纫班就是这样的学校），在芝加哥富丽堂皇的运动场上玩耍，他们，至少是他们的子女，也会变成象我们一样的美国人。所谓“美国人”，意思就是干净、满足、有效率和富裕。美国是“天国”，是没有阶级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好、最自由的国家。

当我年纪稍大的时候，一些事情使我感到不解。我母亲到伊利诺斯南部去组织妇女协会，她回来以后讲述了她的见闻。她在矿工城镇目睹了美国工人受苦受难、举行罢工的情景。她没有讲述细节。不过，我记得：有一次她满脸怒容地走回家来。她说：“这个世界上不公正的事情太多了，令人难以理解。有些人冷酷无情，贪得无厌，干得少，拿得多，根本不顾别人的权益。他们给许多人造成苦难，然而却逍遥法外。你们长大以后，除了获得自己应得的一份收入外，决不能掠夺更多的东西。”我现在回想，她大概是就工人的境遇同矿主进行了争论。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使她感到不解。

有一个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我大概十五、六岁，我母亲快步走向一个黑人妇女，在街上同她拥抱，向我介绍说，这是莫利·丘奇，她是妈妈在奥伯林大学时期最要好的同学之一。我对这位黑人妇女不大热情。我早年对黑人是满怀同情的，但后来受同学的影响，对黑人冷淡起来。我甚至给中学的校刊写过一首诗《忆缅甸》。那时西班牙战争正在进行，我几乎成了一个年轻的帝国主义分子。这个黑人妇女一离开，母亲就责备我说，如果由于人家的皮肤是黑色的，就嫌弃人家，这种情绪可不对头啊，必须立即加以克服。她还说，坏人使得黑人处境艰难，无法受到教育和得到平等权利；如果黑人能接受教育的话，比如她的这位同学，她所表现出来

的勇气远远超过我和大多数白人。因此，她有资格得到特殊的荣誉。我希望能重新碰到母亲的那位同学，以表示我深深崇敬她的为人。

大约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读了贝拉米的《展望》。这部乌托邦的著作使我入迷。它所描绘的二〇〇〇年的情景同我早年所憧憬的天堂颇为相似。它提出的财富公有和平均分配这一经济基础也使我感兴趣。我同母亲讨论了这部书。她反映了她的阶级和她那一代人的观点，她温和地说：“是啊，那真是一个美妙的世界。”但她不无隐忧地说：“不过，当你理解人性的时候，你就会认识到：即便今天实行平均分配，十年以后仍然会出现不平等，因为一些比较能干的人会比别人捞取更多的东西。其实，公有制已在一些城市试验过，效果不怎么好。也许若干年以后，当人们觉悟提高的时候，才会行得通吧。”

象那个时代所有的妇女（包括进步的、有文化的妇女）一样，母亲不大懂得经济或阶级；只知道欧洲有阶级。在她看来，人们是孤立地存在的，各人根据自己的能力、道德和人品而获得相应的收入、名誉和爱戴。然而她认识到：这个世界是不公正的，“坏人”的掠夺妨碍了他人。她的治世之方是：大家必须正直作人，只有这样，世界才会慢慢变得公正起来，因为上帝站在正义的一边，是会伸出援助之手的。……不，这还不够，光正直是不行的，仅仅有正义的思想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热爱人们，热爱世界，即使世人有负于我，我仍然热爱世人。如果我们热爱人们，那就会比较容易地做到：一心为他人，而不大计较报酬。这样，人们反过来也会热爱我们。

她决没有想到她是在鼓励我们心甘情愿地受剥削，去吻压迫者的手。她给我讲了两种不同的伦理观点，她并没有把两者调和

起来。社会经验教育她要作一个正直诚实的互利的人。她自己又加上了作为一个母亲的爱抚和作为一个开拓者的勇气。她不仅把这些品质传给我们，也传给她所接触的尽可能多的人。她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实现平等，但她没有去探讨如何实现这一点，也许当大家都“十分善良”的时候，就能做到这一点吧。

* * *

母亲死后，我对父亲的布道第一次提出了怀疑。他布道时讲了一个关于“轻信的小姑娘”的故事：有些姑娘向男青年表示爱情太轻率了，还没有弄清楚她们选择的对象是否恰当，是否会获得相应的回报，就爱上人家了。我年幼的时候，他在另一个城市，也讲过这个故事，所以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我十八、九岁时，我发现他的观点有互相矛盾之处。

“我发现这个关于轻信的小姑娘的故事同基督教的伦理观不大协调，”我对父亲说，“耶稣教导我们爱每一个人，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世人，而决不要求什么回报。当人们伤害我们时，我们要永远原谅他们。而你现在宣讲的是：姑娘们在获得适当的回报以前，不应委身于人。我很懂得，人们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亲吻给予他人。而根据基督教的教旨则恰恰相反。按照基督教的教义行事，似乎不大保险。”

我父亲被我弄得很尴尬。”我只是要拯救你免于毁灭，”他回答说。

“这是我们之间的又一分歧，”我坚持说。“你认为只有两件事可以毁掉一个姑娘：不幸福的婚姻或未婚私通。诚然，我也认为这类事是可怕的悲剧。但是，如果我碰到这类事，我绝不会因此而永远沉沦下去，我将设法摆脱出来。我不认为这类事竟然象小说里头所说的那样比死还坏，因为如果一个人死去，那就一切都完

了。”

父亲对我的轻浮态度不以为然。不过，在离婚和妇女不贞节的问题上，他比同时代人要宽宏大量得多。对自己的家庭，他持这样的观点：一个女孩子的第一次性经历无足轻重。他鄙弃贪图财产的婚姻，然而他却不加批判地接受了这种婚姻所产生的伦理观点。

我自己也未能摆脱这种伦理观点。尽管我声称“男人加于我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永远毁掉我”，然而我仍然认为婚姻是一辈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选择，它可能决定我今后的前途，我自己以前的任何设想都必须服从于它。

甚至在选择我未来的工作时，我也考虑到日后的婚姻。我觉得写作是一种不错的营生，不管丈夫带我到世界的任何地方，我都可以写，甚至在家里利用零碎时间也可以写。我竭力避免形成过份固定明确的观点，以免将来结婚后必须加以改变。我这样想：我应当有自己的工作，积攒一点钱；如果同丈夫意见不合，我可以保持经济上的独立；如果我同他事事和谐，我也免得成为他的负担。假如在我找到终生伴侣以后才做这些事情，我则必须改变自己的想法以适应他的要求。

我二十岁的时候，同芝加哥大学的一些高水平的教职员作过一次谈话。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我的确把未来的丈夫看作我命运的主人。那时，我同一些比我年纪大的人交往。我既风华正茂，生气勃勃，又喜欢思考问题，因此引起他们的注意和兴趣。其中有一个人戏称我是一个“不想要主人的无主姑娘”。

“不，不对，”我大声说。“我要找一个人，由他来吩咐我应当做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我遵命照办，我就再也不需要自己动脑筋了。”

“天哪，孩子，”我的严肃认真的态度使他不再开玩笑，他说，“你想要的不是丈夫，而是上帝。”

的确，我想要的是一个上帝、一个上司、一个主人、一个能使我继续过孩提生活的严父。人们告诉我：这是符合女孩子的性格的。我相信，我的灵魂已经被宗教薰陶得服服帖帖，崇尚依赖了。然而，与此对立的是，我又有要求自由的一面。我在学校所受到的知识正在使我去争取自由。我自己的生活、我自己的工作、我自己的事业使我越来越感兴趣，使我不那么容易适应他人，不那么容易听任男性的摆布了。我把要求有一个主子和要求自由的这两种互相矛盾的愿望调和起来，我对自己说：我只有找到一个称心如意的、有出息的、非常好的人，才会委身于他，才会把我的整个生命拱手交给他。

我们那个时代的妇女谈及“顺从”一词时是从较严格的宗教仪式婚姻这个角度谈的，对这个字眼时而崇敬，时而畏惧。虽然时代的变化使我高谈男女平等和同志式的婚姻，然而我仍然觉得妻子不尊敬丈夫的那种婚姻似乎缺乏真实的感情。其实我所追求的感情并不是平等的友情，而是一种崇拜的感情。几十年来这种不自觉的追求，同我所真正憧憬的意中人是天壤之别的。

由此可以看出，我周围的传统和我的宗教感情不仅使我要寻找一个主子，而且要爱戴他，尊敬他。如果我在婚姻上找不到意中人，那我也要在工作岗位上成为某个男人的高水平的忠实奴仆，把他当作上帝，不管他怎么任性，我都逆来顺受。假如我所选择的对象不象一个上帝，我则会把我的种种理想加在他的身上。

我清楚地记得：布林马尔学院的院长托马斯曾经在学院的大会上对我们说，教育对妇女是有用的，因为如果她们在婚姻中找不到幸福的话，她们会在别的方面有所寄托。我非常生气，暗想：“多

么可怕的犬儒主义啊！婚姻必须是幸福的，人们决不能承认婚姻是不幸的。人们必须期望得到最好的东西，她们将会如愿以偿。”

由于我年轻时代塑造的所有这些上帝，我变得可以承受任何剥削了，甚至喜欢受剥削，或者至少终生装作愿意受剥削。作为战前美国的一个有教养的妇女，我愿意经历生活的甘苦。

第三章 生活的利器

当花园之神陶冶着我的性情，让我享受或忍受展现在面前的捉摸不定的生活的时候，美国一些名望颇高的学校正为我磨利生活的工具。我必须使用这些工具工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在辛辛那提，为上流阶层开办的私立学校中的学生几乎全部来自富贵人家，这所学校保留着我家里那种文雅友善的传统。这所学校使我和同学们受到教育，以便将来过贵妇人的生活，指望我们彬彬有礼，落落大方，以博得人们的微笑。我们后来搬到正在发展的芝加哥郊区一个叫橡树公园的地方，这里是一片平坦的还未开发的西部大草原。我已经十一岁了，上了当地一所出类拔萃的中学。这时候我开始面临一种每个人都要经历的过程，这个过程使我将来在真正的美国——工业迅速发展的美西部——能够适应生活的斗争。

对于认真读书的学生，上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出人头地；对于不太认真的学生，上学只是为了好玩，装模作样混过去就算了。我们考试实行打分，我们经常凑在一起

比分数,在这方面我总是超人一等。可在玩的方面我却甘拜下风。在班级里,我比其他同学要小三至五岁,这说明家里的学前教育 and 上私立小学给我打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岁数小也使我不能恰当地对付那些男生们的戏弄。我经常被逗得不知所措,不该难为情的时候,我却窘迫得要死,该高兴的时候,我倒生起气来。因为我太小,也没有人带我去参加舞会,实际上我也是听从了妈妈的劝告,她不让我去跳舞。这样一来,我在学校不大合群。别人不愿和我来往,这使我心里非常难过。既然此路不通,只要另谋出路,于是我埋头读书,学习效率很高,考试成绩总是全班之冠。

爱情和事业无论对哪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摆脱孤独的途径,不过人们总是被不同阶层和时间等客观条件所限制。正如以往环境迫使我撇开对爱的渴望转而去创造各种各样的神灵和大师们一样,现在的环境又把我对事业的追求变成为一种要“打败别人”的角逐。不过我很快就察觉这并没有使我变得讨人喜欢。年龄大一点的学生,特别是男生,一旦发现班级里学习成绩最好竟是个最小的女生,总是耿耿于怀。后来学校出版的毕业生年鉴上,我竟被这些同学描绘成一个“有鬼点子的人”,意思是说我总认为自己能比别人强。不错,我的确是这么想的,也确实能够比别人强。尽管这使我变得更加落落寡合,常常令我痛苦不堪,但却起码使我变得引人注目。人们不得不佩服我。这多少减轻了我的孤独感。

记得有一次上罗马历史课,要由一位同学来背课文,但课文里有一部分说到卢克丽霞^①被奸污一事。女同学都躲躲闪闪,猜想着要轮到谁来讲这种令人害臊的故事。女生们对着教室那边的男同学傻笑着,男同学们都心照不宣。老师自然也明白这笑声的含

① 卢克丽霞,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著作中的人物。——译注

义，她很担心让同学背课文时会出点什么岔子。她决定让我来为她解围了。她认为我可以很好地对付过去，因为她以为我不懂里面的意思，我还太小，不明白两性问题。其实，我和其他同学一样感到害臊，不过我仗着记忆力好，把这段强奸的故事原原本本用课文中文雅的语言背了出来：“塔圭尼^①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卢克丽霞。”这回我可真是引人注目了。在众目睽睽之下，我窘迫万分。同学们之间相互传递着疑惑的目光，想搞清楚我究竟是否理解课文的含义。我没有去理睬这些人，我轻蔑他们。一招儿行不通，我还有另一招儿呢。我现在可非同一般，学习效率颇高。

我们受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提高效率，人们使教育极好地适应了这一目的。通过受教育，我们将变得有能力，有效率，并不是仅仅胜任一项具体工作，而是执着地追求任何可能得到的工作，并且有能力使自己对这项工作得心应手。受教育还有另外一个目的，那就是，消磨时光，直到我们达到一定年岁而去工作。在我们周围这个世界上，生产过程的迅速完善意味着对工人的需求量减少，而那些我们打算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推销员，需要量就更少。因此年轻人最好在学校多念几年书。我中学毕业很早，这样就花了一年时间在德国，半年时间在瑞士学习外语，然后才够上大学的年龄。我先在布林马尔女子学院^②学习了一年，而后毕业于奥伯林学院，最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当研究生，攻读博士学位。我这么做，部分原因是我毕业太早，年岁小，找不到称心的工作。不过我学过的所有课程对于我以后可能从事的工作根本起不到什么作用。我

① 塔圭尼，古罗马历史学家李维著作中的人物。——译注

② 布林马尔女子学院，美国著名女子学院，设在宾夕法尼亚州。
——译注

们谁也不知道这个世界要让我们做些什么(我们把这说成为“我们希望做什么”)。我们只知道自己想在世界上出人头地,这是所有美国人都憧憬的。要出人头地,就得讲求效率。

效率不高,可以装腔作势,借以唬人。装腔作势、哗众取宠甚至可以成为效率的一种表现形式。对有些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形式。在我们这个世界上,目前生产的问题已经变成销售的问题,因此强装门面的能力,对于商人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种经商的需要在影响着我们,的确如此,尽管我们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其实这一切都在学校里表现出来,例如,我们常常用轻松自如、信心十足的样子,使老师们以为我们肚子里颇有货色,而实际上则空空如也。要不然就是说话时专挑那些能最大限度显示自己知识的词语,尽管自己的知识非常浅薄——这些制造假象的本领都是学生们所赞赏的。我很善于玩这种把戏,我觉得只要看一下老师的眼色,就差不多能猜出她想问什么,然后立刻回答出来。有时我还要显示一下我有独立见解,故意答非所问,但要适可而止,以免影响自己的地位。

假如自己是个大草包,还想虚张声势镇住别人,那我们可不大赞同。那简直就是在撒谎。然而我们总是暗中佩服一些机灵鬼,他们上课,从来不用翻书。这些家伙胆大妄为,我们就相形见绌了。(以后我注意到俄国农民很敬佩那些手段高明的小偷。)不过搞点一般的装腔作势的小花招是可以的,这甚至是一种能力。使自己浅薄的知识显得高深——自己的货色很差,要价倒挺高——商人们遵循的这种准则也就是我们的准则。我们把这称之为“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力。”战后的一代人坦率地把这叫做“推销自己”,尽管这种说法有点嘲讽味道,可这种准则仍被认为是很理想的。

学校里的高材生们跨出校门后,大都锋芒外露,如同利剑般咄

咄逼人。他们并没有渊博的学识，但却善于炫耀自己的那点本领；他们没有学点真才实学的热情，但却善于随机应变。他们没有专门技术，因为他们对过早选择专业的做法嗤之以鼻。其实，真正应该嗤之以鼻的倒是我们在这个充满商人气息的社会里看风使舵的坏风气，只要有个漂亮的门面就可以了，对任何事情都用不着了解得太深。甚至在今日，到莫斯科去的美国年轻人还不明白为什么俄国人总要问他们：“你们是搞什么专业的，是化学，采矿，文学，冶金，还是艺术？”我们的教授们总是告诫我们在学习上不要过早地注重实际应用，而应泛泛地学点各种各样的课程。然而我们并没有钻研古老的文化，也没有上好各种各样的课程。诚然，我们也有所专，不过同任何一门课程都无关。我们专的是合理化、个人效率和装腔作势。

同在学习上一样，我在工作中也学到不少本领来提高效率。大多数人都是如此。在西部的大学里，人们都普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半工半读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哪怕只维持部分生活，可以显示出一个人的实际效率，这在将来会在商业界得到认可。这种观点在专门培养富家子女的东部学校里却遭到反对。我在布林马尔女子学院时注意到这一点。但在奥伯林学院和芝加哥大学，人们对学习期间做工并无偏见，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行。女学生往往去教授家干家务活，这并不降低她们的身份。更有点头脑的学生便在假期卖东西。我们没有想到：由于美国生产的机械化程度不断提高，需要有一部分容易替换的零件，我们正在被培养塑造成为类似这样的零件。

在奥伯林学院上学的时候，我作出一项决定，这后来对我一生影响很大。我发现一个人可以很容易做到把主要精力用在学习上，而同时以打零工维持生活，因此我开始蔑视那些一毕业就要用

全部力量去谋生计的人。这些人为了赚钱，经常不惜去做那些他们实际上很厌恶的工作。在我看来，这是没有效率的表现，特别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求学时代也曾经自由地选择学科，想学什么就学什么，而把维持生计看成一件次要事情。为什么他们要用自由来换取受奴役的地位呢？我想这是因为他们不能摆脱开对舒适奢华的物质生活的追求，需要更多的钱财。

因此，我决定使自己超脱于这种物质追求之外，绝不让自己陶醉于舒适的生活。我要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不管是否得到金钱的报酬。如果必要，我可以永远打零工挣钱，上大学时我不就是这么干的吗？有些美国人希望能重新过西部拓荒者追求的那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我建议他们采用我的办法。这使我生活丰富多彩。卡尔顿·比尔斯就是抱着这种信念到墨西哥去的，他宁愿放弃在一所高中当老师的好机会，而到印第安人的村庄去漫游。他对我说：“如今，聪明人不会去做百万富翁，也不会去挨饿……”我所追求的目的不如目前盛行的那种拼命赚钱的目的更符合常规世俗。不过在这两个目的之中，实际上追求的都是个人效率。

从我大学毕业到考取研究生的九个月时间里，我找到一份真正的工作，第一次经历了对个人效率的考验。我被聘请到《前进》周刊当助理编辑，这是芝加哥一份信仰新教徒原教旨主义的刊物。工资不高，但主编向我保证，一旦我有了工作经验，就给我增加薪水。干这行看起来真提供了极好机会，使我走上成为作家或编辑的道路。在此之前，我曾出版了一小本诗集《风暴之歌》。我之所以能当周刊的助理编辑，同这很有关系。这算是对我的承认。《前进》周刊在广告里对我大肆吹捧，简直好象我已经成为世界知名作家。甚至我自己也不认为我竟如他们公开吹捧的那样出色，不过

我认为总有一天我会达到那样的水平。为了使他们对我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信任不落空，我工作时是竭尽全力的。

因此我一直不知疲倦地写作。每期刊物都有我的不少作品。少年儿童版上有我创作的神话故事；妇女版上有我写的培养青年女子道德品质的一些专论，有关于牧师联合会和妇女教会组织的报道，还有好几篇书评，另外还负责两个专栏，一个叫“妇女之窗”，表达一种令人可笑的女权运动的观点，另一个叫“多了解妇女”。为了写这些五花八门的文章，我起了四个笔名。这样做是为了虚张声势，好让读者以为我们的报纸有一大群高级记者和编辑，这一招看起来挺聪明。对于他们的剥削，我倒不大在乎，我巴不得能比其他人都多干点。我认为这是得到升迁的途径。

我还写作大量各式各样的诗歌。有神秘诗，有描写大自然的诗，但更多的是有关芝加哥都市本身的诗，其中包括“城市之光”，“城市战友情”和“城市的呼唤”等，表达人们在城市这个无情的怪物中那种神魂颠倒的感觉和被成千上万人所吞噬时产生的快意。许多人为此而崇拜城市，我也属于这类人。我感觉到这个时代的灵魂所在。我还出版了一本薄薄的诗集《城市之歌》，至今我仍认为这本诗集的写作技巧不错。其中有几首诗后来被选到革命文学作品汇编中去了，不过我可没想过要革命。我表达的只不过是“城市战友情”。除了以上作品，我还写了一个十分蹩脚的短剧本《国王的宫殿》——这是我回大学后创作出来的，描写一位年轻的姑娘令人不可思议的理想主义，她面对这个世界，却拒绝跨入它的大门。

我开始走上成为知名作家之路，想想看，还不到二十岁，就已经有著作出版啦！我没有辜负《前进》周刊对我的信任，恐怕从来还没有人象我这样为他们出了这么大力气。意想不到的，五个月后，他们突然把我解雇了，这使我惊异万分。主编含糊其词地说这

是因为对我的工作不满意。这可真让我难以接受。对这个工作我并不在乎，其实我都有点干腻了，而且我也正在盘算回大学去读研究生。只不过他们此举使我对自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假如我没有写作才能，我就一无所有了。

那位业务经理比主编心肠要好些。在发出解雇通知的最后一个月里，他看到我那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便小声告诉我说：“主编这个老家伙习惯于每年秋天招聘一位新的助理编辑，然后在广告上对这位新手大肆吹捧一番，以招徕订户的冬季续订单。到了三月份订期一过，立即把他推出门外辞掉。这样做既可以省半年的工钱，又可以使每个新手发挥最大力量。不过我告诫过这个老家伙：对你，他可犯了个错误。你写了那么多稿子，节省的稿费超过了你的工资。然而他却一意孤行。你可别告诉那老家伙是我对你讲了这些事情。”

听了这番话，我不能不立即得出结论，这完全是在对青年人进行可怕的摧残——先是设法使你忠心耿耿，拚命工作，然后又把你赶出门，搞得你灰溜溜的。先让你自信心十足，然后又大泼冷水——这简直是最恶毒的手段。这比肉体强奸更残酷。我从来没有想到把这归咎于社会制度，而认为只不过是一个腐烂透顶的老家伙的缺德罢了。而当我知道自己并不是由于工作无能而遭辞退时，心头如释重负。我早就认为自己能写作，现在更清楚了。那位业务经理承认我比以前任何人写得都多。这又使我重新鼓起勇气。不过我也体验到，仅仅写作还难以使我心满意足。写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就老变得心神不定，想干点别的事情。就这样，我有了大学毕业后的第一次工作经历，以后的生活也是这么在不断变化中度过的。

我重回学校了，这一方面是因为读书在我看来是最容易的事

情；另一方面这也能使我在《前进》周刊解除我的工作的情况下“保全面子”。那家周刊的主编每年都摧残一些大学毕业生，那些人如果不能返回学校继续学习，就只好在已经遭到一次解雇的情况下重新找职业了。这个老家伙的作法真让人不寒而栗。可我有解脱的办法。凭我的学习成绩想取得奖学金是容易的，这笔钱至少够交学费了。我要争取拿到研究生学位。攻读学位同找工作一样唾手可得，而且更光彩一些。有了学位，我将来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尽管这是什么样的工作，我还不清楚。

我之所以决定选择哲学作为专业，是因为在奥伯林学院时我曾喜欢哲学课上出现的那种宗教激情，使人觉得好象发现一个无穷的世界。在芝加哥大学，头半年学了逻辑和认识论等哲学课程，枯燥无味，我发觉我已经厌烦了。可我要坚持下去，此刻我开始对自己那种从这个学校跳到另一个学校，又从学校走上工作岗位的作法越来越感到不安。这次我要证明我是能够锲而不舍地完成一件事的。这显露了我的个人效率，甚至还使我丢掉了哗众取宠的习气。哲学博士学位可是检验效率的试金石，有了它，再也不会有人说你是半瓶子醋了。这样我便发奋苦学起来，经常搞得头昏眼花。我苦思冥想一些在我看来同生活毫不相干的新问题。

渐渐地我注意到每位教授都有一种相同的习惯，那就是每次上课时，都要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讲些老生常谈，然后才言归正传，谈到他自己真正信仰的哲学思想。每当这时，教授眼里就会光彩熠熠，说起话来不再谨小慎微，而是滔滔不绝了。此时此刻，我就会感觉到那种在奥伯林曾打动过我的宗教激情。有一位教授讲的是伦理道德，还有一位讲的是社会心理学，而另外一位讲的则是艺术，他认为艺术可以把逻辑产生的分歧统一起来。我还发现，逻辑学使他们分裂为不同的理论，而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在谈

及整个宇宙时，他们每个人都会突然流露出一种激情。无论是哪位教授流露出这种激情，都会引起我的共鸣，我喜爱这种激情。用不了几天，我就会象教授本人一样，开始信仰他的哲学思想。这时教授也会发觉我的眼睛在熠熠发光，他对我改信他的哲学，感到兴奋。可我已经清楚地知道另一位教授讲的东西很可能同他讲的正相反。这种浪费激情的做法被称为是“学习全面看问题”。在实验室证明某些问题时，这种做法是有用的，然而在战场上，这却会把自己置于死地。为了使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起来，我不断地动脑筋思考问题，却避免作出任何能影响命运的最终决定。

与此同时，我在各种各样的零工中也学到了一些较有用处的事情。为了维持学业，我干了足有十几种零活，包括打字，辅导小学生和缝制学校开运动会用的三角彩旗。工作太多，我必须合理安排时间。我的学习任务通常也很繁重，别人上三门课，我却要上四门。一般取得哲学博士学位要三年时间，我只用了两年半。在这期间，我不仅能维持生计，而且还经常住在芝加哥的西赛德地区，坐汽车从那里到学校要走一个小时左右，爸爸在那里从事开辟新住宅区的工作。

我在学习和工作时，都要精打细算，合理安排每一分钟。每天清晨我用最旺盛的精力来学康德的《纯理性批判》或其他难度最大的课程。由于是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学这些课程，我可以比平时少花不少时间。精力不十分充沛时，我就学习一些英语课程，这时候脑筋差一些也不要紧。只有到已经疲倦时，我才回到宿舍去做打字或誊写等工作。而打字累得打不下去时，我就缝制三角彩旗然后去卖。

我把做彩旗的过程合理化了。我每次都一起裁制好多面，装饰时使所有边角料都各尽其用。这样一来，我把成本降低了一半。

我通过分工——先把布料一起剪裁，然后一起画出并剪下旗上用的字母并绷在旗上，最后把它们缝制起来——成本又被降低了。我做旗子的速度快极了，每小时可以挣一元五角钱。我计算，做小旗比其他工作多赚钱，当然做完，要都卖出去才行。正是因为有时可能无法全卖出去，所以我必须同时干点其他活。另一方面，我也发现做旗子速度太快，时间一久，总使我疲惫不堪。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能量”，我决定还是同时干几件不同的工作更好。

就这样，我变得很有个人效率——在任何一个美国人看来，这都是最好的素质。那种办事情要合理化的观念已经渗到我的骨子里了，连我呼吸的空气中都有。在合理化工作方面，我比许多人都强，而且我身体健康，头脑清楚。不过我们所有的人也都多少懂得合理化的重要性，除了那些虚度光阴、浪费青春的人。认真的学生明白浪费的可怕之处。浪费是魔鬼，而效率是上帝。有了效率在这个世界上就能出人头地。我们年轻人从未想到过地球上可能会存在着各种不同的人：有些人崇拜的神同我们崇拜的不一样，有些古老王朝讲的是排场而不是效率，有的贵族世家喜欢的是悠闲安逸而不是工作，还有千百万永远不会合理使用时间的农民。我们同样不可想象的是，世界上还会有其他民族，那里的人想法不一样，决不象我们美国人那样，每个人都永远不停地追逐着，盼望高人一头。我们都在使自己适应战前美国那种谁都想出人头地的风气。这就是我们的世界，过去是这个样子，将来也是这个样子。

我到了研究生学业的最后一年，选择了博士论文的题目——《从社会心理学研究祈祷》。我对这个题目很感兴趣。整整一年时间，我阅读了几百年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并加以分类。我发现我阅读到的所有宗教改革以后的神学著作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认

为宗教不应害怕科学。我从理论上论述了我多年来一直体验到的众神之间的那种差异，并将祷文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美学祷文”，来自基督教神秘主义者和寻求大千世界万事皆空的佛教徒；另一种是“实用祷文”，是人们用来借上帝的名义为自己的目的服务的，从找工作到寻觅精神支柱都可以。我把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祷文归结为人类灵魂的基本需要——一是摆脱绝望境地的需要，这在东方各民族宗教信仰者中更为普遍；二是为保证事业上取得成功需要，这主要表现在西方讲究实用的各个民族身上。我从未想到过正是被压迫的民族才需要摆脱绝望境地；而奴役别人的民族需要的却是上帝保佑他们成功。我的这篇论文后来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我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由于论文的选题十分吸引人，芝加哥大学破例让我参加了由学校哲学和神学系教授们组成的联席答辩会。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孩子在这些成员面前答辩三个小时，可真不是件容易事。我绞尽脑汁应付局面，终于以优异成绩赢得了我的学位。我分析和论证了各种祷文的渊源流派，从人类野蛮时期的偶像崇拜到佛教的祈祷论。在芝加哥大学，得到这种学位的学生中，我是最年轻的。

答辩一结束，我立即离开大教室，抓起一件斗篷就跑到了空旷的校园中，在夜幕之下我躺倒在雪地上。我把脸埋在冰凉晶莹绵软的雪里，触到了埋在雪下面的草坪，然后又仰面朝天翻过身来，给夜空中的繁星送去一个飞吻。“上帝啊！”我在内心里大声叫着，“我一直在论证同你有关的最可笑的事情。我希望你会喜欢刚才结束的那场漂亮的答辩会。”我感到有些惶恐不安，害怕天空的繁星骤然逝去。我为了答辩成功而“不得不”放肆地对待上帝，上帝也许会恼怒吧。我此刻要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连上帝也要骗

骗！

这样，以效率著称的美国大学就把过去在花园中孤独寂寞的小姑娘造就成现在这样一个人。她的父母亲使她变得勇敢无畏、特立独行，然而她仍想做个好人以得到爱。她创造出的那些神灵们使得她去追求各种大师，她崇敬他们，并心甘情愿为他们服务。现在学校又把她铸成一把锋芒初露的利器，能刺向任何目标，却引而不发，待价而沽。她现在可真是身价百倍了，不仅是具有高效率的劳动力，而且还有才思敏捷的头脑和充满激情的灵魂，这一切作为取得资本主义世界里各种高官厚禄的跳板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她能够热情满怀地相信任何一件事情，并引诱你也相信；她也能反驳倒这件事情，怀疑它，然后又重新相信它。她适合于成为一名推销商，卖力地为任何商品鼓吹，或是一位律师、政客，煞有介事地为任何事业辩护，或是一位文人墨客，可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辞藻。她也可以成为社会工作者，清除社会痼疾，却永远也不去了解这些弊端产生的原因，要不然也可以成为通过教授哲学而传播“真理”的老师。通向所有这些工作的大门都向她敞开着。可她从来就不知道自己究竟相信些什么，她很难有个固定不变的想法，哪怕只保持十天也好。

假设这位姑娘说，站在所有这些复杂的表面现象后面的仍然是一位孤独的小姑娘，她不仅热切地想作一个“好人”，得到爱，而且还想懂得“真理”，为之献身，这样，当生命终结的时候，她就不会感到自己是虚度了年华——假设你听到她这样说，一定会哈哈大笑起来吧？因而无论她今后再说什么，你一定会满腹狐疑吧？当工人的有时也会想方设法欺骗你，可没那么容易，而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来说，这可是拿手好戏，不仅骗自己也骗上帝，简直易如反掌。

我既要分析上帝，又要崇拜他，这使我朦胧地感到自己有些表里不一，自相矛盾。不过我正好也有遁辞：“人们正是通过逻辑的矛盾和美学情感的统一来认识现实的！”难道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此刻我只是觉得如释重负，哲学终于“学完”了，我感到大地和天上的星星在不断向我靠近。我躺在雪地上很久了，身体早就开始颤抖起来，刺骨的冰雪犹如清醒剂，把我从答辩会场的闷热中解脱出来。我对哲学没有好感，我钻研了两年半只是为了证明我不是等闲之辈，现在我终于胜利了。我厌恶哲学。时至今日，我见到哲学书籍总是懒得去翻。

我已经二十三岁了，比那些在世界大战中死在战壕里的人还大，也年长于许多别的国家的青年人。无论是那些推翻政府内阁的中国学生，那些因反对希特勒而被处死的德国青年，还是那些进行过十月革命以及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俄国青年，我都比他们年长。人在这个岁数，已过豆蔻年华，正值青春，充满旺盛的爆发力和坚定不移的责任感，能够打碎也能建设各式各样的社会。在美国，这种爆发力并不受到欢迎，因为它可能把现有制度摧毁，所以人们用美妙的梦境来限制它或是把它引导到足球赛中。这些人把这说成是要更长久地保护青年人不受这个粗暴世界的影响。其实倒不如说这是在更长久地保护这个世界不受青年人粗暴要求的影响。

直到二十三岁，我才摆脱开阶级和时代的束缚。在走出花园时，我带有如下特征：

感到孤独并有一种要摆脱孤独的强烈愿望；

以个人高效率为荣并视之为自己生存的权利；

渴望有一个世界，在那里我能进行创造和被人们所需要；

头脑灵活，善于言词，不仅能唬别人，也能唬自己，并可以随心

所欲地为自己暂时创造出各种各样在现实中无法找到的世界。

在创造那些个人小天地时，我被一些含糊不清的、从自己早期宗教思想中产生出来的信念所支配——时而相信自己的情感对世界至关重要，时而又病态地认为自己的情感对任何人来说都微不足道；我相信只要通过矫饰和愿望就可以让别人把我看作一个高尚的人，我还认为不可避免的社会进步能使自己得到拯救。

以上这些就是我的特征和信念。你过去见过它们，今后仍会看到它们。这些特征和信念决定了我的一生。

人们会从自己负责的第一项工作中得到很大的启示——这种启示，远非学校所能比拟。

我在芝加哥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回到了西雅图（我父亲已经搬到那里去了）。我和父亲一起想出了一个主意：举办“了解你的城市”讲习会。我们举办有关风俗习惯的讲座和讨论，结束后，大家便一起去郊游。郊游在当时地处边远的西部地区开始盛行起来，因为刚搬进城市不久的居民们已经开始产生了城市意识。但我本人工作能力受到的第一次严峻的考验，是在纽约儿童福利展览上。这项规模宏大但组织混乱的展览，旨在把城市中影响儿童福利的各种因素一览无余地呈示在人们面前。展览的组织者是位梦想家。展览最初还是由他设想出来的，可他却没有能力将它付诸实现。后来在冗长的改组工作中，有能力的人才被逐渐提拔上了领导职位。我开始时仅扮演着一个无关轻重的角色，后来他们请我担任了管理处的秘书。所谓管理处，其实只有新来的主任和我两个人。

我们负责统管整个展览。结果我们工作得非常出色，在纷繁的事务中我做得有条不紊。

但紧接着事情起了微妙的变化。刚开始时主任逢人总把我介绍为“我的副手”，但后来就称我为“我的秘书”了，最后就是连介绍也免了。我觉得很不舒服。但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寻根究源。一方面这可能是由于主任的妻子对我产生了嫉妒，另一方面很明显则是这位职低位卑的老人对我的成功非常眼红，他由于我而想损害整个展览。

了解了这些原因，我还是不能消解我心头之气。这老头比我聪明吗？当然不。他为什么要用这些不高明的手法来搞垮我呢？我开始担心起我自己的工作能力来。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几个月前，我爱上了一个有妇之夫，我努力克制自己，同他保持距离，我的精神都崩溃了，但受的震动还没有这次大。因为男女之情人皆有之，所以那不过是一次小小的不快罢了。我的工作能力却是我赖以生存的支柱。谁攻击我的工作能力，谁就是想要剥夺我生存的权利。美国失业者正是因为这一点而消蚀了勇气。

我原先曾在拉塞尔·塞奇基金会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结识了伦纳德·艾尔斯。他那亲切而睿智的话语，我一直牢记在心里。但他知道我心境不好，就邀我一起吃午饭。“我教给你怎样防止别人危及你的地位，”他说，“你很聪明，肯定一教就会。不过我想你不会照我说的去做的。”

我听出了他话中蕴藏着激将的意味。“你只管告诉我吧！”我嚷道。

“在每项伟大的工作中，”他慢条斯理地说道，“总有成百上千的人在认真地工作，但也总会有那么一个小人，从中捣蛋。他能力可能不大，但造成的破坏不能低估。一个人一旦知道自己注定会

失败，就会试图伤害成功者来发泄自己的怨恨。他冷眼旁观，研究着整个机构的运行，琢磨着从哪里下手去捣乱。结果他东插一手，西插一手，进行捣乱。而成百上千的认真工作着的人，则由于没有时间仔细研究他的手段，而被弄得无所适从，不能准确地发挥作用，整个机器当然也就运转不灵了。”

“对，太对了！”我嚷道，“完全象你说的一样，但怎样才能制服他呢？”

“你需要做的，”艾尔斯说，“同样是袖手旁观，研究如何操纵，并花些时间，看看他是怎样捣鬼的。这样你就可以用别的办法进行操纵，从而击败他。你比他可聪明多了。”

“但我们的工作不是落空了吗？”我近乎失望地叫道。

“对”，他笑着说道，“工作当然会落空。”

“我可不能那样干，”我嚷道。

“我早就说过你不会那么干的，”他笑了笑，“但现在你就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了。一个组织者首先需要作出的选择之一就是这一点。”

二十五年来我一直记着这些话。艾尔斯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纽约儿童福利展览中他教给我这条规律，后来我就通过这条规律理解了为什么苏维埃俄国存在广泛的捣乱行为。“一个人知道自己注定会失败，就通过伤害成功者来发泄自己的怨恨。”有时人们必须停止工作来铲除破坏者，俄国内战期间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有时人们却又不必斤斤计较，而应该继续从事稍显混乱的工作；有时则应该派一些人专门去查获和制裁破坏者，但这样一来，这些人在生产过程中就很难和大家保持同志式的关系了。但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我们都必须仔细分析、深刻理解自己面临的选择。

在纽约和芝加哥的儿童福利展览中，我是秘书，或者叫副手。在堪萨斯城，我第一次成了主任。我从一开始就在那儿，帮助筹建组织机构。这一次，组织机构是根据民主的形式建立的，我自己的传统和堪萨斯城的传统——西部开拓者的传统——决定了我们采取这一形式。这种民主的形式在纽约展览的组织中没有采用，在芝加哥也仅仅得到部分采用。刚开始时理不出什么头绪，我就组织了许多委员会，分别负责健康、住房、教育、娱乐、童工等一切与儿童有关的领域。我想了解委员会每个成员对生活有何追求，他们最想为本市的儿童做些什么。由于世事繁杂，他们多年来对这些问题一直置之脑后。他们感觉到了这一点后，我就通过照片、图表和模型来表现他们的想法。就这样，大家热情很高，委员会也越干越有劲。很快每个委员会都提出了一个有关儿童的计划，有健康计划、住房计划、教育计划；还有娱乐计划、反对童工计划、母亲补助金计划和最低工资计划等。

一个集体的计划就这样从毫无头绪的现实中产生了，尽管开始时很缓慢，但后来发展得越来越快。接着，我们唤起了整个堪萨斯城来支持它。图表、展品、实际操作、由千百个儿童表演的体操和民间舞蹈，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父母。每星期有十万人怀着改善儿童生活的强烈愿望来参观市内这座最伟大的建筑。城里的政客们对此大为吃惊，他们开始认真考虑我们提出的十几项法律草案、改革和建立新机构的建议。在美国我们称这为“公众舆论的力量”。现在看来，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舆论的实际力量，有多少是有组织的虚张声势在起作用，实在难以估计。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的确迫使一些政治家投票赞成对一些机构拨款及通过几项新的法令。

我处在这一生活的旋涡的中心。我使我们的组织机构能平稳地运行。有时我调一位先生到某个委员会里使他能更融洽地工作；

有时我又帮助一位女士用最有效的词语来表达她很好的想法。就这样，我仿佛摸到了堪萨斯城的脉搏，直到最遥远的郊区。就关心儿童而言，我的脉搏和堪萨斯城的脉搏一起跳动着，而我让大家看到了这根脉搏的跳动。

鲁思·怀特象我一样，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孩子，她主管着“生活水平和最低工资委员会”，已成为我的好朋友。当时的某个晚上，我对她说道，“现在不存在上帝，但将来会有一个。假如你认为上帝是高高在上，永远是神秘莫测的话，那么你就不值得去多想了，因为你永远也不会了解上帝。他置身于尘世之外，最多不过象有朝一日会撞毁地球的彗星一样。我们总有一天会撞上神秘莫测的东西而一起毁灭的，但是我们在安排生活时，从来不考虑彗星。

“可是，如果你认为上帝是普通人所具有的一种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理解并重视每一个人，引导他们进入尽善尽美的境界，那么很明显，现在世界上这样的上帝是不存在的。但世界完全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治理。我们人类会一点一点地造就这种超级思想意识。就象我们在堪萨斯城办展览一样，通过发掘人们的共同愿望，加以组织，使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世界，为之考虑、筹划。到了一定阶段，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思想意识的结合体，它来源于众人，重视众人，并将引导众人的能力去谋求尽善尽美。这样的上帝是值得存在的，但今天还没有这样的上帝。”

就这样我在一九一一年堪萨斯城儿童福利展览上发现了世界。以后我一直用我在第一次负责的工作中得到的体验为依据来观察世界。就在同一个星期里，我发现了社会主义。

贝拉米《回顾》一书，激起过我青春的幻想。在这短暂的幻想中，我第一次了解了社会主义一词。但现在，在堪萨斯城，作为一

个劳动力雇佣者，我又了解了社会主义。帮助我们设计各展览厅和中央庭院的建筑制图员在开幕的那一天挤过蜂拥的人群，过来问我我还需要留他多久……“并不是我想走，但我应该了解一下。我看得出，星期六以后这儿就没有我干的事了。”

“是的，星期六以后是没事可干了，”我回答。实际上他的工作早该结束了，是我多给了他一个星期的时间。开幕时一忙，我就把这给忘了。

当天夜里，我发现我并没有忘记。我们爱驾驶汽车的人知道有所谓转折点的时刻。洪水慢慢汇集在大坝的一侧，神不知鬼不觉地漫过坝顶，汹涌奔向一个新的渠道时，就是这种转折点。那天夜里对我来说就是这种时刻。开幕式使我感到又疲倦又兴奋，我久久不能入睡。而制图员的话又一字不漏地在我耳际回荡。我知道，他有妻子，还有两个小孩，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工作了。我知道他找工作的前景非常黯淡。我，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和他素昧平生，为什么有权剥夺他的生存权利呢？他的妻子和两个幼儿对此可能无可奈何，我虽然是个旁观者，却有话要说。多么可怕现实啊！

不眠之夜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了。我从容冷静地追溯着往事，我终于认清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我不能为他提供工作，我必须“对预算负责”。我们的委员会也不能给他工作，因为展览工作已经就绪。谁能给他一份工作呢？我寻遍每个角落，想给他找份合适的工作——他和每个愿意工作的人都应该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我找遍了全美国，我找遍了全世界，但我找不到，因为这样的工作根本就不存在。整个世界一片混乱，十分可怖，没有一点安全感。人们告诉我的改革方法，没有一个能扭转这种局面。那天夜里我全试过了。唯一能够解救的方法，是创造一个结构完全不同的世

界。在那里，劳动、工作和工资都是公共事务，而一切制约他们的因素也为全民所有；在那里社会组织分配工作，限制一定的劳动时间，照顾好所有的工人、正在学习的孩子和完成了工作的老人。这符合常识，这就是效率，这意味着消灭一切混乱和浪费。我的知识告诉我，这种社会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我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

就这样，我开始谴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我个人身受压迫，而完全是出于资本主义教我的对工作效率的崇拜。我走的这条道路鲜为人知，但必须加以研究，因为以后许多人还会走这条道路的。正如资本主义的社会化大生产造就了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一样，资本主义在它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心中建立起来的效率准则，也会最终导致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谴责。但是，当我走上这条道路的时候，人们对它既没有规划出来，也没有予以承认。

翌日，我匆匆赶到鲁思·怀特处，把我的发现告诉了她。我才了解到她刚从麦迪逊回来，并且在旅途中也发现了同样的道理。她向朋友们叙述了堪萨斯城女工的工作条件。他们责备她道：“你说话的口气真象个社会主义者。”……她心里一怔：才知道自己是个社会主义者。她对朋友说，她的确是这样的人。

后来的几天，我们的那股高兴劲是从来没有过的。我和鲁思发现了人生的追求。我们应该用毕生的精力来促使社会主义的实现。道理是如此简单，但为什么就没有人想到呢？几天的兴奋过去之后，我们开始四处探寻其他社会主义者。只有团结在一起，我们才能改造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堪萨斯城一定还有社会主义者的。但我们只听见一个人讲过社会主义，他就是在堪萨斯城《星报》工作的丹特·巴顿。他以社会主义者著名。不过为了生活，他作了妥协。

我们去找丹特·巴顿，向他打听到哪里才能加入社会主义。他疑惑地打量着我们，细细体味着我们那种年轻人的激情。我仍然记着这决定性的一天。当时，正斜的太阳正将阳光从窗户里透进来，洒在楼房的地板上。“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你们相信阶级斗争？”

说来也叫欧洲人和苏联人难以相信，我们当时茫然地回答道：“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

我上过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平时广泛接触社会，还做了两年的改革工作，然而丹特·巴顿的话却使我不知所云。那时美国的大学生活就是这样，把我们同这些概念完全隔绝开来。即使偶然听过一些关于马克思的传闻，但我的整个学生生活也会使我尽量不重视他，最后把他置之脑后。他们并不反对马克思，只是对他不加理睬。如果说我曾听说过巴黎公社的话，那肯定是在含糊地提到一八七〇年一八七一年法德战争以后动荡岁月的时候。甚至若干年以后，我在俄国听到这一字眼时，还以为他们指的是法国革命呢！不仅仅在学校里，其实在美国整个中产阶级的生活中，人们总是闭口不谈这种知识。也许我在芝加哥西部听说过社会主义，但即便听到过，那也只是在绝缘面上轻轻擦过而已。

丹特·巴顿将阶级斗争的含义告诉了我们。我们当然不能相信。看来阶级斗争太可怕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组织美好世界的办法，我们要对各种身份的人进行宣传。我们想和具有同样想法的人联合起来，共同向世人解释，怎么会有人反对我们呢？如果知道有过更好的生活方式，谁还会想继续生活在腐败的资本主义社会呢？也许一些铁了心的“坏人”和象阻挠纽约组织工作的人那样天生的破坏分子是例外吧。但他们并不难对付。

可是阶级斗争呢？组织工人们去憎恨——甚至去屠杀？象我们

这样的出身和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人，怎么会信奉这些呢？

丹特·巴顿对我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党会接纳我们的。他说，阶级斗争“把许多人拒之门外”。他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政党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阶级斗争应该激烈到何种程度：它只意味着罢工和政治斗争呢，还是意味着武装起义。他越说，我们就越觉得反感。即使最温和的社会主义也意味着斗争，而不仅仅是改组这个世界。

我们做了最后一次尝试，我们问丹特·巴顿社会主义党总部的地址，找上门去——一条偏僻小巷里一间肮脏的房间，那里摆满了痰盂，到处是废纸和灰尘。同我们说话的是一位面色惨白的男子。他坐在办公桌旁，衬衫衣袖上满是污渍，抽着卷烟。这副怪模样，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但是他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一种充满热望、坚持不懈的精神。他白天在一家印刷厂工作，晚上就来这个办公室。显然，他心力交瘁地致力于我们信仰的社会主义。但他看来对我俩和对任何人都不抱多大希望。我们跟他说了我们想要向人进行宣传的简单计划，但他毫无反应。

他彬彬有礼，极为耐心。但他对我们讲了我们所处的地位，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党之外，作为无用的人，是他们推翻的对象。他给我们指定的命运，使我们大为懊丧。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我们可以调查研究，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我们是有工作的成年人，而不是被拒之门外的孩童。虽然这个世界也有缺点，但比起丹特·巴顿设想的那个世界来，还是要好些。

如果我早知道如何去理解阶级斗争的话，我就会看到我工作中的许多经历可能就反映了这一斗争。伦纳德·艾尔斯有一次给了我一点启示。我在路易斯维尔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时，他有一次顺道来看我，给我提出了警告。当我们吃饭吃到一半时，他开始神

秘地说道：

“我给你带来了坏消息——他们已经注意到你在纽约举办的展览了。”

我笑了笑，我听了他的话很高兴。“坏消息”只不过是他在开的一个玩笑罢了。

“一点不假，拉塞尔·塞奇基金会设立了一个调查部，来使全国社会调查标准化。考虑到这些儿童福利展览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兴趣，他们决定把这些展览也包括在内，这样就组成了新的‘调查和展览部’。”

“这个主意倒不错，”我兴奋地说道。“这样我们活动的规模可以更大了。”

“我想你还不明白，”艾尔斯微笑着继续说道，“你把大家都鼓动起来了。你可知道，除了一些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小型委员会外，鲁思·怀特举办的最低工资展览还是第一次公开提倡了妇女最低工资制吗？你们导致了许多混乱——一个城市想要最低工资，另外一个城市想要母亲补助金，而第三个城市不知又会要什么东西。他们对此非常激动。事情正在变得难以控制。你们鼓吹的东西不一定总是正确的。比如说，塞奇基金会就认为，给母亲们的补助金和妇女的最低工资都是不恰当的。”……他又扫了我一眼，想看看我是否理解了他的意思。

“要是能得到一个中央组织的支持，那该有多好啊！”我说道。“我已设法使各城市间互相交流他们的先进想法。我把堪萨斯城人在追求些什么告诉了路易斯维尔的人，有时他们觉得也有相同的追求，但有时他们不够开化，认为不需要那种追求。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好主意。如果有一个中央组织，就能把好主意集中起来，更有效地促进这些主意的实现，并且比我更有权威性。”

伦纳德·艾尔斯向后侧了侧身子，打量着我。“事情并不这么简单，”他说。他的笑容背后隐藏着危险的信号。“他们认为应该告诉当地人他们需要什么。”他的“告诉”一词，显得有点冷峻。

“你无法告诉他们需要什么，”我回答说。“假如你在这些城市工作过，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你可以告诉他们堪萨斯城需要什么，怎么才能得到。你可以告诉他们许多其它地方的情况以及成功的经验。但如果你讲完后他们认为不需要，你最好就此撒手。让他们去追求其他东西。除非他们自己心里明白他们需要什么，否则你前脚走，他们后脚就会把你所说的忘得一干二净。结果是一事无成。因此，应该让他们在展览中选择自己愿意为之奋斗的东西，只要大方向正确，这种办法比纽约方面冥思苦想出来的方法要好得多。”我有生以来首次这么清晰地阐述了我的观点。

“也许这不是最先进的方法，”艾尔斯若有所思地说道。“把健全合适的主意制订成标准方案，散发到各个城市。再由一个中央组织配备以适合各地区实际情况的地区性蓝图。这种宣传的方法要比你们现在采用的方法省好多钱。这将是未来的方法。”

“但这种方法没有生命力，”我忧虑地说道，“地方上的人不会搞出什么名堂的。”

“一点不错，这种形式毫无生气，”他点了点头。“我路过路易斯维尔要告诉你的就是这些。还有……你有机会作为他们的组织成员之一，只要有城市提出申请，他们可以推荐你上那儿。他们也许还会给你一份固定的薪水，比你现在想象的要多。你提供服务，他们会向各城市收钱的。在完成任任务后的一段闲暇时间里，你可以呆在纽约，研究办展览的方法和各地城市需要知道的东西。”

“依附于纽约来压地方城市；而不是依靠我试图反映其利益的地方城市，是不是这样？”我惊叫起来。现在我明白了。伦纳德·艾

尔斯点了点头。他笑着说道，“这就是我到路易斯维尔来想对你说的。”

我经常思索着伦纳德·艾尔斯到路易斯维尔告诉我的这番话中所包含的好意。他这个人，我有话总想跟他讲，但彼此却又算不上是亲密朋友。这是一位年事已高的教育家用自己的才智保卫着一个年轻的生命？还是他早年也曾雄心勃勃，结果却发现自己被捆住了手脚，寸步难行？他当时在塞奇基金会担任要职。后来他从教育家变成了统计学家，又从统计学家变成了银行家——在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算是大名鼎鼎了。但他了解我的个性，所以他才途经路易斯维尔时来警告我，向我说明我所面临的选择。

我长期接受的教育使我从另一种角度考虑问题，否则，我的这次经历本来可以使我得出阶级斗争的结论。但事实上我得出的结论仅仅是——就象我们西部人习以为常的那样——“纽约总是企图掠人之美”，我必须保持独立。我的生活标准使我只需花费我收入的很小一部分就行了，所以即使一段时间内无活可干，我还是可以支撑过来的。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这样我就可以对纽约方面的任何制裁无动于衷了。纽约果然对我下手了，我保持了独立。很难相信我的独立性丝毫没有使展览的生存不受到威胁。越来越多的新兴城市请我去，不是去进行民主规划，而是给它们的一些旧观念赋予美好的新形式。当然我到爱尔兰去也是为此。我此行不是应这个大城市之邀，而是受阿伯丁夫人之请。但就是在美国，我的展览似乎也在失去活力。我想我变得无生气了。西部的民主，开拓性生活所特有的主动精神也正在衰亡。表现这种民主和主动精神的展览也在随之衰亡。当我应聘充当华盛顿儿童局展览专家，设计有关儿童健康的标准展览时，我还以为我保持了独立性呢。我只是模糊地觉得，我是在剩下的两个老板中作出抉择，独立之路已

经是完全走不通了。

那些年，我伴随我的工作，风尘仆仆奔走于各城市之间，甚至还远渡重洋，奔赴都柏林总督的府第（在那里，我写了一本名为“地方自治”的小册子和一首为“爱尔兰志愿军”所作的军歌），最后又回到华盛顿任职。我虽然以儿童福利展览专家著称，但我心中却承受着一阵阵绞痛的袭击，因为我知道我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破灭了。我认识到资本主义是世界上一一种可怕的组织方式，我决心用全部身心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可是社会主义者们却不让我如愿以偿。我安慰自己，我的儿童工作永远有用，因为社会主义城市也必须组织儿童福利工作。我尽量使自己精神振作，想到自己的工作很快会将新的城市组织起来，这肯定也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我还记得，在去爱尔兰途中我在一艘轮船上同一位旅客谈过此事。他露出了惊奇的神色，他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他也不明白一个承蒙阿伯丁夫人、也就是爱尔兰总督夫人邀请去举办健康展览的专家究竟有什么值得欣慰的地方。

我被排斥在我自己发现的一个光明世界之外，感到非常孤独，就象我当年在花园里紫丁香花丛旁感到孤独一样。我被那些垄断社会主义的人用一把燃烧着的利剑拒之门外了！

我失去了 “我的美国”

最后不是我一个人发现了阶级斗争，而是阶级斗争发现了我——就象在本世纪头五十年中，它不断发现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一样。他们眼看着自己的国家，从一个由“自由和平等”的移民组成的充满开拓精神的国家，变成地球上最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西班牙战争所开始的历程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完成了：美国成了主宰世界的银行家，而不再是世界的开拓着了。

曾几何时，一个铜板的甘草浆，被看成是童年时代的享受；劳动者为一天一个美元而工作，却向往着成为百万富翁；成千上万的穷苦人离乡背井，涌过埃利斯岛^①，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接受考验，受到剥削，最后被美国同化。现在，这些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着富饶的自然资源和地球上几乎所有民族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精

① 埃利斯岛，纽约港之一小岛，昔日前往美国之移民的登陆处。——译注

力,地球上效率最高的工业部门一个个地形成了。货物越堆越高,但产生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青年人的理想,从要成为一个边远地区的开拓者,转向渴望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家,就是最没出息也得做个超级推销员。一方面产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就业机会却越来越少。

为开发森林和矿藏的宝藏而进行的斗争,迅速地使拓荒者们结成了各种联盟。这不是那种把我排除在社会主义营垒之外的阶级阵线,而是一种“普通人”和掠夺他们的“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大亨们、铁路大王、木材巨商将公共财富占为己有,而普通公民的权利横遭践踏。普通的西雅图人,想要建设公园、游乐场、游泳胜地,以使我们的城市更适合美国人居住,但是我们发现,湖岸和普吉特海峡海滨的使用权都被吉姆·希尔铁路公司永远霸占了。而被我们称为可恶的“章鱼”的西雅图电力公司,也趁机收取很高的照明和动力用电费,将正在挣扎着的、同其它地区竞争的地方工业活活地扼杀了。

发展中的美国西部的生活充满了类似的斗争。那一时期的通俗小说反映了这种斗争。小说中的主人公英勇无比,不依附于任何势力,充满朝气,有胆有识,用种种合法的(偶尔也用一些不合法的)手段来战胜章鱼——由纽约方面在经济上撑腰的横行霸道的恶棍。结局总是主人公获得胜利,但不知以后他是否也变成了章鱼,对此,小说从来不交待。小说总是圆满结束,就象同一时期的性爱小说一样。

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来到西雅图的,当时欧洲人民正在死亡痛苦中挣扎,但美国却隔岸观火。我父亲比我去得早,他去时我还在芝加哥读最后一年的研究生功课。我的母亲早就去世了。几年中我一直在全国各地组织儿童福利展览。但自从归美国

儿童局和拉塞尔·塞奇基金会领导后，这种展览越来越标准化了，它告诉当地居民应该相信什么。意识到整个社会阶层的生活都被自己组织起来时的那种激动心情，再也体会不到了。一九一五年我在旧金山的巴拿马太平洋展览中心替美国儿童局办了最后一次展览，接着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组织了一次“儿童兴趣”的“展览调查”，展出了孩子们的玩具和动物，还展现出他们的业余爱好。以后我再也不愿回到华盛顿特区去过那种单调的生活了。

由于工作关系，我到了太平洋的东岸，在那里找到了摆脱孤独感的一种新的安慰——与群山作伴。在旧金山，我们经常到塔马尔佩斯山远足。到波特兰后，我又经常和一个名叫马扎马斯的登山爱好者团体一起活动，该组织曾征服过西部森林的荆棘，还爬上了胡德山脉的冰峰。我对新发现的原野充满着激情。我开始寻找越来越难以攀登的山坡，征服一座座山峰。十一月，我组织了第一次冬季攀登胡德山脉的活动，中途不期遇到了暴风雪，差点儿把我们四个人卷走。我们花了一整夜的时间赶紧摸索着下山，那时，整个苍穹没有一点星光，乌云将天空遮得漆黑一片，我们刚离开，暴风雪就扫过了山顶。

我们回到波特兰，其他比我们谨慎的马扎马斯成员责备了我们这种拿生命当儿戏的愚蠢鲁莽行为。“你们此行毫无科学目的，你们去干什么？仅仅是为了创纪录。”我争辩说，我们至少了解了山顶在冬季是积雪还是冰峰，从前谁也不知道。但事实上这不是驱使我登山的原因。我该怎么向他们解释我的欢乐呢？当人的意志战胜了肉体的疲劳痛苦，征服了貌似不可征服的荒凉自然界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我在举办儿童福利展览期间，社会交往非常广泛，我曾把这种社交生活称为“创造上帝”，后来又称为“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但那种生活莫名其妙地离开了我，我又一次陷入了孤独的

境地。现在，我拥抱孤独，称之为自由，就象我们的祖辈艰苦创业时一样。我非常喜欢我青春的力量能征服原始荒野，我可以将大自然令人目眩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我知道，随着年龄的增加或体力的衰弱，我总有一天会失足摔死在山崖或冰川之上，但这只能使我更加迷恋大自然这些茫茫的上帝。以后五年里，这一直是我陶醉的新天地。

对西部山区的热爱，加上我对父亲的孝心，使我决定在西雅图定居下来。在前几年的展览生活中，强烈的独立欲望使我能将我工资的一半存起来，现在数目已相当可观了。我象百折不挠的创业者一样，坚信我想要工作，就一定能找到。同时我也帮我父亲看看家，并参与了西雅图日益沸腾的生活。

我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到西雅图的，这个城市当时被列为进步的城市。公众一直反对代表来自纽约的垄断资本的“反动利益集团”。商界有两个组织。商会由木材和电力等大公司组成，代表着“反动利益集团”。比较年轻和进步的商人组织了一个充满民主气氛的商业俱乐部。他们组织郊游、沙滩集会和烤蛤蜊会餐等活动，同周围的农民交往。他们同这些农民一起，要求市办港口、仓库、电力、公共汽车等行业，以便使农业和独立商业在这些廉价的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兴旺起来。他们受到了同样进步的中央劳工理事会的支持。中央劳工理事会由市内各工会派代表组成，其口号是建立一个工资高、住宅完美的城市。

每次艰巨的竞选斗争，只要真正唤起了公众，总能击败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也许其他城市会安于受一个腐败政府的控制，但我们决不会。政治候选人总是拒绝商会及其喉舌《西雅图时报》的赞助，因为接受这些利益集团的财政捐助无异于走上一条失败的道路。年轻的商人和颇受尊敬的技术工人一起成功地使一家家企业

归市所有。市营电灯公司战胜了电力托拉斯，市营码头的规模也远远超过了私营码头。西雅图成了公有制的乐园，别的城市不断派代表团前来参观。

但是，尽管进步力量取得了胜利，但西雅图电力公司，也就是电力托拉斯，仍然兴旺不衰，还攒了不少钱。人们开始听说，西雅图电力公司乐得把边远地区的照明任务推给市营电灯公司，这项任务耗资很大，因为用户分散在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山区内，但市营电灯公司无法拒绝这项任务。而西雅图电力公司则负责向市中心工业部门提供电力这一有利可图的业务，电费由双方协商而定。市营大码头必须承运农民的易坏易损的产品，还得替货物保险，而私营码头则专门挑拣有利可图的顾客。进步力量经过反复斗争，终于接管了市内街道车辆，但他们发行债券购买市内电车所花的钱，使电车原先的主人发了一大笔财。汽车和公共汽车已开始出现，这些电车的主人们即使继续经营下去，也攒不了这么多钱。但西雅图进步的市民仍在继续斗争，他们说：“为了自由必须始终保持警惕”。他们希望只要保持高度警觉，他们就能找到一些公仆，他们只拿几千美元的薪水，却和拥有几百万美元资产的私营企业一样聪明。我们找到了几个这样的公仆，但起不了什么作用。

进步力量要求我竞选教育委员会的公职。多年来，他们一直希望有一位妇女参加这个委员会，因为二十年来，它一直是由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我们政纲的要点，是将学校建筑广泛地供各类公共会议使用。这项提议，迎合了各种小型俱乐部、会社、合作社组织、自由和激进的协会的要求，他们都希望有个体面又不十分昂贵的集会场所。

由于我刚从美国儿童局工作回来，具有哲学博士学位，并著有两三本书，我作为市里的候选人，很容易就被大家接受了。大学俱

乐部支持“由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妇女去对付白手起家的商界人物”。工会组织则支持“学校应该由教师和母亲们主持，而不是由资本家主持”的口号。我父亲的声望对我帮助也不小。他曾说服牧师联合会用劳工代表替换教会的代表，并支持过地方上的几次罢工。那时学校的选举不受重视，少数市民即使参加了，也是无精打采的。一般总是由委员会通过对教师施加压力来控制选举的。我轻而易举就当选了。

我们进步派人士兴高采烈。二十年来第一次一位妇女被选入了教育委员会，我们击败了特殊利益集团。我们竟然大胆地将一位不受他们欢迎的新人塞进了他们把持的教育委员会，这使他们大为恼火。他们将来要同我较量的。但他们也并不十分担心，我毕竟只是五位委员之一。作为对新成员的礼貌，其他委员让我作些改动以后很容易地通过了关于各类市民集会可以使用学校建筑的决议。有一次我审慎地利用宣传手段，成功地阻止了利用我们的中学招募未到年龄的志愿兵的行动。但除此之外，这个委员会每星期不断打搅我，叫我参加各种拨款计划的投票，而拨款干什么，我却一无所知。他们从来不讨论有关教育的问题，而只是推给校长们了事。教育委员会成员感兴趣的是煤气和取暖设备的合同、在重要地区兴建房屋，以及如何花费公共基金。我参加了他们一年多的会议，甚至还不清楚他们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手脚是否干净。其实他们倒也用不着贪污。兴建公共设施地址决定权对他们来说已经够了。这方面的情报就是金钱。对我来说，这些会议是一生中最枯燥乏味的时刻。关于电器开关和下水道安装，可以花费很长的时间来辩论，但对教育的宗旨和方法却一字不提。

与此同时，在体面绅士很少涉足的耶斯勒公路以外阴湿的低洼地中，新的势力正在默默地形成。庞大的木材托拉斯，通过偷窃

或其它手段，占据了西雅图周围几十万英亩的公地。在战争的刺激下，他们扩大了伐木的规模。粗暴好斗、拚命干活、酗酒狂饮的伐木工人们为获得适当的工作条件开展了斗争，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随着冬天的到来，他们流浪到西雅图便宜的住宿区，成为妓女、雇工老板、拉选票的人和煽动家争取的对象。他们有自己的活动大厅，但经常遭到警察的袭击。那里时而发出争取正义的声嘶力竭的吼叫声，时而举办社交晚会。就是在那里，我们这些西雅图体面的进步人士第一次见到了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

这些新来的人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他们是流动劳力，没有合法的选举权。这些漂流不定的人口只有在政客们的指使下或用非法手段花钱收买他们的选票时，才会参加选举。于是他们成了“对真正市民的威胁”。但他们却是真正的美国人，大多数定居的市民还比不上他们呢。他们直接继承了富有斗争性的开拓者的事业。象先辈们一样，他们膂力过人、气吞山河，对自己伐木筑路、开垦人迹罕至的荒野的力量引以为豪。他们现在的壮举，却不再是为了在边远地区建立自己的家，而是奉铁路和木材巨头的命令干的。张张选票包含着多少辛辣的讽刺啊：他们“为整个世界安家立舍，自己却无家可归。”他们把自己的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大厅称为“无家可归者之家。”但即使他们对剥削者的仇恨，也染有屈尊俯就的色彩，完全是劳动者对怪吝精明的城市人的鄙视，虽然他们对这种城市习气毫无办法。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还是保罗·布尼安，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伐木工人，而不是工业家或银行家。他们鄙视后两种人。他们没有欧洲农奴的传统，也没有这种传统所产生的认为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这种观念。

但他们进行着阶级斗争，因为本来他们是自由的并能得到更大的自由，但现在却在慢慢地、不可思议地、无可挽回地变成奴隶。

他们把这种斗争也带进了西雅图市内。这种斗争，已不再是工会想通过增加工资分享一点企业的利润而进行的缓慢的讨价还价，而是为争取基本的人权而进行的严峻、血腥的斗争。它采用了各时代工人阶级进行斗争的思想和语言，如工团主义，“国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等，同时也广泛地继承了美国拓荒者的传统，他们对艰苦和死亡满不在乎，崇拜强壮的体力；他们强调个人，讨厌纪律的约束，但又善于共同奋斗；他们沉默寡言，而又非常重感情。

这些美国的传统，使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在战前的西部能经常冲破阶级藩篱，赢得倡导民主和言论自由的各阶层人士的支持。在出产木材的小镇中，由于居民们主要依附于木材公司，所以他们把产业工人当作阶级敌人而进行无情的斗争。但在象西雅图这样的大商业城市中，有许多小商人，他们必须依靠伐木工人干活才能经营，同时又受到大商业的压迫。在这种城市里，战斗的伐木工人拥有支持者。他们利用言论自由进行斗争。他们蔑视警察们对他们采取的非法行动，他们主动踏进监狱的门，使地方监狱水泄不通，人满为患。由于要审理的案子太多，地方法律机器陷于瘫痪。大多数普通市民还没有忘记拓荒者的艰苦生活和勇气，他们对这种行动颇为赞赏。

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迫切需要木材，国内生活费用也不断上升，西雅图周围森林里的斗争也随之加剧了。突然，附近二十英里远的一个港湾传来了“埃弗雷特大屠杀”的消息。地方警察屡次蛮横驱赶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工人们用自由言论的斗争形式加以回击。附近城市和伐木营地的几十名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成员赶到埃弗雷特，到大街小巷游说，准备受拘捕。警察用棍棒和短枪将他们打了出来。他们立即在引人注目的埃弗雷特广场举行了

集会，西雅图的工人们也驾驶着一艘名叫维罗纳号的船一同赶去，因为所有公路和铁路都被埃弗雷特市当局派人巡逻。在码头上他们遭到了武装人员的拦阻，而一些工人手中也有武器，因而导致了一场冲突，结果码头上和维罗纳号轮船甲板上抛下了许多工人的尸体。维罗纳号撤回到西雅图，全体乘员遭到了拘留和审讯。

美国报界对此颇感兴趣；我为《纽约晚邮报》采访了审讯过程。我无意介入斗争的任何一方，我只是客观地发新闻。这则报道使那些相信新闻客观公正的美国老百姓感到吃惊，因为我写道，每一次都是警察和私人木场的警卫首先殴打和枪击在街上发表演说的工人。木场警卫首先对维罗纳号轮船开枪，并在其驶离时继续射击，但他们中却没有一个受到拘留。谁也没有看见在法庭上因谋杀罪受审的工人有过枪，最多不过是船上某个煽动者开的火。《纽约晚邮报》发表了我描写太平洋东岸这种赤裸裸的不公正审讯的文章，西雅图进步人士从中看出了利益集团的卑鄙，变得更加进步了。

我早已被教育委员会保守会员称为激进分子了。在违背商人集团意志的情况下我被选入教育委员会、我在《晚邮报》上发表关于埃弗雷特审讯的文章、我对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总部频繁的访问和对它的领导人的支持，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他们对我罗织的罪名。我们进步人士对“激进”这个词非常憎恶，我们并不想连根刨掉什么东西，我们只是在继承美国好的传统，使我们的国家不断进步，不断完善——利益集团攻击的，正是这种传统。

到1916年年底，事情已经非常明显，各种强大的势力正在把美国推向欧洲的战壕。但“我们美国的”的先驱者留下的传统是反对“把自己卷入的联盟”中去。同这种消极的反战情绪相辅相成的，是我们有一种积极的坚定信念，认为所有国家、所有民族中最优

秀、最有朝气的人都已来到美国寻求自由。我们必须为全世界维护自由和民主。上帝,或者说自然界,或者说命运,将各民族探索的人们带到世界上最后一个自由的国度,最后一个边疆。我们这里无比富有,人民繁荣自由。除非我们同压迫者决一死战,否则整个世界末日将至。整个世界注定要被利益集团吞噬,他们已经吞下了整个欧洲,将它变成了地狱,他们在纽约通过木材托拉斯和西雅图电力公司向我们开刀。而我们的斗争目的非常明确——保证美国不介入战争。我投身到反备战同盟、反军国主义协会和紧急和平联合会的活动中去。和平主义者、自由派、激进派和进步人士利用这些变化迅速、数目众多的机构,竭力阻止美国走向战争。这些组织在东部、纽约、华盛顿、费城等地相继冒了出来。它们的领导人形形色色,也许还相互冲突:有社会主义者、资产阶级,还有各种色彩的和平主义者。我们太平洋沿岸各州从来不分领导派别,全都走到一起来了,其中有好多反对战争的派别。我们每星期都在一个餐厅里聚会一次,有时还兴致勃勃地去参加星期天的群众集会。对于来自任何全国性团体的演讲者、鼓动会和小册子,我们是一概欢迎的。

我们之间在方法上存在的唯一争议是,究竟我们的集会要不要挂美国国旗。一些社会主义者反对“崇敬国旗”,一些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也把国旗斥之为“暴发户的旗帜”。我们对他们说,别太沮丧了。国旗是我们大家的旗帜,是地球上所有被压迫者众望之所归。暴发户想窃取它,我们不能让他们得逞。美国有些地方情况很糟,但只是暂时的。美国确有坏人,但他们终究要被推翻。美国现在也有利益集团,但全体自由公民正在警惕地同他们作斗争。“我们的美国”是一个民主共和国,由它的公民的意愿统治着。它是一个自由平等的国度,是全世界的先驱者的国度。

我们的观点赢得了赞同，和平主义者的群众集会上飘扬起了国旗。我们的美国不会走向战争，它主张和平。我们的美国在“他使我们不介入战争”的口号下，选举了威尔逊当我们的总统。

威尔逊就任后，战争更迫在眉睫，我们决定“给反战的总统助一臂之力”。我们在全国进行了非正式的民意测验。我在西雅图也组织了一次。我们派数以百计的人走上街头，进入商店和工厂，向公众递送征询意见：“你是否坚决反对在任何条件下参加欧洲战争？百分之九十五的人作出了肯定的回答。我每天把这种民意测验的结果随时报告国会。其它城市进行着同样的活动。我们了解到了人民的意志。我们知道国会也了解到了人民的意志。

尽管人民反对战争，可是利欲熏心者却盼望战争。美国终于抛下了我们，同欧洲一起走向了战争。战争在迫近，我们的反战备同盟、美国反军国主义协会和紧急和平联合会的地方组织日趋衰弱。许多颇受尊敬的会员转而做起了战争准备工作。妇女俱乐部的主任“转而支持总统”；家长教师组织的头头，曾在国旗飘扬的群众集会上勇敢地发表维护和平的演说，现在也干别的事情去了。每星期一次的聚餐会，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少。宣战以后我们还开过一次会，我仍然是这个组织的秘书。我看着空空的桌子，心里真不是滋味。“只剩下了几个社会主义者和一些无主见的人，”我开口说道，“有名望的人都远走高飞了，剩下的人什么事也干不了。”

我们把这个会议改组为反征兵同盟，并决定同东部出现的同名组织取得联系。我要他们另选一个秘书。“反征兵是男人的斗争，”我说，“我很快就要去山里夏令营了，我不会老呆在城里。”

其实是因为我的心都碎了，勇气也已泯灭了，所以我才离去。生活中任何事，包括我母亲之死，都没有象此事这样动摇过我灵魂的基础。斗争失败了，永远地失败了。“我们的美国”死了。利欲熏心

者、军国主义者和利益集团践踏了它，并让它听从他们的使唤。我不能象某些人那样，以“这是一场保卫世界民主的战争”自欺。我看见，宣战之日，正是民主被扼杀之时。人民需要和平。利欲熏心者想要战争——他们如愿以偿了。我生活的基础有着很大的错误。我不知道如何重新起步。

象一头负了伤的野兽，我躲进了深山。象旧时代的先驱们一样，我因不能正视人类社会的问题而逃进了较为原始的荒野。周复一周，我在雷尼尔高高的小坡上忙着打点行装、准备日用必需品、做饭、爬山。每天，我带着大家在冰川上行进八到十个小时。我们拿不到什么报纸，来了我也不看。对战争我避而不谈。我陶醉于森林、山岩、冰川。我二十四小时不停地爬山，使自己精疲力尽。青春、信仰、“我们的美国”，俱往矣！我不能正视我的世界成为一堆瓦砾。

第六章

来自莫斯科的信号

穿过战火纷飞的欧洲战线，横过两大洋和两大洲，我们在美国最北部的林区，在制造军舰的西雅图造船厂，开始看到来自莫斯科的信号，我们获得这些信号，并使它们适应当地的需要。透过腥风血雨的战场，全世界的人们都懂得了我们这个行星是个统一的整体。没有一块土地可以幸免战祸，没有一个港口不卷入这场残酷斗争——在中国，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屿，情况不比战壕纵横的欧洲好多少。但如果世界大战打破了我们美国人所迷恋的得天独厚、与世隔绝的和平环境，那么我们就得到了报偿；我们也成了世界革命的共同继承人。

沙皇的垮台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注意。我之所以苦恼，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爱国者抓住这件事来为美国参战辩护。我离俄国人聚居的地方太远了，无法看到革命者蜂涌彼得格勒的情景，也难以理解这件事的重要性。我所获得的革命的第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会议来讨论以什么样的条件“建立没有割地和赔款

的民主的和平”。

我在冰川边的山区营地得到了这个消息。快到夏末时，营地不定期地出版了一张新报纸——《西雅图号角日报》。这张四版报纸文字粗糙，印刷很差，但它却说出了我对战争的看法。它使用尖刻的言词和蹩脚的英语，把达官贵人不再谈论的事情讲了出来。它嘲笑威尔逊的口号，嘲笑所谓“用战争来结束战争”、“建立一个可以确保民主的世界”等口号，它说，美国是为了保护盟国的贷款和让战争投机商大发横财而参战的。它要求对利润征税来补偿征兵的开支。它发表了来自两大洋彼岸正在发生革命的那个国家给斯德哥尔摩会议的呼吁书。呼吁书说：“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结束这场战争！”

《西雅图号角日报》登载的这些粗糙的红色文字，却使我心灵的创伤得到了安慰。全世界工人联合起来努力结束战争的呼吁，使我有必要从山区返回城市。这再一次给我提供了在人们中活动的场所。夏令营季节一结束，我就找到了《号角日报社》，表示愿意作该报的一名撰稿人。以后，我每天为报纸写的报道几乎占了整整一个版面。我报道了法庭上关于“阶级斗争”的审判。当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会员，由于要求得到美国人的正当权利而被关进监狱时，我就已经使用这样的说法了。我报道了市政厅的贪污受贿、地方监狱的状况、当地的劳工运动以及新成立的伐木工人军团。这个军团的建立是为了破坏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我还报道了我们所能得到的各种国内、国际新闻。由于没有电报通讯设施，我们只能搜集各城市中的社会主义报刊，照抄或改写其中的新闻和特写。由于人力不足，我们每天要工作十四小时至十六小时。我绞尽脑汁，突击写出社论、特写和讽刺诗，而这些是在没有取暖设备的办公室里，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冻得直哆嗦的

情况下写成的。象这样的工作条件，我一生中还经历过两次：一次是在苏俄的头五个星期，另一次是在我创办《莫斯科新闻》的头五个星期。说来奇怪，人们有时会把一年的生活和工作压缩到几个星期来完成。

编辑部里还有两位专职人员：一位是莉娜·莫罗·刘易斯，她是社会主义党党员；另一位是莫里特曾，他大概是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在幕后有个委员会设法为我们的生活筹措资金。我认为，我们决不能充当某个组织的官方喉舌。我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之所以能维持下去，主要是靠我们的印刷老板亨利·皮戈特的友好帮助。我们得到的全部收入都给了他，但为我们支出的帐单却越来越多，他的工厂由于印刷的报纸而终于倒闭了。有时，莉娜想修改我写的社论。她说我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她说得很对，我确实没有想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既然意识到这一点，我就让她修改我的社论了。通常我们当中谁也没有时间给别人的稿件编辑加工。我们观察事物，然后把我们的想法写出来。我们只有一个方针：利用一切材料，特别是战争引起的矛盾，来揭露和谴责那些发动战争并仍在散布谎言的资本家。

我们或多或少想把这些抨击限制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但我们并不十分担心。在美国参战的头几个月里，人们几乎想说什么都可以。言论自由的传统还没有立即遭到压制。西雅图是一个拥有大造船厂的城市。由于军事定货很多，造船业迅速扩展起来。这个城市的工会力量很强，这些工会也在发展壮大，在金属行业中，每周增加的会员竟数以百计。华盛顿政府并不想同西雅图的造船厂工人发生纠纷。《号角日报》在造船厂是深受欢迎的。因此，虽然当局偶尔也找它的麻烦，但却不敢公开禁止它发行。后来也发生过报纸无法出版的情况，那是由于有组织的流氓破坏印刷厂而

造成的。

我们的报纸用大部分篇幅报道地方新闻，但我们满怀希望地关注着远隔重洋的俄国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连资本主义报刊也承认，那里的工人已经憎恶战争了。我们从歪曲了的新闻电讯中获得消息，在偶然碰到的社会主义者或俄国人的帮助下，猜测到了这些消息背后的真正含义。我们很难得到真实的消息，在西雅图有分散活动的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并没有组成政党。没有人告诉我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之间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听说克伦斯基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后来，我们又听说列宁是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很久以后，一个俄国布尔什维克对我说，西雅图《号角日报》是美国第一家衷心为新生生的工人国家而欢呼的报纸。我们是出于纯朴的天真这样做的，而东部各州较老一些的社会主义报刊却在理论的是非上争论不休。我们不懂理论，我们只知道，在地球的那一边，俄国工人已经利用战争夺取政权，并推翻了沙皇和资产阶级，而这正是全世界的工人应当做的。

十月革命后，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来的一条船抵达这里，看来那个城市的工人并不比我们知道得多。这艘船是在克伦斯基统治的时候离开俄国，而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时候来到我们港口的。不知怎么地，在船上选出了一个工人苏维埃，船长在其领导下履行职责。这件事引起了西雅图港口当局的一阵恐慌。把它作为一艘正常管理的轮船来接待，显然是不可能的。人们也不能用哗变罪来逮捕水手，因为合法的船长仍在坚守岗位。这艘船终于被允许卸货，但港口布置了警卫队，不让船员上岸。

海员们设法同码头工人商量好逃避检查。西雅图的全体工人，由于受到《号角日报》的鼓动，渴望得到来自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消息。船上的一名水手被偷偷带进城。我们在一位国际产业工人

联合会成员的家里，通过一位业余翻译同他谈了一整夜。这位水手从来没有听说过克伦斯基，也很少听说过列宁。他谈到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苏维埃”。我们的翻译把“苏维埃”译成“理事会”。而我们不明白它是什么样的理事会。我们所获消息甚少，颇感失望，但没有流露出这种情绪；用我们的激动表情掩饰了过去。我平生第一次听到了革命丧礼进行曲，那支曲子是午夜后在一架小钢琴上弹奏的。以后，我在饥荒遍野的萨马拉^①，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在狂风席卷的蒙古平原，一再听到这首进行曲；我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盛大代表大会上听到由交响乐队演奏的这支曲子，那时，代表们肃立，低头默哀。我就这艘船在我们港口所受到的接待情况，在《号角日报》上写了一首很长的讽刺诗。

与此同时，西雅图的阶级阵线围绕着个人的斗争正在形成。在美国宣战以后，我所参加的最近一次会议上受权散发的一张反征兵的传单，竟导致四人被捕，其中最著名的是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前主席休利特·韦尔斯，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刚从山区营地回来，他就来看我（他获保释）。他要求我提供前美国反军国主义协会成员的名字，我曾担任这个组织的秘书，仍保存着它的成员名单。他解释说，起诉人正在根据密探和无赖提供的所谓证据来控告他。这些人企图证明这些传单是由“德国人资助”印刷的。而被告则想维护他们作为美国公民反对卷入欧洲事务和征兵的权利。他们要把几个月前公开赞同他们观点的许多美国知名人士开列出一个名单。

我说：“如果这是你们的辩护方法，你们就应该请我作证人。我可以帮助你们不仅同西雅图的名流，而且同美国东部的著名人士

^① 苏联地名，今改称古比雪夫。——译注

联系起来。我会去作证，我们是在餐馆召开的那次会议上决定印发那张传单的，传单是由美国著名人士资助的，而资金是由我亲自经手的。”

韦尔斯不想难为我，他比我更清楚这样做会给我个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同被告的律师范德维尔进行了商议。他也对我的未来表示关切。“年轻的女士，”他微笑着警告说，“我对你的忠告是，你需要请一名监护人，使你从这件事中解脱出来。但作为被告的律师，我认为，你给我们提供了打赢这场官司的最好机会。”

于是，本市教育委员会的这位女委员在审讯“叛国案”时站在证人席上作了证，西雅图的报纸在头版位置用八栏篇幅，醒目地刊登了这条消息。范德维尔谋划得很好。他让起诉人提供警察法庭坐探的所谓证据，使人们看到这是在密室里策划的阴谋。然后，出乎人们意料，他请西雅图受人尊敬的妇女中一位最有名望的妇女出来，作为他的第一个证人。这位妇女是本市教育委员会的委员。她同母亲们、孩子们和进步人士都有联系。而我同《西雅图号角日报》的关系，除了工人读者外，别人还不大知道。

这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年轻妇女说：“是的，我们印刷了这张传单！除了文字粗糙，它有什么不对呢？难道你们由于它有语法错误而逮捕人吗？我本来可以把它写得好一些，但我只是提供印刷费。我们都这么做了。有哪些人呢？有美国反军国主义协会，有协会在东部的成员简·亚当斯、莉莲·沃尔德以及所有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憎恶这场战争，认为战争是违反美国利益的。那张传单哪一点犯了法呢？传单不是在征兵法通过以前印刷的吗？当时，全国难道不是有十分之九的人认为征兵是违反美国传统的吗？即使不是这样，谁能阻止生来就自由的美国人反对一条不平等的法律呢？”……审讯宣告结束，因为陪审团意见不一致，只能悬而不决。

在法庭上这样的冒犯只能偶而为之，因为这是严重损害社会地位的行为。一个人只能这样干一次。在这以后，我成了西雅图最有名的妇女，而不再是最受人尊敬的妇女之一了。

对于被告来说，我的证词毕竟没有起多大作用。地方检察官在几个月后再次审讯了他们，那时我们手中不再掌握出其不意的武器了。在第二次审讯中，这位检察官轻而易举地给他们定了罪，那些社会主义者就被关进监狱。第一次审讯的真正后果是，它起了鼓动作用，并引起了我个人地位的变化。商会的政客们则抓住机会，动用罢免权，要把我清除出教育委员会。

罢免权是进步分子用以推行民主的武器，旨在促使官员们对公众负责。而现在它却被反动分子在西雅图首先使用了。他们使用它时不惜违犯法律，因为他们出钱雇用了一些人来散发请愿书。但是，最初他们征集到的签名寥寥无几，差一点使这次罢免请愿夭折掉。我的一位朋友经过位于一条有名大街上的罢免委员会总部时，一位已站在那里观看布告的妇女向他发问：“他们为什么要罢免她呢？她做了什么错事？”……“她反对战争，”我的朋友说……“天啊！谁不反对战争呢？”这位妇女咕哝着走开了。在西雅图，即使在美国参加协约国行列七个月以后，反战仍是深得人心的。

我自己的失误使罢免一事死灰复燃了。我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者路易丝·奥利夫里奥“交朋友”，她因在士兵中散发煽动性传单而被捕。她是一位富有想象力的人，对她来说，战争决不是多少部队的兵力调动，而只能是活生生地造成血肉横飞、肝脑涂地的悲剧。她在心灵深处听到了每个被害者的惨叫声，她无比憎恨战争。然而，她的行为完全是徒劳的。她在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办公室当打字员，她用自己所得的微薄工资去购买纸张和支付邮资。她收集了各个时代圣哲伟大的反战言论，他们是托尔斯泰、林肯、索

罗,还有《圣经》。她把这些言论油印出来,并寄给了应征入伍的士兵。油印印得非常糟,人们很难看清楚。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传单影响了任何一个应征入伍的士兵对国家的忠诚。

路易丝·奥利夫里奥拒绝请律师为她辩护。她在庄严的西雅图陪审团面前宣称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她象飞蛾扑火那样,自投监狱。我们《号角日报》无能为力,什么也阻止不了她采取这种态度。她要求我在法庭上坐在她旁边,这样中午和晚上审讯休息时她能同我友好地交谈,来缓和一下美国司法机关那种令人窒息的气氛。我去了。报纸用八栏大字标题刊登消息说,已经被要求罢免的那位学校女监督员,同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交了朋友。对此,我既有点出乎意料,又不是毫无思想准备的。

那奄奄一息的罢免之风很快重新刮了起来。美国军队已经在法国的战壕里作战了,西雅图的气氛也改变了。以前支持我的人转而在要求罢免我的名单上签了字。但同时又有新的力量站出来,开始作为一个阶级出来讲话了。这股罢免风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在一位邻居同我谈话以前,我还没有来得及分析这种新的政治组合。

“你所有的老朋友都在骂你,”他说。“妇女俱乐部联合会已站出来反对你,还有家长教师联合会、大学妇女俱乐部和市政协会也反对你。牧师联合会不想讨论这个问题,可你知道他们也是反对你的。还会有什么人站在你一边呢?”

“噢,有的,”我急切地说,“我在这个城市里得到许多最大的组织的支持。拥有七千多会员的锅炉制造工人联合会正在热情地支持我。铁匠、码头工人、机械工人、电工,还有其他许多人也是这样。整个金属业理事会大概很快要通过一项支持我的决议,尽管这是违反该会的章程的,因为其章程规定不许参加政治活动。甚至

从来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建筑业理事会，也一直在鼓励我。我可以依靠这些组织中的大多数。我们确有获胜的可能。”

他说：“竟有这么多莽汉支持象你这样一个女子！”

我默默地回想着他的话。从他同我告别的安妮女王山顶上，我凝视着西雅图连绵的山丘上闪烁的灯光。我回忆起在罢免运动开展几个星期以来遇见的成百上千的新同志，那些来自锻工车间、铸工车间和造船厂的支持我的工人群众。我并不十分在乎我被罢免的后果。我讨厌教育委员会的那些会议。我为能同群众并肩战斗而高兴。不久，我才真正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同市政协会和商业俱乐部一起支持进步候选人的中央劳工理事会，已经不再是为劳工说话的唯一代言者了。造船厂由于战争而扩建了的有成千上万的新会员加入到金属业的强大工会中来。他们是新会员、先锋队，其中有些人是以前的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他们所有的人再也不能忍受过去的清规戒律了。

西雅图《号角日报》以它坦率、粗犷的文风成了他们的喉舌。他们憎恶战时的镇压行动。由于没有罢工的自由，也不举行选举，他们没有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意见。

突然间，他们得到了一个机会。文化教育界的一位年轻妇女，由于维护工人言论自由的权利，竟遭到了利欲熏心者的攻击。这引起了拓荒者对自由的扼杀者的愤慨。这也激起了无家可归的西部征服者保护一位“正派的女战友”的同情心。这些激情与造船厂不断高涨的阶级感情交融在一起了。我们利用这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地，打进了对旧规章不能容忍的新会员的组织。于是，铁匠、机械工人、码头工人、锅炉制造工人等组织，不顾理事会惯例，相继挺身而出，在这个政治问题上展开了斗争。

那次选举在西雅图显示并帮助建立了新的政治阵容。以往是

“进步分子”和“利益集团”之间进行斗争，进步分子总是在政府机关占优势，而利益集团则在工业界保住阵地；而这次则是“良民”同“赤色分子”进行一场恶战。那些良民提出争论的问题，并确定选举日期，他们把罢免问题同定期的市议会选举联系在一起，企业获得更大的胜利。除西雅图《号角日报》以外，三个月来没有一家报纸刊登过我们方面的言论，但是当选举结果揭晓时，那些本想以十比一的优势战胜“一小撮卖国贼”的“良民”们，在总数为八万五千张选票中仅获得大约两千张票的微弱多数。事实上，他们在市议会选举中败给了那些机智地准备了一份整个候选人名单的“赤色分子”，而那些“爱国者们”却全力以赴地集中注意于罢免一事和市长人选问题上。“爱国者们”一下子哑口无言了；他们焦虑不安起来。而我们则在中央劳工理事会庆祝我们的“胜利的失败”。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西雅图选举中，最初的阶级阵线却是围绕着一位并不信奉阶级斗争的女子而形成的。在这场斗争中，引起报界注意的是对我的罢免问题，而不是市长和市议会成员的选举。罢免问题明显地引起了阶级对立。在以后的多年中，西雅图的选举把这个城市分成两派：一派是“良民和爱国者”，另一派是“赤色分子、亲德分子和该死的布尔什维克”。而“赤色分子”通常获得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四十五的选票。我们自豪地认识到，如果新来的造船厂的工人都有选举权的话，我们在这个城市就会拥有事实上的多数。

西雅图《号角日报》在靠借债和亨利·皮戈特印刷厂的帮助下维持了九个月以后，终于停刊了，因为承印它的印刷厂也被一帮“爱国者”捣毁了。很快取而代之的是西雅图《工会纪事报》，这是一份由市工会所拥有和控制的报纸，影响很大。它比《号角日报》更受人尊重，在关于战争问题的讨论中也较为克制。它对国际产

业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和无政府主义者保持一定距离。它维护他们的“言论自由的权利”，但“不支持他们所有的观点”。它比《号角日报》影响大得多，因为它不仅得到造船厂激进分子的支持，而且还赢得了市联合工会的支持，联合工会以自己能成为拥有一份日报的美国第一个地方工会而自豪。对于市政府和遥远的美国劳工联合会来说，联合工会太强大了，因此不能小看它们。我们的主编哈里·奥尔特，多年来一直是个社会主义者。虽然惬意的工作和舒适的家庭已经削弱了这个年轻人的斗争性，但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解释仍比其他年轻的热心人精辟得多。《号角日报》靠借债度日，工作人员没有报酬，而《工会纪事报》则是一份能支付固定工资的资金雄厚的报纸。

我在这份新报纸编辑部里找到了工作，担任特写编辑。关于革命的消息大部分是由我负责处理的，因为这些消息很少是通过电报传来的。它们是由过路的演讲者和偷越国境的人所提供的，是从一封封信中搜集到的，是从小册子里翻译过来的，或是从飘洋过海传到我们这里的非法新闻简报中挑选出来的。尽管我们同苏俄相隔万里，但我们刊登的关于苏俄的消息甚至比东部社会主义报纸报道的还要多。因此，我们不时遭到年龄较大的工会会员的反对。他们指责说，我们太热心于“那些布尔什维克”了，而不怎么注意木工和油漆工的合法问题。但是，我们最热心的读者是造船厂工人，而他们很想知道“俄国的事情”。我们不大了解俄国革命的理论基础是什么，我们只是心甘情愿地为已取得政权的无产者欢呼。我们这份报纸也许是在美国共产党成立以前的时期里美国唯一的一贯亲苏的报纸。然而，我们的亲苏主要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对它的理解。

好几个月之后，我们突然从一位最伟大的人物那里获得了消

息。列宁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作了关于组织政权所面临的任务的讲话。这个讲话冲破层层封锁传到了纽约，接着由兰德社会科学学院的亚历山大·特拉顿伯格翻译出版，并附有序言和注释。在东部各州，这本小册子发行量不大。兰德学院被司法部弄得焦头烂额，而社会主义者则受到严密的监视。此外，这本小册子以袖珍版形式出版，是准备给学习社会主义理论的学生们阅读的。

我们在西雅图得到了这本小册子后，立即把它复印，在工人中广泛散发。我们摒弃了特拉顿伯格所写的故弄玄虚的序言，他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及一些无关紧要的人物的阐述是很难懂的。我们插进了我们自己写的序言。这篇序言是我天真而冒昧地写成的。它生动通俗地解释说，这个文件“叙述了工人阶级当权的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因此，所有想掌权的工人都应该阅读它。我还在这个文件的每一节上面加了小标题和内容提要，这样，习惯于阅读报纸标题的工人，就能很快理解每一节的中心意思了。

工人们列宁的这本小册子爱不释手，他们渴望知道俄国工人是怎样管理新诞生的国家的。我们发行了两万册，它们很快在西雅图和西北地区的几个城市被抢购一空。不列颠哥伦比亚的温哥华的工人组织选用我写的序言和提要，又复印了两万册在加拿大发行。这些小册子又从温哥华传到温尼伯。一时，在西雅图街道的小汽车和渡轮上，成百上千的人在看这些小册子，造船厂工人在上班的路上读着这些小册子。西雅图的商人们，对这一现象火冒三丈。事情十分清楚，那些工人正在如饥似渴地认真探索如何组织他们未来的政权。

西雅图的工人已经在谈论“工人政权”了，认为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这将成为现实。锅炉制造工人、机械工人和其他金属业工会

提出，要把造船厂作为他们很快可以接管的企业，而且他们能比现在的主人把它们管理得更好。这些想法给工会会议注入了新的活力，把我们同全世界正在高涨的工潮汇合起来了。每星期三晚上，中央劳工理事会开会到深更半夜，听取遭受压迫、奋起反抗的人民使者的讲话。这些使者来自印度、爱尔兰、中国和朝鲜。我们为工人在德国占领工厂、法国军队在敖德萨哗变、苏维埃在匈牙利和巴伐利亚的兴起而欢欣鼓舞。全世界无产者正起来当家作主了，很快就要轮到我們了。可是，对怎样才能获得政权，我们却一无所知。各地的事态发展似乎表明，政权正在纷纷落入工人手中。

那些亲眼看到俄国革命的记者，有时来到西雅图作巡回讲演。他们对理论问题也不怎么关心，但对奇闻轶事和胜利的事实却津津乐道。雷蒙德·罗宾斯、路易丝·布赖恩特、威尔弗雷德·汉弗莱斯、艾伯特·里斯·威廉斯相继都来了。我们从他们那里听到了不少新闻：妇女获得了自由，落后民族有了平等权，在物资供应不足时把定量食品首先分配给儿童。这些事情激发了我们的热情。我们还听到了对工人管理工厂持相反意见的叙述，以及从革命法庭中传出的令人惊奇的故事。这些法庭竟撇开古老法律的不公正的条文。而采用不见经传的常理来断案。这些新闻是激动人心的，但又是难以完全理解的。我花了几个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的时间同每个演讲者谈话，然后把他们对我所讲的事情写成连载文章。那位被日本人驱逐出境的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克拉斯诺晓科夫的夫人，从日本远涉重洋逃到这里来了。我们从她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苏联的学校和对儿童关怀的情况，然后帮助她前往东部地区。

我钦佩这些传播信息的使者。他们是得天独厚的人，他们看到了世界风暴的中心。在那些年头，我不止一次想要离开西雅图。

后来，朋友们责备我是一个不会安家立户的天生流浪儿。然而，当整个新闻界涌向欧洲前线，到凡尔赛、莫斯科和各个发生革命的地方去的时候，我却情愿留在太平洋沿岸西北地区的一个遥远城市，理由很简单，革命已经在莫斯科爆发了，但并不限于莫斯科一个地方。世界革命把我们都卷进去了。它的使者飘洋过海，来自印度、爱尔兰、德国和匈牙利。世界革命已经在莫斯科发动了，而且它正在向西雅图扩展开来。因此，西雅图就是我们的战斗岗位。我们也属于这个新世界的组成部分了。

对于新世界的每个部分，我们一视同仁地为之欢欣鼓舞。我们既发表了列宁的文章，也发表了英国工党的宣言。为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社会主义，工党制定了战后的新纲领。我们之中有些人认为，这个宣言听起来枯燥乏味，比俄国人的步子更缓慢，但另一些人认为，它更实际些，血腥味也少得多——“盎格鲁撒克逊人，跟我们一样；我们将要象他们那样去干。”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革命运动正朝着同一个大方向前进，谁也不能断定哪一种运动会首先达到目的。俄国人已经掌握了政权，但他们面临着许多困难。也许另外一个国家的工人会找到一条比较容易一些的道路。不管怎么样，夺取政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能通过许多条道路到达目的地。

在各种道路中，西雅图工人却兴致勃勃地想办合作经营的工人企业。从纽约来的沃巴斯先生对我们说，这条道路对实现工人所有制来说，是毫无痛苦、收效良好的。我们也听他的话。于是，各种形式的合作企业兴办起来了。互助洗衣店是其中的第一家企业，它是由有组织的工人开办的，作为工会经营的洗衣店。这样，它就能把所有其他洗衣店的工会组织者庇护起来。这个办法成为经常使用的一种策略。在老板反对工会的那些小产业里，工会就开办

企业，这样就可以为被其他工厂开除的所有鼓动者们提供就业机会。我们还经营一家电影院、一批合作商店、一家互助储蓄银行，以及我们这家大报。我们经营的企业开始同农民直接做买卖，可是我们卷入了一些使人头疼的纠纷之中。为这些企业提供资金的方法是不明确的，有些是消费合作社资助的，有些是由工会掌握股份的股票公司资助的。我们发展到了这样的阶段：甚至“劳工朋友”开办的私营企业也好象成为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工人企业。没有人批评新体制。那时正值工人企业欣欣向荣，就业充分，工资优质，万事如意。

我还记得路易丝·布赖恩特从革命的俄国回来，用她那些灿烂的琥珀珠子和她对那个禁域的动人叙述，使拥挤不堪的码头工人大厅里烟雾弥漫的空气为之一新的情景。会后她对我说：“你可不要因为俄国人从战争中撤出来，就把他们当作和平主义者，他们相信武装起义……”

我答道：“当然。”但我又感到有点惴惴不安，好象我们在西雅图忘记了什么似的。我们的武装在哪里呢？

不安的心情很快消失了。在西雅图没有人拥有武器。仅有的枪支是在城外的刘易斯营，在那里“男孩子们”正在被迅速遣散，《工会纪事报》在那里拥有朋友和读者。我们在西雅图的市民中已经拥有多数了，难道人们真的需要用武力从斯金纳手中夺取造船厂吗？人们偶而也进行这样的讨论：“究竟是用发行债券的办法来赎买造船厂好呢，还是干脆夺取它们。我是赞成那种认为没有理由去伤害斯金纳的意见的。他可以领取养老金退休，舒舒服服地过日子。我们在西雅图拥有多数。而且革命高潮正在兴起，这将使我们在世界上也拥有多数。

尽管我们的想法是模糊的，但我们感情上的忠诚却是真实的。

西雅图码头工人领导了罢工，反对把武器供应给高尔察克，罢工遍及海岸各地。他们依靠他们战时的实力，赢得了同海运公司签订的第一个集体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码头工人通过工会接受雇用，并在舒适的工会大厅里等候提供就业的召唤。这就取代了原先的野蛮办法，那时人们在码头上竞争就业机会，不得不顶着烈日，冒着雨淋，一直等到老板出来挑选那些最强壮的人。可是，协议的墨迹未干，工人们就发现武器藏在密封的箱子里，正在装船运往高尔察克。他们懂得，当他们决定罢工时，他们承担着怎样的风险，因为这样就会破坏这个集体协定，他们再也不可能恢复这个协定了。但他们知道，英国工人为反对运送武器去干涉俄国举行了罢工，法国军队发生了兵变，世界各地的工人举行了声援罢工。因此，他们在反对高尔察克的斗争中尽了自己的职责，这也是他们对世界革命作出的一份贡献。

当时众说纷纭，各种尚未分析的观点互相对立，而西雅图正是出于上述这种声援感情，举行了总罢工，这是我们当地的“革命”。

第七章 西雅图“革命”

1919年1月，沿海各城市之间广为流传着西雅图马上就要爆发革命的消息。为了声援造船工人的罢工，西雅图其他行业的工人也开始了总罢工。谁也无法预料这场总罢工的结局。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宣传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在美国西北部出现。

罢工前西雅图形势紧张极了，无论怎么描述都过份。商人们都作了暴乱损失保险，并购置了枪支。市民们都储存了生活物资，以防止长时期的困境。库存多年的煤油灯也被拿出来高价出售，以防罢工影响到市电灯公司。一些有钱人家为了逃避动乱，干脆躲到波特兰去了。新闻界呼吁罢工工人们不要自毁家园。后来新闻界又改变了腔调，不无威胁地质问罢工工人：“你们是站在谁的旗帜之下？……如果是站在美国的旗帜之下，那么就立即扑灭你们中间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全市所有行业的工人都参加了罢工，这是北美洲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罢工。许多年来，国际产业工人联合

会一直在谈论着总罢工，宣称工人阶级的力量一旦释放出来，就能使资本主义土崩瓦解。可他们中间几乎没有人了解，一旦举行了这样的总罢工，会发生什么样的结局。这真好比一个人扣动枪的扳机时，却不知道枪膛里上的是什么子弹。政府官员和资本家们都说枪膛里装的是革命的子弹。然而所有劳工领袖们则急忙否认这种说法。

如果不是这些所谓的“劳工领袖”们恰好不在西雅图的话，这场罢工很可能根本不会举行。大多数劳工领袖都去芝加哥参加为争取释放穆尼而举行的一次会议。当他们听说罢工决议已经通过时，简直惊恐万分。在返回西雅图的火车上，这些人就商量起对策来了。十天前，当他们离开西雅图去开会时，劳工运动是充满活力的、进取的，但却是循规蹈矩的。可是当他们返回西雅图时，迎接他们的将是什么呢？

我也在那趟从芝加哥回西雅图的列车上。我现在已经成为西雅图工人的一位领导人。在劳工运动中，我认为是一名“进步分子”，这意味着我支持工联主义（通过把手工业工人工会联合起来的办法来实现），支持劳工采取的政治行动（我们在建立一个农业工人党，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中的反动分子），支持工人最终统治整个世界，尽管还不知道如何统治或何时实现这种统治。

从我走进《号角日报》办公室成为它的撰稿人的那天起，我就感到同志情谊和自由气氛融合得十分自然，以致于直到这些美好时光早已过去之后，我才得以细微地回味当时情景。我自行安排工作，并独立完成。我觉得我干的事情总是最合我心意的。不过有时候遇到新问题我还得去请教别人，如主编哈里·奥尔特，中央劳工理事会秘书吉米·邓肯等。邓肯经常受我们委派去参加美国劳工联合会会议。在与会的人中，只有他投票坚决反对贡帕斯^①，

使得贡帕斯当选为劳联主席时无法获得全票。我的信念，不，应该说是我们的信念，产生于许多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以往共同的经历，遭遇的共同事件，共同的同志情谊以及共同听到的造船工人和煤矿工人的呼吁。我的思想很容易同别人产生共鸣，被一种个人自由和集体事业的感觉所占据。

我的作品在全美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报刊上赢得了声誉。我用“安妮斯”这个笔名，每天都发表一些讽刺短诗，别家刊物竞相转载，有的甚至还被外国的工人报纸翻译发表。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这些诗作，能使我形象地看到当时我们西雅图左翼分子的风貌。

这些短诗敏锐地意识到资本主义的重重矛盾和残酷无情，嘲讽了许多现象，如地方上一些所谓爱国主义者进行的竞选活动和令人感到荒唐可笑的间谍恐慌症，抨击了木材厂、矿山和别的企业中存在的浪费现象和战后欧洲的混乱局面。资本主义的弊病在我们眼里是一清二楚的。我的另一些诗歌则充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这些诗谈到未来，谈到“新世界”、“新的自由”和大踏步向前迈进的全世界工人。可是如何组织工人的前进运动，我却找不到积极的方案和理论。在我们看来，世界革命似乎是一个封了口的包裹。上帝，或者说不可抗拒的人类发展规律，将来一定会把它给我们送来，这是一场谁也无法预见的迈向光明的西方的大进军。我们满怀激情地相信，一场伟大的变革正在到来，可是这变革的时间和方式我们却不清楚。

因此，当我们从芝加哥返回西雅图的火车上看到表明这场伟大变革真正到来的第一迹象时，都吓得目瞪口呆。举行总罢工犹如释放出一股蓄之久矣的能量。这会轻而易举地把许多东西摧

① 塞缪尔·贡帕斯，1850—1929，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首任主席。

毁——很可能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精心组织起来的工人运动。然而我们却不能谴责六万名工人采取的行动。劳联的那帮无耻的反动家伙们才经常拒绝支持群众，而我们左翼理想主义者是和工人群众站在一起的。对于如何指挥这场罢工，我们既无指导思想，也无计划，只能研究局势并“紧跟”不放，希望最终有可能解脱出来，又不至于同工人发生冲突。由此可见，劳工领袖们从一开始就在表面上支持罢工和背地里希望终止罢工两者之间徘徊。

骤然出现在颇感为难的劳工领袖面前的这场总罢工，是从六万五千名造船工人争取提高工资的罢工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整个战争期间，工资标准是由政府有关机构同全国工会领导人协商确定的。资本家们讨好技术熟练工人，却降低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这是违背我们地方工会组织“冶金工会理事会”“团结一致”的既定方针的。在战时的一年半时间里，工人们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怒火中烧，一有机会，烈火就会熊熊燃烧起来。紧急运输公司老板皮兹的两面派行为是点燃罢工烈火的火种。他在公开场合一再表示工人们有权同老板们直接谈判，即使在战时也是如此，可在暗地里他却打电报威胁造船厂老板们，一旦他们同意增加工人工资，他就要停止供应钢材并取消合同。由于信使“搞错”了，把皮兹的一份本应送给冶金协会（老板们的组织）的电报送给了冶金工会理事会（工人的组织）。这样一来，造船工人把矛头指向了华盛顿，开始罢工，并呼吁全西雅图所有工会都起来支持他们的行动，举行一次总罢工。这场罢工——一次政治抗议——正是为了反对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政策。

全市的工会违反自己的章程，不顾全国工会领导人的劝阻，放弃经过艰苦谈判才同资方达成的协议，相继参加了罢工。加入到罢工行列的包括，保守的印刷工人工会、有产业的木工工会、实力

较弱的旅店服务员工会、坚定的音乐家，以及富于斗争精神的码头装卸工人和卡车司机等。西雅图的日侨工人工会一直被排斥在苏联的大门之外，但它也通过决议举行罢工，并推选出了参加总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也采取了类似举动。附近煤矿的工人们送来了致敬信，并询问我们是否需要他们的支持。就连一些小企业的老板们，也因为憎恨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涉，同意了工人进行总罢工的一些条款。只有政府职员工会没有参加罢工。邮电职员们派来了代表参加了总罢工委员会的会议，要求得到指示，因为他们如果参加罢工，将受到拘捕。西雅图的工人们第一次面对这样的事实：他们曾强烈要求实行的公有制对他们的压制要比私人企业主们还厉害。总罢工委员会对工人是“忠诚”的，它不主张邮电职工冒被抓进牢房的危险去罢工。

总罢工委员会由来自 110 个工会的三百多名代表组成，1919 年 2 月 2 日星期天，举行了整天会议。代表们收到了全国同行业的工会领导人打来的指示电报，却没有理睬。他们还收到了西雅图卫生局的命令，威胁垃圾汽车司机要立即复工，否则就把他们送进监狱。他们采取了这样的对策：同意经特别准许，在罢工工人的监督下复工，但只能清除“潮湿性垃圾”。代表们否决了把“我们失去的只是锁链，而得到的将是整个世界”这句话作为罢工口号，而用“团结一致，我们将会胜利”取而代之。这是因为他们觉得失去的不仅仅是锁链，而且还有许多东西——如薪水很高的工作，他们还要靠这去买丝绸衬衫、钢琴和住宅呢。他们要的是团结，而不是阶级斗争。当时代表们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考虑甚少，因而把罢工日期定在星期四上午十点开始，并决定在罢工开始的星期四晚上再继续开会。在此期间如出现新情况，由一个经选举仓促组成的十五人委员会负责解决。

谁知,从第二天早晨起,十五人委员会竟在不知不觉中成为西雅图市的实际主宰者。他们并不是为了取得权力才组织起来的,而他们恰恰是要努力摆脱权力,可现在他们手中却被人突然塞进了权力。总罢工可不是件简单事情,这涉及了全市生活的所有方面。全市街道在夜晚能都变成一片漆黑吗?自来水能停吗?三十万市民吃什么东西度日?罢工工人和其他市民很快就会觉得生活无法忍受,如果不想把他们列入那样的境地,那么现在的问题就不是简单地命令罢工,而是如何复工和如何管理。

全市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是这座城市的组成部分,他们为自己的城市自豪,为市营供电供水系统以及公营港口自豪,可现在突然遇到了这座现代化城市错综复杂的局面。多少年来,为了取得这些公有权,他们曾同利益集团作过斗争,他们决不愿意破坏这些东西。实际上,他们并不想破坏任何东西,即使是私营造船厂,他们也不想破坏。他们只想给皮兹先生一点颜色看看,并显示他们同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造船工人的团结一致。看到别的国家的工人夺取政权,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相信总有一天也会轮到他们取代资本主义来管理世界。现在突然间真的轮到他们来管理了。

委员会收到了几百份要求复工的申请,下面我只摘录几份:

县政府专员要求有人复工看管县政府大楼——没有批准。

腊斯特要求有人复工看管劳工大楼——没有批准。

合作市场要求有人值班,因为他们要给罢工工人食堂提供食物——批准了。

运输汽车司机工会要求准许为一家瑞士医院运油——同意了。

杂货店雇员们询问如何满足全市的药品需要。主管罢工时期公共福利的委员会决定,出售药品的柜台可以营业,但杂货店中不

能出售其他商品。

商业印刷厂提出让工人复工来印刷罢工宣传品。这被拒绝了。但罢工委员会要求印刷厂听从它的安排，工人可以自愿义务劳动。双方就这一点达成了协议。

小汽车司机被允许运送急诊病人和参加葬礼的人，不过这要通过小汽车司机工会来安排。

电话员们被要求暂时继续工作。

戴维森面包房被允许开业，但工人工资要全部上交给罢工基金会。

码头装卸工人要求上工处理政府邮件、海关物资和旅客行李。后来只同意他们装运邮件和海关物资，但不能运行李。

水暖工工会被准许保留七名工人值班以处理紧急事故。市内
有轨电车工人得到批准，可以保留六名工人值班看管电车车库。

市政管理局局长凯斯在市长的支持下要求夜晚路灯不要熄灭以防“流氓行为和暴乱活动”。在这个问题上意见纷纭，因为在技术上很难把照明用电和动力用电分开，不过最后还是允许电灯公司继续开工。

经进步工人选举担任公营港口主任的罗伯特·布里奇斯呼吁罢工不要影响到冷库中的农产品。他说：“大公司可以把自己的产品贮藏在自己的私人仓库里，由你们罢工根本波及不着的西雅图电力公司为他们供电。可是小农场主却只能把农产品贮藏在公营仓库里，由市电灯公司供电。千万不能停电而把这些小农场主搞得破产呀！”这一呼吁促使市电灯公司得以全部运转。

以上提到的只是一座现代化城市生活问题的几个侧面。罢工工人们从要求继续开工的申请中可以看到他们手中的生杀予夺大权。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重要的问题使得工人们必须掌握组织

工作的权柄。

就拿医院的洗衣房来说吧，难道能关闭洗衣房使病人大受其苦吗？为此，洗衣工人工会与洗衣运输汽车司机工会，各医院和洗衣店老板协会之间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协商。最后提出了一项方案，只允许一家洗衣店开工，专为医院服务，而运送衣物的汽车上面要标有“经罢工委员会许可”的字样。这项被洗衣店老板和洗衣工人都接受的方案得到了十五人委员会的批准。

为解决供应儿童牛奶问题，也制定出一项类似方案。奶车司机工会在全市各个地区设立了三十五个牛奶供应站，附近的农民们用车把奶送到那里，然后供应给有儿童的家庭。牛奶厂主们被批准可以让一座牛奶消毒车间继续开工，但只能由他们动手操作，为医院用的外地送来的牛奶消毒。专用的运奶车标有“特许”字样。

为了帮助警察维持秩序，罢工委员会还组织了“工人卫兵”。市长汉森表示愿意出面组织工人卫兵，并说要给卫兵颁发标志和武器。但这一表示没有被工人卫兵的领导人拉斯特接受。拉斯特决定从参加工会的退伍军人中挑选工人卫兵。他表示：“应当使西雅图在这些人的爱国热情中得到保护。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力量来维持秩序，用不着武器。如果真发生了开枪事件，那将不是我们干的。我们认为，如果公众知道工人们手中没有武器，他们是会放心的。”

从宣布罢工到罢工正式开始的几天里，我起初真觉得我们鲁莽从事，肯定要遇到灭顶之灾。为了教训皮兹，我们把西雅图造船厂关闭了。然而，我们这样做可能只会有利于霍克岛的另一家造船厂，据说皮兹本人对此很感兴趣。我们的盲目行动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不过当我看到工人由于罢工而掌握巨大权力时，我的希

望又增大了。我想起了列宁对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后遇到的问题所作的论述。在我看来,我们现在也遇到了列宁论述过的问题。就在罢工开始两天前,我在一篇社论中写道:

我们正在采取这个国家的工人以往从未采取过的伟大行动,而谁也不知道罢工将被引向何处。我们不需要歇斯底里!我们需要的是工人们钢铁般地奋勇前进!

工人将养活人民……

工人将照顾婴儿和病人……

工人将保证秩序……

工人有力量管理得井井有条,这将保证赢得这场罢工。而压制这种力量是没有出路的……只是由于罢工而关闭我们的工厂是不会严重影响东部那些资本家老爷们的。真正能够影响他们,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西雅图的资本家工厂关闭之后,工人竟能自己养活自己,照顾病弱,并维护好秩序——这看起来多么象工人已经夺取了政权!

如果罢工继续下去的话,工人们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管理之下,从事越来越多的活动。

这就是为什么说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

这篇社论被人们作为罢工者的正式表态而广为流传,当地的进步人士将其称为是对罢工的“第一次具有建设性的解释”。“你的社论使我们看到了从这次罢工中可以学到的东西——工人学会自己管理的能力。”可是六万名工人罢工就是为了学这点东西?当我后来被捕时,这篇社论被作为我的罪证之一。然而词句的含糊帮了我的忙。法官们说社论中“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一句话

是要制造无政府状态。而辩护律师却反驳说，这句话的意思只不过是表明未来是不可知的。其实双方谁也没抓住这句话的本意。这句话是在呼唤人们要具有开拓者那种深刻的信心：人类的进步是不可避免的；是在激发工人们向着未开发的西方前进。但这句话是经过斟酌的，并没有鼓吹战斗。在敌人面前，我们显示工人的力量作为一种威胁，不过我们只是威胁一下而已，并无他意。我们已清楚地表明这一点。我文章中的一些话，如“这看起来多么象工人已经夺取了政权……”或“工人们可能不得不在自己管理之下，从事越来越多的活动……”等，并没有留下任何把柄。我们从来没用过诸如“将要”、“必须”等肯定的词。我们感到自慰的是：我们在忙乱之中，做了不少漂亮的工作，如组织工作，管理奶站和罢工食堂等，但我们在最终目的上却吹了牛——“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被引向何处！……”总之，早在罗斯福新政前十六年，我们这就有了那种预感了！

星期四上午十点钟，西雅图六万名工人开始罢工。管理整个城市生活的大权一下子落在工人手中。可是工人们自己并没有感到这点。权力只不过是给工人们那种欢欣鼓舞的团结气氛加了一点调料而已。工人们笑着把罢工称之为“三十年来的第一次休假”。工会的领导们也得意地说：“六万名工人罢工了，没有发生过任何动拳头的事。”这些领导人很欣赏这种非暴力行为和自制能力。无论什么地方聚集了人群，纠察队员们总是和颜悦色地劝告他们解散，以免有人趁机捣乱。罢工传单也告诫工人们不要到街上去，而应去图书馆浏览图书，或是在家里把花园修整一番，总之，应“最有效地利用自己的闲暇时间”，因为这是“休假的最好季节”。在市中心居住的工人的饮食问题由一些临时性服务行业操办解决，在罢工期间大约开设了二十一个特别食堂，罢工结束为止，它们每天要为三

万人用餐服务。这些情况表明，西雅图工人战斗团结力量得到很好的引导，表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能力。几年之后，当英国举行总罢工时，我看到了同样的情况。英国工人甚至在罢工期间同警察进行了球赛。在西雅图罢工期间，地方法院拘捕人数要远远低于平时。工人们十分谨慎小心地防止出现殴斗现象。

尽管工人采取了非暴力的态度，可是西雅图那些商人老板们却很清楚，此刻权力已经从他们手中不知不觉地转移到这些新涌现出来的人们的手中了。这些商人老板们在大街上游逛，不是看看那些西雅图公共服务行业机构挂出的标有“免除罢工”字样的牌子，就是要一张到罢工食堂用饭的餐券。他们这些人气急败坏的心情每时每刻都在增长，他们简直是恼羞成怒，恨不得发生流血事件。他们不断向市长和华盛顿施加压力，并从武器商店里买来枪支，还要求为民请命的权力。二千四万名非工人的“市民”把工人卫队拒绝接受的枪支和标志搞到了手。军队从刘易斯营房开进市内，严阵以待，“防止任何暴乱”。

奥尔·汉森当时是西雅图市长。他原先的职业是地产商人。正如他的职业和职务所要求的那样，这位市长既是一位笑容可掬的政客，又是一个吹牛拍马能手。当罢工决定宣布之后，他把一些工会领导人请到里佩饭店吃了午饭，并请求说：“诸位，街道照明，自来水和医院可别停工，至于其他方面你们都关掉，我也不在乎。”他还到我们的《工会纪事报》办公室用甜言蜜语拉拢我们。这位市长拉住我的衣服，称赞衣料，并问在什么地方买的，要给他妻子也买一件。奥尔在那些日子里可不是反革命。他设法与革命妥协。他只不过是个地方小政客罢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看风使舵。不过从这个“风向标”身上，人们可觉察出目前吹的是什么风。当罢工开始后的第二天，他站出来反对我们时，我们本应当猜到他一定是

发现了我们的弱点。当他把几百张自己的照片寄给全美国的各家报纸,并标榜自己是粉碎西雅图革命的英雄时,我们本应该认识到我们已经输了。

奥尔不敢在西雅图市发布那样的声明。从别的城市传来消息说,奥尔把我们的罢工称之为一次预谋的革命,并已经被他镇压下去。西雅图的工人听到这个消息,都感到可笑之极。在罢工的第二天汉森召集商人老板们开了一次会,随即突然发布了一项复工命令,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工会服从这项命令。在奥尔声称把我们“镇压”下去的第二天早晨,我们在闹市区拍了一些照片,表明街道是空荡荡的。全国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看到了西雅图,要求停止罢工,可是遭到工人群众的强烈反对。

然而罢工进行到第四天时,突然传来一项决议,决定终止罢工,并声称这不等于罢工失败了,但所有工人次日必须复工。这项决议含糊不清,唯一清楚的是罢工结束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其中的原因。这种含糊不清的语调,几年后也出现在终止英国工人总罢工的决议中。

难道人们不应该指责黄色工会领导人破坏了罢工,是他们才希望这样结束罢工吗?这样指责他们是容易的,也是恰如其份的。然而我们更应该问的是,为什么无论哪个工人当上工会领导人之后,总是要结束罢工?这样问才更加一针见血。因为在罢工的五天中,我发现这种事情接连不断地发生。普通工人尝到了掌握大权的滋味,并相信领导人能用这种权力去夺取胜利。然而正是这些普通工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一旦成了某个组织的负责人,他总是希望停止罢工,以免发生“暴乱和流血冲突”。在罢工中不会产生任何愿意把罢工进行到底的领导人。我们所有的人在普通群众队伍中都是“赤色”分子,可一旦登上领导岗位却变成了“黄色”分子。因

为我们根本不打算进行真正的斗争，我们只想等待权力轻而易举地落入我们手中。我们只是在感情上喜欢看到一个较美好的世界的到来，但我们的工会领导人以及不少普通工人群众在旧世界中的既得利益太多了，舍不得丢掉。总罢工使我们获得了一切，就是没有枪支。我们的罢工只能持续到一定时候，对方一开枪，我们就得复工，我们只不过是一群牛皮大王。而善于虚声恫吓的奥尔·汉森早在罢工开始的第二天就看出了这个弱点。

我们却没有看出来，甚至直到罢工结束后也没有看出来。我们不愿意认输。一位天真的记者很失望地说：“我原以为我们要占领整个工业企业呢。”假如哪个领导人有这种想法，哪怕只是下意识地想一想，我们就会立即让他忘记或打消这种念头。我们自己用所谓“胜利”等词藻在自欺欺人。诸如：“我们显示了工人的力量”；“我们使整个大陆都看到了皮兹的鬼计”；“我们比以前的任何美国工人都更加了解如何管理一座城市”；“我们组织了牛奶的供应，给三万人提供了食品”；“我们进一步了解了管理问题”，等等。我们力求使自己相信这些就是我们罢工的目的。工人们真的相信了我们，或者说半信半疑，都带着一种已经取得一些成果的感觉回去工作了，可是谁也说不出来到底是什么成果。

我当时带着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和一种简直令人奇怪的理想主义写了几篇社论。其中有一篇说：“如果革命就意味着暴力，强占个人财产和杀人，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希望如此。但如果革命是意味着巨大变化将要到来，并且改造我们工业生产的方式，那么我们是相信这种巨大变化的，我们的罢工就是朝着这种巨大变化向前迈进了一步。”

我们成立了一个总结委员会，集体研究和总结罢工经验，“为了使全世界的工人都既能接受我们的教训，也能学到我们的经

验”。我成了历史学家，先将总结出来的东西交委员会审阅，然后通过《工会纪事报》发表出去，让工人们评论。我们试图分析一下我们原来希望达到的目标以及如何才能达到。这场罢工仅仅是想显示团结吗？那么我们本应该明确罢工开始和结束的日期。罢工是为了给造船工人增加工资吗？我们本应当说明这一点。罢工是为了进行革命吗？我们本应该作好掌握权力的准备。“然而我们的经验太少了，或者说思想上根本没有做好革命的准备”，我这样写道。

我们作了大量的观察，写了许多材料，不知不觉地涉及到夺取权力的整个问题。在罢工结束后的很长时期里，我了解到其他许多人的梦想，如有人想以“技术官僚来统治天下”，而洛杉矶工人则梦想从规模不大的工人所有制工业企业向社会主义转变，以及指望靠信念和激情使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脱颖而出。如果不了解以上这些人的想法的话，那么，人们对问题理解上的今昔差异会使我感到难以置信。我们以往的幻想同以上这些人的梦想真是如出一辙。

纽约花旗银行的前总裁费兰克·范德利普在罢工结束后曾来过西雅图。他是位颇有远见的资本家。我作为《工会纪事报》的记者采访了他。他谈及欧洲的经济形势。他的远见卓识受到一些顽固不化的资本家的蔑视。他读了我们写的总罢工经验总结之后对我说：“我原以为你们写的只不过是些标语口号之类的东西，可没想到竟是一些重要的史料。我读后很吃惊。我作梦也想不到在美国竟存在着如此强大的力量。”

然而美国的大资本家们并没有睡觉，华盛顿的政府官员也没有睡觉。我们的做法把这些人猛地惊醒了。他们用比我们更有效的方式行动了。我们显示了力量，可是并没很好地加以使用。他们

下决心不容许我们再一次显示这股力量。他们采用更为残酷的手段以突然袭击的方式逮捕了社会主义者和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中的罢工支持者。他们甚至放肆地抓走了《工会纪事报》的一些主要负责人。一天我正在家里写稿子，突然哈利·奥尔特打电话告诉我：“法院的人来办公室抓你了，你赶快来对付一下。”我立即赶到办公室，并在起诉书收条上签了字。那位工作人员让我签字时显得很窘迫不安。我在地区法官的办公室中留了下来，锅炉工人工会去银行提款为我交保释金。

他们抓人抓得实在太匆忙了，根本没有认真加以考虑。他们的行为使华盛顿州的民主党人最为焦虑不安。这个党马上派人来提出反对意见。来人表示说：“天啊！被抓起来的人可是受四万名选民支持的。要知道正是这些选民们选了罗斯福，后来又选了威尔逊。现在你们的做法只能让农工党把选票拉跑了。”这样一来，对我们的起诉便不声不响地撤回了。不过，选民们下次选举时的确把选票都给了农工党。

无论如何，我们是在节节走向胜利的。我们是东部各州工人的指路灯，是世界上全体工人战斗集体的一部分！我们就是这样一股力量，直到后来造船厂关闭为止。老板们说，造船厂关闭是因为战争结束了，不需要军舰了。然而他们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同样接受政府订货的霍格岛和旧金山的造船厂却在一年之后才关闭，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要不然就是东部出了一位聪明人，决定要收拾一下“红色西雅图”。内情如何，我们永远也不清楚，我们又如何会知道呢？

我们只知道1920年至1921年的经济危机比其他地方早一年降临在我们头上了，西雅图的造船工人流浪到外地找工作谋生。年轻的、胆大的和最勇于斗争的人都走了。而那些受家室之累、需要

分期付款交房钱的人则留下来了。这样一来，工人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变化。被人们称为“通往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工人企业”慢慢消亡了。那些膨胀过分的合作企业在责难声中相继倒闭了。而那些曾在《工会纪事报》上登广告以讨好工人的公司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弱点，施加压力影响我们的报纸。工人与工人之间竟相争夺就业机会，而不是同资本家争夺权力了。

围绕《工会纪事报》发生的各种冲突，使我感到孤独和迷惑不解。正如我曾经嘴上说要保持中立，实际上却让东部垄断资本家们控制我举办的儿童福利展览一样，现在我又高喊着“同志”这种空洞的口号，而实际上正是这些同志正在相互指责对方为叛徒。我心中又萌生拓荒者的那种愿望，想要摆脱我周围那些无法解决的问题。到处都是无谓的纷争，过去对西雅图“革命”所抱的热情和信心已经彻底丧失了，只留下令人绝望和痛楚的回忆。我怎样才能从这种种纷扰中逃脱出来呢。

第八章 改弦易辙

大约十五年前，是林肯·斯蒂芬斯在西雅图的布兰克咖啡馆启发了我去莫斯科的念头。

对我们好动的人来说，这样的契机时有发生：生活骤然改变方向，似乎与旧时毫不相干，但这种转变方向实则是由种种影响潜移默化所造成的，随之而来的某个偶然事件，只言片语，所见到的一张新面孔，便会触发我们踏上早已注定的新路。而转变的时刻便成为决定性的关头，永远铭刻在记忆之中。

所以我始终忘不了与林肯·斯蒂芬斯的一席谈话和布兰克咖啡馆那个灯光暗淡的小隔间，那是我莫斯科生涯的开端。在1920年的那些日子，布兰克咖啡馆昏暗的小地下室是西雅图的艺术、作家和左翼成员通常光顾的地方。虽然我们闹“革命”，但我们仍自称是“进步分子”。我们把贵客带到那里，美餐一顿，安静交谈，而又不至于从我们并不富裕的腰包中掏钱太多。

斯蒂芬斯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我年轻时所钦佩的记

者。他曾报道过“城市的耻辱”和所有旨在维护美国民主的揭发弊端的改革运动。所以当他从饱经战乱的欧洲大陆回国演讲，介绍布尔什维克革命时，我便把他请到布兰克咖啡馆，象所有不客气的朋友那样刨根问底地打听他个人的所见所闻。从墨西哥到莫斯科，他目睹了六、七次革命。他还参加了并没有带来和平的凡尔塞和约的签字仪式。而使我们大家更为兴奋的是，他帮助促使威尔逊总统首次正式派遣特使布立特去俄国考察那个使全世界惶惑不解的苏维埃国家，他本人还与布立特同行。他在全美国就此行巡回讲演，抽出了一天时间来西雅图。

我在饭桌上向他倾诉了我们那儿的纠纷。“过去的战友们分道扬镳了，昔日的朋友彼此攻击对方是叛徒。”

“这是几时开始的？”斯蒂芬斯问道。

我回答说：“几个月了，情况越来越糟。中央劳工理事会会议过去一向是来自全世界的工人代表慷慨陈辞的讲坛，如今却成了木匠和管子工为争夺几件小活儿恶语相斗的场所。我想这是在造船厂关闭，金属行业的工人逐渐离去后开始发生的。我们曾经为之自豪的那些工人企业开始分崩离析了，所有参加过的人都受到责怪。现在我们编辑部某些人又在非常猛烈地攻击主编哈里·奥尔特，其中有人还扬言，倘若我不加入攻击，他们就要让我‘声名狼藉’。恫吓我的还是一个我过去所喜欢的男人呢。”

“那么你支持哈里啰？”斯蒂芬斯问我。

“哦不，谈不上支持哈里，”我对此解释道：“我认为我们的报纸办得糟透了。登广告的商人开始控制我们。工人运动团结时，各个公司都得找上门来刊登广告，而现在它们则爬到我们脖子上，让我们采取缓和的立场。哈里进退维谷。我觉得他缺乏勇气，他应该敢于冒犯那些登广告的商人，哪怕我们不得不缩小版面，也在所

不惜。不过这张报纸是他的宠儿，是他过去在印刷所当徒工，夜间睡写字台时就梦寐以求的。他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这张报纸，我不愿听那些暴发户骂他为叛徒。但我也无法赞同哈里，他居然说工人们忘恩负义。谁也不能说这种话。”

斯蒂芬斯说：“你真该知道你们在西雅图的这场斗争与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斗争简直如出一辙。你那个哈里使我想起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在背后捅了革命一刀。你必须甩掉哈里，他会把你出卖给登广告的商人的。”

“我在编务会上一直是反对他的，”我答道，“但我反对他是出自好意，因为我了解他的难处。我不能加入那些想把他撕成碎片的恶狼行列。”

“你得很快加入一派，”斯蒂芬斯严肃地说，“不然两边都会把你撕成碎片。”

“他们双方已经要挟我了，”我懊恼地说，“倒不是哈里，他还友好，但他那帮保守的朋友、那帮老派工会分子，威吓起人来非常凶狠，象那些不顾一切的狂热分子一样。我对双方多少还都了解，我要帮助他们和好。他们过去志同道合，我们大家曾携手前进。他们应该重新成为要好的战友。”

“办不到，”斯蒂芬斯说，“绝对办不到。这种分歧只会更加扩大。世界上所有这样的分歧都在扩大。”

他的话令我沮丧。我们转而谈起莫斯科，谈起斯蒂芬斯最近才到过的那个富有神奇色彩和冒险性的国家，它正在旧世界设立的封锁线那边建立一个新世界。莫斯科，我曾搞到并印刷过那儿出的小册子，却还从未想到去那儿访问。此刻我脱口喊道：“噢，要是能去那儿，我可以豁出一切。”跟别人通常发出这类豪言壮语时一样，我的话未必有多少实在意义。

“为什么不去呢？”斯蒂芬斯平静地反问，这可叫我张口结舌。我刚才只是不过说说而已呢，还是当真的？西雅图有什么值得我留恋？钱吗？我的工资积蓄足够我在任何地方生活几年。工作？我的工作现在让我感到幻灭。家庭牵连？我父亲那儿有一个日本学生操持家务。大战期间他的和平主义造成了他与老朋友们的隔绝，如今我这个激进的女儿与其说是帮助，不如说是在妨碍他们言归于好。

斯蒂芬斯用闪电般的问话使我明白西雅图羁留我的一切因素都不复存在，现在只有惰性使我裹足不前。然而假使不是他对我将了一军的话，我还可能长期徘徊呢——惰性可以延续几年，甚至一辈子。

我于是郑重其事地问他：“怎么去呢？”

他答道：“现在有两种人可以通过封锁线。在东部各州新成立了一个非法的美国共产党，他们有办法。但你同他们毫无联系，却同可敬的社会福利工作者们交往甚多，你最好的机会是加入公谊会。象在欧洲所有受战争蹂躏的国家一样，他们也在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开展救济工作。他们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唯一允许合法进入俄国的平民，也是布尔什维克唯一接受的资产阶级分子。”

当天晚上我给在费城的美国教友会寄了封信，提出到它在欧洲，包括在俄国的各救济站采访三个月，然后写一本关于这些救济站的书。我盘算的是，以海外采访记者的名义向《工会纪事报》请假，采访回来后我就会耳聪目明，明白如何解决我们的纠纷。美国教友会回信说，他们只按九个月的合同往欧洲派人，而且目前只有一个美国救济工作人员被准许派驻莫斯科。

几个月过去了。我在雷尼尔山的几个合作营地度过了一个暑假，暂时脱离了斗争。他们甚至把“合作营地”也改名为“华盛顿高山俱乐部，”因为“合作”二字激进主义味太浓！转完这几个营地后

我需要休息，而以前我野营后是从不需要休息的。我请假陪父亲去了加利福尼亚，回来后又投入了战斗的旋涡。1921年初，美国教友会突然拍来一封电报，问我愿不愿意去波兰做九个月的宣传工作。九个月？惰性告诫我无法离职九个月，再说波兰，谁愿意去波兰呢？

另一次决定性的机遇加速了我的命运。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在西雅图《工会纪事报》社发生的事情。虽然由于经营有方，我们搬进了一栋新楼，但也带去了依然如故的内部分歧，这些分歧很快就使这家工会报纸永远散伙了。我们这些干事果断的人染有一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方式作出决定的习惯，这种习惯使我们见不得桌上堆着没有了结的文牍。所以我写了个回绝的电报后，便叫女电话员发。她叫通西部总局，刚刚开始对费城说头几个字时，办公室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我的一个一直在维也纳为教友会做救济工作的朋友。我同她已经三年不见面了。

我迅速撤回了我的电报，我发什么疯非要匆忙答复不可呢？再说费城那帮诚惶诚恐侍奉上帝的家伙要到星期一早上才办公，我满可以星期天晚上再作决定。我同我那位更有经验的朋友和其他人商量了此事，另发了一封我十四年后仍记忆犹新的电报：“此次任务是仅限于波兰呢，还是有机会走访他地，包括莫斯科？宣传工作只限于募捐呢，还是也允许写促进改善国际关系的文章？”这其实不过是把我的意图预先告诉他们而已。我多少已经知道我非去不可了。

美国教友会办事老练圆滑，既有处世之道，又有理想主义。他们给了我一个未明确表态的答复，随我去琢磨。他们提到了争取俄国签证的困难和钱款对救济工作的重要性。显然他们指望我主要呆在波兰，用我的写作才能去募捐，虽然他们不愿明说，但同样

明显的是，信中没有任何禁止你去梦想的话。而且他们也是禁止不了的。我在接到他们的信之前，就已经开始准备行装了。

如果说我是利用教友会来达到与他们的意愿相左的目的的话，他们也同样是在利用我和他们在波兰的其他工作人员。在华沙机构服务的大多数成员最初都是申请去俄国，这是我们年轻的左翼理想主义者向往的国度。象我一样，他们也无限期地期望，一旦封锁解除，华沙便会是通往莫斯科的大门。但在他们当中，我倒第一个达到目的。

我认为，虽然我们另有所图，但这一点儿也没有妨碍我们在波兰勤奋工作。恰恰相反，我们倒是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忠实高速的劳动为达到更大目标铺平道路。我们这个救济机构的负责人弗洛伦斯·巴罗是一位温柔的英国妇女。她曾在俄国伏尔加河一带救济战争难民，直到协约国政府实行封锁的命令迫使她撤出。在她看来，布尔什维克既不是世界的破坏者，也不是救世主，而是人，他们在一些大国由于仇视而强加给它的困难条件下，努力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家园。她慈悲为怀，希望仇恨会平息下来，布尔什维克能在没有更多动乱的情况下成功地恢复工业和农业，为人民提供食物。面对革命和反革命的激烈斗争，她平静地保持包容一切的做人之道，正由于此，我得以很快有机会离开华沙去莫斯科。

同时她也以她那和蔼可亲的方式，利用我的炽烈希望，去激发我在波兰完成每日使命的热情。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们曾在靠近东部边界一个流行疟疾的村庄露宿；还有一天晚上在巴拉诺维兹车站过夜，由于臭虫太多，坐下去都是一种折磨，我们索性彻夜不眠，在月台上踱来踱去。弗洛伦斯微笑着对我说：“这是在接受俄国的训练。”象很久以前登山时一样，我恢复了毅力，以苦为乐，从磨难中品尝胜利的喜悦。疲劳，虫咬，痢疾只不过是诞生欢

乐之前的阵痛而已，是进入边境那边正在混沌中诞生的新世界之洗礼。

在华沙同教友会的其他人一起，我结识了苏联刚派驻波兰的大使馆的成员。大使馆秘书米切尔·鲁宾斯坦过去认识我。他曾在纽约居住数年，读过纽约《号角日报》上转载的我以“安妮斯”为笔名写的诗。他愿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最大奖赏：“一张去苏维埃俄国的签证。我出于资产阶级的信义感，拒绝抛弃公谊会的同伴而单独前往，他颇有点恼火。我恳求他替我保存那张签证，一旦我有机会再给我。

事情的发展使我如愿以偿。我在报社所受的训练使我得以很快把教友会在波兰各机构所提供的新鲜材料整理为大量文章、消息和图片，它们几乎都用不完。我甚至搞了一套完整的幻灯片报道，有一百多幅照片。当我采访完所有机构，准备离开最后一站罗兹回华沙时，终于遇到了去莫斯科的良机。在罗兹的最后一天晚上，一个刚从纽约来的美国红十字会的姑娘走进了我的房间，她坦率地说在波兰才呆了十天就腻透了，她祈祷仁慈的上帝能送她参加胡佛正在组织的向俄国伏尔加河饥荒灾区运送食物的救济工作。

“他们已经到了里加，”她告诉我，“美国人进入俄国了，我希望能有我一个。”

“是什么使你想去俄国？”我问道，因为从她谈吐中听不出她对劳工问题或革命有半点儿兴趣。

她回答说：“那儿大得多，要干的事也多得多。在波兰这儿同在国内的贫民窟工作没什么区别，就是更脏一点。而去那儿是抗饥荒，那才了不起呢。”

我彻夜未眠，她的话总在我脑海中翻腾。我似乎听到美国在

通过这个姑娘年轻、天真而又清新的声音在说话。美国准备重新看待俄国。过去的诽谤中伤使一些人把布尔什维克看作是世上万恶不赦的魔鬼，共产共妻，从母亲怀中夺走孩子，烧杀抢掠——所有这些看法就要不攻自破了。这个姑娘就全然没有提到这些事。美国当然不会承认自己错了，又有哪个国家会认错呢？但假若激发起它新的慈善热忱，它会忘却那些旧的看法，它会热衷于救助俄国人而忘记他们是恶魔。

新闻！饥荒的新闻以及边境那边新世界的新闻。这个美国红十字会姑娘需要它，成千上万像她那样的美国人也需要它。我要传播这种新闻。第二天一早我回到华沙，对弗洛伦斯说：“任何记者现在为世界和平和国与国之间加深了解所能做的最重要事情莫过于真实报道俄国饥荒。你知道法国的反动派叫嚷说，‘俄国人推翻布尔什维克，就让他们挨饿。’我们必须反对这种想法。在莫斯科的公谊会掌握事实。其他事实也可以很快得到澄清。必须有人打破这种新闻封锁，才能开展救济。”

我向她请三个星期假，以便深入伏尔加河流域。我要求有权向纽约发报并同某家通讯社建立联系，鲁宾斯坦许诺过给我一张去俄国的签证，我努力不辜负他的希望。我说：“我可以比别人更快脱身，这会儿我在华沙没什么要做的工作了。”

一天后，弗洛伦斯把她的决定告诉了我。她说：“你无需请假，你可以作为我们华沙办事机构的人去莫斯科出差，我们原已决定结束在波兰东部的救济工作，但又有大批难民从伏尔加河饥荒灾区涌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得知道还要有多少人来。他们会来几十万，还是几百万？他们来的速度和来时的状况如何？我们在波兰以后的工作取决于此。

“你尽可以去莫斯科，如果办得到，你也可以去比这更远的饥

荒灾区。你可以向莫斯科教友会机构报到。如果那儿需要你，他们的要求优先于我们的。如果那儿不需要你，就不要打搅他们，去执行我们的任务。我不禁止你同任何愿接受你的电讯的美国通讯社建立联系。我同我们美国的副主席商量过，也给伦敦打过电报，既然你不占我们的签证名额，他们都不反对。也许——”说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也许我还应该问一下费城。”

我一下子楞住了。虽说费城总部从未禁止人们去俄国，但我有某种预感：“他们会出于谨慎而反对我此行。但面对弗洛伦斯小姐，我镇定自若，我知道我已踏上了去莫斯科的路程，而且终有一天，现在或以后，会达到目的。我只是提醒她：“每周一趟去莫斯科的火车明天发车。而费城回电要三、四天时间。”战后通讯状况的确如此。

弗洛伦斯小姐是否也对费城存有戒心呢？她是十分聪明的领导人，是不会让我知道这一点的。她踌躇片刻，显示了她那一贯包容一切的做人之道，为此她可以不露声色地承担所有外界压力。她平静地说：“我们派办事人员去柏林和维也纳时没有请示费城。我看不出有任何必要认为莫斯科与世不同。”

为这件事，她后来受到申斥。至于申斥的严厉程度，我不得而知，因为她从来没有提起过，我是从别人那儿得知的。那时胡佛正在因俄国饥荒而谋划组织庞大的美国救济署。他想利用粮食的威力打入俄国，并试图控制那儿的局面。俄国人深知这点。胡佛派往里加的代表要求给予所有救济工作人员外交特权，以便使他的使者能够调查伏尔加河流域灾情最严重的地区，并把秘密情报不受监督地发往美国。李维诺夫痛心地说：“粮食也是一种武器。”世界上的帝国主义列强企图使用粮食这一武器深入苏维埃俄国的腹地，这是它们用大炮所未能奏效的。美国的粮食曾经帮助推翻

了匈牙利的苏维埃，遏止了德国的革命。

胡佛操纵了这一武器。他要求所有美国的捐赠都必须经过美国救济署，公谊会也不例外。教友会是国际组织，美国有，英国也有。美国的公谊会友出于我们美国人潜意识中的那种自然而然的自负，甚至试图把胡佛的控制扩及英国人，结果遭到英国公谊会的反对。而美国的公谊会却不得不听任胡佛操纵。有一段时间，这种状况给教友会对俄国的救济工作造成了歧见。比如说，美国人必须从本国购买所需要的粮食以帮助美国农民，而英国人从罗马尼亚买粮要快得多。胡佛还要求所有派往俄国的人员须经他批准，这也得到了美国公谊会的应允。胡佛不想让同情布尔什维克的“赤色分子”去那儿。

因此，当我突然出现在莫斯科，并远达伏尔加河，每天向赫斯特报系（它们捞到了让我采访报道饥荒的良机）发电讯时，我们的费城总部大为紧张。我毫不含糊地报道说，教友会远在胡佛之前就在莫斯科开展救济工作了，我本人送到伏尔加河流域的食物比胡佛运输的粮食早几个星期到达萨马拉。我同样毫不含糊地报道，苏维埃人通过自己见义勇为的牺牲精神为灾区贡献的救济品远远超过他们从国外所得到的东西。我展示的是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卫生部门、学校和地方政权都在同自然灾害作斗争，而没有美国那种无政府状态。

这个情景可不合胡佛的心意。如果费城的教友会愿意象我们过去反抗章鱼般的垄断势力那样为自身的独立而斗争的话，这一情况本可以对他们有很大助力。但他们没有走这条路，他们已同胡佛沆瀣一气。他们告诉华盛顿当局：我去莫斯科是未经准许的，他们认为我不负责任，擅离职守，加入俄国赤色分子的行列，再加上华盛顿原来就认为我是一个参加过西雅图“革命”的左翼劳工作

家,结果导致华沙的美国领事扣留了我的护照,那是我严格照章办事,在去莫斯科之前存放在他那儿的。在这件事上我比任何其他去莫斯科的记者都更守法。这叫我吃了不少苦头,在华盛顿花钱打官司,等待判决,直到弗洛伦斯女士证明我是如何去莫斯科的。

不过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我一离开华沙便投入紧张的工作中:为救济饥荒奔波了几周,作为记者发电讯,同伤寒病作斗争,在莫斯科的病床上为教友会写了许多小册子,然后回到华沙,艰难缓慢地得到康复。此后我才知道我是个无护照的黑民。不过即便我事先知道,我也很怀疑这是否能阻止我行我素。因为当我接近分隔两种世界的边界时,我曾相当平静地自言自语道,如果稍微开启的封锁重新关闭,我必须作出抉择:要么原路返回,再也看不到苏维埃国家,要么一往直前,永不回头,毫不犹豫地与美国永别。那道边界在那些年月里犹如出鞘之剑一样锋利。

从斯蒂芬斯的那句话激发了我的意志那一时刻起,我已经在通向莫斯科的旅途上飞驰了很远很远。

第九章 废墟中的理想 国度

我进入的那个理想国度已成为一片废墟：饥饿和瘟疫席卷全国。我们在西雅图目睹了资本家巧取豪夺、残酷剥削，曾推断这些弊病一旦铲除，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的好日子就会随之而来。我们考虑到，为了进行必要的重新组建，得花费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我们在西雅图搞革命时，由汽车司机工会负责的牛奶供应直到第三天才安排好。但是我们没有考虑到象俄国这样的非工业国家的落后程度、广大人民低下的亚洲式生活水准和物资的匮乏。我们更没有考虑到干涉与封锁造成的破坏，对这种干涉封锁我们根本没有足够的认识。我在波兰逗留的两个月已使我对战争的祸害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但没有想到干涉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内战外战打了七年，接着又是伏尔加河流域两年的干旱。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欧亚两洲之间的这块中央平原就经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随着地球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缓慢地流逝，这块平原逐渐干旱起来。平原上

过去那些巨大的内陆湖泊也缩小成为咸水湖，里海和咸海就是这些湖中最大的。平原上的河流不断变换河道，沙子河床变得越来越浅。如果人们不找出征服自然的办法，汹涌的伏尔加河总有一天要绝迹。

沙皇俄国的农民对此一筹莫展。他们用木犁把土地开出一条一条的浅畦，靠着祈祷和宗教游行求雨。无情的大自然使他们饱一年饥一年。在沙皇统治的年月里他们的命运一向是如此的，正象中国与之类似的地区今天的命运一样。可是1920年伏尔加河流域发生了旱灾，紧接1921年的旱灾更加严重，而那里的农业设施却破烂不堪，马匹也因连年战争大大减少。

成千上万的人被瘟疫和饥荒吓得惊慌失措，正在逃离这个我急于进入的工人共和国。整个波兰东部都挤满了这样的难民。他们是六年前沙皇军队1915年大撤退时被赶到东部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现在封锁一解除，这些人又被饥荒所驱赶，便大批回到他们过去的家园，那里自从他们离开之后已经成立了新的波兰共和国。哪怕能找到一点残存的房屋框架，也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剩下荒芜土地上的一堆瓦砾废墟。

在波兰巴拉诺维兹检疫站，我看到了成千上万这样的难民，他们身披六年前逃亡时穿的羊皮，浑身上下长满虱子，在风吹日晒下吃喝歇宿，生育死亡，处境十分悲惨。虱子传播了伤寒病，难民们一路走一路有人病倒。在通往明斯克的漫长道路上——这段路现在只需几个钟头，那时却得在被战火摧毁的小路上走一天多的时间——在黑暗中可以看到这些难民营火的亮光。难民们在掩蔽壕里、在被毁坏的棚子中、在地上的洞穴里蜷缩成一团，或者只好依靠树木那一点点遮盖。谁也说不出来他们的数目，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们就会送命。在长达一千英里通往死亡的路

上到处都留下了无人照管的坟墓。

比较有秩序的是那些搭火车到达边境的难民。他们经过莫斯科和明斯克时都登了记,并且在没有药品、肥皂和干净内衣裤的条件下尽可能给他们消了毒。我试图和他们中的一些人谈论他们仓皇逃离的那个工人阶级的国家。他们中的农民在革命中只看到了打短工,打仗和逃亡。有几个工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萨马拉看到了工厂。他们说老板和地主是没有了,由工人来主事。可是工厂倒闭、机器破损,没有食物、没有衣服、没有油、没有原料。他们说,在发生饥荒之前,他们的工资是每天一磅面包。我问还有什么,他们说除了偶尔有些鲱鱼和土豆之外,什么也没有了。纸币卢布根本不值得留。有的还说,有人抢劫工厂,用废铁换土豆和白菜的,可是工厂被拆得七零八落,就连这点来源也断了。饥荒甚至使每天一磅的面包供应也中断了,于是他们不得不逃荒。

尽管听了他们这番话,但我还是很难相信我理想中的国度已经遭到了如此的破坏。我看到铁路工人的帽子时很高兴。帽子上带有锤子和活动扳手交叉的路徽,被我误认为是苏联的锤子镰刀国徽呢。这个迹象说明毕竟还有正常运转的工厂在生产帽子。我高兴地打开我的食品篮——那是我最大的一件行李,别人告诫我说,那是用什么也换不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开始把巧克力糖分发给佩带着这些徽章的列车人员。这徽章是我所见到的第一件革命后制造出来的物品,我要让佩带着它们的铁路工人知道我是他们的同志,正要去莫斯科。这些铁路工人盯着我,好象以为我疯了似的,但他们把巧克力都收下了。在送了五六块之后我停住了,从他们的目光中我清楚地看出他们把我当成疯子了。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次旅途中与别人的第一次交往。我坐在明斯克车站的站台上,装食品的篮子放在近旁,这时一个鬼鬼祟

崇的犹太人走过来用蹩脚的德语问我：“有什么东西没有？”当一位赤卫军士兵走近时，他赶紧走开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他是个投机倒把的走私贩，想和我换点东西。那位赤卫军士兵赤着脚，态度和蔼可亲，用条绳子拴着步枪。我们列车上衣冠楚楚的波兰官员看到这情景时轻蔑地笑了笑。我想起华盛顿和瓦利福奇的景象，不由得憎恨起那个波兰人。带着大粮食口袋的农妇企图挤上车来，好把在白俄罗斯多雨地区相对充裕一些的粮食运到莫斯科去卖高价。

在明斯克一个为饥荒募捐的男青年来到我们的车上。他的衬衫和裤子都是用自织的麻布做的，而且显然除了这层衣服他什么也没穿。他虽然穿的比美国任何一个乞丐都要少、都要破，却保持着正式官员的尊严。他出示了一张盖有该市图章的文件，说明他是共青团员，有权为伏尔加河流域的饥荒募捐。显然，他并不认为自己需要救济，他是在帮助别人。我第一次认识到被国外的宣传所掩盖的一个事实：这个艰难困苦的国家正在从穷人那里募集援助来养活挨饿的人们。我后来听说，来自苏联公民的救济物资要远比来自世界上富庶的外国的救济品多得多。

在明斯克还上来一位身着破旧制服，表情忧郁的人，他在我的包厢里坐了一会儿。他看到我那些国外带来的行李，就叽哩咕噜地说了几句德语。我告诉他，我很高兴访问这个工人国家。他抱怨说，这是个腐朽、饥饿的国家，还说我要是有护照能够逃出去，那就幸运了，最好是离开这儿。我感到很惊奇，难道连一个满腔热诚的人也没有了吗？我又和一位从华沙去莫斯科的苏维埃信使攀谈起来。他是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似乎悒郁寡欢，但后来我看到他面带微笑地用手抚摩无名指的关节。

他发现了我注视的目光，解释说：“我的结婚戒指过去就戴在

这儿。现在不戴了，指头有点不习惯。我们共产党员决定把所有的金子都捐献给饥民。我结婚三十年了，戒指还从来没有从手上摘下过。我有一个儿子死在波兰前线。我的妻子正在莫斯科等着我。我们用不着戒指了。”

是的，激情已荡然无存。那种感情已在严酷的战斗与毁灭中耗尽了。全体公民也并不都忠实地支持这场战争。我一过边境就期待着看到一个由不向世界屈服、有着坚定信仰的社会主义者组成的统一国家。然而我看到的却是怨声载道，食不果腹的人民，许多人赤着脚，许多人在欺骗政府，大多数人都牢骚满腹。然而我开始注意到，到处都有人在默默无闻地、执着地，甚至是愉快地把全部心思放在如何使国家生存下去，而从不考虑自己的需要。这些人中，我开始发现，大多是共产党员。他们人数不多，似乎被淹没在一片混乱、牢骚满腹的群众中了。但是共同的目标激励着他们前进，并使他们推动那些消极的人一起前进。那时在这个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或许甚至更加公开化、更加残酷。那些能团结在一起的是胜利者。虽然他们没有精力去表露激情，但他们需要精力去进行斗争。

我来自美国，来自一个有着丰富感情、容易激动的国家。我还不能马上理解这些人冷酷的心绪。他们经历了战争的极度苦难，死亡已成了无关紧要的事了。我一到莫斯科就快活地去外交部。外交部的新闻司在大都会饭店最里边的一个角落里办公。负责人是魏因施泰因。我几乎还没有出示自己的证件就对他说，我想在俄国无限期地住下去，并想现在就开始靠苏联的配给生活，既然别人能够忍受，我也能。他对于我希望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的愿望没有表示出任何兴趣，只是说：“俄国此时的配给量很少，不能维持工作效率。你要是想干好工作，还是领取教友会给你的食物吧。”

我多少有点泄气，于是出示了国际新闻社的记者证，还爽快地提出可以发表他希望发表的一切声明。我不是听说俄国人想要对外进行宣传吗？“你们这边的情况还从来没有向美国人民报道过，”我有点多余似地对他说，“跟我说吧！我将用电报发出去。我会详细地引用你关于革命或者饥荒的言论。”我的提议与其说他高兴，倒不如说使他尴尬。

“你在这儿呆上一段时间，多看看，很快你就会知道该发些什么东西了，”他和善地说。“我可不是为你写电讯的记者。”我努力使自己成为他们的同志，却只落得这么个结果。这是我在莫斯科最初几天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

人民卫生委员部给我的印象也很深。驻莫斯科教友会的领导人阿瑟·瓦茨第一天就派我去那里。他没有译员为我翻译，而我又非常渴望立即着手工作。最后，他笑着同意了我的请求，让我不带译员试试。

“你愿意把第一批外国食品运到伏尔加去吗？”他问道。“美国救济署制订工作计划之前，还要派调查人员到整个伏尔加河流域巡视。这一耽搁很严重。我们知道饥荒的中心地区在萨马拉。成千上万的人正从那里逃离。教友会从我们在莫斯科的儿童救济品中省出两车皮食品来，不是那种配好的食物，而是罐装牛奶，可可、脂肪和糖，用来补充政府配给的面包。实际上，这些食品也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我想，把它们发放到萨马拉，会造成心理上的效果，使人们知道外国救济品到了。

“这是用俄英两种文字写的卫生委员部的地址。你去找运输部门负责人特列古博夫博士。他只会讲俄语，可他的医生能讲德语。把这张用俄语写的食品清单给他。问问他是把这些食品都运到萨马拉去呢，还是也运一部分到萨拉托夫。看看他有没有卡车把食

品运到火车站，还是非得由我们运。要他下令找车皮，问问他车皮是不是和卫生委员部的食品供应列车一块走，如果是的话，你能不能一块去。”

我拿着纸上写的地址向街上的行人打听，终于在彼得罗夫卡街十五号找到了卫生委员部。这是一座大楼，有着贯通的门廊。我还是头一次见识俄国式的房子，一个门牌号有好几个门。我试了两个大门、三层楼。每层楼都挤满了坐在办公桌后的职员，可没有一个人愿意看一眼我的食品单。我恼火了。这就是卫生委员部的苏维埃官员！他们对几车皮的食物并不关心，呷着淡黄色的茶水，连脸也不抬一下。我的证件，他们连用手接一下都不接。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沙皇政权遗留下来的迂腐的官吏。整个革命时期，他们都一直闲坐在那儿，再加上连年来的饥荒已把他们耗得精疲力竭了。他们是共产党人建立政府机构必须加以利用的原材料。

大概是因为我有足够的饭吃吧，我倒精神饱满，又很着急。当我找到第四层楼上那些冷漠的官员时，我已经想好了：即使这些职员无动于衷，上边也许有人很乐意得到这批食物吧。这回我没有再和职员们说什么，而是径直从他们身旁走过，看见里面有个门就进，好象自己知道要去什么地方似的。没有人拦我，根本没人管。我走进一间里间的办公室，那儿有三个人正坐在桌旁开会。我进去时，他们都看着我。我一言不发，递上了我的文件。

我猜对了，这些人一见到食品单，就立即行动起来。他们试着用俄语、法语和德语和我说话。当找到了共同的语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特列古博夫博士在另外一个办公室。我们正在开重要会议，不能和你一块去。我派一位会讲德语的医生送你到特列古博夫那儿去。”我们爬了十几段曲里拐弯的楼梯，穿过了几个办公室去寻找那位繁忙的运输部门负责人。医生终于找到了他，还给我当

了翻译。我进楼还不到半小时,就办妥了手续:我得到了运食物到萨马拉去的书面命令,他们还同意我坐卫生委员部的粮食供应车一起去。

那天给我的教训,我永远也忘不了。莫斯科可没有我在美国所习惯的那种办公机构。在美国,每一位下属都会为上司提供迅速、热情高效率的服务,而坐在里间办公室的上司则上班时优哉游哉,经常迟到,把具体工作都留给下属去做。俄国的办公机构混乱不堪,充斥着懒惰的人们,他们一点也不关心自己的工作。然而在他们身后某一个里间办公室里,上司却起早贪黑地工作,他们呕心沥血,使全盘的工作得以进行。他们不象那些职员那样只顾自己喝茶吃饭,只顾自己的那点事;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政权的每一项工作都与自己密切相关,至关重要。

我曾想象革命受到所有人的拥护,想象着过了边境就会看到一个无所畏惧的新天地。我看到的是旧世界在崩溃,人们在旧世界的废墟之下濒于死亡。而生活在这废墟之中的人们正在用残垣断壁建设起一个新世界,虽然有不少军队企图把他们埋葬在这片废墟之下。军队干涉使天下大乱,然而大乱之中还有建设者。他们象迷雾之中的火苗,互相映照,驱散阴霾重现光明。

我对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渴望化做一种强烈的感情。这儿有着真正的工作、人世间最重要的工作。我将成为动乱中的一名建设者。把食物送到饥荒地区,就是这项工作的开端。然而这还仅仅是个开始。我得马上学俄语,看我还能干点什么。我记起列宁在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过的一段话,在西雅图时我们曾经散发过这份报告。列宁说,苏维埃最缺少的是认真负责、高效率的工作人员。他的话是正确的,卫生委员部就是个例子。这正是我大显身手的地方。

按照正常的时刻表，火车从莫斯科到萨马拉约需四十多个小时。一九二一年闹饥荒时，我乘坐的特别列车则花十天时间。这是一列神奇的火车，装备有可做五万份配给食物的餐车、一次可烤制一吨面包的烤面包车、一个药品车厢和一个急救车厢以及为人数众多的工作人员准备的生活用车。这列车除了带有我那两车皮教友会赠送的食品，还有三十多车皮的食物。它仅仅是卫生委员部为救灾而使用的许多这种列车的一列，车上带有要求沿途车站站长加快列车运行的特许令。可是我们照样得在岔道上等着，等着修理机车，等着砍伐做燃料用的木头，等着一列列比我们的车还要破旧的、满载饥民的火车缓慢驶过，开向莫斯科。头五天我们走了四百英里。美国人的那种急躁情绪几乎使我发了疯。我觉得，不等我们赶到，所有人都会饿死的。

当我们又开动时，车窗被随风刮来的湿木燃料发出的火星照亮。我们这列车的医疗主任是位年轻的军医，实际上是半瓶醋的助理医生。连年战争和流行病使苏维埃俄国的医生奇缺。那些剩下来的医生要去治疗更严重的疾病，不能浪费在食物供给列车和一般的急救上。列车长问我能不能从外国救济品中分一些冬装给他们长期在露天工作的列车工作人员。”我们有二十四个人。去年冬天政府还给了我们六双靴子、十件大衣，今年他们什么也没给。除非我们的列车工作人员有御寒服装到室外去工作，否则我们怎么能在整个冬天每天给五千儿童分发食物呢？在欧洲大陆所有城市中，萨马拉的气候最奇特：夏天热得要命，冬天冷得要死。”

列车上一位官员的妻子在逗着她三岁的小孩玩，她还怀着一个不久将要出世的孩子，她想知道从哪能侥幸搞到一块为新生儿做内衣裤的布料。她旁边那位讨人喜欢、头发花白的妇女是奥伦堡市母婴委员会主任，她去了一趟莫斯科找内衣裤，刚刚回来。但

她是为了成百的婴儿，而不是为了一个。政府已经给了她一些棉布，可她没有毯子，也没有一点御寒的东西。她还需要油脂，眼看着婴儿们都瘦弱了。差不多所有的孩子都死了，没有东西给孩子吃……我们车厢里突然响起了婴儿的哭声。一位婴儿的母亲在我们停车时，把孩子放在餐车的踏板上，哭着说：“收下孩子吧。若不然我就得把他放在市场上。我没有吃的。撇下孩子，我或许还能挣扎到有面包的地方。”我们接过了孩子，对她说：如果他能活下来，就交给萨马拉的卫生部门来照顾孩子。

列车里的每个人都代表着某种急迫的需求。我转身去看窗外，听到成百骨瘦如柴、肮脏不堪的孩子的叫声：“面包，看在上帝的份上，给一小块面包吧，给一点面包吧！”他们纤细的腿几乎支撑不住身体的重量，他们举着瘦骨嶙峋的手，声音微弱地哭着。我看到一群群男女老少的农民在小车站上蜷缩在一起御寒过夜。他们都持有用来代替车票的政府颁发的通行证，正等着列车把他们运到有面包的地方去，在等的过程中有的人就死去了。

“你们怎么能这样救灾呢？”我忍耐不住了，大声喊起来。“机车每隔几里路就得修，车厢每天都要检查，总有一些人被抬出去。燃料是湿木头，还得一边等一边砍。成千上万平方里的土地象烧焦的荒漠颗粒无收，可在这么大的地方只有几条破烂不堪的铁路线。全俄国的人，不管是工人，还是官员，都吃不饱，穿不暖，因为营养不良而效率很低。这真是糟糕透了。这根本没有办法。”

“世上没有没办法的事，”索尼娅用清晰坚定的声调说。索尼娅和我共一个包厢。她是他们在莫斯科为我找的翻译。她利用自己一个月假期做救援饥荒工作。她是共产党员。她出生于一个居住在英国的俄国流亡者家庭，革命后回到俄国。在英国，她当过纺织工人；回俄国后，先在波兰前线当战士，后在一所军队医院当政委。

战斗中她曾两次负伤，得过伤寒、天花和疟疾。她有过丈夫，后来又离开他，上前线打仗去了。她总随身带着一把小左轮手枪。“以防万一他们捉住我，发现我是个女的”。

“过去我也总是认为有些事情是做不到的，”索尼娅接着说，“我管理过八个月的伤寒病院，在那儿一千人躺在无法消毒的木头地板上。这些人身上的脏衣服因穿得太久，只好撕下来，他们全身都烂了，身上的脏东西用手一摸就纷纷碎在你手里。他们肉里都长满了虱子，非得使劲擦或是用刀片刮，才能去掉。我们没床，没垫子，没床单，没毯子，没肥皂。医生护士过上十四天就会患伤寒病倒下，根本没有什么办法保护他们。你知道，当他们接触病人时，大部分人两周后就会得伤寒病。

“我过去也觉得没法办，但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我们征用了一所学校的大楼，只有这座楼大得足以安顿我们的病人。我们找来了一个洗衣服用的大木槽，在槽里给病人擦洗身体。我们通知全城（这是一个有三万五千人口的城市）要每家送一套内衣裤给病人穿。我们把病人的衣服撕掉后，他们都赤裸着身体。大多数人是无偿赠送。共产党员必须捐衣服。即使他们自己没有内衣穿，也得捐。我们共产党人在搞革命，需要我们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她谈到革命时并不仅仅限于过去发生的大动乱，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尚未结束的过程。

“负责逃兵的部门可帮了我的大忙。我们不枪毙逃兵，而是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我们派他们去做医院工作。这其实比上前线还危险，可他们对这个并不那么害怕。他们往往因脏、病而死，但不是死在枪口之下。让他们干什么活，他们都服服帖帖的干得很快，好不被送回前线去。每隔两周，我就招来二十个逃兵。两周后他们患了伤寒病，我再去招二十个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自己没有

病倒。别人都认为我有免疫力。后来在前线时我得了伤寒，那时我的体质一定很弱了，我曾两次负伤，又很脏，连着几个星期浑身上下都是虱子。后来我什么病都得过了：伤寒、天花，疟疾。

“可我明白了世上没有什么事是做不到的。总会有办法的，也许没有轻而易举、不需要牺牲性命的办法，但总归是有办法的。除了我们更加疲惫之外，这场饥荒同武装干涉的战争相比，算不了什么。我们已经有了巴库油田和顿涅茨煤矿，还修理好了一千多座铁路桥，就连被干涉军炸掉的萨马拉那里的伏尔加河大桥也修起来了。你想想，救济饥荒要是没有这座桥那会是什么局面啊！我们已经开放了边境，封锁已经被打破。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国外进口食物。我们国家还有黄金和珠宝，我们既然已经挫败了干涉，饥荒也别想阻挡我们。”

“可是会有几百万人死去，”我对索尼娅说。

她回答说：“已经死了几百万人了。”

我不知道她是否只是说在武装干涉战争中死去的数百万人（他们的死赢得了革命的独立），还是也包括为了军阀的利益和可憎的凡尔赛和约无谓地死在欧洲的几百万人。数以百万计的人将要死去，但是团结一致的共产党人将赢得最终的胜利。索尼娅已经不再去想那几百万人了。这个有着在艰苦环境中形成的人生观的索尼娅不过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比我还小十岁。在这可怕的重灾区，耳旁响着窗外孩子们的哭泣声，她拿过一本小说，就着烛光读了起来，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就想要两个孩子，我们俄国有的是孩子，可是能象我这样工作的妇女可不多。”

她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我吹灭了蜡烛。

第十章 饥荒线上

在一片灰蒙蒙之中，黎明静悄悄地、徐缓地降临到了我们车窗外的荒原上。这雾霭弥漫的黎明，象是戏弄般地把秋天的露珠撒到那早已被夏日的大旱灼死了的土地上。我们此时是在饥荒的中心地区，这里的大地由于干旱全都龟裂开来。我们离伏尔加河越来越近。随着黎明的到来，窗外孩子们的阵阵啼哭声已经静了下来。在这灰色的早晨，我看到了村庄的茅草屋顶。

我们继续缓缓前行。在那村庄外面，我看到了农民的土地。这地已经耕过，而且为了来年的收获而播种的冬季黑麦已经吐露出了头一茬青绿的嫩苗。苏维埃政府给这个庄稼全部都旱死了的重灾区调来了种子。我可以想象得出为征集这些种子要花费何等大的努力，并且在沿这条破烂不堪的铁路线运送种子的时候又要遇到何等的困难。这个地区的农民在他们自己孩子啼饥号寒的哭声中，在纪律的约束和控制之下，饿着肚子去耕耘大地，撒下政府调来的种子。待到来年收获季节来临之前，很多

人可能已经死去，而活下来的人将把庄稼收割回来。

于是我找到了我的报道主题。我要用电报把这些情况报道给大洋彼岸的那片吃穿无愁的土地。在俄国以外的新闻界中流传的那些耸人听闻的传说我都知道。什么在惶恐之中医院被烧毁啦，什么农民们在逃亡时发生暴乱啦等等。我也认识这样一位记者：他跑到伏尔加河畔，说：“鲜血，让我看到鲜血！让我看到那些被饿狗吃掉的尸体。”然而我所要报道的是一个更为伟大的故事——这故事就是，在这种纪律的约束之下人们播下种子，但他们自己却不能活到收获的时候。我一定要讲的是在成百万上千万的死亡之中不断延续的生命的故事，是明斯克一个赤脚的男孩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他人募集捐款的故事，是一列食品车上的乘务员没有鞋穿，没有大衣，在严冬的暴风雪中为了喂养五千名儿童而辛苦劳作的故事。我一定要讲的是发生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的故事——在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每一座城市、村庄都遭受了长年战争、内战的毁坏；在这里由于封锁的缘故火车仍然是被迫靠着应急的木头燃料蹒跚向前，在尚未完全修复的路轨上其行进速度之慢令人不能忍受；然而，就是这片国土，它组织起了它的城市，训练了它的农民把生命所剩余的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一个共同的斗争之中。它的奋斗不息的青年，甚至包括那些姑娘们，都确信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美国西部大平原和城市中的人们。我必须使用最为简明的词句。我决不能涉及莫斯科的政治，决不能提起布尔什维克或共产党人，也不能常提苏维埃，因为这些字眼会在许多人心中激起奇怪的、莫名其妙的怒潮。我所要用的必须是那些美国人听得懂的词语，如“卫生局”的列车，“教育委员会”下属的儿童之家，“地方当局或中央政府的救济工作”。我必须把这一切都告诉大洋彼岸那个我所熟悉的国度中的男男女女，不论他们是

生活在草原、山区还是城市，好使他们感到这一切绝不是关于一群怪模怪样的异族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家中死去的荒诞传说，而相反却是完全可能发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中的事情，假如他们也以同样的英雄气概进行同样的斗争的话。

所有这些便是我在后来的四个星期里报道回去的内容。在希兹兰我同索尼娅分道而行了。她仍留在那列食品列车上，我带上一篮子吃的和一封介绍信乘上了跑得快一些的邮政火车。一夜之间，我就到了萨马拉。在萨马拉车站，我一见到帽子上有红十字标志的人便把那封介绍信塞给他看。当索尼娅随着她那列火车三天之后到达时，我已经在第二列食品列车上安顿了下来。这列车一直是定期在萨马拉车站工作的。于是我与当地负责卫生保健和教育的部门商定了分发食品的试行办法。可是索尼娅却感到十分不安。她告诉我说，在这里，就连医生和教师也都是强盗，因此必须由萨马拉执行委员会对这些人施行有效的监督。委员会要核查他们得到的每一磅食物。索尼娅为此作了安排，她又设法弄到了一套马车供我们每天用几个钟点，这样我们就可以去访问那些慈幼机构。她还想办法在我的电报上都加盖了公章，这样就可以通过萨马拉杂乱无章的邮局把电讯发出去。

我就住在萨马拉车站的一列食品火车上。每天早晨我都是在五千名儿童的嗡嗡低语声中醒来。他们极耐心地从黎明时分等到中午，为的是那用来维持生命的一餐粥，或汤、或面包和可可。怀孕和喂奶的母亲们也排队等待，她们为带着的孩子领取一份食物。他们大部分是露宿于车站周围的农家妇女和孩子。这些农民从死亡笼罩的村里逃出来，等着搭车去那有面包的地方。在他们之中还包括准备去遥远的波兰的难民。所有的火车都被这些农民挤得满满的。他们还爬上了车厢和车头的顶上，有的人由于饥饿和

疲劳，一松手被甩下车顶，摔死了。那些孩子和那些带着孩子的女人是最为衰弱的了，然而他们又是未来的希望。正因为如此，保健部门既然无力兼顾所有的人，便专门救济他们。

每天我都得从塞满了车站的几千人中间挤出去。这时候要想不招上一身虱子，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一天洗一个澡也没用。我得去负责卫生和保健的办公室、负责教育的部门、儿童之家以及医院，去安排如何分配那几车厢的公谊会供应品。我们带来的主要是炼乳、鱼肝油、食糖、可可以及其他类似的食物。这些东西的很大一部分要调拨给保健部门负责的各儿童医院和婴儿之家。另外一些要送到教育部门管理的儿童之家作为定量供应以外的补助。我们还带了好几百磅肥皂，这东西象食品一样急需。大家一致同意把这些肥皂分配给那些臭气熏天的“收容站”。这些“收容站”负责看管、检疫并遣送数百名每天从萨马拉街上捡来的孩子。他们都是被父母从遥远的村庄带到这里，可是父母又养活不了他们，便把他们抛弃街头。于是萨马拉地方当局便赶紧在一些破楼房里组织起了这些紧急收容站。这些破楼房的墙上和窗户上还留着捷克斯洛伐克干涉军入侵时留下的痕迹，地板上到处是破木碎瓦。饥饿的孩子们成千上万地被送进了这些破楼房，他们患着霍乱、伤寒和痢疾。他们没有肥皂，也没有可以更换的内衣或是外衣。他们在地板上乱扔些肮脏的东西。我们就象往一只饿疯了的猛兽口里扔食物一样，把数百磅的肥皂送进了这些收容站。

除这些收容站之外，有组织起来的正规的儿童之家。在儿童之家里的孩子都经过了检疫，并按年龄分班的。这座饥饿不幸的城市不得不几乎每天都得组建起一所这样的儿童之家。在这些正规的儿童之家虽然还没有褥垫、床单、书籍或衣物，但这里有良好的秩序。我看了一个已经建立了两个月的儿童之家，每天孩子

们都按部就班地上课。最低班级正在学着讲俄语。这场饥荒使十几个民族的百姓背井离乡，流离失所。这些民族自从中世纪时的那次大规模移民以来一直与外界没有任何接触和交往。在这所儿童之家里就有六个不同的民族，莫尔多瓦族、楚瓦什族和另外四个民族。程度高一些的班级在学着读那些从萨马拉的瓦砾堆中捡来的零散书本。只有那些最高年級的班级才学着写字。而这所学校仅有六支铅笔。

然而萨马拉的教育当局在看到了我的物品清单时，竟意想不到地对我说：“这些巧克力糖数量太少，实在不够用来做食物供应之外的补充。因此还是让我们利用这些巧克力来搞一次数学活动吧。让我们所有的儿童之家在他们的算术课上根据萨马拉儿童之家里全体儿童的总数来算出他们可以分得多少块巧克力。然后让每一个儿童之家选出自己的代表，凭由学校委员会标明应得数量的书面证明到你的列车上去领取巧克力。”

后来接连两天的早晨，孩子们的代表都来了。他们脸色苍白，但却都很自豪，每个人都带着由他所在的学校签了字、盖了章的证明文件。我们把巧克力送到各儿童之家，看孩子们分发巧克力糖。结果，所有的儿童之家里没有任何一个孩子在份额之外要求得到更多的一份。我感到十分惊奇。人类社会有组织的生活竟有如此战胜死亡和混乱的力量。通过纪律和教育，正常的生活以其在革命中确立起来的全新的形式重新降临到了人们之中。动乱中的开创者们创立了这种新形式的生活。对他们来说，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组织能力贯穿于整个饥荒时期。

每天夜里我都通过国际新闻社把白天的报道发到美国去。我把写好的电讯稿送到一个乱糟糟、慢腾腾的邮政局。那儿没人懂英文，只有一个办事员认得拉丁字母。于是他就照葫芦画瓢似地在

电报机上把电报稿拼写出来。这个邮局看起来实在太杂乱无章、太不认真负责了，我不敢肯定他们是否确实把那些电文发了出去。而且我始终没有收到能使人放心的答复，既没有来自遥远的西方的答复，也没有来自莫斯科的答复。甚至在我完成了救济工作，打电报请示今后的工作时，我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我感到极度孤立无援，就好象我是从火星上发出信号似的。只是在过了一个月之后，我才听说我的那些电讯传到了美国，而且西方报界还特别突出登载了“一个美国姑娘发自苏维埃饥荒中心的报道”。

日复一日在萨马拉我结识了许多新的动乱中的开创者。其中有布拉兹南斯基博士，她是一位女医生。她在一个连木板和钉子几乎都找不到的城市里组建并装备起了一个产科医院。她以极大的干劲，从那些被战争破坏了的楼房外面的瓦砾堆中，仔细拣回了床垫弹簧、铅管和破铜废铁。还有一位是一家工厂的经理。在索尼娅“假期”结束回莫斯科去了以后，他充当了我的翻译。此人是俄国犹太人，出生于纽约东区，其貌不扬，然而当他领我去看他的工厂的那两栋破楼房时，他的脸上却漾起了光采。为了修复萨马拉被毁坏的房屋，他在这两栋破楼里创建了一个门窗厂。

然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普里阿耶夫了。他是萨马拉附近一个小村庄的救灾主席。他现在仍活着呢，还是已经死在那次饥荒之中了？当我遇见他时，他已经是饿得瘦骨嶙峋，这与那些因饥饿而浮肿的大部分灾民的情形完全不同。他拒绝吃那种掺了磨碎的树皮和稻草的代面包来充饥，而其他人正是因为吃这种代面包而全身肿胀的。他当时还是注意保护自己的肠胃的，这些器官帮助他控制饥饿引起的阵痛。我看到他在村里受到人们的拥护，我还见到了他那些仔细统计出来的清单。自从饥荒以来，一千七百人中间已有二百多人逃荒在外；在剩下的一千四百七十七人当中，七十

九人有够吃一个月的面包，可没有一个人的食品能持续到圣诞节。“现在有一千三百三十三人都在吃那种用草、树叶和树皮做的、掺有极少一点粮食的面包，”他一边告诉我，一边拿给我看这种又黑又硬的“面包”。接着他又说：“四天前，在我家里，我们还有一块真正的面包。”

在普里阿耶夫的村里，我分发了公谊会的最后一些衣物。当时我坐在村苏维埃的屋里，看着衣服一件件地分出去。救济委员会按照登记有全村各户的名单把衣服逐一分发出去。农民们慢吞吞地走进来，听着叫名字，然后又走出去。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都可以进来听，并且发表意见。他们中有的人抱怨说：“我们也有没衣服穿的人，他们整天在家靠着炉子。难道不能给所有的人都分上衣吗？”……“要所有的人都分上衣，那的确不够。我们现在只能分给那些最贫穷的人，”普里阿耶夫说。于是，人们也就没有更多的抱怨之辞了。

那天晚上，我们请普里阿耶夫一起吃饭，我们准备了一块很大的面包。“我真想把你们打算给我的面包带回家去，”他在踌躇了一下之后对我们说。我们后来得知，他把面包带回去同他的妹妹还有他妹妹的孩子们一起分吃，而每个人最多只能分上几口。几个月之后，当我听说许多救济委员会主席在他们的岗位上忍饥挨饿，严格地遵守那条把救济粮只发给儿童的铁一般的法令时，我便想起了普里阿耶夫。后来有几个救灾主席到底给饿死了。此后随着美国救济品的运到，那条铁一般的法令便放松了，救济站的工作人员也可以分上食物了。然而不知普里阿耶夫是否挺到了那条法令放松之时？不过我想，他的意志是不会垮的，即使是在死神降临之时也不会。

我第二次来到普里阿耶夫的村庄时，是作为美国救济署的工

作人员来这里组建食堂的。当时我们公谊会的食品已经分发完毕，我正在等待莫斯科的新指示。就在这时，胡佛救济组织载着成车厢的食品到达了萨马拉，并立即着手建立它的地方机构来分发救济品。虽然当时俄国的每一个村庄都有自己的救济委员会，有无粮户的名单，也有征来用作食堂的房屋，可是所有这些全都不合那些美国人的心意。他们要求在每个村里有他们自己的特别委员会，而且在特别委员会中不仅要有当地官员的代表，还必须有当地的牧师代表。这虽然使各村都感到有点惊愕，但他们还是照着做了。“面包是一种武器！”由于美国救济署缺少人手做组织工作，而我当时又有的是时间，于是我就乘上了他们的卡车到分属于五个乡的中心村庄去组织起第一批作为样板的地方委员会；同时发给每一个委员会一份可以从设在萨马拉的美国救济署物资基地领取食品的领货单。…普里阿耶夫的那个村是我挑选的样板之一，因此他也到萨马拉来领取了食品。

就这样我最后一次见到了他。这也是我对他的印象中最为记忆犹新的一幕。这是在一家旅馆的房间里，房间很大，但往日的豪华已经消退。住在这房间里的是一个美国救济署的人。他是从里海沿伏尔加河北上，一路进行调查来到这里的。不过这人与当地的救济工作没什么关系，他所要做的只是向华盛顿报告这里的情况。他此刻坐在萨马拉所能提供的最好的房间里，享用着一桌丰盛的酒饭：浓浓的俄罗斯红菜汤，子鸡，还有葡萄酒。他酒足饭饱，显露出一种近乎挑衅般的心满意足。在他身旁的地板上成篮子的火腿、罐头、葡萄酒以及贴着外国商标的烈性酒。

普里阿耶夫并不留意那些吃的东西，而只是盯着看那个人的制服——这是一套用上等料子做的军官的制服，钮扣、肩章金光闪亮，而且熨烫得平整笔挺，就象是准备去参加阅兵式似的。普里阿

耶夫自己那瘦削的身躯此时穿的是打着补丁的亚麻粗布衣服和破旧的羊皮袄。他过去就是穿着这一身衣服在赤卫军里同侵略军作战的。他以前见过这类制服，同样华丽的毛料，同样闪亮的装饰，只不过颜色有所不同。他见过沙皇的军官穿这种制服，他见过干涉军的军官穿这种制服，他曾把穿着这种制服的人统统打翻在地。可现在他看见这制服又回来了，这次是穿在美国人身上。这些美国人在运粮的名义下沿着那经过艰苦斗争夺回的整个伏尔加河从南向北，一路边观察，边报道，而且竟还是在苏维埃的保护之下。

接着普里阿耶夫才把眼光移到了那一大篮一大篮的食物和葡萄酒上。他的眼睛里露出的不是饥饿的神情，而是不安和轻蔑。难道是他过去同战友们一道推翻了的那个旧世界又重新回来统治伏尔加河吗？眼前的这个人到底预兆着什么？他又转过头来看着我，仍旧是满腹狐疑。那天早晨我坐在他所在的村苏维埃的屋里，而今晚却又坐在这个军官的房间中，我到底是什么人呢？那天他高兴地收下了我发给他的食品领取单，可他想不到拿着这个证明来领食品，竟会遇上这样的怪事。他搞不懂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我在干什么？

这就是我见到普里阿耶夫的最后的一面，而且差一点也就成了我目睹那两个对峙的世界的最后的一面或者同世人相见的最后的一面。在萨马拉我紧张地工作着。白天我从事救济工作，夜晚我又忙于完成记者的写稿任务。在经过了四个星期旋风般的繁忙之后，我突然染上了伤寒。这可一下子把我从一个未来的“动乱中的开创者”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粮食和医院空间的耗费者，而这两样东西在萨马拉来说恰恰是最为宝贵的。

第十一章 伤寒与风暴

当医生说 I 染上斑疹伤寒之时，我就从紧张的工作中解脱了出来。得了伤寒便什么事都可以原谅了。

它为我因剧烈的头痛而中断工作五天做出了解释；同时也使我那近乎狼狈的虚弱以及我和我的护士所占据的那一整间病房都可以得到谅解，须知，在当时一间病房原是可以接纳三个儿童的。我当时是那样的虚弱，晚上不能入睡，早晨无力梳洗，这使我日夜都在哭泣。所有的俄国护士根本没有时间顾及给病人梳头这种事情。她们只是把一盆水放在我床边的一把椅子上，然后递给我一条毛巾，可我一下就把那毛巾掉到了地板上。我哭了，因为我连一条毛巾都拿不住了。我成了一个没用的人，比没用还糟；我在成为别人的累赘。

我羞愧地想我为什么没能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就离开？或者，要是我能再多坚持一天，那该多好啊！在千里之外的莫斯科和华沙，他们在等待着我的回音。那盼望已久的电报已经来过，并且叫我回去。我的车票也都买好了，

是那天晚上的火车，我的衣物也几乎都装好了箱子。这是几个星期以来头一次用一节专门车厢来把记者们和救济工作人员从萨马拉运送到莫斯科去。就在这时候头痛把我打倒了。我没有力气走了。他们对我说：“要是火车上有个医生就好了，或者要是再有另外一个女人也好，那么我们会把你背上车去，因为萨马拉实在不是个生病的地方。不过，明天恐怕你可能起不来床了。”他们说对了；我没能起来，一连几个星期都没能起来。

到第五天时，医生曾试着让我看自己胳膊上的那些表明是斑疹伤寒的小黑点。为了避免唠叨，我就撒了个谎，说我看到了。实际上当时要我把眼睛集中起来注视某件东西是十分痛苦和困难的。所以，至今我也不晓得斑疹伤寒看上去到底什么样子。可是当我象是躲进一个巨大的宽恕之所似的又沉回到伤寒中去的时候，我还是以得到了解脱般的心情长吁了一口气，对于超负荷的工作以及稍加小心便可避免的愚蠢来说，这还算不上是什么惩罚；这也不是流感，要是在家的话我也会患流感呢。眼下是虱子传染的斑疹伤寒——这是战争和饥荒的产物。我来得太晚了，未能赶上战争；由于我可享用公谊会的食品，我免受饥饿之苦。唯有这伤寒成了在动乱中我与他们同当之难。这是我为自己能参加那些建设者们的行列所付的加入费。

对于我那声宽慰般的长叹，医生似乎显得有些不高兴。“这是很严重的病，”她带着责备的口吻对我说，然而她不懂在这种令人惭愧的终日无所事事的情况下，恰恰是这病的严重性使我能够随遇而安。“有很多人死于这种病吗？”我问她。她赶紧缩了回去，忙说：“哦，那倒没有。你可千万不要想到死。”就这样，我想到了死，在头痛的迷乱中，长时间地恍惚想到了死，同时又决意要与之抗争。在萨马拉，走上死亡这条路是不会有结果的，即使是

一次宣传性的葬礼也不会有。我不能死，我不能在刚刚度过了六个星期的新生活之后就死去。

剧烈的头痛使我整整七天七夜都睡不着觉。医生给我的镇静剂也毫无作用。第八天晚上她给我换了一种药。“这种药会起作用的，”她对我说。结果那天晚上，整夜我都在做恶梦：我踉踉跄跄地走在一片荒凉的沙漠上，一群疯狂的哥萨克人不停地追逐着我。他们叫喊着：“你顶不住了。”我惊醒过来。在筋疲力尽之中我感到十分恼怒。这医生连一宿安稳觉都不能给你，她还有什么用？在那象是存心报复似的最后一阵清醒中我这样想：“我要是疯了，那就活该那医生倒霉。”几乎就在这同时，我的确发疯了，我从萨马拉逃了出来，乘坐在一架柔软温暖的飞机中。

我来到了芝加哥的圆形大剧场，开始向成千上万的人们讲述关于这大饥荒的一切。他们必须赶快把食品运到那里去！在这集会中我看到了我妹妹的脸庞，但我却不能停下来看看她，我得到英国去作报告。我无法在费特街公谊会办公处的门前降落。街上到处是出租汽车，实在太危险。于是我去找弗赖伊小姐。我一直追到了她在乡下的那栋房子的三楼上，可是二楼工人在闹罢工，把楼道堵塞得谁也上不去下不来。这儿的水喝下去就象是在喉咙里塞了一团棉花似的。我真没想到在英国他们的水竟如此恶劣。偶尔他们给我一个柠檬，柠檬汁穿过那团棉花真是好吃极了。这是他们从伦敦用一只皮箱带来的。可当我向他们再多要一个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说到土耳其斯坦的交通运输已经中断。这借口简直是疯话！

在萨马拉之外的城墙上情况就好一些了。就象中国人的长城一样，我们筑起这道城墙是为了挡住成群的饥民，在这黑暗的茫茫大草原上，饥民象狼群似的哭嚎着。究竟是狼群呢，还是一支在

落日的余晖中摇旗呐喊的军队？他们在前进，他们向南、向北拉开自己的队伍，他们从四面八方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但是他们却攻不下这座城池。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对于我们来说，世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的城墙既高又厚，而且非常之长。它横卧于黑暗的平原之上，一个塔楼接一个塔楼地向左右两方伸延到很远很远。每一个塔楼上都由一名孤寂的哨兵在那里守卫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直到在夜色中再也看不见他们为止。在我脚底那笔直的城墙下是一条宽宽的护城沟，沟中堆满了人的尸骨。雷电的闪光照亮了这累累白骨和那些在远处包围着城墙的人群。可是他们无法从我们这儿通过，他们过不了我们的城墙！

我乘着飞机在一个叫作南森城的地方越过了北极圈。这是极地的一个小港湾，有不少悬崖峭壁。在北海上空，极地之夜象是一堵不可抗拒的黑墙在向南推进。一群小船绕过暗礁和悬崖急匆匆地拼命向港口驶去。极地之夜追上了一只小船，把它吞入无尽的黑暗之中。我不喜欢那极地之夜，我不要到北极去！飞机向南飞向那阳光普照的天空。地面景色在我的下面急速掠过。

忽然，我听到一个粗暴的声音：“你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吗？”……不，我不是，我不是在萨马拉，不是在那座凄凉的城市，那儿的那位医生曾想把我的房间要去，给三个生病的孩子住。几年前我就离开了萨马拉，并且不愿意再回去。然而美洲、欧洲以及整个地球都在我的下面极为平稳地旋转着，接着一个飞机场突然向上升起，并在萨马拉追上了我。我十分困难地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有着大玻璃墙壁的病房里。他们告诉我说，我已昏迷了七天。

随着体力的恢复，我开始注意周围的人们。这儿有一个手脚麻利的人，这人总是非常及时地弄来一些冷水给我喝，并且总是把

我的床褥刷得又干净又整齐。然后又帮我翻过身来。她的动作轻得让我几乎都感觉不到。她就是公谊会从莫斯科派来的英国护士。她是在我得了斑疹伤寒后的第十天到这儿来的。她带了一个可以垂下床的床罩，还在包里装上了一个柠檬。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她照顾了我这么久，给我擦洗，轻轻地劝我吃东西，可我还不知道她的名字。后来问了医生，我才知道了她叫什么。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帕蒂森、帕蒂森，”想记住这名字。但这全是徒劳。她一走进房间，我就再也想不起她的名字了。我这么不知情达理，她对我会有怎么样的想法呀？

当时在那儿还有一个护士。对这个护士，我从未感到内疚。我记得住或记不住她的名字，全没关系，她一点也不在乎。她也并不期待能得到什么。她是伏尔加河畔的一个农村姑娘，从德意志共和国回来。她在美国学过英语。她就象是收获时节的黄土地那样的健壮而沉静。每当她那结实的双手一触及到我，我便感到生命之泉流入了我的身躯。她每天就蜷缩在放在我房间里的一张小帆布床上。对她来说，睡在哪里，吃什么样的饭食，都无所谓。然而很显然她十分乐意接触人。我在她的触摸下起死回生，而我还用不着费心去表示感谢。

很多天以后，我问她叫什么名字，问她为什么总是默不作声。她告诉我说，医生不希望她讲述她的经历来烦扰我。可我自然还是坚持要她讲给我听。她说她爸爸是伏尔加河边马克思塔特的一个技术娴熟的木匠。家里有八口人。全家曾去过美国，但是就在战争开始前又回到了伏尔加河畔。自那以后，他们就一直在苦难中生活。由于在马克思塔特没有东西吃，她便和几个伙伴一起离家外出去谋条生路，到德国，或塔什干，或者随便其他什么地方，只要有面包就行。然后她再接全家去。于是我考虑一个技术娴熟的木匠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一份工作呢？这姑娘在萨马拉的火车上无法弄到个地方。冬天已经到了，她连件外套都还没有。没有外套，她就无法继续她的旅程。

那天晚些时候，一个救济工作人员来看望我。我问马克思塔特的情况如何。“糟透了，”他说，“死的死，走的走。”

那医生是对的，我真是不该听这段悲惨的故事。那姑娘再也不是象收获时节的褐色土地那样使人感到安慰、舒坦了。当她走进房间时，我就把脸转向墙壁，使劲地想一个木匠带着六个孩子能在什么地方找到糊口之粮。只是过了很多天之后，我的神经才变得坚强起来，把她所遭受的那些不幸置之脑后。一个人非得使他的神经变得麻木不仁，他才能在饥荒中挺过来。然而从那以后，只要有她在，我的心就再也不能象从前那样平静了。可这都得怪我自己使这姑娘成为了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再是一棵令人心旷神怡的绿树。

就在我躺在萨马拉缓慢地恢复的时候，周围的饥荒却在越闹越严重。这情况我是从那位英国护士和那些路过萨马拉去布祖卢克的救灾人员嘴里听到的。教友会的救济基地眼下就在布祖卢克。我听说了从迢迢千里之外的满洲里开来的那列火车。它一共挂了三十五节食品车厢，车身上还写着：“哈尔滨救济委员会致饥饿的俄国。”我又听说一列外交列车载着阿富汗的第一位大使从塔什干开往莫斯科，途中经过了萨马拉。我还听说在火车站的急救医院，灾民们排成了长队，可是医院把这些绝望的人们打发了出来，说：“你们没有病，你们就是饿的。”从村里出来的年轻小伙子现在都已经饿得步履蹒跚。孩子们也都得由大人抱着，因为他们已经弱得根本走不动路了。这些孩子，还有小伙子们，都正在死于同一种病。而这种病，除了食品可以治疗外，其他任何药品都无能为力。

我躺在医院里，透过玻璃内墙，见到隔壁一个患了斑疹伤寒后正在恢复的年轻女医生。她在听了她母亲带来的消息后发疯了。他们家变卖了所有的家产，买回了一百磅面粉和十磅食糖。可是一群强盗冲进她家把面粉偷抢而去。那女医生当时就疯了。她站了起来，冲出去要夺回那面粉，可是她当时还根本无力行走。这，就是面包的含义，即使对那些享有政府定量供应的医生们来说也同样如此。

教友会的同行讲起在布祖卢克的救济工作。那里也有儿童收容站，就象萨马拉的难民所一样。教友会一直在帮助这些收容站，可是不久就被要求停了下来。因为那里的农民们在知道了收容站里还有吃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抛弃自己的孩子，结果被父母抛弃的孩子越来越多，以致于无处可住。于是当局说：“首先要把食品调去救济村里的人，使他们安稳地呆在家里。”可是马匹却饿得倒了下去，无法再驮运食品，远处的几个中心村镇始终没有派马匹来。只有一天从很远的一个村庄里来了一个人。他踉踉跄跄地挨到布祖卢克来报告说，他所在的饥荒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是要么死了，要么在患斑疹伤寒，而且根本找不到可用之马了。那人被送进了医院，他浑身烧得滚烫。教友会于是开始到塔什干去买回喂马的稻草，以免运输彻底中断。

一天，我收到一封从美国来的信，信中还夹带了一份菜单。这是一条来往于大西洋两岸的轮船上的菜单。我们把它在医院里大声地念了。大家都在笑，又在哭。我们把这菜单保存了一个星期，并把它拿给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看。这菜单并没有引起大家的羡慕，因为这简直象是一场虚幻的梦。它引来的是充满怀疑的厌恶和轻蔑的笑声。菜单开头是橄榄、泡菜和两三种汤，然后是三种不同的鱼和三种小菜。接下去便是极其奢华的鸡、鸭、肉食，还有色

拉。最后是很多水果、甜食及五种乳酪。可是第二天我们就注意到这菜单上省掉了一样东西。面包！可见面包的供应已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又一次都笑了起来，同时又在哭：世上居然还有人认为面包是理所当然会有的。

冬天，南森乘坐的那列特别救济列车把我从萨马拉医院的病房送到了在莫斯科的公谊会寓所。这里给我准备了一个床位。我当时需要好几个月卧床休息，因为伤寒过后，血栓又接踵而至。我是躺在担架上被抬到萨马拉车站的。因为下雪，车站到处都是白茫茫的。到莫斯科后，一辆救护车穿过冰雪覆盖的街道把我送到了公谊会寓所。生活又恢复了它日常的程序。有关饥荒的消息每日都被送到我的床边，而我此时已不再是那种无力自助的状况了。我在两膝上横放了一块木板，然后把手提式打字机放在上面，拼命给在英国和美国的公谊会救济运动写出一篇又一篇的报道。这些报道印了成千上万份，而且还在许多会议上宣读。

冬天越来越寒冷，饥荒也越来越严重，形成了更为巨大的恐怖。这恐怖透过暴风雪时常在我们面前隐约闪现。公谊会的寓所里常常是挤满了救济工作人员。他们从伦敦赶到这里，却因为暴风雪阻断了铁路交通而无法继续东行。我们发出了一列又一列挂着食品车厢的火车，它们都朝着萨马拉的方向开去，然后便消失在暴风雪形成的一条巨大的白色幕布后面。除了偶尔有电报来说又有一个我们的救济人员因患伤寒而倒下外，再没有别的消息回来。

一天半夜，我突然惊醒过来。只听见隔壁房间里的一个声音在说：“美国救济署的那个男人发疯了。他想要数清谷仓里的那些尸体，但他总数不过四十八。那里停了几百具尸体，可是他终日都在不停地说‘四十八，四十八’。不过，他倒用不着停下来，第二天早晨他就全都好了。”

我猛地坐了起来，然后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讲话的人是海克。他是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三星期以前，他离开了我们去了解有关饥荒的消息。他一直在暴风雪的那一边，现在回来了，我一看到他的脸，便叫了起来：“你病了吗？”他听后笑了。“倒是没有病，只是在冰天雪地里冻了十天。没有吃的，没有燃料，也没有水。就是那趟你一直在等待着的塔什干列车。”

他讲到了仓库中成堆成堆的死尸。死尸身上的衣服都被扒了下来留给活着的人用。“没人有力气能把那些尸体埋进那冻硬的土里，”他说。“那些活下来的人会在春天去埋葬的。”他还讲到孩子们哭号着同饿狗争抢一点点面包屑。“我看到因饥饿而脾气暴躁的男人们在打孩子，挨了打的小孩都象是死了一样的倒在地上，呻吟着。那些狗也是一样，遭打之后全都匍匐着爬到一边去，毫不作任何抵抗。要是有点吃的东西可抢，那些狗和小孩子们就要争一争了。”

他经过了很多村庄，然而只有在救济站周围才能见到一些生命的迹象。他看到了有些男人因吃人肉而被逮捕。他们弄死了一个小男孩，然后把他分吃了。另外一些吃人肉的倒没有杀人，他们只是偷死尸吃。有人问过那些囚徒，人肉什么味，他们说：“相当好。你用不着放很多盐。”他们简直是些毫无良知的人。

海克说，最严重的困难要算是运输了。长年的战争破坏了铁路线，地方运输也由于马匹的死亡而中断了。运送难民的火车在岔道上一等就是几天。而在这期间，原来挤得满满的车厢却因不断有人死去而变得空荡起来。他所乘坐的救济快车就曾在布祖卢克与奥伦堡之间被一场暴风雪困阻了十天之久。当时在那里，狂风席卷了乌拉尔山脉以南数百英里的地区。他对我们说，“车厢都在晃动，就象是要被刮翻似的。第二天，风小了一点。于是我

们有一百人下了车，沿铁路线去挖找我们的火车头。车头原是为去帮助一列货车的。可是它自己却被封在大雪之中。我们一共十二个人走到了车头被困的地方。我们清理出了一小块地方。在回来的路上，我们不停地摔倒在大风刮成的雪堆里，然后又挣扎着爬起来。在黎明之前有一个人因筋疲力尽终于倒下死了。几天以后，在我们把那货车挖出来的时候，又死了一个人。

“我们在火车里生活了十天，象疯了似的不停地往奥伦堡和萨马拉发电报，然而都没有回音。我们出版了一份小报，名叫《无效警报》。我们都希望那上面登载的消息全是真的。当时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饥饿，也不是寒冷和黑暗（我们的车厢里没有灯）。最严重的问题是渴。我们始终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把雪融化成我们可以喝的水。结果是终日因口渴而坐卧不宁。

“最后终于从奥伦堡来了一辆汽轮扫雪机车。同时一列载着一千五百名复员军人的火车自萨马拉启程，中途恰好经过我们受困的地方。他们一路上边清扫铁轨，边往前开。当他们快要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便把我们的行李车厢沿铁路推到了好几英里以外的地方藏了起来。然后我们又自己把自己终日反锁在车厢里面。这是因为那些搭救我们的人一个个全都饿得如狼似虎，而且一共有千五百多人。我们生怕他们会要吃掉我们剩下的最后那一点食物。瞧瞧，我们竟然还得要提防着来营救我们的人。

“到了梁赞之后，就剩下最后六小时直达莫斯科的行程了。这可把我们高兴得要发疯了。于是大家开始唱歌。生病的躺在卧铺上唱，身体好的在过道中来回走动，一边唱，还一边叫喊着。开头唱的都是些无聊的小调和一些瞎编的歌，后来大家就唱起了民歌和革命的歌曲。就这样，我们开进了莫斯科，载着隔离车厢里的二十名伤寒患者。他们之中有两人已经死去，还有两个正在弥留之

际。其余的人，不论是生病的，还是没病的，都在喊着，唱着。”

这就是海克从悬垂在我们与东部地区之间的那道白色风暴幕布后面带回来的故事。第二天傍晚又一列火车出发了，载着许多我们的救济人员开往饥荒地区。两天之后，暴风雪又一次卷土重来，而我们则又一次开始等待列车的归来，而且一等又是十天。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星期接一个星期地度过了整个漫长的冬季。与此同时，在那风暴的幕布后面，在那覆盖着皑皑白雪的广袤无垠的大平原上，在整个伏尔加河流域，人们同饥荒展开的搏斗在继续着。

“很可能，”莫斯科的一个妇女曾这样说道，“很可能自然灾害会打败我们。很可能我们俄国人建设不成共产主义社会，因为我们太落后、太贫穷，太筋疲力尽了。很可能我们会象是又一个巴黎公社那样被载入史册，仅仅起到预示未来的作用。这样在将来的某一天，某些西方先进国家中的工人阶级就可以从我们这血的厄运中汲取他们为争取胜利所需要的经验教训。”这位妇女的名字这里就不必提及了，因为从目前她工作得挺出色这一情况来看，她不会愿意回忆起她在当初那些日子里的灰心沮丧。

正当一些同这位妇女一样的理想主义者因想到革命已经失败而自杀的时候，正当共产党人在饥荒前线，在暴风雪和伤寒之中奋战、死去的时候，新经济政策之下的第一批资本家侵入了红色首都。沿街两旁私人商贩的小铺就如同雨后春笋般地迅速滋生出来，集市上回响着投机商的叫喊声。夜晚，更有那些板起脸孔的奸商，带着他们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人，在莫斯科这饥饿之城的咖啡馆里欢宴作乐。

第十二章 制高点

人们常问我，是什么东西吸引我又回到莫斯科的。我初次到莫斯科时，它正处在最艰难的时代。五个月里有四个月就是在病床上度过的。那些日月在我身上留下的痕迹永远不会完全消失。在这样大的国家里，我生活得一点也不舒适。五个月中，我没有尝到过淡水，没有喝过鲜奶。我没有见到过重要人物，看到的都是护士、医生、农民和小官员。我既没有看到高效率的工作，也没有看到任何成就。我所看到的是无燃料的火车，无灯光的街道，毁坏了的工厂和挨饿的村庄。伏尔加河畔的这座城市在我记忆里是一座污秽、混乱和死沉沉的城市。

我也不能过分地夸大我工作的重要性。我在萨马拉曾救过一些人的命，通过我用小册子的宣传，救济金增加了。我向遥远的美国比较翔实地报道了苏俄的情况。但几个月来，我却成了累赘。我收到美国教友会的一封信，指责我不该来俄国；这使身体虚弱的我很多个夜晚睡不着觉。我的俄国之行是一个傻瓜的冒险，我以此来为疾

病开脱。

不过,我从来没有想到我要永远离开这个国家,离开这个在混乱中诞生的新世界。正是这片混乱和混乱中的开创者吸引了我。我有意要分享这种创造。毁坏的建筑物、糟蹋成土路的混凝土马路和被破坏了的铁路,激起我强烈的战斗欲望。美国不再是世界的先锋了。世界大战把它降为帝国主义国家首领了。从前我认为,现在还是这么认为,俄国是人类战斗的最前线。

我在莫斯科恢复健康的最后几天,医生允许我每天可以出屋一两个小时,我利用这个机会同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以便在我与教友派的合同到期后能使我回去。我见到了卡尔,当时他是美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位美国共产党人。他同意为我安排房子和配给,并说,如果我愿意留在莫斯科,作为一些劳工报(包括我自己的西雅图《工会纪事报》和一些新办起的共产党报纸在内)的记者的话,就按照当时实行的“共产党工资”每月发给我二十五美元。我同意了条件,答应三个月后回来。

在华沙我用了两个月的时间边工作,边养身体,在英国又呆了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与教友会达成的合同。我即将离开伦敦去莫斯科之前,国际新闻社(赫斯特报系)让我当他们驻苏联的兼职记者。他们还说:“我们不反对你以‘安尼斯’的笔名为劳工报写文章。”我表示,如果劳工报纸不反对我这样做,我自己也不感到双重工作太累的话,我就同意为他们写文章。当我到达莫斯科时,我发现卡尔已经走了,他没有为我安排房子、配给或工资。受他委托的同志得知国际新闻社给我提供的工作,高兴得跳了起来,因为这样就解除了他们对我承担的责任。想到我曾对此犹豫时,我微笑了。我同意为资本主义报纸写文章来养活自己,并在空余时间为劳工报纸免费写稿。我以这样的方式工作了许多年。

去年冬天，我在莫斯科街头邂逅几次，日益猖獗的投机买卖和私营商业使我心烦。我把这个问题提到克拉斯诺晓科夫那儿，这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共产党要人。两年前，我们在西雅图《工会纪事报》上发表过一篇关于他夫人在日本侵略西伯利亚时逃跑的故事，那时她相信丈夫已经死了。他作为游击队领导人、远东共和国主席幸存了下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是莫斯科财政委员部副人民委员。

“告诉我”，我说，“我应该怎么看待这些正开张的商店？其他记者和美国救济署的人为此欢欣鼓舞；他们衡量莫斯科的进步就是看它有多少百货商店和能买到什么东西。在我看来，每一步看上去都是一个失败。这个城市正在变成通常的亚洲人的市场，讨价还价，尔虞我诈。可怕的新暴发户在增加，看戏观众由工人变成了炫耀老婆的小商贩，他们比美国资本主义还粗俗。为什么一定要为此而高兴呢？”

克拉斯诺晓科夫说：“如果你看到一个挨饿的人，你想养活他，但好的食物都已分发出去，于是他到垃圾车里去捡肮脏、沾染了细菌的面包渣，你会为他不再挨饿而高兴，但你心里是不会舒服的。这种私营商业是垃圾车里的食物；具有资本主义的贪婪、欺诈等各种弊端。但这毕竟比让他们挨饿好。

“要是我们的政府能够对工人说，‘给你们六个月的粮食’，那么政府便可以要求他们：‘为我们生产’。如果我们能够对农民说：‘给你们农具、衣服和盐，’我们就能要求他们生产粮食。只有在物质生产富裕的基础上才能建立共产主义，而我们连温饱还没有解决呢。我们是从一片废墟上开始建设的，又被迫打内战，并遭到封锁，遇到流行病灾难。

“工人们以最大的革命精神在挨饿的情况下设法进行生产，希

望把生产的商品送给农民，以换取面包，可是他们生产的东两没有送到农民手里，却投入了战争。出于本身利益或因为被强迫，农民给了我们粮食，并相信我们以后会给他们提供商品，但粮食没有用到生产上，而是送给了军队。接着，我们连续两年干旱，造成饥荒。

“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坦率地对人民讲：‘政府无法都养活你们，也无法为所有的人提供工业品，我们将经营最需要的工业部门，养活这些企业里的工人。’其余的人必须采取任何办法去自己养活自己。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允许私营商业和私营车间存在。要是他们能够养活在他们那里工作的人，那是件好事，因为别人养活不了他们。以后，待国营工业生产有剩余了，它们便会扩展，从而挤掉私营行业。”

他慢慢地补充说：“外国干涉不仅掠夺了我们的物资，还夺去了我们的同志。每当我们布尔什维克打算进行革命时，我们总是想到我们以后还要在那里过日子。但我们现在知道，我们中的多数人会在革命中献出自己的生命；共产党人在每一条战线上都是首先被杀害。唉，要是现在我们那些好同志都活着的话，情况就不同了。我们的人力和财力枯竭了；我们必须训练新生力量，创造新的丰富的物质条件。”

他的这番话使我暂时放了心。但是，当我于一九二二年春末作为赫斯特报系记者回到莫斯科时，我发现在我不在的三个月期间它好象变了样，从一个依靠配给维生的同志城市变成一个漫天要价的投机商城市。新经济政策使苏俄变成了两个世界的战场：一个是工资很低的、通过配给控制职工的国营企业；另一个是迅猛扩展的私营商业。私营商业十分引人注目，而在混乱中进行开创工作的较早的那个同志世界则变得不显眼了，必须去找，并且很难找到。从表面看来，生活是无情的竞争，无限制的谋利。

我与这种表面生活的接触是从寻找一间房子开始的。一位活跃、矮小的妇女答应租给我一间由厨房改成的卧室，早晨供茶，晚上供餐，一星期索价十二美元。在昂贵的莫斯科市，我发现这是最便宜的；我欣然接受了。但她却犹豫起来：“我必须到房产委员会去，”她说。下个星期，她一再提高房租，絮絮叨叨地担心房产委员会找麻烦，所以我就把这处房子放弃了。

一位朋友解释说：“除非她让房产委员会来‘安排’，否则，在她承认有一间多余房子时，房产委员会会立即没收她的房子。”

“难道这房子不是她自己的吗？”我问。

“这个年头，很难弄清楚究竟什么东西是属于个人的，”他回答道。

我另租了一间房子度过夏天。它属于一个有钱的贵族。我用这两个字并没有夸张。太太倚在长沙发上，用法语讲话。她解释说，过去，整个七间房的公寓都属于她所有。后来可恶的无产阶级进来了，只给她留下了一间房。她保留了最大的一间，把她所有的东西都堆到里边。这间宽敞的卧室简直成了古玩杂货铺：旧衣柜、床、桌子、盘子、镀金枝形吊灯和各种古玩、奢侈品乱七八糟地堆放在角落里。革命以来，一直未清理过；要移动所有这些东西是不可能的。这位太太被放在大理石桌面上的煤油炉吓了一跳。她说，革命前，她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一顿饭。从大理石桌子上的杂乱情况来看，她显然从此以后没有洗过盘子。我让她浪费了我四天时间。我急于得到一间房子。她也害怕房产委员会。

接着，我突然冲破障碍来到同志们世界。通过朋友们的辗转介绍，在国家出版社担任重要工作的苏恰诺娃接待了我。她在大都会饭店有两间房子，由于她丈夫去德国，空出了一间房子。未经房产委员会批准，没有要钱，甚至连见我也没有见到，她就捎话说：

“请带着你的东西于今天上午十点钟我上班之前来我这里。”

她给我一张铺着薄草垫子的木板床和一张写字台；她往墙上又钉了两个钉子（当钉子钉入昂贵的硬木板墙时，我不由得一楞），对我说，现在可以把衣服挂上了。她把我当作一位好同志对待。我需要她所需要的那种条件：一块工作和挂衣服的地方和一张睡觉用的有垫子的木床。她匆忙地赶到办公室，到半夜才回来；接着，她又打开台灯，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三点钟。

我在莫斯科中心的这套房子里和苏恰诺娃一起住了两个月。我不能象她那样工作到深夜；午夜之后我需要睡觉。我学会了不闭门睡觉。我从来不知道第二天早晨会有多少人来我们的房子。她经常在这里开委员会会议，会议经常开到街上没有汽车的时候才散。因此，与会的人索性睡在地板上，第二天直接回他们的办公室。不管什么人来，房里有什么就吃什么。一旦没有什么吃的，我们只好饿着肚子到第二天。他们对吃、穿、住都不在意。他们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在治理国家上。这就是执政阶级的风貌。

从深夜的谈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一种奋力治理这个国家的坚韧不拔的意志，一种冷静、赤诚的意志。有了这种意志，多余的人类情感便早已不复存在。他们注意到各种滔天大罪，视之为社会问题的一部分。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勇猛顽强，前仆后继，要世世代代战斗下去。然而，每当我离开那座房子时，我总是觉得好象这些热情工作的同志们一定会被大街上越来越厉害的牟取暴利的大暴雨所淹没。这些夜以继日工作的有觉悟的人们是在增多呢，还是在减少？

人们至少可以看到，国家组织得越来越好了。一条接一条的铁路为广大乘客开放，记者们也开始旅行了。过去那些不注射霍乱预防针就不能去的地区也消除了霍乱，限制已经取消。快车上

正在竭力想办法提供毛毯，但还不能提供被单。当著名的下诺夫戈罗德博览会开幕时，每条路上都有卧铺车厢，甚至还有飞机航线。西伯利亚快车重新运转，并设有餐车。

全莫斯科市掀起了维修热。在每条街上，我不得不闪开正在修理的人行道或粉刷着的建筑物。陪伴我在大都会饭店工作的是刺耳的铁器与石头的碰撞声，工人们正在铲掉破砖断石，修理在内战中被枪弹毁坏的饭店走廊。在第一个夏天，莫斯科修复了六座毁坏了的桥梁，另外承包出去四十二座桥梁；街上的有轨电车增加了一倍，路线也加长了；还修筑了十万平方的鹅卵石人行道；那时还没有柏油路。

在城里的广场上和林荫大道上点缀着十二万平方的绚丽花坛。入夜，孩子们嬉戏于街头，青年男女愉快地漫步。

伏尔加地区饥荒带来的后果仍未消除，但其他地方每个人都为新的收获和不断增多的食品而高兴。六月，苏恰诺娃和她的朋友为我从美国救济委员会买来的白面粉和果酱而高兴地大声喊了起来。她们用这些东西开了个晚会。到了八月份，这些东西则成了食品供应的附加品，根本不值得再另外跑一趟了。六月份，我的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借我的衣服。我们差点儿为我那件能一般挡雨的老式雨衣争了起来。而到了八月，她们到柏林去休假，回来时买的新衣服比我的还多。每个人都去休假了。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世界大战开始以来第一次停下来喘喘气。但是“够吃”仍然意味着一日一餐，大约早晨五点左右吃一顿饭，上午和晚上再加些茶和面包。又过了一年的时间，他们在早饭时才吃上鸡蛋、黄油或粥，并开始有了午餐的习惯。

在这些令人喜欢的同志圈外边，有人却在大肆捞钱，他们的猖狂和无耻程度比我在美国所看到的还要厉害。美国商人来谈判，谋

求特许权。他们多是华而不实的人，冒险来到俄国未开发的土地上，希望迅速获利。他们宣称，全部恢复都要归功于私营商业。俄国已接受了教训。它正尽快地恢复正常。所谓“正常”就是资本主义及其老的生活方式。

所有表面的生活现象看来都已证实了他们的话。这些新来的人有许多发财机会。“垄断莫斯科公共汽车”仅是我听到的一个机会。体育协会已经垄断了俄国的全部体育用品。他们用从中赚来的钱支持他们的组织。作为副业，他们从德国买了一辆公共汽车。这辆公共汽车在莫斯科大街上一天就挣一百卢布。“如果某人愿意资助我们购买十二辆公共汽车的话，”他们说，“我们便能垄断莫斯科的公共汽车交通。仅一辆公共汽车，还谈不上垄断！”他们寻求外国资本家同他们合作。

在美国呆了一些年，如今在苏联工业单位工作的一位年轻技工让我看了制做电灯泡金属部分的冲模。“列宁格勒有一个国营工厂，”他解释说，“它一天做两千个电灯泡。如果有了机器，他们一天可以生产二十万个电灯泡。他们从德国进口灯泡的金属部分；我有七个想在这里制造这部分的技工。如果我们有几千美元，我们便能组织一个小车间，与国营工厂签订合同，向它提供金属部件。将来有一天，他们会把我们买过去，但眼下还不会这么做。他们首先将增加他们灯泡的总产量。根据生产金属部件的合同，我们将同他们一起扩大生产。”他的两眼闪着亮光。他似乎看到他自己立刻就会变成百万富翁了。

甚至一个政府部门也让我看了一份关于愿意建立俄国—美国贸易公司的文件。文件规定，苏联政府应该占公司一半的股份，美国资本家占另外一半，公司应垄断苏美贸易。一九二二年为此要求的外国资本数额是那么小，我想只要我到纽约也能筹集到。但是，

他们又收回了这个计划。“我们关于此种合营的政策尚未敲定，”他们说。“目前，越来越倾向于在工业部门推行特许制，而把能够迅速赚到利润的贸易部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看起来，许多事情都未定下来。小型国营工业或者合作社组织与外国资本家讨价还价，希望获得惊人的利润。他们甚至愿意达成暂时协议。然而，这些协议还没有来得及被上级批准，大多数已经成为废纸。但是，当时的气氛类似于西方的一个繁荣城镇，似乎任何事情都是可能出现的。发小财很快，人们梦想发大财。谁也不知道有什么界限，将允许私人资本发展到什么程度。

共产党人知道，他们将尽量缩短私人资本的寿命，尽量限制其发展。而这一点，别人还不大相信呢。他们知道已经订出了消灭私人资本的计划；但是，他们不知道消灭的速度有多快。

他们的计划是掌握工业的“制高点，”从而控制其他小企业。他们对资本主义了解之深超过多数资本家。他们知道它的力量源泉。他们把土地、自然资源、银行、外贸、铁路、全部重工业和所有大型工业企业全都掌握在自己手里。国家掌握着四千个大型工业企业，拥有一百万工人^①。他们愿意把拥有八万工人的四千个小型企业租给合作社或私人资本。城市土地和建筑物是市政府的财产，市政府的预算依靠它们的租金。零售业和无数零散企业落到了任何愿意推行经营的人的手里。但是，政府利用它的批准权和区别对待的规章制度引导私人资本的投资方向或者完全把它压垮。

“我们掌握制高点，”共产党人这样说。一九二二年，在我和我们许多人看来，经营得最差的、赔钱的企业全部由国家包了下来。国家银行拥有的唯一资本是迅速贬值的纸币卢布。国营铁路完全

^① 到1934年，国营企业拥有二千三百万工人。

陷入混乱。顿涅茨煤矿因长期的外力入侵而毁坏，矿工们跑到农场去谋生。钢产量仅占正常生产的百分之五。巴库石油井积了很深的水。全部制高点都成了被毁坏了的山丘。但是，轻工业和零售业却能迅速赚钱，这些部门都掌握在资本家手里。在我看来，这些企业有一部分是正常的。我们在西雅图已看惯了作为“公共事业”的没有盈利，或赔钱的国营和国营企业。社会主义也许正是这种情况的延伸吧。

但是，它使我担忧。私人猛赚钱的劲头大大超过那些改进迟缓的国营工业。“革命老朋友”重来莫斯科时，变得越来越灰心。“除了亚洲式的市场之外，什么也没有了，”他们说。外国商人则对此颇为振奋，他们留下来还价。外国帝国主义者等待更大的崩溃和更好的条件。当我回顾投机商自鸣得意的那些日子时，今天很难理解他们究竟陶醉于什么幻想，竟然期望私人资本繁荣和获得最后控制权。同样的幻想导致独立派相信他们有可能推翻垄断势力。同样的幻想导致西雅图工人相信，小型繁荣的工人企业有可能和平地赶走资本主义，直到政府下令关闭造船厂，打破他们的美梦为止。我看到，同样的幻想在一九三四年的加利福尼亚也出现过，那时失业的工人相信，他们的小型企业正在一个旧壳里建造一个新社会，虽然全部命脉都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们靠信念来生活；而俄国共产党人则靠研究经济法则来生活。

国营工业大肆投机，牟取暴利，不以为耻，比私人资本家犹有过之，因为他们更无所畏惧。我不禁要问：难道这样的国营托拉斯果真是社会主义的吗？很明显，这一点并没有使工人们担忧。他们不仅对国营企业利润不断增加而感到欢欣鼓舞，并为之做出惊人牺牲。他们牺牲假期来制造市内有轨电车或机车车辆，作为向“五一”节的献礼。虽然我对国营托拉斯的“贪婪风”感到担心，但我也

受到了工人们这种态度的感染。然而，我是用理想和感情，而不是用基本经济发展法则来看待这个斗争的。

国家银行行长在经济学方面给我上了第一课。我去问他：他是用什么炼金术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价值一千万美元的迅速贬值的纸币卢布转换为价值二千万美元的黄金。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九二二年的一月，当时国家银行刚开张，我想知道为什么把支票换成现金要用一个小时。他和蔼可亲地微笑着，他给我的回答使我终生难忘。

“同志，你知道我不是一个银行家，我受的主要教育是呆了十年沙皇监狱。现在我们需要国家银行建立黄金储备。我们可以在两种行长中进行选择：一种是希望我们国家银行失败的内行银行家，另一种是象我这样的愿意用其生命来使它成功、但却一点也不懂银行业的人。就这样，他们让我来负责，而让内行的银行家当我的助手。我必须使他们老老实实工作，不要耍花招。”这实际上也是整个俄国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

数月之后，我又见到了他。他让我看一堆堆金条和一摞摞英国、美国货币，当时这两种货币在世界上是坚挺的，他开办银行时那价值一千万美元的纸币在头三个月就贬值三分之一。然而，他却换来了价值两千万美元的黄金。“你是怎么把纸币换成这个的？”我吃惊地问他。“政府的货币制造者却不相信货币，这是为什么。”

“任何政府都不相信货币，”他立即微笑着说道。“但他们要使自己的人民信任货币。统治者相信的是煤、石油和自然资源——世界的真正财富。”

接着他作了解释。“我们向国营木材托拉斯提供贷款。他们用纸币卢布偿还他们在俄国的账。他们向英国出口木材，还我们英镑。我们不仅从贷款中获得利息，还可分享他们的收益；有时我们

拿走他们收益的一半！毛皮工业也很赚钱，在外贸中赚百分之二百或三百的利润；我们分享相当大的比例。我们对所有从国外寄来的汇款收百分之十的黄金。”

“怪不得国营工业称你们为强盗，”我惊愕地说。这个无情的银行家微笑起来。“共产党允许这个强盗政策，”他说，“直到我们有了黄金储备为止。”

高级金融业就是这么简单！自从上了那堂银行业的课之后，在后来的一些年代里我便很懂到施廷内斯的钱是从哪里弄来的，很懂得贩卖波罗的木材的英国商人和通货膨胀国家里的所有其他暴发户的钱是怎么弄来的。国家银行满不在乎地向我表明，当一种货币贬值时，他们可以用此种贬值的货币付给工人和借钱者，然后到国外去换取外汇，从而赚取数以百万计的钱。施廷内斯就是如此掠夺德国中产阶级，自己发了财。美国出口商在新时代就是如此牟取暴利。俄国国家银行被允许如此“掠夺”正在挣扎的工业，获得黄金储备，然后用这种储备来发展这些工业。

国家银行向我表明了金融威力的秘密，而工业银行则向我表明了它通过信贷紧紧控制工业的情况。快到一九二二年底时，我参加了国营工业管理人员会议，他们正在反对国家银行的控制。

国营工业被称作“托拉斯”，这个资本主义字眼使我迷惑不解。我们独立派曾反对过美国托拉斯。我不喜欢苏俄使用托拉斯这个字眼。随后，我看到它们的形式与资本主义的托拉斯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它们的股份是由国家掌握着。它们由一些工厂联合而成，受董事会的领导，董事会成员部分是工程师，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承担任务，设法使自己的工厂自力更生，自行发展，否则，在他们一汇报情况后，就要被撤换。

他们是在极端不顺利的情况下开始他们的斗争的，设备被毁

坏了，没有钱发工资。顿涅茨煤矿工人派代表到莫斯科申诉说：“我们在齐腰深的水里工作，吃少量黑面包。请给我们吃的和修理矿山的资金。”但是，莫斯科回答道：“现在还不行！你们要提供煤炭，以便维持向灾区送粮的运输线和冶炼钢铁之用。在饥荒年代里，我们只能为你们供应目前这么多粮食。明年你们也许得到一些工资。”

矿工们继续提供煤炭，直到他们断了粮食，然后跑到农场去找吃的。整个顿涅茨的工会大楼里贴满了因为要吃饭而停止供煤的“逃跑者”的名单。他们还贴了一些“英雄”的名单。这些英雄们在工作岗位上垮了下来，但当他们能够站立起来时，便又立即返回工作岗位。他们在内战中和第一年的和平时期就是这样开采顿涅茨煤的。到了一九二二年，顿涅茨煤矿工人使铁路和工业重新用上煤炭，不再象内战期间那样使用木头作燃料了。只到那时，他们才开始得到工资。

他们是通过采取断然手段做到这一点的。他们扣押了铁路存入国家银行的资金。国营铁路因此抗议说，他们自己的工人有数月没有发工资了。“我们的任务比开矿更艰巨，”他们争辩说，“他们可以把最坏的矿井关闭，而我们却必须使全线畅通。我们没有周转资金，但又必须装运货物，等待付款。让我们征收战前运费的一半，这样，我们可以把铁路修好。”……莫斯科对这种要求不高的请求回答道：“不要收那么高的费，否则你们便要搞垮挣扎中的工业。”

一九二二年上半年，这个饥饿的国家无偿地从工业和交通业中拿出价值七千万美元的产品供养饥饿的农民和工人。当一九二二年的收获给农民提供了一些资金时，棉制品、火柴、盘子之类的工业品第一次可以要价了，从而支付了生产费用。于是，它们较快

地得到了恢复，而钢铁这样的重工业则仍然处于灾难性的状况中，生产水平仅仅达到战前百分之四到七。

在这种情况下，国营工业代表在莫斯科开会反对国家银行滥用信贷权。“你们用了一年时间积累黄金储备，”他们说。“你们借钱给次要的工业部门，因为它们能最快地收回成本，但是这样一来却搞垮了工业。我们要求拥有信贷权，以制订统一的工业规划，促使它有步骤地得到恢复。”他们得到建立“工业银行”的权力，国营工业、铁路和外贸委员部握有其股份，他们特有的信贷权不是用来建立黄金储备，而是迫使工业部门执行联合规划。

“我们把原棉借给纺织托拉斯，”新银行行长向我解释道，“并迫使纺织托拉斯把某些纺织品拨给服装托拉斯，而服装托拉斯则奉命以贷款的方式把服装送给顿涅茨矿工。向煤矿提供的这种信贷使我们可以把煤炭赊卖给某些搪瓷业，并要求它们把壶和盘子送到西伯利亚的伊尔比特皮毛博览会上去，而皮毛托拉斯从那里购买皮毛后出口到伦敦。我们银行拿皮毛托拉斯的这些外汇再进口原棉。对工业部门就是如此严密控制信贷的。我们用它来加强全国工业委员会对整个生产系统的计划，从而把我们的全部工业建成为社会主义的牢固基础。”

对于我来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如此直率的讨论。信贷权和金融与工业的关系是公开的代表大会和工人会议经常谈论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其他国家则是私人利益集团的秘密。人们曾对我说，这些问题太复杂了，普通人弄不懂。我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些问题故意弄得神乎其神，唯恐普通人懂得他们是如何被金钱统治的。在苏联，所有工人都可以听取关于他们共同财产的详细报告，参与决定，并付出英雄般的努力，从这些战争遗留下来的烂摊子中重新建立起这些财产。

不管充斥市场的投机者的疯狂叫喊，他们痛苦而缓慢地组织和加强了他们经济生活中共同拥有的“制高点”。

第十三章 北部边疆

当莫斯科在两个世界之间正奋力打开一条狭仄道路时，全国其他地区在发生什么事呢？“你一定要来卡累利阿看看，”努奥捷瓦说。我在外交部新闻司曾看到过他，他最近已被派往北部某个荒凉地区去工作。“我们管理伐木工人的部门正在千方百计为国家采伐价值十亿美元的木材。在卡累利阿有许多湖泊，几乎每一个渔民都可以有自己的湖泊。”

我大笑起来。我已经听惯了西方人的大话。努奥捷瓦谈边境地区时说得是那么轻松愉快，以致吸引了我。我不知道共产主义思想或标志着新经济政策的投机倒把思想究竟深入到莫斯科以外多远的地方，在边远的北部森林地区哪一种思想占上风？

在卡累利阿，夏天的午夜可以看到阳光，秋天可以看到北极光，而冬天则笼罩在北极黑夜的阴影下。在一望无际的茫茫原始森林里，交织着十万多个湖泊，蕴藏着大理石、云母、铁和铜的山脉杂陈其间。它从列宁格勒延伸

到北冰洋，绵延近千英里，宛如一条又长又细的带子飘在芬兰和北海之间。它是芬兰的后方，在反革命夺取首都赫尔辛基时，芬兰革命者便逃到这里来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摩尔曼斯克铁路贯穿全境，这是苏联与北极不冻港相连的唯一的一条通道。

我第一次见到卡累利阿主席古赫林是在莫斯科，他是来这里表示反对给他那年轻的政府增加额外地区的。在战后的欧洲，每一个政府都在争夺新的土地，强迫人们归顺。他的态度则不同，我惊奇地非要问个究竟不可。他说得很简单：“这是为了便于管理。他们想把通过我们水路可以非常容易到达的大片地区划给我们。然而，他们那里的人讲俄语，而我们卡累利阿人讲芬兰语。这样会使我们的教育问题更复杂化，在我们召开的所有会议上必须要讲两种语言，因此，我们不想要那个地区，但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暂时把它管起来，直到能建起一条铁路，从列宁格勒可以直接到达那里时为止。”

我大声笑了起来。“我希望你能把这个明智的想法向波兰人宣传一下，”我说。“他们正在争夺四种不同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与众不同的语言。也可以向捷克人、或者罗马尼亚人，或者南斯拉夫人宣传一下，或者向战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宣传一下。他们都在拼命地想扩张领土。如果他们都能有卡累利阿那种想法，对国际联盟来说，那就好办得多了！”

“是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这是比较简单的，”古赫林微笑着说。“除非为了方便，我们没有其他理由分割领土；我们没有私有财产。”

“现在，你谈到所有权这个问题，那么卡累利阿的财富属于谁所有？”我问道。“是属于莫斯科，还是属于卡累利阿政府？你们是否为此而争吵？”

“我们为什么要争吵呢？”古赫林说。“我们卡累利阿各级组织

有多大发展力量，就有多大的财富。我们靠中央政府的贷款向南方借粮食和衣服。全国至关重要的大规模富源将由全国性组织予以开发。我们没有关于所有权的斗争，只是地区之间有些比赛，看哪个地区开发得最快。这一方面决定于地方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决定于中央计划，我们参与制订中央计划。”

“既然所有权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越边界，”我问道，“为什么你们称自己是一个单独的国家？”

“还是为了方便，”古赫林微笑着答道。“我们有一个自己的语言和与别人不同的历史文化，还有某些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因此，我们有一个单独的国家来处理教育、卫生、农业^①、地方法律和法院问题。但是关系到全国的事情，比如铁路、邮政，以及木材、矿产或水力资源等，必须由全国来处理。这是一个明智的分工，然而，在私有制社会里，要办到这点是不可能的。”

于是我访问了卡累利阿。在随后的日子里，我了解了卡累利阿热爱古赫林主席的原因。一九三四年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仍然是他们的主席。他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曾是芬兰的一位贵族，曾任赫尔辛基大学统计系教授和芬兰银行的董事长。然而，他又是革命的领导人。当反革命势力席卷芬兰时，他镇静地坚守在维堡的岗位上，组织其他人民委员撤退到瑞典。自此以后的六个星期，他一直藏在下水道里，到了晚上，他才到地窖里呆一小会儿。每天早晨，他都听到头顶上的嗒嗒的机枪声，数以百计的同志被打死在监狱的院子里。在这之后，他来到卡累利阿工作，他和他的全家住在政府大楼里的两间房子里，办公室在楼下。象苏恰诺娃和她

^① 由于全国大规模农业集体化，需要全国统一计划，因此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农业是由全苏委员部负责的。基本土地政策在全国是统一的。

——原注

的朋友一样，他们一家睡在木板或者地板的床垫上。他是一个镇静的、不辞劳苦的人，为了满足平民百姓的需要，他不分白天黑夜地工作。

政府成员住在政府大楼的其他房间里或大楼周围的木板房里，他们从不想个人发财致富。个人虽穷，但他们手中却掌握着一个未被开发的广阔地区的森林、矿山和采石场；他们一讲就是多少百万……他们说：“去年，尽管有灾荒，我们的木材仍有一百万美元的盈利。”但是，这一百万美元的盈利是用于卡累利阿的国家预算的，而不是装进他们自己的腰包。他们自己刚刚开始领取货币工资，他们希望当地商店或者他们的配给卡不久将除了给他们粮食外，还给他们衣服。他们一直忙于勘探、开发和建设，没有时间去考虑个人的舒适安逸。他们是开拓者，是一种新型的开拓者。

维尔泰姆和他的英国妻子住在古赫林主席的隔壁。我和他们同住在两间房子里。维尔泰姆在革命中不止一次死里逃生。现在他帮助组织卡累利阿的外贸工作。曾掌管卡累利阿各种工业部门的撒科斯曼是一位老芬兰工会工作者。在革命时期，他负责把一列列装载食品的火车带到彼得格勒，其中一半车厢装备着机关枪，用来扫清前进的道路。农民出身的皮特耶夫现在是卡累利阿农业部门的领导人。经济委员会领导人是老布尔什维克肖特曼，他曾是一个小委员会的委员，该委员会和列宁一起确定了发动十月革命的时间表。

他们都是真正的人，都有光辉的过去，受过坐牢和死亡的考验，在难以置信的艰苦条件下取得了成功。现在，他们已转向重建被战争毁坏的国家的任务。他们的前进仍然受到战争的威胁。革命以来，每年一到芬兰的沼泽地和湖泊被厚雪覆盖，可以通行时，便发生战争。过去的五年，年年冬天如此。来自西方的白芬军、德国

军和来自北方的英军、美军同来自南方的俄国红军相遇，战于卡累利阿雪野。后来，这种干涉慢慢变为小规模の边境战争和土匪骚扰。我来之前的那个冬天就发生了这种战事。白芬军在一九二二至二三年冬天会再次进攻吗？这是大家都在问的问题。

“每一个冬天，”有一天晚上维尔泰姆夫人对我说，“我们望着北方发问：‘会打仗吗？’实际上每一个冬天都在打仗！”

然而，战争并未阻止他们开拓北方的劲头。“今年春天在这个地区要锯的木头减少了，”我听到他们说，“因为去年冬天在这些森林里进行了拉锯战。”在他们忙着锯木头时，这是他们唯一的评论。

比作战更难对付的是卡累利阿的落后状态。我遇到过一个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男青年，他是前年来这里帮助革命的。他被派往木材业部门工作，人们希望他用美国的办法增加生产。他对卡累利阿的做法牢骚满腹。“彼得大帝建造了这个城镇及其造船厂，”他对我说，“他们仍按照彼得大帝造驳船的做法建造驳船。今年他们为木材业建造了四只新驳船，修理了十五只旧驳船。这些驳船的木板没有一块是锯的，都是用斧头砍的。这些手艺人一辈子都用手砍，他们竭力反对使用圆锯。在这些驳船上，一个金属管子也不用，他们用特别钻孔器在九英尺长的木梁上钻孔，需要三个人操作。这些继承了彼得大帝手艺的人是很自豪的，要使他们学习美国的做法是非常困难的。”

在重建卡累利阿的革命者中有一位匈牙利的浪漫主义青年。他是通过交换俘虏来到莫斯科的，被派往北方，在露天工作，以医治他那受到严重摧残的心灵和精神。见到一位能与之交谈的人，他十分高兴。我们用德语讲话。他向我倾诉了他的故事。我发现，他的谈话同俄国人和芬兰人简洁实际的谈话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出身名门，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他支持革命，被捕并坐过

牢。四年之中，他挨饿受冻，屡受折磨，给他的心身留下了永久的创伤。他的最精采的故事是关于那位残酷的监狱看守。监狱看守五次把他打昏过去。

“四次被打昏之后我说：‘你想打死我，但是这办不到。我年轻，有一天我总要出这个监狱，然后，我找一位漂亮的姑娘，你打昏我多少次，第一天晚上我便拥抱她多少次。现在，你已给了我拥抱四次的机会，’我嘲笑他，‘我还能得到更多的机会吗？’于是他又把我打昏过去。几天之后我在医院里醒了过来，他们想，我可能活不了，然而我没有死。我非要活着气气那个看守不可。”

我问他，他的大话是否实现了。他满意地微笑了。这位勇敢的青年对俄国人和芬兰人的震动远远不如对我的震动，难道他们点燃不起炽烈的感情？对勇气不热心？

努奥捷瓦的全部热情都倾注在发展卡累利阿的学校上了。他有两份工作，有两个办公室。上午，作为教育领导人，他一直忙于重新组建受战争毁坏的学校；下午，作为外贸部门的领导人，又在出售卡累利阿木材。他是一个聪明能干的人，能讲九种语言。他有许多规划。那些在边远的森林地区进行开拓工作的一些学校主管人都到办公室来找他。去年夏天的特殊战斗就是修理房屋。卡累利阿的所有学校在内战中都遭到了破坏。前一个冬天，由于白芬的入侵，重建的学校再次遭到毁坏。教育工作者以自己的英勇的独创精神又一次把它们修复起来。

比如‘有一位教员，拣到了白芬军在退却时认为没有用而抛掉的十匹半死不活的马。他让学校的学生喂养它们，带它们到草原去，把它们养好并卖掉，换来的七百五十美元作为该地区学校的基金。其他教员把学生分成若干农业小组，用出售庄稼的钱来整修学校。凭着这种平凡的辛苦劳动，他们在战争和饥荒的浩劫刚刚

过去的土地上又使学校井然有序了。一万八千多儿童已经入学，人数超过战前。

“现在很难办的是找不到足够的懂卡累利阿语言的教师，”努奥捷瓦沮丧地抱怨道。“在沙皇统治时期，没有教卡累利阿语的学校。”

“看到有吃有穿的孩子们在周围玩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那位青年说。“去年夏天，他们没有足够的衣服，因而没有玩的劲头。”这些情况是对他们的严峻而又简单的检验。

“卡累利阿的人对新经济政策有什么担心吗？”我问努奥捷瓦。

“使我们担心？”他提高嗓门儿说。“正是有了新经济政策，才允许这些教师为学校养马和种庄稼，而不是伸手向中央政府要这要那。”

“但是出现了新的投机分子，有人可以乘机大发横财。”

努奥捷瓦承认，“这给我们添了一些麻烦，影响了我们队伍中一些落后的人。有些妻子，甚至共产党人的妻子开始抱怨起来：‘当人们挨饿时，我们忍受了饥饿的折磨；然而现在有些人在赚钱，过得很舒服，我们为什么不能呢？如果在政府担任高级职务，不能给自己的孩子们搞到衣服穿，那又有什么用处呢？外部的投机分子并不难战胜，但是象这种倾向则必须预防它们削弱好同志的斗志。”

从极北地区的里姆帕勒那里，我得到了对我的问题的最令人信服的答案，不是通过他的言词而是通过他的所作所为。他是回来为革命工作的一位美籍芬兰采石工人；他正在北极圈以北开发云母矿和长石矿。卡累利阿的大部分国家预算不是来自税收，而是来自国营工业，其中包括里姆帕勒管理的矿山和采石场。

在政府大院后边一个小仓库里，我看到维尔泰姆代表外贸委

员部接受价值十万美元的云母。来了两名穿矿工衬衫的人，他们来自极北地区，脸上呈古铜色。去年春天，他们带着十吨面粉和一些钝斧头作为工作资本开赴北方。他们甚至连建一个码头的锯都没有，也没有替换的衣服。在里姆帕勒看来，最糟糕的是，他们既没有汽钻，也没有用来进行爆炸的黑色火药。他们不得不使用甘油炸药来炸云母，结果造成浪费。

他们蹚过齐腰深的沼泽，撑船越过河流和湖泊，把船抬过山丘。他们训练不识字的农民在采石场和矿山工作。他们从荒野里夺得财富。夏末，他们带着他们的劳动成果到南方来，不是在一次大的狂欢中花光用尽，也不象阿拉斯加开拓者那样来到南方的西雅图把钱存入银行以备后用，而是把它交给国家。维尔泰姆检查样品及其重量，给他们收据，然后回到未油漆的木板房的办公室里去。没有人认为曾经发生过什么不寻常的事。然而，如果他们做的这种事经常发生的话，就会破坏资本主义世界整个工业体系。他们做的这种事能够制止莫斯科大街上的投机倒把活动——只有它才能制止住这种投机活动。

“你从你夏天的工作中得到了什么？”我问里姆帕勒。

“我得到了配给的土豆、好的肥肉汁和一双换了鞋底的靴子！”他大声笑了起来，拍了拍他那破旧但却结实的皮靴帮。“我有一双漂亮的靴子，是从美国带来的，我穿着这双皮靴越过湖泊和沼泽到芬兰边境。我身上的所有东西，我都保存着，但是，别无他物了。有些人今年夏天得到工作皮靴。我不需要它们；只是我的靴子不得不换底。”

“他们告诉我现在要开始领薪水了，”他补充道。“但是，一年前又有谁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有好肥肉汁呢！”

我决定和里姆帕勒到北方的云母矿上去看看。古赫林主席乘

摩尔曼斯克铁路的慢车同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程。当时这段路需四天时间，现在只需两天。我们一行六人辞别了卡累利阿首府。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个晚上是如何度过的。

车上为主席一行留了六张木卧铺，卧铺上没有垫子或被褥，一个人躺下去可以伸开腿。其中只有两张下铺。作为一个女客人，我得到了一个下铺，另一个给了古赫林主席。他得到这个优待不单单因为他是主席，还因为他腿骨上患有结核病。他是躲在下水道的那些日子里得的这种病，一走路就疼。他离开前，每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打算在克姆也这样做。他由于疲劳而弯着腰。当火车在一些小车站耽搁很长时间时，他总是走出火车同站台上的农民交谈，询问当地的情况和群众的要求。

半夜里，农民发现车厢里挤满了人，便开始向这个包厢里涌。这个地方有铁路才刚刚几年，他们不理睬铁路上的规章制度。一位带着小孩的农妇坐在古赫林主席卧铺的边上，并开始推他的两脚。他不自在地翻了个身，并把他的腿收回了一点。那位农妇立即把小孩放在空出来的地方。她利用小孩的头作为武器慢慢地但却一直不停地推古赫林的脚，挤占更多的地方。难道她把他当作善良的人，即使在睡眠里他也不会伤害小孩的头？不久，古赫林便坐了起来。我告诉这个妇女：这个地方是专座，她呆呆地盯着我，不回答。我提出要与古赫林换位子或者叫醒上铺的一个人。他微笑着说：“他们能睡，就让他们睡吧；他们的工作也很繁重。”他痛苦地把身子蜷缩在半个卧铺里，很快便睡着了。他睡得很不自由。我躺在那里没有睡，一直在想：古赫林是如何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别的主席啊。

第二天，古赫林在克姆下了火车，我同里姆帕勒和他的矿工伙伴还要向北走一天的路程。我们穿过北极圈，来到白海岸边到处

是湖泊、森林、驯鹿和北极光的土地上。我和他们一起沿着他们修的崎岖不平的道路穿过沼泽地，从一个矿走到另一个矿，乘他们撑的敞篷船划过海，来到他们的长石和石英矿场。我和他们吃同样的肥肉汁土豆，还有当地野禽肉、鱼和秋天的浆果，这真是美餐佳肴。这里只有六个小型露天矿，每个矿上有十二个人工作。里姆帕勒教他们如何开矿，他本人是从美国的缅因至卡罗来纳的采石场上学会这种技术的，晚上，他组织他们加入工会、合作社商店和上夜校。

“这些北部森林里的农民仍然过着远古时代的生活，”他对我说。“由于战争的需要，这里才修了铁路。他们多数人没有金属工具，我睡觉用的那张大麋鹿皮，他们送给我了，以换取大镰刀的刀片。我发现其中一个村子里有一把又老又钝的锯，是一个过路的陌生人送的礼物。这是他们看到的唯一的锯，他们不知道它为什么不能锯东西了。当我把它磨锋利之后，他们恨不得把他们的整个村子都送给我，以换取我的‘魔法’。”

我跟里姆帕勒进了一家农舍。一个妇女正在用卷线杆纺线。这种卷线杆，我是从安徒生童话故事的插图里认出的。她在一个粗糙的手织机上织布，用手拉线头。她还没发展到使用纺车和脚踏织机这一阶段。里姆帕勒正在组织这些人加入工会、合作社和上夜校，这样一来，他们便可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平等公民了！

“这是很有益的工作，”他简单地回答我的热心询问。“我考虑，这里距边境这么近，距白芬的宣传这么近，住在这里的农民无知和挨饿，这里的土地永远不会有足够的收获量，我们需要有一种能使人民吃饱肚子的行业……”因此，他考虑的不只是增加卡累利阿外贸财富的问题，而且还有革命的政治问题。

“我们现在在这里需要一个真正的管家，”他补充说。“我开个

头还可以,我知道开石,我也能够加工长石和石英,但是在云母方面我没有经验。在这里,云母将占重要位置,我们需要有一个懂得云母的真正的主管。”

他的话使我最为吃惊。他是主动开创这种工作的,除了“土豆、肥肉汁和一双换了底的靴子”外,而他一无所得。对于这一点我能够理解。我也喜欢北方的茫茫旷野。用他们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了政府支持的工业中,明年这个采矿业将得到资本和设备,而现在他甚至没有请求继续委托他管理这个行业。

“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吗?”我问里姆帕勒,我想答案会是肯定的。

“是的”他提高了嗓门儿说,他的眼睛闪闪发光。然后他控制住自己,补充道:“现在仍然是一个发展对象。我到这里来只一年。我想,今年冬天他们将会吸收我。”……我考虑:“如果连参加乱世创业者行列的发展对象都有这么严格的要求的话,我怎么才能加入呢?”

三天以来,我不是在丛林和沼泽里穿行,就是在那美丽的原始土地的湖泊里划行。这是一个迷人的印第安式的夏天,温暖明亮。三个晚上,我都躺在一张鹿皮上观看北极光,它们比我过去看到的要明亮得多,照射半个天空。里姆帕勒、古赫林、维尔泰姆,“加利福尼亚之子”以及千百万象他们那样的人不断浮现我的脑海。这些人在同莫斯科的那些投机分子,同“牟取暴利”的外国商人,同所有私营行业的渣滓在作斗争。这是一支大军,它不仅仅在莫斯科,甚至不主要在莫斯科,它掌握着整个大地。

莫斯科诉诸我的理智,使我思考问题,我在莫斯科学了许多东西,但是,莫斯科的辩论和冲突常常使我迷惑不解。而广漠的北方则诉诸我的感情。“新型的开拓者在建设一个新世界”,我非常高兴

地得出这个结论。“我要和他们一起奋斗终生。”

在我回家的旅途中到达彼得罗扎沃兹克时，他们正在庆祝到十月一日为止的一个财政年度。工业战线的领导人在盛大宴会上作报告。宴会席上摆着鱼子酱、熏鱼、色拉和高加索酒。他们说这应归功于卡累利阿的声誉。这和去年每天配给的四分之三磅黑面包和一条鲱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们有二百万盈余用来进行新的开发，”古赫林说道。“这笔钱必须用于扩大木材工业，它能最快地为农民提供就业机会，使他们有饭吃。”除了木材工业外，他还希望有更多的国营工业，开支较高的工资，获得更多的利润，用来办学校，修道路和改善公共设施。“在今后几年里，我们可以有很大的发展。”

“但愿保持和平，”他重复说，“但愿保持和平”。听了这些话之后，全场一片寂静，因为没有人知道卡累利阿是否会保持和平。我甚至没有问他们是否渴望和平，因为我知道，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愿望。一种是希望平静地扩展工业，开发土地；另一种是希望芬兰发生革命，这意味着，在这个湖泊森林之国重新打仗和挨饿。卡累利阿位于两种制度的前线，面临着一千英里长的敌对边界线，卡累利阿必须作好战争与和平的两手准备。

即使在最美好的梦里，他们也难以猜想十年和平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那不充足的农田将扩大百分之五十；他们的工业将从四千手工艺者扩展为三万五千工业工人、四万五千林业工人。十年之内，将挖掘一条贯穿全境的大运河，一条连接列宁格勒与北部煤矿、木材和矿场的波罗的海—白海水路。在五年计划的头四年，卡累利阿对工业和文化投资九千四百万卢布，其中三千一百万卢布用于学校。在卡累利阿以北，走过里姆帕勒用十吨面粉和一些钝斧头开拓的那些小型云母矿便是新兴起的希比诺戈尔斯克，在

这里，一年可以从世界上最大的磷灰石产地开采一百多万吨矿石。在标志着结束饥荒的宴会上，他们自豪地计划把二百万卢布的盈余用于卡累利阿。十年之后，希比诺戈尔斯克一个城市一年光用在工人住房上的投资就达六百万卢布。

离开彼得罗扎沃兹克之前，我问努奥捷瓦，现在那位浪漫的匈牙利人情况如何。努奥捷瓦诅咒了起来。“这些可恨的个人主义革命者”，他说道。“丢人的是，我们不得不把他送回南方。他给一位农民姑娘惹麻烦。我们在这些农村地区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哪有精力再去处理这些傻瓜的私情！”

这是一个打击。我曾钦佩那位年轻的匈牙利人的丰富感情。这些不热情的俄国人是正确的。我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有一段时候我不相信所有感情了，甚至包括那些在卡累利阿北极光下使我一直难以入睡的感情。我说：“工作是主要的，只有工作是重要的！”

第十四章 俄国早期的 美国移民

在卡累利阿极光下使我一直不能入睡的那种兴奋劲并不是新的感情。有一次鲁思·怀特和我发现社会主义时也是这么兴奋，直到丹特·巴顿的“阶级斗争”把我们关在门外为止。它使我的生活有了新内容。在失掉“我的美国”之后，它使我走下山，参加西雅图《号角日报》的工作，而当西雅图劳工运动因不团结而失败时，又使我漂洋过海来到苏联。多年来，这种兴奋和期望变得越来越强烈。

然而，我也在变。矛盾的感情支配着我。看到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可能突然使我认为苏联是一个新的专制国度或者是一个亚洲式的市场。我有新闻记者的习惯——难道仅限于新闻记者吗？——抓住孤立事件，加进自己的感情，把它们说成是普遍规律。但是我也学会了不以一时的感情行事。在我采取行动之前，我要等等看，看多久这种事会再发生。我是相当稳健的，通过我的多数感情来下结论。

这些主要感情不仅越来越要求将来在苏联工作，并且还要在组织上与苏联生活联系在一起。我看到，建设社会主义不再是梦想，而成了现实。比以前我预想的困难要大得多，但是力量也大得多。我看到这种力量是相当神秘的，群众已经觉醒，要筹划人类的未来。这种“意愿”把分布在地球六分之一土地上的千百万人都团结在一起。这种意愿是强大的；个人的意愿^①可以永远消失其中。它^②强大得足以征服所有古代的贪得无厌、人间不平等和世界上所有漫长的战争。如果它不能的话，就没有为之生存的价值了。在第一年里，我经常怀着这种心情写文章。

与这种有组织的力量进行实际上的联系并不是那么简单。我想成为这个国家的一员的愿望，在我到达这个国家的第一天就受到了无礼的阻挠。外交部新闻官员劝我吃教友派教徒的饭，如果我希望保持工作效率的话。当我提出参加共产党的问题时，他们对我更是大泼冷水。首先听到我提及此事的共产党员大笑起来：“象你这样一个爱动感情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想加入共产党！”

这话刺伤了我。我是一个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事业的妇女，但却受到了嘲笑。我变得越来越含蓄了，如同一个提问题的记者一样拐弯抹角地问加入这个党的条件。我了解到要在工作岗位上才能入党。但是，我是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工作的。我还了解到，资本主义的记者是禁止入党的。那么，为什么卡尔派我找的那些同志一直那么热切希望我为赫斯特系报纸工作呢？这看起来不公平。当我进一步询问时，我了解到我可以回到美国去参加。这是最不友好的话。这些乱世创业者告诉我离开他们去加入党！我真的想加

① 请参看第三十一章对觉悟和意志的看法。——原注

② 注意：我说的是“它”，而不是“我们”。——原注

入共产党吗？肯定不想在这种条件下加入。另外，我有其他感情。

我主要在为赫斯特系的《国际杂志》工作。该杂志主编诺曼·哈普古德喜欢我的文章，我也喜欢他确定的标准。“对于重大历史事件，我们需要新颖详尽的报道。我们也希望文章写得简明生动，使堪萨斯奶车司机或是圣路易斯杂货店职员都觉得它有内容有意思才行。”为美国西部广大中产阶级的群众写文章，引起我的兴趣。所以我放弃每天给国际新闻社发消息的苦差使，集中精力就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写长篇生动的文章：“为俄国石油而战”，“向酗酒开战”，“教堂革命”以及其他许多题目。正是在一九二四年四月，我在赫斯特杂志上发表了第一篇在美国出版的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偶尔，我作为赫斯特《国际杂志》驻东欧和中欧记者到德国或波兰去。我喜欢这一工作。这是锻炼把文章写得生动的好机会。它的稿酬很高，所以我有足够的时间免费为自由派和劳工报纸写文章。

在美国对苏联持有很深偏见的时期，我发回大量对苏联友好的文章。我的共产党朋友都说我的工作有益处。那么，为什么这种工作反而使他们很明显地把我当作外人看待呢？我青年时期长久不得其解的想法又重新出现在脑海里。这里的人们不需要我。问题可能出在我身上。当我阅读共产党文献时，我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一九二二年底，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即将召开；预备性的专题理论和策略分析文章已经发表。我几乎难以阅读下去。这些分析文章是那么阴暗、那么沉重，对世界又是那么愤怒。其中没有一句话使我感到兴奋。我习惯于写激动人心和令人高兴的文章。

我越强迫自己阅读那些报告，就越觉得我不象一个共产党员。即使那些我弄得懂的事情也使我不满。一件明显的事是，他们攻击德国社会主义者、英国工党，甚至攻击他们自己党内的一些持不同意见的成员。为什么他们不能变得更“友好”一些？正象斯蒂芬

斯在西雅图曾说过的一样,各地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这是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弄得一团糟,英国工党行动相当迟缓。他们不象这些俄国人那样创造一个新世界。但是,难道他们没有尽最大努力吗?如果非得攻击某人不可,为什么不去攻击资本家呢?

所有这些阴沉的理论与一个乱世创造者的激情(如里姆帕勒或萨马拉的工厂厂长),又有什么联系呢?我不想与德国社会主义者争吵;我甚至不想阅读关于他们的文章。我的兴趣放在那些“做实事的人们身上。我想与世界大动乱作斗争。难道里姆帕勒必须先仇恨英国工党领导人,他们才让他去挖云母吗?我不相信这一点。古赫林——是的,也许古赫林懂得那些理论——他是一位教授。但是,是否有一些较简单的办法?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仍保留着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交给我的一封信,他们让我在欧洲旅行时,通过《工会纪录报》报道西雅图工人关心的事情。红色工会国际将于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它正从各种工人组织里找代表。我写信给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请他们为我开一个出席代表大会的证明信。这样,我在会上便有可能“会见世界各地的工人代表”。让“进步的西雅图”成为首先派出代表的组织之一吧。西雅图同意了。他们寄给我证明信,指定我“代表西雅图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代表大会,但不受任何决议的约束”。

俄国人对待证明信的态度远比写证明信的美国人认真。我了解美国一些参议员,他们第一次见面就会给你开到世界各地的介绍信。但是,即使在美国,美国劳工联合会对这种介绍信也十分重视,它指责西雅图中央劳工理事会不该轻率地开给我介绍信。俄国人对这封介绍信给予足够重视,他们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大会。出于礼仪,在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我也

享受类似待遇，但我发现大会论文非常难读。

在红色工会国际的一些会议上，我的心情又变得沉重起来。他们让我参加一个讨论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各种工会的理论和策略问题的委员会。我讨厌所有这些理论性的讨论，它只能在同志之间产生恶感。但是我没有把这一点说出来；我认为那样做是不礼貌的。另外，我还认定所有理论并不真正重要，重要的是工作。如果理论不得不吞下去的话，我还是可以吞下去的，正如很久以前我“征服”哲学那样。不管怎么说，让他们替我写理论还是比较容易的，正象有一次我让莉娜·路易斯把马克思主义写进我的社论里去一样。她认为这很重要，而我则不以为然。

介绍信给我一个实际好处：它使我得到了勒克斯旅馆的一间房子，而当我为劳工报刊全天工作时，他们却拒绝让我住那间房子。我对自己说：“这些俄国人是那么喜欢小纸条！一年的辛苦工作不能得到的，一张介绍信却得到了。”对于我来说，努力而有效地工作才是生活的保障。我完全不懂，俄国人对我感兴趣的远远不是我个人的工作，而是我代表一派有组织的工人。多年来，我都不理解这一点。

在那些日子里，因为有大量的差事要办，许多国家的外国人都住在勒克斯旅馆，另外，还有多年住在国外的俄国人，他们陆续返回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国家。许多人是从美国回来的。成千上万的人都有同样的愿望，希望跨洋越海到这个新的世界生活。无论是在莫斯科或到全国各地旅行，我都看见这样的人，有的成群结伙。有的是个人。里姆帕勒、加利福尼亚之子和萨马拉工厂厂长只是他们许多人中的几个。

并不是所有的人在俄国都过得那么愉快。第一批来的人曾想这里是工人的天堂，但是他们看到各处遭到的毁坏之后，他们的幻

想很快便破灭了。即便那些预先被告知艰苦条件的人——俄国人竭力事先提醒外边的人——也不能想象如何困难。他们原先设想，良好的愿望和高效率将很快为他们获得一个好的位置。但是，他们习惯于美国的企业，在那里，劳动有分工，所有设备都由老板提供。他们引以自豪的技术，在工具和设备简陋不堪的情况下，英雄无用武之地。他们的美好愿望被官僚主义的洪水所淹没，被不熟练的工作人员所窒息。那些俄国工人尽管效率不高，仅凭力气或手艺就能够生产，而美国人根本无法这样做，为此，他们嘲笑这些新来的人穿戴和习惯，称他们为资产阶级。

然而，俄国人希望有美国人的技术和效率。列宁自己也说过，建设社会主义，除了工人的权力以外，还需要加上这一点。俄国人尽力使美国人适应他们的制度，但不能保护他们免受大混乱的影响，每一个人都被大混乱卷进去了。而一批批工厂、矿山和油田的人们都正在勇敢地大混乱中杀出一条道路来。美国人必须斗争，但他们不知道斗争的方法。同时，靠吃黑面包，也没有那份劲头。

因此，那些从世界各地来这里帮助革命的外国人很难适应这里的条件。所以俄国采取了一项政策，只接受那些能够提供机器、设备、衣服、食品和准备开发土地或开办生产性企业的、有组织的团体或“公社”。在西雅图公社、列宁公社、库兹巴斯工业区、阿斯托里亚渔民以及其他许多美国开拓组织中，有些组织失败了，有些则成功了。但是，当时他们对苏联的建设都做出了贡献。新的国度为他们提供了它可能提供的最好的条件；熟练工人、美国机器、同相应的政府机构签订的协议。双方互相信赖。然而，即使这些团体也很快遭到预想不到的困难的打击。

一个小型美籍芬兰人渔业团体从阿斯托里亚和俄勒冈来到卡累利阿北部，他们装了成车厢的先进捕鱼和罐头工业的设备；可是

他们怎能想象，他们的货物会在混乱的摩尔曼斯克火车站丢失好几个月，以致于他们不得不用一些手锯手斧、少量的衣物和食品来应付北极的冬天。来自我故乡华盛顿州的勇敢的美籍芬兰农场工人和伐木工人把西雅图公社组织成一个农业技术友好中心，向整个地区传授技术；他们是否知道，地方当局为给他们找地方将要赶走一大批未注册的擅自占地者，从而给邻居留下仇恨，两年来，这里的农民甚至拒绝卖给美国人一只鸡。他们是否预见到，连续三年的疟疾给他们带来极大灾难，蹒跚着去工作的少数人仅能种够公社吃的粮食。

在美国人办的所有项目中，最雄心勃勃的项目是西伯利亚的库兹巴斯工业区。这块广阔富饶的土地的面积等于匹兹堡山谷加梅萨巴山脉之和。如果他们能把它开发的话，就把它交给美国工人合作区。但是“工人自己管理工业的这种大好机会需要数千名有技术和组织得很协调的工人以及精心挑选的配套设备。来自纽约东区的热心激进分子一到西伯利亚就受不了那里的艰苦条件而返回纽约。身体更好，决心更大的其他一些人来到这里，并且战斗到底。他们同运输大混乱作斗争，同许多仇视美国人和苏联人的当地工程师作斗争，以及同当地工人的排外思想作斗争。他们也同自己人的不团结和低效率作斗争。他们斗争，挨饿，患病，一直坚持斗争；但他们的人数不够，不足以按照需要迅速地开发库兹巴斯。为此，苏联政府买下美国工业区的全部财产，把它重新组织成一些国营托拉斯。但是今天，西伯利亚钢业中心的部分力量还是来自那些顽强的战士，他们现在分散在苏联工业部门，可以与最好的开拓者媲美。每一个人都珍视“老库兹巴斯人。”

除了这些公社，俄国人并不鼓励新的移民。他们使你很难得到签证。如果要来的移民是共产党员的话，他们受到党的纪律的

约束而来不了。他们说：“如果那个人是好的革命者，那么他就留下来，在自己国家搞革命吧。如果他不是一个好的革命者，他在俄国也不会有用。”

我们美国人不理解俄国人的态度。我们同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们说：“他们的排外为什么那么厉害？这难道不是我们也有份的世界革命吗？难道我们效率不高吗？我们宁愿为社会主义工作，而不愿为资本家工作。”甚至有的人为了到俄国来，把美国共产党的资格都放弃了。他们说：“建设和破坏比较起来，我更倾向于建设。我在俄国搞建设，比在美国攻击资本家，更有用一些。”他们是这样来为自己离开困难的阶级斗争辩解的。我也是这样为自己逃避困难的西雅图劳工运动辩解的。如果这些人不听任何劝告，坚持要来，俄国人便接收下来，并尽力安排他们。谁知道一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最有用？作为一个决定因素，他们尊重人的个人意志。

封锁被打破之后，通过各种方式来的个人或团体在勒克斯旅馆进进出出，讨论他们的问题。我们开始分析自身和我们的麻烦了。我们断定，我们美国人是感情用事的人。我们是满怀崇敬、热情和糊涂的思想来俄国的。我们想，单凭广泛的同情这一点，就应该分给我们住的房子，提供翻译和安排忙人的接见。我们想，我们的友好情谊将引起俄国人的注意。然而他们从来不是这样。我们自己也很快讨厌那些新来的讲我们本国语言的人了，讨厌扶轮社的“友好服务”方法：“确切地说，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我是非常同情你们的革命的。”我们特别钦佩不动声色的俄国人，他们想不受个人感情影响来了解这些新来的人的所作所为是否能够抵得上他们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麻烦。但是，当我们竭力不动声色时，我们变得粗暴了，这是感情脆弱的另一面。我们缺乏俄国人的那种

严峻经历，这种经历使他们警惕感情用事。

过去我们学的是，使自己习惯于老板。我们要么服从命令，要么辞职不干。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分析情况和改变命令。我们不可能了解如何做才好。在灾荒即将结束之际，哈罗德·韦尔把美国第一批拖拉机带到了俄国。他的计划是用拖拉机耕地，达到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力量谋求发展。他不只有机器，而且有精心挑选的一批美国农场工人，他们可以教俄国人。国际饥荒救济组织德国负责人一点也不懂农业，他派韦尔的一个小分队到距铁路八十英里的彼尔姆北部贫瘠的农村去。由于这块地方没有开发过，一路上，他不得不修理二十座桥梁才能把他的拖拉机开到农场去。山丘上光秃秃的，农事季节又非常短，自力更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他告诉韦尔这是“党的命令”，韦尔象一个尽责的工人一样，驯服了。当他喜爱的联合收割机运到时，救济团体却把它安装在彼尔姆商店橱窗里“展览”起来，而美国人却在火车站到处找它。与此同时，在八十英里外的农场，人们用镰刀收割。

“由此，我了解到，”韦尔说，“即使是党的命令，也不是上帝的意旨，而是人的意旨。你必须要知道到哪里去，去找谁。你必须知道何时顺从，何时与之作斗争和如何斗争。这个国家的意愿是诚实的。但是你必须学会如何与此意愿联系起来。你必须懂得政治，而我们美国人没有一个人懂政治。”

我们还了解到，这个国家没有“公平交易”。没有任何人曾得到他期望得到的东西，得到他“挣得的私有权得到的东西”。有时他得到的多一些，有时则少一些。这使我们美国人迷惑不解。我们中有些人说：“这些俄国人不守信用。”另一些人说：“这是亚洲人效率低的表现。他们会进行公平交易的，但他们不知道怎么进行。”我们终于看到，这里边包含有更多的东西，有旧的，也有新的。其

中一部分的确是效率不高，但是另一部分是新的集体标准。你将加入一个合作社，事先为你的一套房间付款。你得到的东西与你为之所付的代价不相称，三年太晚了。没人欠你的任何东西。这是你们集体的过失，你们的合作社管理得很糟糕。否则，你会得到从未预料到的意外收获，免费戏票，或便宜蜂蜜，或者半费在克里米亚休假，这是因为你所属的组织是一个效率高的集体。我们开始认识到“公平交易”这一概念来自做生意的资本主义，它和世界上其他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和友谊、家庭没关系，和古代封建主义以及将来的社会主义也没关系。

取代“公平交易”的是“集体斗争”这一新概念。你不是站在这边，就是站在那边，要么唯利是图，要么努力加强工人的权力和建设社会主义。在第一种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的战士竭力用各种方法反对你。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能帮助你你就帮助你，这是不常见的，能帮多少就帮多少，帮助是不多的。但是，大家都坚持斗争，坚持学习在大家一起建设的東西中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在个人问题上，不要象理想主义者所竭力做的那样，多愁善感地自认为在作出自我牺牲。这种看法只能使俄国人讨厌。你应该照料你自己，不要大惊小怪。

“这场斗争比我们过去进行的战争更艰巨，”过了一会，我们开始讲话了。“至少对于我们来说，更艰巨一些，因为我们不懂当地语言、斗争手段或者社会反应。既然这场革命是属于全世界的，那么它也可能是我们的革命；但是，它不是我们的国家。”我们开始理解为什么俄国人曾劝告我们留在美国，闹自己的革命。这不是排外主义，这是常识。现在这样的环境使我们难以发挥力量。然而，既已选择，我们中间有些人也是有贡献的。

在理解我们的新战斗和它的新概念时，我们新来的人主要得

到了“回来的美国人”的帮助，这些俄国革命者在美国呆了一些年，是回来搞革命的。他们的情况各异，那些在美国住得最久的人同我们最密切，而那些离开这里时间最短的人同俄国人最亲。但是，他们这两种人在两个世界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他们了解我们，想帮助我们，一是为了他们自己，二是为了我们。他们在俄国是采用美国方式的旗手，他们希望有一天我们将帮助他们。他们珍视我们的才能，也理解我们的短处。

聪明能干、精力充沛的比尔·沙托夫在美国时煽动无政府主义，为言论自由而斗争。回到俄国后，他管理西伯利亚铁路和彼得格勒的民兵。自那以后，他先后担任过银行的行长，矿山调查者和石油出口经理。随后，他投入第一条新的大铁路的建设。

沙托夫吹捧美国。“它是我的老师，”他说。“我现在已不属于它了，但不管怎么说，它教育了我。当我在这里的铁路上工作时，他们称我为铁路专家。当我在军队工作时，他们称我为军事专家。鬼才知道呢，我不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美国人。我的所谓军事训练是在科罗拉多追赶恶棍，我的警察训练是躲避警察，我的铁路训练是不买票偷乘火车。在美国学会进行工作的窍门，即做事情不费劲的办法，这对你从事的任何工作都是有益的。”沙托夫使我们新来的美国人激动，他知道什么是效率，他证明我们是有道理的。

另一个从美国回来的梅尔尼钱斯基那时是莫斯科工会主席。民兵懂得了把在大街上迷了路的所有美国人都带到他的办公室。他是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特别擅长于为许多在困难中挣扎的公社解决问题。他确定他们的合同，查明货物存放的地方，帮助发送出去。

其他几十个人在国营工业的各个部门工作。克拉斯诺晓科夫

曾在芝加哥开办过一所学校，回来后成了远东共和国的主席，现在是工业银行的行长。他把混合服装工人工会的捐款和工人带给俄国。他正在计划办一个“美国工业大学”，把农场、工厂和学校融为一体，在距莫斯科不远的十五个庄园里开办。阿瑟·亚当斯管理AMO汽车厂，早期该厂大部职工是“归来的美国人”。鲍罗廷先是在芝加哥工作，后来在中国出了名。作为美国工程师协会成员的洛谢夫正在修理全俄国的发电厂。他对我说：“除了共产主义，我便为采用美国管理方法而斗争了。”

过了几年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即使这些被我们尊为良师益友的“回来的美国人”，由于和我们住在一起多年，也难以完全使他们适应俄国的环境。他们知道如何办工业；他们在生产方面是有用的。然而，正如韦尔所说的，他们不“懂得政治”。担任高级职务，他们往往不会成功。他们不了解俄国同事的本能要求；他们已美国化了。比尔·沙托夫直到此时还未能参加共产党。梅尔尼钱斯基在工会的地位升得高，但是，由于他反对党的政策，他被调离工会。克拉斯诺晓科夫因贿赂而被捕坐牢。

我是否该说“贿赂”？贿赂这个词向美国人传达了俄国人感到的耻辱。但是在美国人看来，他的行为并不是耻辱。我们听到俄国人说，他背叛，应当枪毙。我听到美国人嚷：“但是，他的所作所为正是办银行惯用的方法，他是在加强工业银行。”双方都是对的。在美国来说，他的办法是办银行事业的惯例，而在一个共产党国家，却被看作是背叛。

克拉斯诺晓科夫代表苏俄同外国商人打交道。他盛宴未来的买主，用政府的钱招待他们，吉普赛音乐会，他和他的秘书也参加。他把国家的钱贷给他的在莫斯科承包房屋建筑的兄弟。房屋建筑业是急需的行业，私人承包是合法的。他的兄弟所提供的保证金是

一笔有足够数额的美元现金，这种保证金超过许多国营工业被毁坏、管理不善的工厂所能提供的保证金。但是，办银行是为国家服务的，一个共产党员能够进行这种辩护吗？

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早期，政策界限还不清楚。投机者在大街上趾高气扬，苏联工人的愤慨与日俱增。现在需要一个明确的规范界限。克拉斯诺晓科夫事件是一颗信号弹，照亮了新经济政策的界线。他的判决书说：“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弊端来说，谋取私利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要是光想着谋取私利，并使其发展，便是罪过。”敌人仍然是那个永久的敌人。也许可以停火，但是没有和平。

过了一些年，克拉斯诺晓科夫在被释放很久之后，又重新担任负责工作，成了一个工业部门的领导人，甚至恢复党籍。有一次，他对我说：“我在美国呆的时间太长了。我的习惯、动机和方法太美国化了。它们永远不会完全对路，反而使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绝非偶然的是，许多在国外呆了多年的俄国人从革命开始时的工作岗位上跌下来，俄国群众推举了新的领导人。他们距我们的外部世界愈近，他们距这些群众就愈远，而这些群众则是力量的源泉。

我们美国人的确注意到，我们钦佩的朋友和良师益友的工业效率超过了他们的政治技能。这对我们来说，不是缺点，而是美德；我们更加钦佩他们。他们是工业的实干家，当别人幕后操纵他们时，他们不免感到不快。这是我们所理解的党早期大多数讨论和斗争的意义。

我们美国的历史情况使我们看不起“政治”。在我们的词典里，它意味着个人幕后操纵，利用竞选演说获取选票，利用选票上台，

上台以后为个人捞取财富和权力。它意味着把高级职务交给自己的信徒,以建立自己的政治机器,这部政治机器反过来又赋予它的操纵者更大的权力。我们在苏联也看到了一部分这种情况,便以为,在这里,政治也是这样的。我们想;当然,他们必须要有政治斗争,但是愈少愈好。

过了没有多少年,我才认识到,我们美国人所谓的“政治”仅是外表,出于个人的贪得无厌,有些人经常在玩弄腐朽的权术。实际上,政治是研究群众的内心深处的本能意愿,分析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动态,不断调整构成社会的成千上万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

第十五章 工人当家作主

我们打算怎样使我们的钢厂、煤矿和油井运转起来？在一九二三年初的苏俄，这些问题挂在每个人的嘴边。工人们在工会会议上讨论这些问题；工业管理人员在群众大会上与工会代表商计，共同制订计划。习惯于战争术语和在许多战线上打败敌人的人们以及不久前曾战斗在“饥荒前线”的人们现在都讲“工业战线”了。

莫斯科两大报纸之一的《真理报》举行了一次评选活动，来确定企业里的“最优秀领导人”。设想一下，美国一家报纸举行评选，决定洛克菲勒，或加里，或匹兹堡的某个工厂的经理，到底谁是最好的领导者！在我们美国人看来，比评选本身更有意思的是评选标准和确定的方法。

工人们向报纸写信，吹捧他们的上司。另一些信则指责上司，其中有些上司随之被撤职。由本厂工人推荐，经其他厂的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而确定的十二名最优秀的候选人应邀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宴会，并且戴上劳动红旗勋章，这是国家最高荣誉之一。

工人们确定的评判标准使我吃惊和感动。他们写道：“我们工厂一直开工不足。后来，阿钱捷尔斯克来了。他的话把我们鼓动和团结了起来。他制订了规章制度。他很快就使生产水平达到了战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阿钱捷尔斯克把他的整个身心都用在工厂工人身上了。他整修了住房和工人的宿舍，他安排工厂青年上技术课。十个月来，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一天天改善。”

在谈及不好的领导人时，他们这样写道：“他管理的十个月里，所用的油比需要量多用了二千五百吨；好的机车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事故增加了三成。工人们开始怕他，说：在这个人的面前，工会不能保护我们，他没有采取什么措施来增加生产。他没有修理任何东西。他对教育一点也不感兴趣。整整两年半，他没有做一件改善工人生活的事。”

这些就是工人们确定的用来评价他们领导的标准。他们不问经理是否大量赢利，他们甚至也不讨论工作时间和工资问题。他们对他支持与否，同西雅图工人的做法完全不一样。西雅图的工人支持政治领导人，是因为他“令人信服”，“他的意见同他们一致”。所有这些范畴看起来都退居第二位。他们问道：“他能组织我们战胜混乱，使我们的工厂走向正规，为我们大家创造一个好的生活吗？”这是对正在进行建设的人们的明智的检验。世界其他国家所确立的标准突然显得不明智了。

非常清楚，这些工人是作为主人翁来说话的。但是在什么意义上他们是主人翁呢？我知道西雅图的公有制——市营的发电厂、码头和有轨电车。所有进步人士都为之而自豪，我们说我们拥有它们。这意味着，每隔一两年，我们便改选一些人参加董事会。但是我们的公营公用事业从来不象俄国的国营工业那样引起工人这么持久的兴趣和热心。可以肯定，我们的有轨电车工人从不想用

他们的假期来修理汽车，作为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俄国人是否更热心公共利益？也许这是“所有制”的一种不同形式？

从莫斯科往南走一天多的路程，在乌克兰，有俄国的“匹兹堡”，即生产煤和钢的顿涅茨山谷。朝东南方向继续走三天，在里海岸上有世界上最大的油田——巴库油田。这些是苏联重工业的主要基地。它们曾先后被各种侵略军所控制，也受到了国内战争的破坏。全国都非常注意这些地方。即将召开的共产党代表大会把恢复工业生产作为三个主要议题之一。乌克兰主席拉科夫斯基打算到顿涅茨去参加那里的党代会，起草一份关于煤炭和钢铁的报告。苏方安排我跟他一起去。

我估计，大概会有长时间的生动有趣的讨论。我想，会有很多时间坐小汽车。我还没有理解这些布尔什维克是如何工作的。拉科夫斯基晚上六点坐上车，就立即睡着了。前两个夜晚他一直工作到黎明。半夜，他起来开始阅读堆在那里有几英尺高的一些外国报纸——英国、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保守派报纸。他毫不费力地迅速阅读这些各种语种的报纸，标出让秘书去剪贴的地方，然后把它们扔在一边。他一直工作到累才罢休，或者直到他的“服务员同志”给他送来了吃的为止。他吃完饭或睡完觉后，又开始工作，完全不论白天、黑夜。

“在莫斯科的一个星期，我落在外国报纸的后边，”他微笑着说，“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的敌人对我们有什么看法。”

“他们是否也用心了解你们？”我问道。

“他们对我们的了解甚少，”他回答道。“我是在洛桑知道这一点的。”

在等着去顿涅茨时，我访问了基辅，并且在“三·八”国际妇女节那天向广大妇女讲了话——在褪了色的围巾下边是一张张疲倦

和专心致志的面孔。我是用很糟糕的法文讲的，翻译得可能更糟。但乐队奏了起来，妇女们鼓掌欢迎，她们把我当作一个杰出的人物，从美国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但是我知道，她们每一个人都比我强，她们经受了十六次的轰炸，一直在料理家务。

在内战中，基辅城十六次易手。德国人控制过它，彼得留拉、邓尼金，各种游击队、波兰人都控制过它。四分之一的建筑受到枪炮的破坏。当我问妇女们什么最难忍受时，她们没有提及危险的事。她们说，最糟的事是，正在做饭时供水设施被破坏了，你必须要到数英里以外的河里去提水，煤矿被敌人占领，你就没有燃料了。战争危险正在消失，人们不那么激动了。但是又有谁曾讴歌过她们在无休无止的战争灾难中苦熬过来的精神呢？

现在复苏的基辅正在举办一个大型博览会，“以便了解我们的新工业”。在许多货摊上，六周之内做成了价值六百万卢布的生意。政府的新企业采取了各种形式。资本主义的宣传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清一色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一个所有者垄断一切。有十几个组织形式，有竖向联系的托拉斯，也有横向联系的托拉斯，有经营地方产品的小型城市托拉斯，也有全国性的石油或粮食托拉斯。它们都是公有制，但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很灵活。课本由属于教育机关的托拉斯出售。药品由卫生人民委员部下属的一个托拉斯经销。高加索有一个水泥托拉斯，乌克兰有一个纸张托拉斯，粮食托拉斯用一万七千吨粮食来打破私人对粮食的控制。这些只是我们看到的许多公有企业的一小部分。

很清楚，主要是地方的积极性在起作用。看起来，如果你知道如何控制的话，即使是私人投机商也可以加以利用。博览会主席、基辅公共设施和住房领导人维坚斯基对我讲了他是如何修复被破坏的供水设施、发电厂和被毁坏了的有轨电车网和数百座建筑的，

仅用了一年时间，没征收一文税，而是把商店和市场货摊租给私商，象资本家那样，只要买卖能做，就尽量多让他们做。同我不一样，维坚斯基并不为私人买卖而哀伤，他利用它来重建城市。他设想，将来“基辅是一个花园式城市”，蜿蜒的第聂伯河在壮丽的山脚下流淌，计划种植二万五千英亩的森林供人民游乐。

“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有这么好的场地”，他说。他们还没有城市规划专家，还没有其他花园城市的蓝图。但是他们手里掌握了基辅的一切，一个被毁坏了的基辅，有全部的租金，工业和森林。他们保存了城市的集体财富，从十六次战火中夺回了它，对于这样的人来说，还有什么办不到的事呢？

乘拉科夫斯基的小汽车从哈尔科夫南行半天进入乌克兰无产阶级的心脏地区——煤炭钢铁山谷。从人们不断提出公开的批评中，你可以感到你是置身于工人中间，置身于当家作主的工人中间。“你好，拉科夫斯基同志，我们何时才能得到他们已答应给的工作服？何时才能得到矿井安全灯？”

拉科夫斯基不再阅读外国报纸了。他正专心致志地读当地报道。他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天二十个小时在商讨问题。报纸上登满了工人的来信，大多数是批评信件。“斯捷潘斯基去年十二月为他的电站落成大肆庆祝了一番，但是至今还没有供电！”……“市营农场的牛奶本应当给患结核病的工人，却送给了政府机关的朋友们，而工人们排着队，眼睁睁地看着牛奶被拉走。”……“我们的矿山有好的设备……这是俄国最深的矿井，但是，这些设备由‘专家’看管两年了，没有成效，尽是麻烦。让忠实可靠的工人来管理吧。这些‘专家’在搞破坏！”

有一座矿山为它的经理阿巴库莫夫而自豪。他们把他作为最优秀的领导人之一来参加《真理报》举行的评选。他们是这样写他

的：“他得到的是一个已经报废的、被毁坏了的矿山。矿里的水多得无法进行工作。但阿巴库莫夫穿过冻结的土地从四英里以外的地方引来电恢复矿山。他用电动火车代替了马。由于他，我们避免了毁灭，甚至增加了产量，这里也有了煤气，炼焦炉和化工厂。”
……

其他国家能为这坐煤矿唱这种赞歌吗？

我下到其中的一个矿井里，遇到一些美国矿工。他们正从下面沿着又潮湿又滑溜的斜井往上走。他们听到我讲英语，便和我打招呼，并且借助矿灯那微弱的光上下打量我。然后我们坐在满是泥的通风管道口，在若明若暗中低着头弯着腰，煤泥打湿了我们的衣服。他们带着伊利诺斯的土音对我讲了他们对俄国的看法。

“去年相当糟糕。这里的状况受到饥荒的袭击。我们后悔不该来这里。但是，现在好了，我们估计，我们在这儿的生活和在美国一样好。矿山组织得不好，在这里一周挣的钱相当于在美国两天挣的。但是，在美国，不能指望一周只工作两天，因此，有得有失，得失相等。我们宁愿工作正规。这里环境更平静一些。”

“平静”，我惊奇地大声说。内战和饥荒才刚刚过去嘛。但是他们对我讲了工人对平静的看法。

是的，这里没有罢工或闭厂。晚上可以上床安稳睡觉，不必担心明天早晨的工作，在美国却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在这里，我们和上司没有争吵。这里有工人工会，有矿工委员会，工人病了或出了工伤事故，都由公家管。有些事情是相当腐朽的，我们和老农民出身的工人相处不好。我们穿着象样的衣服进城时，他们便叫我们资产阶级。这些人在采到煤之前大概早已不在人间了。他们很懒，工会在矿门口组织学习班，他们也不去学文化。政府给他们各种机会，但是他们不利用。然而，我们希望政府能有钱买好的机器。

他们的心眼是好的，但是没有机器，不过，我们也不想回美国去。我们估计，五年到十年之后，这里将是第一流的工人国家。”

在随后的若干年里，我会见了数百次美国工人，他们都持这种态度，这是首次在苏联工业部门工作的美国工人的典型态度。他们相信这个国家的政策。他们希望把工作做好。他们因为俄国工人的落后或者缺乏机器以致影响了他们自己的工作效率而烦恼。多年来，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俄国领导人称美国工人“太被动”。尽管他们在生产中有干劲，但在思想上是被动的，等着机器来，等着懒惰的人死去，等着必然的进步来拯救他们。俄国人说，这是因为他们习惯于靠老板过日子，他们没有用革命推翻他们。可以肯定，他们缺乏亲切的主人翁感和责任感。我发现，比较先进的俄国工人有主人翁感和责任感，因为他们通过流血斗争夺回了这些矿山。他们知道，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一定要想办法使矿山投产。

为准备全国党代表大会，在红色卢甘斯克出席区党代会的八百名男代表和少数女代表知道，国家属于他们所有，他们必须管好它。这些从矿山、钢厂、农村来的人穿着工作服，好象是他们刚下了工。关于工业和少数民族问题的文章已经发表，并正在全国各地的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红色卢甘斯克并不很关心民族问题。关于这一点，他们听拉科夫斯基的意见。他向他们解释，中央政府要增设一个新的民族院。“我们共产党人认为，找出办法来解决全欧洲都感到头痛的这一困难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荣誉的问题，”他说。

关于工业，代表们不等拉科夫斯基，便热烈地谈论起来。懂工业的不是他，而是他们这些钢铁和矿山的主人。他们说，莫斯科和哈尔科夫的官僚主义正在毁坏工业。他们要求权力下放，给地方以权力。”我们生产的机车从去年的十三辆提高到今年的三十四

辆，”机车车辆厂厂长发言说。“但是，这三十四辆机车仍然停放在我们的车场，它们停在那里已经一年了！在莫斯科的某个人忘记告诉铁路把这些机车取走的情况下，我怎么能一直催促工人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为社会主义需要而生产呢？”

“你们的机车要多少钱？”大厅里响了一个声音。“现在铁路上也根据经济规律办事了。可能他们付不起钱，也许你们的机车价格太高了。”

“我怎么知道要卖多少钱？”厂长回击道。“这又是该诅咒的中央集权在作祟。我知道工厂里的一切。我知道制造一辆机车的时间减少了，但是，我的煤是从十公里外的煤矿运来的，矿山经理和我都不知道煤炭的价格。这是会计的秘密，不知他在中央哪个办公室办公。”

一整天，来自工业部门的人，矿山经理、车间委员会书记、直接来自采煤工作面或机床的工人讲了一大堆意见和情况，有尖锐的细节和具体的要求。然后，他们选举了最擅于表达大家观点和掌握最多支持此种观点的情况的人当代表，出席在巴赫穆特举行的州代表大会，此次大会将使这种观点成为全顿涅茨煤炭钢铁基地的观点。从巴赫穆特选代表到哈尔科夫出席全乌克兰为期一周的党代表大会，集中全乌克兰所有工人的看法和意见。从哈尔科夫，他们将赴莫斯科出席全国党代表大会。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最后决议体现的将不是某个高级领导人的意见和看法，而是集中了上千个工厂、矿山和农村的经验。代表们返回城市和农村，将解释和支持已制订的计划，并且在来年的工作岗位上加以贯彻执行。

这是建立在共同觉悟之上的基本工作方式。我看到全俄国都是如此。他们是在混乱中的创业者。但是，他们在混乱中并不是孤立的。看上去，他们不象在挨饿的萨马拉农村和极北地区新开

的矿山那个样子。他们在上百万健壮的铸造工人、煤炭、石油、钢铁和铁路工人中有一个牢靠的基础，他们代表了这些工人的决心和意志。现在我更加理解，里姆帕勒尽力把这些不识字的北方农民出身的工人组织到工会、合作社和夜校，是为了什么。这不仅仅是社会服务，不单是善良的里姆帕勒为无知的人做好事，象美国的一个进步的资本家可能做一些福利工作来教育他的工人那样。这些是领导这个国度的工人权力的组织形式。在南部的工业区，工人们早已组织起来了。他们用武装斗争赶走了旧厂主。他们夺取了生活和工作的手段。现在，他们从自己的队伍中推举了数千名里姆帕勒式的人物，作为他们的代表，派他们赴莫斯科，如果需要，派他们到边疆，掌管日益扩大的权力，组织国家的工业生产。

根据从一系列这样的会议上搜集到的情况，拉科夫斯基着手为全国党代表大会写一个报告。这与我过去看到过的任何政治报告都不同。我习惯于议会里政治讲话的形式，执政党用旨在打动听众的精彩流利的演说吹嘘他们的全部成就，而在野党却在那里攻击他们如何滥用职权，但任何一方都不去寻求实实在在的朴素真理。拉科夫斯基力求准确地写出顿涅茨的需要和愿望。作为一个领导人，他的成败在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成功地集中千千万万工人的要求。数十名工人代表也将出席此次代表大会。

他这样写道：“生产只及战前的一半。这就是说，我们所有工业部门必须使用的产品的成本增加了一倍。钢铁工人的工资的购买力只及战前的百分之四十，而且工资还不能按期支付。住房情况令人震惊，资本家从不花钱修理房屋，因为，租赁期已过。在许多地方，即使是未修理的房屋，其中四分之一在内战中也受到毁坏。不过，去年粮食紧缺致使数万工人弃工从农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眼下再没有愤怒的抗议集会了。抱怨意见已由粮食转到

住房和设备上。这些意见是通过工会、工厂委员会和报纸等正常渠道反映上来的。生产稳步上升。红色卢甘斯克在一九二一年生产了十三辆机车，在一九二二年生产了三十四辆。”^①

从红色卢甘斯克往东南走一千英里，又有两个工人权力中心：石油都城巴库和第比利斯。在第比利斯，高加索四十个民族正非常热烈地讨论民族问题。当拉科夫斯基朝北走时，我来到了巴库。

何等壮观的巴库油田啊！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油田。闪闪发光的黑色油架林立，无论是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水面或者烟雾笼罩的山上，凡是视线所及的地方尽是钻油井架。除了这些井架，便是一片荒地。巴库不长绿色的植物。蓝色的里海水是咸的；巴库仅供饮用的淡水是穿过一百英里的荒地运来的。巴库从来不是为人民的幸福而建的；而是为着远在别处的主人的利益，为剥削无文化的当地工人而建的。整个荒地上仅有的几棵树在彼得罗拉别墅，这座别墅是为诺贝尔石油公司的高级官员们建造的。我去访问时，它已被四个儿童之家所占有。

这是在原始的亚洲背景之下进行的现代化工业。工人们正在操作刚从美国运来的旋转钻井机，他们的土话几乎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用面纱蒙面，肩挑两个沉重水桶的穆斯林妇女，艰难地走在千年城堡废墟的狭窄街道上。在下面的平原上，一座欧洲最大的现代发电厂输送的电流供八个分散的油田使用。在我脚下的比比艾巴特油田的喷油井每小时喷油一次，喷油时在半英里深的地下就开始发出隆隆声。不远的地方就是另一口著名的喷油井，七年来

^① 在1928—1932的五年计划的4年中，旧卢甘斯克机车车辆厂生产了845辆机车，1933年11月27日开办了一个新机车车辆厂，年生产能力为1,000辆机车。——原注

一直喷油，一年产油一百万桶。其他井架的铁链格格作响，因为钻头正旋转进数百英尺深的沙石。淡黑色的原油流经油田里的油腻土地，朝大储油池流去。

全部石油最终都运输到巴库城和它在海湾的一些大炼油厂。这里可以看到通往码头的油管 and 正在装卸的船。这里有曾属于诺贝尔的俄国最大的炼油厂，生产八十种不同的石油产品：汽油、煤油、机油、石蜡等。二十种不同品位的汽油不停地倾注入白色发亮的油流里。多种颜色的机油闪着金色、棕色等各种光泽。跟在大桶大桶黄绿色“油脂”油后面的是一桶桶蓝灰色的“洗油”。外边是一大池一大池的重油，呈暗茶色，这是废油，但可作燃料。

所有这些财富过去曾经归一百多家私人公司所有。这些公司用惯用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进行着浪费的竞争，挖对方油田的墙角，彼此争斗着，走向破产。这些公司的股票分散在十几个国家，股票市场对这些小纸片进行着赌博。在巴库工作的俄国人、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波斯人都从未看到过他们的主人。一直到他们和其他俄国工人一道起来，夺取了油田，自己才当家作主。接着，外来干涉者煽动种族和宗教战争。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互相进行大屠杀。巴库最先被德国人夺走，接着又被英国人占领，最后由石油工人再一次夺回。在这些斗争中，油田受到了破坏。到一九二〇年，在废弃的油井里到处是水，看上去巴库石油可能永远丧失。

工程师们告诉我，谢列布罗夫斯基挽救了油田。他领导了饥寒交迫的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与洪水斗争，与烧了大喷油井的火灾斗争，与管理人員和间谍活动和破坏活动斗争，与封锁和饥荒斗争。过去由一百家私营公司经营这些油田合并成了一个国营石油托拉斯——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八个主要油田里的油井进行了合

理的组织，每个油田都有自己的工程技术人员。阿塞拜疆石油公司通过伦敦购买了美国机器，因为当时还无法同美国做买卖。生产逐渐上升。到了一九二三年，产量相当于一九二〇年的两倍^①。

接着，阿塞拜疆石油公司重建了巴库工人的生活。谢列布罗夫斯基从北高加索买了大批面粉，并且派代表到波斯用石油换大米。由于缺乏足够的工人，他到土耳其，从士气低落的兰格尔部队里招募来一批渴望当工人的人。他们努力弥补以往的过失，成了第一流的工人。从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利润中抽出了一部分钱，到一九二三年已为石油工人的子弟办起了六十三所学校，为战争中的孤儿办起了十四个儿童之家。厂办学校、夜校和工程技术大学都是靠阿塞拜疆石油公司的盈利办起来的。

头两天，我谋求从谢列布罗夫斯基的办公室搜集情况。他本人难以采访。他办公桌周围放着四把椅子，坐满了等着要见他的人。他轮流简短地回答他们每一个人的问题。当其中的一个人站起来时，我便坐在那把空椅子上，轮到我的时候，我说我想了解关于炼油厂的情况。谢列布罗夫斯基没有谈任何情况，他在一张便笺上匆匆地写下他的命令，递给我说：“炼油厂负责人将给你派一个工程技术人员。请您告诉他，您讲什么语言。”这就完了，该轮到后边的那个人了。

这位挽救了巴库石油的谢列布罗夫斯基住在内院安全出口上边的两间房子里。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皮肤苍白发亮，面颊火红，巴库的艰苦生活条件使她得了肺病。这里缺少牛奶和鸡蛋，使

^① 在1920年产量最低的九月份，巴库生产石油18万吨，1922至1923年，生产石油350万吨，平均每月30万吨。但实行五年计划之后，巴库在1934年头八个月里生产石油12,493,000吨，平均每月150万吨，相当于1920年的八倍。——原注

她慢慢地得了营养不良症。太阳光很毒，刮起的风沙吸入肺部。她与丈夫住在一个房间，而丈夫很晚还带人来讨论问题。“现在比以前好了，”她告诉我。“我们有了两间房子，我可以在一间房里休息。”她全天都躺在一个小房间里。听到她丈夫在铁楼梯上的脚步声，她才在桌子旁呆半个小时，直到他开始晚上的工作为止。有一天深夜，我听到他在办公室里回答家里的电话：“不，肯定要到午夜了，可能要夜里一点才行。不要等我了。”

第三天，正当我写一个关于这个新型石油大王和他的妻子的英雄故事时，一个讲英语的工人来找我。“我们听说你有西雅图工人的介绍信。那么为什么你把时间都花在头头身上？”

我结结巴巴地说：“怎么，我认为谢列布罗夫斯基……”我曾想，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国营石油公司里，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代表工人的嘛。难道我错了吗？难道他是一个老板，如同在美国的老板一样吗？难道工人们不喜欢他吗？

访问者看到我难为情的样子咧着嘴笑了。“谢列布罗夫斯基是一位好管家，”他说。“但是，我们当中还有其他人，为什么不到我们工会来？”

我去了。工会希望我看看，他们象谢列布罗夫斯基一样也有漂亮的汽车，因此他们载着我到各处看看。他们有二十五个图书馆、三十个工人俱乐部和一百二十七个扫盲学习班。我参观了其中的一部分。他们还让我参观了医院、疗养院和社会保险事业。我说：“我想这些东西都是由阿塞拜疆石油公司资助的吧。”

“对，”他们说。“你认为谢列布罗夫斯基就是阿塞拜疆石油公司吗？……阿塞拜疆石油公司是我们大家！谢列布罗夫斯基管工程技术和生产，但是我们安排工人们的生活。钱是油田出的，至于如何花钱则是由工会决定的。”

很清楚，这是苏联所有制的一种形式，它不同于西雅图的“公有”码头、电灯和有轨电车，我们曾认为那种形式是朝社会主义迈出的一步。那种所有制迫使“人们”提供廉价的公共服务，这可能使小商人、农业工人、“独立经营者”同其他城市竞争，并且使竞争永远进行下去。这实际上有利于大资本家，使他们能够集中力量去经营更能赚钱的商业，或者把过时的公用事业高价卖给渴望建立“市级所有制”的公众，或者牢牢控制为城市提供经费的一些大银行。

而苏联的“公有制”则是开发巨大的自然资源和控制在垄断性行业，所获利润不仅支付政府预算，而且用于改变亚洲工人——鞑靼族、波斯族、突厥族以及其他许多民族的落后状况，并且建起了由工人掌管的蒸蒸日上的生活。

这种所有制是一种综合体。我还未能全部理解它。但是，我清楚地看到，一个经济组织，如石油托拉斯，为国家负责进行有效的管理；工会这样的社会团体组织当地工人进行共同生产，共产党这样的政治组织来协调国家的各种需要，决定哪一个“战线”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点也是清楚的：旧的主人正象黎明时一场恶梦一样已不复存在。那些手里拿着一些小纸片，但却从未见过巴库的人，声称油井属于他们，正如持这种纸片的人声称他们拥有世界上的绝大多数油井一样。我知道，在远离巴库的地方，在巴黎、伦敦、圣雷莫、热那亚和海牙，人们也在谈论着俄国的石油。我知道，法国和英国签订了一些条约，壳牌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已经制订联合计划：如果它们弄到巴库油田，它们如何处理俄国石油。投机狂席卷整个巴黎。寡妇、孤儿和妓女把面包和卖身的价钱都押在巴库石油的股票上。在苏联国界以外，人们仍然相信所有这些

奇怪的财产所有权的神话。

在巴库，没有人再相信了。当我问一个工人：他知道不知道壳牌石油公司或美孚石油公司现在是否要求在诺贝尔石油公司的财产所有权，他看上去有些迷惑不解，然后突然领悟过来，咧着嘴笑了。“我们怎么能知道呢？我们生活在巴库。油井掌握在我们手里。”巴库石油工人当家作主了！

第十六章 我的首次大失败

各种各样的美国人在苏联重建的最初几年里来到这里。除了可能的移民之外，还有新闻记者、胡佛救济组织的官员，合法或非法来的共产党员，以及谋求特许权的推销商。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美国人”。我不象俄国人一贯做的那样，生硬地给他们划阶级。西雅图劳工运动的经历教育我，阶级斗争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它是偶尔发生的，是特定条件的产物，在罢工和革命时才出现。在我看来，俄国人认为处处都有阶级斗争。他们为什么不同时看到各个阶级都有好人和坏人呢？在莫斯科，我可能比任何人都更广泛地同各种美国人打成一片。

在我看来，一九二三年初一个俄国共产党员对我说的话是冷嘲热讽：“你是否注意到美国救济署人员的变化？第一年军人，第二年商人！他们的军事间谍没办法推翻我们，因此现在他们派商业间谍来寻求特许权，以腐蚀我们。这标志着我们的前进。”当然我知道，胡佛曾用其掌握的粮食来破坏匈牙利的革命，美国继续进行粮

食封锁的威胁曾迫使一九一九年暴动的德国工人屈服。但是，我是把救济署的工作人员当作个人来看待的。他们是有效率的人。在十分保守的人的领导下，他们在一个效率很低的国家做着分发粮食的艰苦工作。

但是，没有人否认，他们正在寻求商业机会，同时，从兑换卢布中渔利。我知道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用一个星期的工资就可以买一件钻石。他们的美元收入使他们可以乘俄国饥荒之危廉价购买大量珠宝、黄金首饰、名画和艺术珍品。他们的外交豁免权使他们能把这些东西运出国。我不赞成这些行动，但是，我不愿意用这些美国人来概括整个救济署。即使听了一个消息灵通的俄国共产党员告诉我的话，我也没有这样做。“他们正在把从我们国家掠夺的数百万元的珍宝运出去，”他说。“这些珍品的价值是否超过了救济我们的东西呢？”

在俄国老百姓当中，由于救济活动，美国人受到广泛的欢迎，尽管是表面的。比较单纯的俄国人甚至习惯于把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干涉都说成是“英国人”干的，而把所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救济品都当作“美国人”的。这是美国人所不敢当的，因为美国和英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上述两种活动。共产党决定给他们的人民上一课。他们等到美国救济署的特别信使把装满珍贵礼物的特大圣诞节货物邮袋带出时，动手了。他们在边境扣留了信使，把他带回莫斯科，并且请美国救济署当着他们的面打开袋子，找出走私的出口物资。苏联报纸对发现的珠宝和艺术珍品写了详细报道。

美国报纸上出现了一些抗议文章。“干预我们的圣诞节礼物，”美国人这样说。多数人认为这是忌妒的官员的愚蠢行动。美国的“友谊”换取这么一点掠夺物，肯定是值得的！这不是愚蠢。用意是清楚的，既然现在救济很快即将结束，要向俄国人民表明，它披着

慈善的羊皮，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豺狼。他们是这样报道的。

正如我们的旅馆变成美国工人和共产党同情者的天然中心一样，美国救济署在一九二三年夏季终结以前也成了来俄国做生意的美国人的天然中心。它实际上履行了旅行社、邮件收发点和非正式领事馆的职责。在那些日子里，美国人在莫斯科没有这些机构。甚至救济署的粮库也变成了美国人的食品杂货店。

各种美国人在俄国感到孤立，特别是新闻记者尤其如此，因为他们的工作是进行各种联系，以得到消息。他们感到要做到这一点有困难。即使是短时间的采访也难以办到。在各国首都，重要报人和高级官员都可以有私人交往，而在莫斯科却办不到。我看到，不止一个记者开始时出于对苏联人的钦佩而设法到俄国工作，最后因感到孤立而走向反对俄国的道路。共产党员不给他们时间。他们唯一能交往的是一些忧虑不满的知识分子和旧政权的残存者。这些人同他们交往，一是为了他们的钱，二是为了消遣。这种环境最终使他们失去“对革命的同情”。

即使对俄国情况有较深的理解，因而受到俄国人称赞的沃尔特·杜兰蒂也对我说，他不得不经常到国外去，“以进行一点有理智的谈话，否则，我无法生活下去。”我问道，“难道莫斯科没有明智的人吗？”他反驳道：“有是有，但是，他们和我交谈吗？”

那些希望帮助建设社会主义的美国人感到的孤立的程度不如记者严重。然而，即使我们也发现，我们的消息出自错误的来源，给我们提供消息的人被作为反对派而予以“清洗”。我们看到的反对派比实际存在的还多，因为这些人有时间同我们交谈。

由于各种美国人都希望接触俄国的生活，于是建立俄国—美国俱乐部的想法便产生。我几乎不知道它是怎么开始的。它是由于多种需要而产生的。我很快就成了它的主要促进者，因为其他人

都很忙，而我在写作之外，还渴望做些事情。我刚刚接手，人人就开始提建议。由于我的主要兴趣是放在那些希望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采用美国高效率的那些新的开拓者身上，俱乐部便首先采取了表达他们需要的形式。

工业界的人士说：“让我们有一个美国技术文献阅览室。一九一四年以来的文献，我们的技术图书馆一无所有。”洛谢夫说：“如果我们能有一个图书管理员，我就拿出我的价值两千美元的工程技术图书。我们将组建一个工程技术组，用我的书来教俄国年轻人。”来访的美国音乐家、医生、工程师和教育家说：“难道我们不能会见我们的俄国同行吗？”我把这些建议集中起来，到处传播。

我们将得到一个大的住处，美国救济署很快就要腾出来。我挑选的一处在格拉纳特尼大街上，这是一座宽敞的房子，有十个卧室，两个浴室和许多漂亮的会客室。这些房子已经按美国人居住的需要进行了改装。美国救济署同意把他们的床铺和办公室的家具捐献出来。我准备捐出从我为杂志写文章的稿酬中节省下来的两千美元，因为这样一来我可得到一个永久的住处。我们将把房子租给来访的美国人，向他们提供翻译、打字员以及莫斯科艺术博物馆和名胜古迹的资料，保持他们的通讯地址，请他们回国后寄给我们技术文献。我们将举行招待会，让美国工程师会见俄国工程师，美国教师会见俄国教师。我们每月将出版新闻简报，发展两国间的关系。

他们真的会让我做这些事吗？我已经两、三次试图打入苏俄的生活，总是吃闭门羹。他们真能允许我开办象俱乐部这样好的事情吗？它将有助于把美国的高效率带到俄国，在加强两国关系方面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了得到一座房屋，在莫斯科怎么才能得到应有的许可呢？看起来，谁对这事也摸不清。我不知道能够

作主的“大人物”在哪里。我想到托洛茨基，便把此事告诉了他。

我曾经见过托洛茨基。当我作为“西雅图代表”正不知道如何使我的工作由为资本主义报刊服务转到为共产国际理论服务时，我曾拿着一个法国共产党员的介绍信见过他。象其他人一样，他首先告诉我继续为资本家写东西。他还请我给他教英语。我反过来请求他给我上“关于革命的课”。我同他进行了大约二十次英语谈话，其中大多是谈他所经历的轶事。我不晓得在这些谈话中还缺少什么。它们只是证实了我的观点：理论是无所谓的，重要的是精力充沛地干事情。

这样，我便带着建立俄国——美国俱乐部的问题去找他，开场就说这是为了用美国技术建设社会主义，并且把希望组织俱乐部的在苏联工业界担任负责工作的美籍俄国人的名单交给了他。“要是你说这是一件好事，我就去做，”我对他说。“要是你说这不是好事，我就放弃它。”

他仔细看签字人的名单。“他们都是我们自己的人，”他说。“难道你不能找一些美国商人吗？”

“我能找到你喜欢的任何一个美国人，”我惊奇地回答。“人们都热衷于建立一个组织。我之所以不和商人接触，是因为他们不关心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我也不相信会允许他们在这里建立什么组织。但是，我可以找到他们，今年夏季城里有许多美国商人。”

“去掉社会主义口号吧，”他说，“把你能找到的所有重要商人都找来。晚些时候我们再让自己人参加。我将把你的计划告诉契切林。”

我理解他的意思。那年夏天，英国正竭力煽动全世界对苏联的仇恨。寇松的最后通牒扬言要进行干涉。在下达最后通牒的那一天，传来了苏联驻洛桑代表沃罗夫斯基被暗杀的消息。对武装

干涉的日子记忆犹新的莫斯科工人涌向红场，示威游行。莫斯科的气氛仍然紧张。与英国的谈判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在莫斯科有许多美国商人，甚至还有一些美国参议员，如拉福莱特、布鲁克哈特等等。他们来调查了解贸易关系。

如果美国著名商人现在申请在莫斯科组建一个俄国—美国俱乐部，那该多好！噢，对了，我知道了！我应邀参与一个国际政治大讹诈。利用这个机会，可以给伦敦拍一份绝妙的电报。这一点我可以做到，美国人易于合作。即使把情况全部告诉他们，只要不花费他们的钱，不使他们承担什么义务，他们都会笑着答应去做，只要是吓唬英国人，就行。是的，我们的俱乐部是非政治性的，“旨在促进俄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关系。”他们都会参加的。我甚至没有想到我正在放弃我早些时候的计划。其余的人将晚些时候参加。大家都是朝一个方向走。由于“有事可做”，我高兴得什么也不去想了。我那种美国人对有效率的渴望得到了满足。

大约在十天之内，我使在莫斯科的十分之九的美国人都报了名，成了俱乐部成员。沃尔特·杜兰蒂变成了组织的创始人，并且吸收了其他一些记者。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坦普尔顿鼓吹交一百美元的特殊成员，并表示第一批申请加入。来访的一个纽约商会主席对此表示支持，美国参议员作为“名誉成员”签了名，就是说，他们是我们的通讯成员。我们的执行委员会包括杜兰蒂、坦普尔顿、在俄国宗教界很活跃的美国卫理公会的赫克、一位美籍俄国共产党工程师和我自己。这正是我们美国人喜欢说的。“各方人士。”这在今天的莫斯科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啊！然而，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这却是很平常的。

过了十天，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的最可怕的夏季！开始“仅仅是

手续”问题。我们必须有一个许可证和房屋。托洛茨基到南方休假去了。契切林把这件事交给努奥捷瓦去办，他使我天天到外交部找他。我必须遵照苏联的法律惯例重写章程；其次，我必须把它译成俄文；第三，必须由官方盖章证明译文准确。第四，要我送去三份副本。我做得愈多，看来愈使努奥捷瓦恼火。他是有意拖延我。

办了两周的“手续”之后，我对努奥捷瓦说：“当我使你满意时，我可从你那里得到什么？一张许可证，还是一座房子？”

“噢，不，不能得到什么，”他说，“许可证要由内政部发给。房子由莫斯科房产部门给你们。我们只是把你们的请求转达给这些部门，以表明我们没有反对意见。”

“我自己来办吧，免得你麻烦，”我说。我逼着努奥捷瓦给我开了一张去莫斯科房产部门的条子，并且对他说，我们的俄国—美国俱乐部正在组建中，想要美国救济署的一座房子。拿着这张条子，我闯进了房产部门，并且得到了一张许可证：“一俟美国救济署腾出来，”我们就可以搬进格拉纳特尼大街的那座房子。再过五天，我们将搬进我们的房子了。

我从来也说不准是怎么开始出现反对意见的，看起来，可能是外国救济组织协调委员会来了一个不好对付的人而开始的。他曾答应把格拉纳特尼大街的房子给联合分配委员会。我直接从房产部门得到这座房子，他被激怒了。“我要把房子弄回来，”他威胁道。我不知道他如何办到这一点。

但是，代替努奥捷瓦“等等瞧”的，是一股积极反对的势力，他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散布反对意见，对这些渠道，我无能为力。有顾虑的房产部门取消了房子许可证，并且严肃地告诉我，我们的组织不合法，要房子是借口。我已难以见到努奥捷瓦了。当我千方百计找到他时，他说他尽了最大努力。是不是他帮助内政部拖延呢？

我问他在内政部找什么人，他愤怒地走开了。我不理解外交部的语言。我去内政部，找到了给俱乐部发执照的委员会，我问他们：努奥捷瓦转来的俄国—美国俱乐部章程处理得如何了。

“努奥捷瓦”，他们说。“谁是努奥捷瓦？”我向他们解释了我们的俱乐部，他们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将会立即办理。自此以后，便难以见到他们了。

联合分配委员会搬进了格拉纳特尼大街的那座房子。那位为他们搞到房子的人得到了一辆汽车作为礼物，是通过他的组织以正当的方式送给他的。但是，我还没有绝望。一九二三年夏天在莫斯科将举办农业展览会。他们希望有外国参观者。但是在全俄国没有旅游局，没有提供翻译的单位，甚至也没有关于博物馆、美术馆、领事馆或者名胜古迹的资料。我汇集了这些材料，把它们油印出来，并且列举了一些能胜任的翻译人员。如果我们能够有一个合法的章程，即使没有房子，我们也能开办。我请求农业展览会让出一个角落，以便我们向来访的美国人提供这些服务。他们向外交部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来回地跑，过了一天又一天。我对外交部说了十几次：“也许你们反对我们的组织，希望它改变。”“不，不，”他们说，“要耐心。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章程。”在内政部，他们告诉我十多次，某人在休假，委员会还没有开会。是我真的不太耐心吗？或者是某人在说谎？我难以说清楚。

接着，苏联政府为美国救济署举行了饯行招待会。我们美国人很少见到的要人出席了招待会。最主要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①，

^① 加米涅夫于1934年被定为组织谋杀基洛夫的一个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原注

他任莫斯科市长并兼任其他高级职务。人们对他说：“俄国—美国俱乐部未能开张，太遗憾了，如果有了这个俱乐部，我们便能够有更多的会见苏联官员的机会。”我也请求约见加米涅夫，以便把这一情况告诉他。……他说：“好的，来吧，他们所希望的是什么？”

在一个小时的会见中，我向他讲了全部情况。我说：“请告诉我，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如果你说要坚持干下去，我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坚持下去”，他说。“这是一个好主意。你需要什么呢？一座房子？我和房产部门说一下。”他当着我的面给他们挂了电话。”一个章程？我告诉内政部，你下周便可拿到。”

“是保留这些商人呢，还是回到原先的想法？”我步步紧逼。“保留这些商人，”他回答道。“我告诉内政部检查一下你们名单中的不合格的人。”美国参议员竟填写了有关党员的调查表，对此，我们不禁都大笑了起来。他微笑着送别我时，又说“坚持下去”。

在他的支持下，我又坚持了一个月，但是从此我再也见不到加米涅夫或者莫斯科房产部门的领导人，再也见不到颁发俱乐部许可证的委员会的人或者外交部任何人了。我在莫斯科的一些机关成了被人讨厌的人。公务人员对我很粗鲁，我请求要见的人都在“开会”。然而，我仍然坚持我认为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准许办的事。辛克莱石油公司的坦普尔顿先生在美国旅行三个月后回来对我说：“我走之前，要把那一百美元为你留在外交部。他们不接受。他们说：‘那俱乐部办不成，并且永远办不成。’”

我在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当中掀起了一场风暴。终于，他们把我召到了外交部。罗斯坦给了我致命的打击。“请放弃俄国—美国俱乐部吧，我们不希望开办这种俱乐部。”

“谢谢你这样告诉我，”我说，“但是为什么不早点说呢？你知道

不知道整个夏天我白白失掉了多少时光的信念？你知道吗，我再也不相信任何一个苏联官员了？他们为什么都要我坚持下去？他们都在撒谎。”

“没有人想到你对这件事会那么卖力。”他和蔼地回答。“他们可能认为你自己会放弃它的。”

“如果他们曾给我机会在这个国家办什么事，”我气忿地嚷了起来，“如果他们要我坚持下去，别想让我放弃它。”我在离开外交部时，除了罗斯坦，我愤恨所有的人。“可诅咒的亚洲人！他们是客气多变的撒谎者，他们从来不直率地告诉你他们想干什么。”我没有考虑到外交部的困境。我没有分析我过去一直在塞给他们的不适宜的东西，也没有分析拒绝一个有参议员参加的俱乐部的微妙含义。我只是从我的“乱世创世者”滑向另一个极端。

我宁愿再得一次斑疹伤寒，也不愿过那个夏天。它比我失去“我的美国”时还糟糕。过去我主办一件事，还从未失败过。这是彻底的惨败，它在我灵魂深处留下了毁灭的痕迹，永远不会完全忘记它。自此以后，我再也没能以美国人的那种快乐劲头冒失地走进苏联的机关。过去我曾相信，友谊和效率会使人们听取我的意见呢。

那年初夏我见到鲍罗廷时，我向他谈了此事。他用两分法哲学来安慰我。“办俱乐部是个好主意，你抓得好。你卖劲地去做了。俱乐部是需要的，有些想法会成功的。但不是现在，可能步子走得太快了，可能形式要改变一下。至于谈到你自己，我现在刚知道你完全灰心了。当你再灰心二十次时，你就适宜于生活在苏俄了。”

“我适合去死，”我大声喊了起来。

.....

俄国—美国俱乐部有两个续篇。第一个续篇是，大约一年之

后，在莫斯科建立了对外文化关系委员会，沃尔特·杜兰蒂对我说：“你是否看到了那个阐明宗旨的声明？它同我们的俄国—美国俱乐部一样！我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是的，成段成段的文字都取自我散发过的那个阐明宗旨的声明。

“如果我们办，它的效率会更高，”杜兰蒂安慰说，“但是，他们必须按他们的方式去搞。”

我同意杜兰蒂的意见。不过，我仍然去问，我能为这个新组织做些什么。我打算不久到美国巡回演讲。在美国，我有广泛的联系，我认识许多到过苏俄的人，他们都希望同俄国建立技术和文化关系。俄国人喜欢我组织一个美国分会吗？

一个助手看上去有些为难。“请给我一些介绍信，”他鼓起勇气说，“我想亲自到美国去一趟。”

我微笑着答应了，并且给了他一些介绍信。我内心里暗暗讥笑他。我想，拒绝我的不是革命，而是那个想到美国旅行的人。对此，我倒也不介意。

然而，我毕竟耿耿于怀。第二个续篇是一年之后出现的。我对一个来访的外国共产党员——他大概是德国人吧——全部讲了关于筹备俄国—美国俱乐部的经过以及其他想打入苏联生活的徒劳努力。我谈这些事情时，心里仍然愤愤不平。我吃惊地看到，我所谈的事情倒使那位德国同志很开心。他的双眼里闪着快乐的亮光。

“我一直非常担心，”他说，“大街上有那么多的私人买卖，那些有特权的外国人都大摇大摆地出入旅馆。这么多奇怪的力量包围着我们。真不知道他们会发展到何等地步。不过，你已经回答了我的怀疑！真的，完全回答了！你向我表明，除非我们的党着手干某件事，否则，任何人都无能为力。即使有你这么能干的人和托洛茨

基的支持,也不行。”

“这是不幸的事,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被他的话所激怒,大嚷了起来,“这是在阻止好的意见。这个国家是那么不讲效率,人们有劲儿,也使不出来啊!”然而,他的话在我脑海里回荡,使我反复思考。

“也许这是一个好意见,”他承认。“或许也有它的危险性呢。我承认,这个国家的效率不很高,但是在阻挡外来者的影响方面,它是有效率的。这一点对我来说足够了。”

在以后的那些年代里,我也曾想过一些危险性。当我看到各种各样的美国人来到莫斯科时,我曾想象到这种情况:我主持一个俱乐部,在那里,通宵饮酒作乐和女人乱搞,或者坐在桌旁对苏联冷嘲热讽。这怎么行!我曾经好几次开始觉得我最好不管这种事,但是,我还没有承认这一点。

“他们还是做了,”我断定说。“如果我们满怀美国人的热情去做,现在我们也可能被承认了。最后阻止我的难道是负责人的决定吗?其实,那是一个想去美国旅行的人干的!”

“关于承认的事,别太天真了,”德国同志回答道。“光有一些作为名誉成员的参议员,是不行的。毫无疑问,那个人是尽力使自己得到一个好的旅行机会。但是,他们知道他是执行命令的人。他一直是这样,不仅仅是为了一次旅行。”

对此有什么答案吗?没有,没有什么答案。我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报刊写稿的人,是一个局外人。内幕情况,我是不得而知的。……

只有过了十一年,在为写本书回顾往事时,根据我现在对苏联组织的了解,我才认识到是我自己扼杀了我自己和许多好同志衷心希望建立的俄国—美国俱乐部。我仅仅找到了一个领导人,说:“请你决定它的存亡。”在我对阶级划分无知的情况下,我甚至没有

注意到我自己意图的变化，从一个微小但正在发展的现实转到一个不现实的国际政治讹诈，这个政治讹诈又与苏联生活不能接受的一伙投机家纠缠在一起。那个较早的想法符合正从事工作的人们的需要，因此，一年之后它又冒了出来。

第十七章 我的伏尔加的孩子

我的机会突然来了。费希尔夫人对我说：“儿童委员会希望你在伏尔加河畔一个新的无家可归的孩子的农场担任顾问。”

费希尔夫人是一个曾在英国流亡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妻子。她是政府机关和教友会救济组织之间的联络人。我那时曾见过她。现在，她为儿童委员会工作。该委员会代表中央政府协调全部有关无家可归儿童的工作。她在伏尔加河上的赫瓦林斯克老家休假期间，由于发现非常需要安排无家可归的儿童，便决定组织一个年龄较大的男女孩子们的自助农场。

“我们希望你从美国弄些机器来，搞一个示范农场，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组织吗？”一九二三年秋天，我父亲来莫斯科看望我，我们一块去了。

那个时节正是全国各地成立公社的时候，有为成年人办的，也有为各种年纪的流浪者办的。普通儿童之家已不能吸引因战争和饥荒遗留下来的年纪较大的流浪儿

童了。他们往往是冬天来找避寒地方，春天便跑掉了。为什么不把他们按年龄编成小组，让他们在现在属于政府的一些荒废的种植园里劳动呢？只要有老师和设备，这些地方可能变成模范的农业中心，对农民是一个启发。

我对赫瓦林斯克的印象不好。这里有许多穷苦的孩子，地方当局乐意提供土地。但是，他们建议的地方是一个古老的修女院，野地里有古老的果园、森林、水池和一个已坏了的磨房。这倒是一个供人们休假的好地方。所提供的农场土地分散在四个地方，最远的在十五英里之外。在伏尔加地区，农民耕种的土地通常都是这样的。它们由倾斜的山路连接。即使我这个对农场外行的人也能看出，在我们的马车经常打滑的山边是不便于用拖拉机的。而他们却期望我“运来美国拖拉机，办一个模范农场”。

“具体地说，我应该负责什么？”我问费希尔夫人。“在我去美国作四个月的巡回演讲期间，这里怎么办？”我的肯定态度反而使她显得有些难办。但是，她说，儿童委员会将负责组织工作，教育的费用和儿童的伙食由它来管。顾问的工作是在国家预算之外来改进技术。“你不必管基本的组织工作。只要你从美国弄点东西回来，功劳就不小了。”

这个农场距莫斯科有两天的路程，我很难经常照管。在这里承担什么责任，当然不是我所希望的，何况这里的自然条件也对我不利。但是，这是苏联的一个组织请求我做的第一件事。他们拒绝我成立俄国—美国俱乐部的意见，令我一直伤心。我不想失掉这个首次得到的机会。费希尔夫人知道这一点。她指望能成功。

我从当地土地部门获悉，如果我们能保证开发，可以另找土地。当我要求给一块较大的整块土地时，他们提出阿列克谢耶夫卡，这是沿河而下二十英里处的一个老庄园，靠近码头、交通方便。

它现在是一个国营农场。如果我们能开发得比现在好，我们可以为孩子们搞到它。他们使我们相信，管好并不困难。在那些日子里，国营农场的设备和好的管理人员都很缺少。他们估计，只要有价值五千美元的机器和牲畜，就可以说服政府要求最严格的部门让我们优先获得那个国营农场。这些就是苏联公共财产的基本原则。私有者不能得到政府的这些财产，然而，任何能表明自己可以管理得最好的公营组织则有希望得到它。他们必须继续不断地发展它，否则政府便转交给某个更新的组织，只要后者表明能更好地管理公共财产。

大家商定，我们的农场应立即在山边那个名叫切鲁姆桑庵的修女院开办，第一年耕种那四块分散的土地。如果我能从美国带回足够的机器来进行开发，我们可以指望得到阿列克谢耶夫卡农场。十名男孩子立即搬进修女院，还有一位农民耶雷麦耶夫，一个木匠费多托夫。他们住在窗户破了的空房间里。他们从原来的儿童之家带来五麻袋稻草、五条薄毯子、两盏油灯、十个碗、十把勺子、两个做饭的铁锅、一些黑麦面粉、土豆和葵花籽油。他们从赫瓦林斯克带来的一匹马和一辆马车留下来干农田活。他们获准推倒两个破烂的棚屋，用那里的木材做桌子、板凳和床铺。这些活儿是费多托夫用他那套旧工具做的。

就这样在切鲁姆桑庵开始办起了约翰·里德的儿童农场，与此同时，我到美国去弄钱、机器和技术人员。我认为在伏尔加河畔兴起的不仅是一个模范农场，而且是一所俄国—美国大学，它在形式上是苏联的，但采用的是美国技术，学生们通过劳动自助。我知道有数以百计的美国人希望“为俄国的未来出一把力。”教员、农场工人、护士、木匠都在恳求自费来俄国，生活不计较，目的是帮助俄国儿童。我将挑选和带这些人来。他们中很少人能讲俄语。幸运

的是,我们的第一志愿者是英语教员安娜·格雷夫斯,她正在莫斯科。如果头年冬天她能教一些儿童学点英语,他们便可以吸收越来越多的美国专家。我们实际上是为苏联组织一个俄国—美国大学农场,这将比俄国—美国俱乐部好。我现在也认识到,如果办那个俱乐部,它很可能堕落为酗酒玩牌的场所。

这些革命的流浪者各自都承担了任务;他们是英雄。虽然他们缺乏教育,衣服破烂肮脏,曾经到处流浪,有许多人当过小偷,但他们都努力工作,为建立一个每个人都劳动、对大家做出贡献的集体而奋斗。他们有生活下去的毅力。他们的队伍稳步扩大。不久,他们派了一个代表团找城镇当局:“我们现在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正在制作盘子、家具、床铺和修理鞋。我们缺乏粮食。请把池塘边的那个破旧的磨房交给我们吧,我们可以修好它。”他们得到了这个磨房,增加了四个孩子管理它:两个男孩想当磨房工人,两个女孩做饭和缝纫。他们派代表团到农村为他们的磨坊兜揽生意,开始挣钱糊口了。他们做了更多的床铺,收了更多的孩子。他们从结束工作的教友会救济组织那里搞到了一些粮食和其他东西。到第一年春天耕种时节,五十七名孩子开始了农业生产。我当时仍然在美国。

他们干得多么出色呀!他们冬天晚上在切鲁姆桑庵就筹划好了,同耶雷麦耶夫谈论他们应该建的新生活。虽然他们隐居在被白雪覆盖的山上,没有什么文化,但是他们想方设法吸收知识。两年之后,其中一个女孩从威尔斯《历史纲要》的图片中知道这是一部关于人类发展的著作。她指着古代亚述人的文字说:“文明的开始”。她是从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那里学到这种知识的。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每周从切鲁姆桑到这里来一次,照管他们的俱乐部,教“人类发展史和破除宗教”课。但是这种教育很肤浅,只能学点零

星的东西。他们还没有书。安娜·格雷夫斯成功地救活了一个小女孩。当那个小女孩肚子痛，住在医院时，她一直喂她。然而，在那个几乎是原始生活的环境里，她教的英语不多。

那年春天，耶雷麦耶夫用农民多年采用的办法教他们种地。他们先后在四块地里宿营，建起过夜的草房。耶雷麦耶夫和他们住在一起，驱赶他们干活，骂他们，用巴掌打他们，就象一个农民父亲对待他的孩子那样。他是一个不信教的农村共产党员，因此，复活节时，农场里继续干活，而没有过节喝酒。他们向全城证明，不是靠庆祝复活节，而是通过赶早劳动才可以取得丰收，因为他们得到了创纪录的收成。

第二年秋天去征服阿列克谢耶夫卡的男孩子，自己已经组成了“责任明确的工作队”。我发现，他们睡在阿列克谢耶夫卡粮仓的稻草上，耕地工作一直进行到十月下旬。秋雨打在他们那单薄的身上和裸露着的大腿上。他们冻得发抖，并且染上了从河里传上来的疟疾。那些披着羊皮袄的人耕地的时间最长，然后，他们把外套借给另一拨人，自己蜷缩在稻草下边。这时，下一个班又在耕地了。他们要求我弄一些“肉汤，什么脂肪都可以，猪油，油类或黄油，只要最便宜就行”。他们直接从他们那单薄的身子上吸取热量。有一个男孩的哥哥、一位年轻的共产党员从莫斯科各报的编辑部搜集了一箱子书，给他们寄来。他们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其中有各种各样的书，从故事到马克思著作。这是他们第一次获得真正读书的机会。

他们耕地要作记录，以便确定他们这个农场可以耕多少地。最强壮和年纪最大的男孩子正在替其余的人耕地。就这样，那年秋天，他们耕了二百英亩肥沃的土地，另外，他们还在切鲁姆桑的山上种了五十英亩冬黑麦。他们在阿列克谢耶夫卡干的活比任何一

个成年管理人员都多，创了革命以来的纪录。他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土地和房屋。他们的农场获得成功。第二年，在阿列克谢耶夫卡的伏尔加河畔山上又开垦了五百英亩的黑色土地。他们甚至把山脉那边朝西的肥沃的紫花苜蓿地也弄到了手。他们晚上住在那里，准备第二天早晨干活。他们甚至得到了供全乡农民用的旧庄园的一个四层楼的磨坊。

沿着河从沃尔斯克到锡兹兰走八个小时的路程，便可以看到我们的宏大农场了。在伏尔加河两岸还没有比我们更大的农场。除了我们从美国弄来的福特森拖拉机外，别处还没有拖拉机呢。人们走几英里跑来参观；我们成为“农民的灯塔”。伏尔加河上游和下游一带无家可归的孩子听到我们的情况，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我们的行列。

这个农场不单单属于我们自己，它正接收愈来愈多的无家可归的儿童，朝着世界大公社发展。这个农场受教育最多的、十六岁的莫洛索夫对此作了解释。

他是阿斯特拉罕一个女仆的儿子，十岁时看到了革命：挨饿的士兵抢劫商店，波斯工人用刀砍死他们的老板，吃其肉。他看到工人们在会议上选举苏维埃政权。他围着赤卫军，看他们选举军官和宣布“革命秩序”。他看到阿斯特拉罕城堡被攻占，剧院广场一片火海。接着，他破天荒第一次上学了，读完三年级。后来在饥荒年代，他和其他五百名儿童一起被用棚车运到有饭吃的地区去。他在遥远的科斯特罗马读完了五年级。十六岁时，他申请加入我们的公社。在男孩会议上，他讲了他为什么加入这个公社。这些孩子什么都管，“象正式公社社员一样”。

“我喜欢这个地方，因为它不是学校，学校在你十六岁时便把你打发出校门，而在这里，十六岁时却变得更有用了。我没有家，

我对城市不感兴趣。我想建设大公社；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好。在这里，我们将从事建设，没有人会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我们看到的一切，土地和房屋、磨坊和商店，我们会说：‘它们是我们的。’”

我问莫洛索夫：等到阿列克谢夫卡农场再不能为公社的发展提供更多粮食时，他打算怎么办。他能永远不断接收新的儿童吗？如果不能，那么，这个农场将变成一个由成年的有产者组成的集体，二百个联合场主，而不是一个场主。我想的是财产，而莫洛索夫则不这样想。

“当我们长大，建筑了自己的房子和仓库时，还有其他一些办得很糟的苏联农场，还会有一些空地，我们可以去出力嘛。当所有无家可归的儿童都住上房子时，还有些生活贫苦，希望加入我们行列的农民儿童。我们的公社会不断增加新的分支部门。在我活着的日子里，土地不会失去，儿童们也会不断进来。将来，我们也仍然是日益壮大的苏维埃共和国公社的一部分。”

莫洛索夫知道他憧憬着什么。其他孩子们也知道。他们是革命的流浪者。但是，约翰·里德公社从未变成他们梦想的公社，也没变成我的俄国—美国大学。伏尔加流域对此还未作好准备。不管是它的管理人员、农民或是政府官员都没有作好准备。

当我结束第一次美国之行返回切鲁姆桑时，我首次发现我们的公社碰到了麻烦。两个月以来，我一直从那宝贵的五千美元中寄回一部分钱，为阿列克谢耶夫卡购买牲畜。然而，我没看到牲畜。那些钱用来养活孩子们了。但是，孩子们由于缺乏营养，脸色苍白。国家从来没有给这个公社拨钱。当地儿童之家捐献的只是儿童和房屋。儿童委员会把全部钱都送给了州级机关。而州的首府萨拉托夫反对在河的上游建立公社。

费希尔夫人一直坚持着。当萨拉托夫不肯松动时，她请求从教友会给点“补充配给品”。公社得到的救济物足够一百五十名儿童享用。整个冬天，公社实际上平均只有二十五个孩子。它便把多余的糖、炼乳和可可拿到一个极端匮乏的农民市场上换取别的东西。市场上五年来看不到糖了，过去更从未见过可可。就这样，公社弄到了粮食、衣服和一架缝纫机。教友会发出救济品大约是在我的钱寄到的时候。我的钱勉强够买配给的东西。

教员的工资也没有列入政府的预算，但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教师协会和共产党妇女会争着给我们教员，因为这些教员可以从我们商店里得到配给品。各个组织通常在指派教员方面达成妥协，派出的人数等于需要的三倍。每个教员都有“亲戚”，这些亲戚都是在饥荒年代里形成的。他们比所有的儿童都吃得多。这些革命的热心流浪儿养活了他们。当我想要辞退那些教员时，我弄不清楚是谁雇用他们的。萨拉托夫和莫斯科都推卸责任。当地组织只是提名，而没有雇用。所以，没有人能够解雇他们。他们赖在这里。也没有人对这个公社的建立承担责任。

接着，从当地谣传中，我了解了费希尔夫人坚持反对萨拉托夫的理由。她在赫瓦林斯克度假期间，她最大的儿子出去散步。他回来后说：“我看到了一个最幽静的古老修女院，那是收容无家可归的儿童的最好地方。”两周之后，他在莫斯科河里救一位同志时牺牲了。他的母亲记住了她那英雄儿子在切鲁姆桑建立儿童农场的最后愿望。

我原先以为是儿童委员会，甚至也许是共产党欢迎我投入苏联的生活呢，到头来，却是一个孤独的母亲想使我们同她一起实现她那死去的儿子的夙愿。也许连她自己也讲不出赫瓦林斯克究竟贫困到什么程度，她自己的悲伤究竟有多大。我看到，在社会主

义社会里，正如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样，男人的各种意愿总是占上风；投入苏联生活的愿望本身并不能带来智慧；如果你是一个轻信的傻瓜，即使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也不会落得好下场。我怀着刺痛了的心情认识到，人要有头脑，即便和同志们打交道也要这样。

但是，孩子们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有力量征服土地。依靠慈善事业的救济和以物易物勉强糊口的这些孩子竟然梦想建立世界公社！对这些孩子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对苏联组织系统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做，去找谁。费希尔夫人已经离开莫斯科。给孩子们带来援助的是儿童委员会的亚沃斯卡娅（在这之后她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她在沙皇时代就为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而奋斗了。她的生活长期以来就是母亲般地收养无妈妈的孩子。她不知疲倦，聪明伶俐。她逐步给教员们弄到了国家的拨款。她削减了教员人数及其享受配给的亲戚。但历时两年才做到这一点，而且，取消了公社，改为学校。因此，即使现在我也说不准，费希尔夫人的大胆做法是多么明智。在那些日子里开办的公社都得不到什么政府拨款，但其中一些公社幸存下来。

我想，如果任何一个成年人象孩子们那样了解公社的含义的话，如果有一个组织者象几十个青少年那样好的话，公社便有可能存在下去。在苏维埃共和国的那些年月里开办的数百个公社中有几个现在颇为有名。它们是：工业日益发展的博尔谢沃劳动公社，一九三〇年我在西伯利亚参观过的克鲁普斯卡娅农场公社。当我看到那些正在扩展的工厂时，当我漫步在辽阔的土地上时，我想到了我们分散在各地的孩子们。但是那寥寥无几的成功的公社经受了许多的动乱。它们需要有一个坚定明智的领导人。在约翰·里德公社里缺少一个明智坚定的人。亚沃斯卡娅来这里度她一

个月的暑假，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们做些事；我在这时候也来了。即使我能够在伏尔加住下来，我懂的俄语和俄国生活方式太少了。

因此，孩子们关于公社的梦想受到了漫不经心的官员们的沉重打击，从而使他们从少年时代起就学会了不信任这些官员。当曾宣布与公社无关的萨拉托夫州政府得知，该公社从教友会弄来一百条毛毯和做床的许多木材时，便又送来五十名无家可归的儿童，但他们来时没有带口粮。他们这样做，究竟是出于贫困，还是由工作上的混乱，现在无需去研究了。我们十六岁的公社成员虽然营养不良，但却获得了丰收。他们用获得的粮食养活了双倍的人数。他们没有脂肪或糖。他们本来可以用自给有余的粮食去换得这些东西的。逐渐把该公社列入其预算中的沃尔斯克县政府第一次履行职权，就送来三十五名最坏的小流氓。春天来临时，他们都逃跑了，偷了双份的鞋和毛毯。那些年轻的公社社员整个冬天都用他们第二次辛苦挣来的东西喂养了这些懒汉。因鞋子被偷，他们又赤着脚开始了播种。

他们不幸的是，没有碰到一个好社长。他们的三个社长是苏联农村行政领导所经历的几个阶段的真实写照。第一个是耶雷麦耶夫。他是一个粗暴无知的农民。他在内战中成了一个红色指挥官和赫瓦林斯克民兵领导人。值得称赞的是，他诚挚地希望有一个公社，他自己担任领导。从理论上讲，他是一个共产党员，实际上他是一个家长式的农民。在他看来，最重要的是不断弄到更多的土地；其次是得到更多的马匹来喂养；再次是养活男孩子们。最后，他才想到喂养女孩子们，她们只会洗衣服和擦洗。他从来不给女孩子们有趣的工作——种地、驾驶拖拉机、做木匠活，只让她们洗脏衬衣，而且不用肥皂。她们是多么恨他呀！

阿列克谢耶夫卡办一个更大的农场，他完全不能胜任了。为

了购买大磨坊的零配件，他几乎把第二季的收成全都卖了。由于领导无方，磨坊未能办下去，因为它应付不了越来越多的农民粮食。我们只好把磨坊转交给能修理的国家托拉斯。我们在冬天一月份就挨饿了。这时，公社只好求助于沃尔斯克，虽然搞到一点粮食，但却来了三十五名小偷。至于教育，耶雷麦耶夫从来不去想它。他不知道教育为何物。他不信任那些喜欢摆弄铅笔和纸张的男孩。他也不诚实，他为我们公社偷国家托拉斯的水泥和木材；他让一些男孩到很远的市场用欺骗的办法卖掉一匹坏马。我称他为贼。亚沃斯卡娅和我利用磨坊这件事把他搞掉了。

但是第二个社长彼得罗夫^①更不老实，他偷公社的东西装进自己的腰包。这时，我们多么想念耶雷麦耶夫啊，他虽然偷，但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公社。我们多么想念那位粗鲁的农民，他和社员们一起睡在田野里，他自己身上的虱子和男孩子们一样多，他一喝醉或发怒就打人，但是他教给他们怎么干活，而不是油腔滑调、狡猾的懒汉。彼得罗夫早晨十点才起床，到磨坊转转，便去厨房吃饭了，然后下午到阿列克谢耶夫卡村去拉政治关系。

毁掉公社的正是这个堕落了党员彼得罗夫。他害怕大男孩子们的义愤。当从美国运来的一批衣服到达时，双方的对立推向了高潮。

我想我已经为约翰·里德公社在美国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人材。在康乃尔农学院，有一个年轻的俄国农民帕维尔·雅辛正在一边学习农业，一边在试验站挣钱维持自己的生活。他战前来到美国，现在无法回去。他曾在美国和加拿大小麦农场里工作。他的妻子和一个小孩仍留在萨拉托夫区。他学习农业是为了回国造福

^① 我想最好在这里用一个化名。——原注

桑梓。调查过我们公社的党内监察委员会曾告诉我，我的作为顾问的任务是寻找一个好的技术专家。谁能比雅辛更强呢？康乃尔学院把雅辛回国想得有些浪漫色彩，他们认为，他可以“在伏尔加建一个康乃尔学院，”这个新的康乃尔学院几乎马上就可以同老康乃尔学院交换种籽和实验成果，将来再交换学生。他们为各种设备筹款。雅辛打算带价值几千美元的机器回国。

其他学生送来衣服、外套和鞋子。包裹没写约翰·里德公社的地址，因为我已不信任那个社长了，而写的是公社的共青团，即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孩子。可以相信，他们会把收到的任何东西当众分配的。但是，彼得罗夫伙同当地邮递员和合作社商店的头头密谋偷拿不可侵犯的邮件。他们锁上门，打开这些邮件私分，有些分给合作社，有些分给他们的朋友，根本不分给年轻的公社社员。

这些社员已不再是孩子了。他们已是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他们建设了一个著名的农场，但是在彼得罗夫的统治下，这个农场快要完蛋了。共青团举行了一个群情激忿的大会，他们群情激昂，咄咄地猛击关着的屋门，由于没有得到回音，他们又举行了一次大会，再次猛击屋门。当屋门终于打开，彼得罗夫出来时，那些包裹已被搬走。年轻社员渴望的美国物品已摆在农村合作社商店里了。

自此之后，对于彼得罗夫来说，到宿舍去已不安全了。他向沃尔斯克政府控诉这些“年轻的流氓”。当这些人纷纷偷坐轮船流到沃尔斯克去告状时，他们碰钉子了，因为彼得罗夫已经把阿列克谢耶夫卡的官员买通了，他们抱成一团。有谁会信任偷着坐船来的“年轻流氓”呢？坚持斗争的头头被赶出了学校，名誉扫地。他们正当干工作的年纪啊。其他人作为超龄学生逐渐被淘汰了，因为公社正改为正规学校。

当我和帕维尔·雅辛一起从美国回来时，整个事情已快过去了。在伏尔加一带，我们那一大片肥沃的五百英亩犁过的黑土地再也不是公社的一面旗帜了。一部分耕地成了学校的一个实验园地，国营农场又回来了。年岁小的孩子们留了下来；公社改成了学校，只收十六岁以下的孩子。公社在苏联各地快过时了。大多数公社是被教员的亲戚和彼得罗夫之流扼杀的。当时正在流行的是“青年农民农业学校”。

彼得罗夫还呆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把雅辛除掉，贪污了他弄来的一部分机器为止。在伏尔加建立康乃尔学院与美国交换种籽和科学实验成果吗？彼得罗夫对此才不关心呢！种植优良菜籽的园子被随便安排在牛走的路边，又没有围上篱笆。没有派任何小孩在园子里干活。孩子们喜欢友好而又绝望的雅辛，所以做完其他工作之后，总是来园子里种菜和锄草，于是彼得罗夫便派他们去做别的工作。他把雅辛当作一个为“外国顾问”，搞间谍活动的“外国专家”。他甚至竭力使他离开这个集体。就这样，雅辛最终在萨拉托夫试验农场找了一个工作，并对康乃尔学院设法作了一些解释。彼得罗夫不仅得到了那些机器，甚至也搞到了雅辛的缝纫机。雅辛认为自己是一个公社社员，他没有把缝纫机列为私人财产。

当彼得罗夫罪恶累累，即将暴露时，他很容易地悄悄溜到国营托拉斯找了一个工作。每个人都很忙，无暇对他追查到底。我们第三位管家来了。他的名字我忘记了。这个事实本身就够典型的，他代表了苏联管理工作的新阶段。他年轻，刚从师范学校毕业。他用痉挛性的发号施令来掩盖他那缺乏经验的忧虑。但是他还是竭力想把工作搞好。他是第一个重视教育的人。后来又换了几个校长。约翰·里德学校设在遥远的未开发的地方，不能吸引优秀管理人员，因而它成了新毕业生获得经验的地方。

不过，它毕竟幸存下来了，它易名为“集体农场技术学校”。它是今天注意的中心。它从阿列克谢耶夫卡搬到了内地一个人口稠密的农村。在广大地区，它在所有这类学校中仍然是设备最好的学校。它仍然有康乃尔学院的美国机械。即使是那台最早的拖拉机，在大规模集体化的日子里仍在继续犁地。所有的公社社员都曾在这台拖拉机上学习过驾驶技术，它是沃尔斯克和锡兹兰之间广大地区的第一台拖拉机。最后它仍在犁地。也许它要一直犁到社会主义；但犁不到大公社。到那时它将用坏了。

但是，我们早期公社的社员现在在哪里呢？他们尽管失败了，却仍然是勇敢的战士。这谈不上是青年的毁灭；这是讲关于苏联的情况。那些社员是苏联的好儿子。他们从周围那种混乱贫困的环境中选择了他们需要的东西，远远比我做得好。他们在战争、革命和饥荒中成长了起来。

他们不是财主，没有因为丢掉一个农场而被毁。虽然这个公社倒了，但国营农场和新的国营工厂正在兴起。他们毕竟学习过开拖拉机和管理过一个磨坊；他们中有些人还和一个美国专家一起工作过。他们是伏尔加的新贵族，自由的工人，会开机器。虽然他们知道的东西少得可怜，但毕竟比别人知道的多。用周围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可说已经进过了我的“俄国—美国大学”。

如果说他们的世界里有彼得罗夫的话，那么也有亚沃斯卡娅。每年夏天，她利用假期来帮助他们找好的工作和学校，她根据他们的能力把他们分类。她把每个孩子都当作自己的亲生孩子。我们的两个最坏的小偷也当了美术工作者；她在萨拉托夫艺术学校为他们找到了工作。我们最好的拖拉机驾驶员进行了深造，成了工程师。那位在疟疾流行时跟当地医生实习的姑娘进了医校。所有的学生都得到了政府发的助学金，苏联学校都如此。其余人在新的

水泥厂或新的国营农场找到了工作。

对于我和亚沃斯卡娅来说，他们更是她的孩子；她与他们通信，保持联系，对他们年轻人的问题提出意见，同时她在他们的婚姻和生育第一个孩子的问题上也给予指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也是我的孩子。我不再从美国筹集款项。我自己写文章得来的稿酬的结余足够给他们买点零碎东西了。在亚沃斯卡娅的计划下，我们逐年给他们的钱相当于苏联最贫穷的家长所给的钱，以补充政府助学金的不足。给一个学生一件外套，给另一个学生几双鞋，给第三个学生一点牛奶津贴费。他们不再是“无家可归”的孩子了；约翰·里德学校成了他们的家。由于有亚沃斯卡娅无微不至的关心，再加上农民青年的勤奋好学，约翰·里德学校比莫斯科管理得最好的学校还要成功。从这个学校出来的二百六十个男女学生里，除了十个学生外，亚沃斯卡娅都与他们保持联系，一直到他们成家立业为止。他们全都成了有用的人！

他们分散在从列宁格勒到巴库的各个地方，分别在工厂、农场和学校工作。他们多数人仍然互相通信，自称是“约翰·里德帮”。偶尔他们路过莫斯科，便停下来谈谈昔日情况。他们高兴地听到耶雷麦耶夫学习了三个冬天的专门课程，现在在管理着一个大的国营农场。“是的，耶雷麦耶夫身上有很多优点，”这些未来的法官说。有一次他们曾说，他们应该搜寻彼得罗夫，把他清除出党。不过，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些仍然留在伏尔加地区的人在假期里往往首先到约翰·里德学校去。他们这些自豪的工人校友回去帮助收割，告诉年轻人如何干活。他们消化耶雷麦耶夫和彼得罗夫的经验教训，如同他们那强壮的胃曾消化战争和饥荒一样。他们热爱那些连绵的山丘，他们那到处流浪的双脚在这里第一次固定了下来，他们通过劳动首

次安了家。他们热爱那清新的黎明、伏尔加缓慢的季节、遥远的苜蓿地里的老棚房和那失去的磨坊。从所有这一切，甚至从彼得罗夫身上，他们吸收了他们工作和战斗所需要的东西。他们给我写信时，把约翰·里德学校称为他们“走向生活”的桥梁。

第十八章 我成了苏联在华 尔街的代理人

在我担任赫斯特《国际杂志》驻俄国和中欧记者近三年之后，我接到诺曼·哈普古德的电报，取消了我所从事的工作：研究犹太居民在乌克兰南部农场定居的情况。哈普古德先生作出种种努力，使他的刊物成为著名的国际杂志，因而发行量大增，致使赫斯特的另一个出版物《世界主义者》月刊的销售量开始下降。这位报刊大王决定把它们合并起来；为了扩大赢利，两宗“财产”合成一宗。他向全世界宣布，要办一份把这两种杂志的所有特点集于一身的更大更好的杂志。赫斯特在拍给哈普古德的那封率直的电报中讲到了事实真象：“你的杂志在本期印刷出版后即停刊。”赫斯特的《国际杂志》组织被取消了。

当我在此之后不久回到美国时，哈普古德写给我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把我推荐给吞掉他的《世界主义者》月刊主编。新的主编说：“不，我们不需要报道俄国或中欧。我们需要的是关于个人经历的故事。它们将更能刺激读

者。”

“如果你想要关于个人生活的故事，俄国有的是，”我说道。我谈到有关索尼娅和其他类似的故事。这些关于个人生活新标准的故事是激动人心的。他的眼睛里闪烁着贪婪的光。过后，他摇摇头，长叹了一口气。

“非常精采的故事！但是不能要！除非堪萨斯的送奶工人和圣路易斯杂货店的营业员感到他们也可能发生这种事，否则，这种故事就无法扣人心弦。俄国的故事是不可能使他们有这种感觉的。”

什么堪萨斯送牛奶的人，什么圣路易斯杂货店的营业员，以前我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些？我突然认识到这是赫斯特的人叫得很响亮的口号。哈普古德对我用了这些口号。我曾激动地想过他们是指美国广大群众。现在，我才看到他们是指小商人的世界，赫斯特迎合了他们那种声色犬马、花天酒地生活的需要。哈普古德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有世界眼光的人，他谋求用我们时代的伟大历史事件来激励他们。但是，赫斯特反对这样干。我很为哈普古德难过，他被象赫斯特这样的老板牵着鼻子走。

《世界主义者》月刊主编对我是友好的。“你能讲很好的故事，”他说。“如果你能为我们写些美国人自己的经历的话……”我微笑了起来，说道：“不，我另有计划。”

我的新计划是：使自己成为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为各种出版物撰写稿件。我将每年去美国作一次巡回演讲，与主编们重新进行联系，和他们共同商讨我应该到苏联的哪些地方去旅行，我应该写什么题目。这样，我就可以保持自己的自由，把空闲时间用于俄国的约翰·里德学校或其他事情上。

我竭力使我去美国的这些旅行发挥尽可能多的作用。在那些日子里，苏联机构正开始与外界进行初次交往。他们希望得到书

籍、技术杂志,想进行各种交往。我注意到了这种愿望,并尽力为其效劳,希望找到一个我可以发挥作用的途径。于是,我为俄国少先队员们带来了体育和群众游戏的手册,给列宁遗孀克鲁普斯卡娅弄来几箱子关于教育的最新书籍。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委员部工作。但是,这些活动只是偶尔为之。我想找一个机构,以便可以充分利用我在美国的关系。看上去,有两个渠道:在莫斯科的美国教育实验班和特许权委员会。

美国教育实验班是从我的约翰·里德公社发展而来的。尽管它的混乱让人失望,但是,我从美国搞机器的能力给在莫斯科负责流浪青少年工作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什么把精力浪费在效率低的伏尔加地区呢;我们在莫斯科给你搞一个地盘,”他们说。教育当局在郊区塔拉索夫卡有一百二十幢房屋,多数供孩子们的夏令营使用的,但是,也有一些房子是冬天让流浪儿童住的。他们向我提供了六座房子作为教育实验班,我可以安排一些美国技工和机器设备,办自助工厂,训练从附近的少年之家吸收来的青少年。在塔拉索夫卡或周围地区,我们可以用尽可能快的速度发展。

多么好的设想啊!它把我试图做过的一些事情更好地融合在一起了。我再次看到可以把美国效率同苏联人结合起来。我们将避免以往导致失败的各种陷阱。在粮食、住房和教学问题上没有繁杂拖拉的公事程序了,也免除了适应苏联方法的艰苦过程。只要选择美国技工,让他们教听话的喜欢美国技术的孩子,就行了。“我能在任何地方组织任何美国人,”我高兴地大声说。莫斯科教育当局让我全权掌管我所能组织的全部实验工厂,并可以通过塔拉索夫卡教育委员会同莫斯科的学校挂钩。这是在教育方面给一个外国人提供最大自主权。我可以利用我到美国旅行的机会挑选美国技工。数以千计的人都想来苏联,并自带工具和设备。

与此同时，我在特许权委员会也进行了联系。这个委员会负责同外国商人打交道。数以百计的外国冒险家涌进莫斯科来寻求发财的机会。苏联提供了机会，是有明确的条件的。鉴于不能立即全面发展自己的国家，他们只愿意对那些将带来机器和现代技术方法的资本家提供“特许权”。共产党人是很难对付的讨价还价者。他们是不会把财富白白扔掉的。他们希望，在煤矿方面取得特许权的人应当懂得开煤矿的技术，可以实际操作生产。然而，来苏联的人主要是推销商，他们希望搞到特许权，在华尔街出卖股份。少数人是准备做生意的。还有一些人是进行国际冒险的，他们想从政府手中诈取数百万元。

例如，福尔和辛克莱集团乘专列来莫斯科谈判油田问题。当时福尔仍是哈丁内阁的一个成员，是这个大石油托拉斯的政治首领。他们用他们的政治影响来吓唬俄国人，暗示给辛克莱提供石油在国际上对俄国有好处，至少是可以得到美国的承认。俄国人以牙还牙。他们给辛克莱石油公司提供了萨哈林的丰富油田，其条件是每年要有明确的勘探和开发量。那时，萨哈林还被日本占领着，辛克莱无法进行钻探，俄国人便粗暴地取消了特许权。这位石油大亨在美国报刊上大肆叫嚷苏联“背信弃义”，而冷漠的俄国人根本无动于衷。

“他大吹大擂什么国际影响！他们知道当我们在特许证签字时，它意味着什么。把日本赶出去，我报之以石油！在石油和政府间的关系中他不是一个小孩子。”

我不喜欢做买卖；我也不喜欢特许权。我不喜欢来俄国的那些推销商。但是，我向特许权委员会申请工作，说我每年回美国一次，如果我能先在其机关工作一下，了解他们的愿望，会对我在美国建立联系有好处。他们立即让我当了“美国顾问”，定为十七级，

这是在文官中最高的一级。我列出了应当订的美国商业出版物的清单。我把这些清单读给他们听，把美国的商业条件摘要写给他们。我询问了前来机关的商人的级别，帮助决定哪些人值得介绍给苏联的要人。我还用英文编辑了现有的全部特许范围及其条件，并向询问者提供这些材料。但是，这个工作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一天干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该回美国了；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天，我要作一系列演讲。我曾写了一本关于约翰·里德公社的书：《革命的孩子》。我计划出售此书，筹集教育经费。我将利用这次旅行来为美国教育实验班物色技工和筹措资金。我问特许权委员会：我在美国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

他们说：“请会见华尔街商人，了解一下他们对我们有什么看法，他们希望得到什么特许权。”

我请他们开一个证明我是他们在纽约的代表的介绍信；我希望它使我不再感到自己是局外人。

他们说：“带着这封介绍信过边境对你可能不便。在美国海关，它可能使你难堪。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将会知道你的身份。”

我发火了。他们把我当作什么人——特务吗？我倒希望美国海关找我的麻烦。那样一来，我就有机会在国务院面前挥舞那封介绍信，大嚷道：“这就是你们不承认的那个国家。而我则是美国良民，我的出生证你们是拿不走的。我是来华尔街为那个国家办事的。如果你们有胆量，让我去找博拉、惠勒和拉福莱特吧！我在参议院有朋友，他们都准备挣脱出来呢。”……不，我们美国人不是阴谋家；我们的技术不是老谋深算，而是虚声恫吓。

我怀着一种被抛弃的感觉想到：“到了纽约，我一定告诉他们。”我用洁身自好的姿态，拒绝了他们认为我工作的两三个月应

得的工资。我曾经非常为十七级而自豪；而现在看起来，一文不值。“既然你们希望我作为一个没有公职的人去，我也不要你们给的工资。这样，我就能够说：我从未得到俄国的任何钱。请把钱寄给约翰·里德公社吧，”他们没说什么，便这样做了。钱对他们不象对我那样具有象征意义。

那年冬天我赴美国作了一次疯狂的旅行。我是经过中国抵达西雅图的。这次行程，我在别的章节还会写到。此行目的有三个：通过演讲筹集明年的生活费用，为特许权委员会同华尔街进行联系，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即为约翰·里德公社和美国教育实验班筹集资金和技术援助。在加拿大，我最远到了那里的温尼伯，从加拿大又返回美国的西雅图，沿海岸而下，穿过堪萨斯到东部城市。那年冬天我一共进行了八十四场演讲，有时多到一天讲五场。我严格按计划为霍尔德曼——朱利叶斯出版社写了文章和“小蓝书”。有时，我越讲越兴奋，几乎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只是一个劲儿地倾诉出活生生的现实，我的眼睛盯在那些乱世创业者古赫林、里姆帕勒等人身上。而我自己感到他们并没有接受我。

希望到苏联去的技工申请书源源而来。只要能永远抛弃资本主义，为海外的社会主义而工作，他们情愿贡献出数千美元的工具设备。他们同意筹路费，在工厂开始生产之前他们自己负担自己的生活。在工厂投产以后，他们可以接受统一的工资，从自己的生产收益中支取工资。超过这个标准的其余一切收入应该用于他们的青少年帮手和用来为俄国扩大教育实验班。他们将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贡献给”这个天堂。他们带来了劳工组织的推荐信。地区的负责人帮助我进行挑选。

与此同时，我经常给特许权委员会写信，谈及我的旅途情况，中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商人的评论，还详细谈到了加拿大小麦

联营的情况。在加拿大，农场工人的一些合作组织为对付粮食投机商一年就控制了加拿大小麦出口的百分之六十八。他们当中的一个小的左翼组织谈到了关于建立一个“世界粮食合作市场”问题，希望与苏联粮食组织取得联系。我寄了一些关于记账方法的样品，“这可能对苏联征购粮食有好处”。我不知道那些空白表格或粮食联营的意见有什么结果。自那以后，关于这两件事，我没有听到任何消息。

在底特律，我见到了亨利·福特，但是他仍然相信君主制。大约一年以后，当苏联人开始买他的拖拉机，他考虑要认真做买卖时，他派人来请我。整整一个小时，他谈的尽是一个老夫子的陈词滥调。他对我在约翰·里德公社的经历颇感兴趣；对俄国是如何组织生活的也感兴趣。我尽力向他兜售我的想法：用二十五个自助的农业大学来使俄国广大土地机械化，这些大学是建立在现代化机器基础之上的大农场，可以充当教师和服务站，来促进周围地区日益发展的机械化。

“十五年之后，你便可以使俄国‘福特化’，但是你绝不能在这个国家谋取暴利；人民不会允许你。能维持你的农场大学就行了。你可以通过出售机器，从中央政府那里谋求一定利润。”

“可以这样做，”福特说。“我好好想一想。但是，工业比农业更重要。相对来说，组织人们的粮食供应比较简单。而办工业更加重要、更加困难。”他说的值得一提的话仅仅这些……当我鼓吹由一个私人资本家办二十五个自助大学时，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苏联自己会在几年之内组织起三千五百个农业技术和机械化中心以及拖拉机站，使农业不是在十五年内，而是在五年内就机械化了。

在纽约，我了解到，苏美贸易股份公司从来没有听到过特许权委员会有什么“美国顾问”。在我的坚持下，他们谈到了这样的谣

传：有人曾说，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可能来见他们，他们应当利用她的影响和关系。但是，我没有“影响”；我只有写文章的技巧。我没有华尔街的“关系”；我只有可以随便接触美国人的本事，我可以与任何美国商人交谈，但是这种本事不能转让。一个美国农业机械推销商对我说：“有你作为助手，仅从我所认识的人中就能保证得到二千万农业机械贷款。我们将通过宴请制造厂家的小型宴会来办这件事。在宴会上，你给他们讲讲事实。晚些时候，我将派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代理人到各处去，宣传一下，他们都很想做买卖。”

我也相信我可以做到。但是，在当时，一走进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办公室就完全糊涂了。即使是提一下这种建议，看起来也是不体面的。一部分原因是效率低，而另一个原因是对商业的态度，一会儿被当作国家机密，一会儿又感到好象是犯罪。他们地位较低的人有东欧小贸易城镇的那种作风；共产党人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做买卖的人吗？他们地位高的人则故作姿态，高不可攀，缩回到以往深居简出、沉默寡言的状态。人们不禁会问：他们是在等待更合算的买卖呢，还是害怕犯罪？为了拯救他们的国家，他们好象是在犯卖淫罪似的。

美国人天然与商业有缘份。他们感到它是他们终生爱好的职务。他们做生意就象和妻子在一起那样的快活和自豪。他们通过夸夸其谈的宴会，通过效率和吹牛这两手来做买卖。它的外表是讨人喜欢的真诚直率，它的见不得人的部分却蒙上一层诱惑而又正派的面纱，它的巧取豪夺得到法律的批准。这种异趣的人怎么能做买卖？列宁给共产党下的一道最严厉的命令，是要他们“学习做买卖”。他们学习了。最后，大家承认，有时他们可以击败美国人。但是，不是在苏美贸易股份公司的早期日子里。

我是一个美国人。虽然我不再崇敬这种商业，但我了解它的手法。苏美贸易股份公司不知道如何利用我，但是我却有一个任务要完成。当时我会作为一个记者去说：“我在俄国已经生活了四年。去年夏天，我帮助特许权委员会编辑了一些材料。我不能代表官方说话，但是，我知道俄国的生活情况，可以把你们的愿望向重要人物反映。我很快就回俄国了。”

就这样，我使自己成了苏联在华尔街的代理人，一个不领工资、也没有证件的代理人。毫无疑问，商人们会问，我在推销什么，是不是我指望他们找一个工作。这没有什么关系。他们习惯于推销商了，并不鄙视他们。我通过社交界的朋友或报纸进行接触，发现打入华尔街很容易。商人请我吃午饭和晚饭，应邀的还有其他人，这样就传开了。他们都急于与俄国人做买卖，他们甚至与苏美贸易组织谈了起来，但是，它的头头不讲英语，而除了头头外，没有人敢谈论此事。

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冬天是值得铭记的奇怪日子。几个小石油公司正竭力使美国承认总部设在巴黎的“格鲁吉亚共和国”。他们希望得到巴库的石油。美孚石油公司支持苏联，他们与苏联人已有交易。美孚石油公司公共关系顾问艾维·李邀请我出席一个由贵妇人和资本家出席的晚宴，其中包括德怀特·莫罗，艾维·李尽力使他相信，“扼杀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最好方法是“与俄国经商和打破它的孤立”。我的作用是要穿着体面、精神愉快，用我的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个美国妇女在苏联住了四年之后仍然健康、充满信心。

银行家们正在大谈俄国的旧债。在担任花旗银行行长期间曾处理沙皇借款事宜的弗兰克·范德利普邀请我到他的乡村别墅去。他说：“俄国人应当派人根据现有的老资料核查这些债务。据

我所知，这些债务大大夸大了。最后他们可能打些折扣，求得某种政治解决。最好是双方立即开始分别进行调查。”

地位重要的商人还没有访问俄国；他们害怕丧失其保守派的立场。一个经营额达数千万美元的国际银行行长沃尔特·萨克斯决定“带头打破常规，访问俄国”。我给他写了去莫斯科的介绍信。他说：“银行界的朋友都羡慕我的此行；他们称它‘好极了’。但是，他们自己不敢去。公平银行行长对我说：‘只要我一越过边境，就会有人说，公平银行将资助俄国了。我们现在还不敢冒这个风险。’”

公平银行负责对外商务的副行长勒布朗想冒这个风险。他在银行家中是一位肆无忌惮的冒险家。他是一个法籍加拿大人，他反对着伦敦眼神行事的英国传统。他已经给了俄国一些小小的资助，并且为自己先走一步而自豪。“在纽约我们是唯一同沙皇贷款没有瓜葛的银行，”他吹嘘道。“他们希望我们带去五百万。但是，我们当时最大的股东老雅各布·希夫，如同现在的洛克菲勒一样，了解俄国。他说：‘只有他们搞革命以后，给那个国家贷款才是保险的。如今早就可以给他们贷款了。’我们认为俄国现在比过去保险了。”他愉快地补充道：“博拉说，所有交到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俄国旧债券都是用英国大使馆的信封送来的。他们有一个制造这些票据的正规工厂。”

勒布朗甚至雄心勃勃地想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同摩根比个高低。他说：“有一些银行可能在大量向俄国贷款方面打破他的垄断。前提是承认俄国，这个不会那么艰难。但是银行这样做，必须合算才行。”

“你所说的合算是什么意思？”我问他。

“第一批贷款几乎是不会偿付的，”他回答道。“俄国人认为，

银行是白给他们这些钱，但是，贷款必须有利息。要对付许多反对意见。但是，如果一个银行能签订几年的契约，在纽约充当俄国的财务代理银行，如同摩根曾充当英国的财务代理银行一样，那么，在开始阶段为了向美国广大群众宣传俄国而失掉一些钱，还是合算的。一些实力雄厚的银行，非常认真考虑，充当俄国的财务代理银行可能比做英国的财务代理银行，更事关重大。”

只有两个组织完全拒绝讨论苏联问题：花旗银行和摩根财团。摩根财团公共关系顾问马丁·伊根说：“让他们停止屠杀人民，退还他们偷窃的财产吧。”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有半个小时不知所措，象被榔头打了一样。我毫不怀疑，摩根财团是怀着刻骨仇恨的。

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对我的全部谈话不感兴趣。难道俄国人真的想让步吗？一直阻挡他们这么做的，是没有效率呢，还是内心非常不乐意？我回想起来，我认为两者兼而有之。搞革命的工人反对向外国资本家让步，只是勉强地同意而已。而日益发展着的苏联生活一直在竭力排除这种障碍，从它的代理商举棋不定上也反映了这一点。我过去曾认为，是特许权委员会使我感到自己不起作用、无关紧要。我现在才看到，同我比较起来，特许权委员会本身更感到自己不起作用、无关紧要。

我写信认真报告了我谈话的情况，尽管从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回音。当我返回苏联时，我给他们作了我的最后报告，还给了他们一份清单，列举了评估机构、剪报社和进行特别调查的商业服务社。然后，我便洗手不干同特许权有关的事了。我讨厌作一个没有证件的代理人。我的清单和报告如石沉大海，永无回声。

我只给苏美贸易股份公司作过一次联络工作。连续两年，我先后与通用电气公司董事长杰勒德·斯沃普共进两次午餐。他在第二次午餐时说：“我知道，俄国人愿意对那些提供贷款换取特许

权时而蒙受损失的公司给予补偿。通用电气公司可以在此基础上搞交易,但是,我们不愿带这个头。”我知道苏美贸易股份公司非常渴望这种交易,但是又怕带这个头。因此,我出面,把彼此的想法告诉对方。又过了一年,便提供了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贷款,并且勾销了通用电气公司的全部旧的债权。这是大公司对苏联的第一次突破。然而这是随着岁月的流逝,这两个公司已经成熟之后的事。当时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可能拉上关系。

在阅读多年没有瞥过一眼的昔日报告和书信时,我突然觉得我对自己的看法一如苏美贸易股份公司对我的看法。我这个活泼愉快的美国人给摩根财团打电话,在午餐会上与勒布朗开玩笑,在斯卡巴勒同范德利普一起度周末,在华尔街大谈特许权问题。我漫不经心地信步越过了曾吞没上百万人生命的鸿沟,那么快活地用震撼世界的雷电来吓唬人。我曾想,并且现在也认为,他们可能设法利用我。如果他们知道我没有证件,他们该多么开心啊!

* * *

我轻易地与华尔街取得联系,因而恢复了信心,我狂热地投入了美国教育实验班的工作。看来,我可以对付任何美国人;唯有俄国人,我无能为力。我将放弃特许权的工作,把美国人组织到我们的教育计划里来。

我挑选了一个美籍俄国犹太人共产党员科根^①作为经理。他的职业是牙科技工,他曾通过一个农业公社到了苏俄。但是一到俄国后,就发现他不懂农业。在我与莫斯科教育当局最初联系的阶段,他给了我非常有益的帮助。他说,跟我在一起会比在农场“更有用”。这样,在我到美国旅行期间,我便把他作为我的代表留

^① 这是我虚构的一个名字。——原注

在莫斯科。第二步他说服我，我们的工资限制不适合于他；一个总管家不能等到开始生产再拿报酬。在这些人当中，我给他最高的工资，但是他发现靠此维持生活仍有困难，因为他有一个美国妻子和两个孩子。这样，我再次同意当我在美国时，我在莫斯科的房间给他用，作为对他工资的补贴。他说：“科根夫人害怕塔拉索夫卡的流氓对儿童产生影响。我将在春天到来之前使她逐渐习惯这里的生活。”

我在美国时，他写信给我，说我必须筹集更多的钱。“普劳斯来时带了大量的手表零配件，超过我们的预算数百美元。我必须寄一百美元给他在日内瓦的家庭用，一直到他们愿意来俄国时为止。普劳斯用破产来威胁我们。”

我愤怒地写信给普劳斯：“如果你把不属于你的钱寄给你家，你可能被逮捕。”我颇后悔不该接受普劳斯。

前一年，我发现普劳斯在日内瓦一个阁楼上制造手表，并在卢梭学校任教。他曾经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同列宁很熟悉。但是，他的妻子是瑞士人，为了照顾他的孩子，他脱离了党。他为此感到羞耻；他竭力利用他那小小的表店向列宁惨淡经营的报纸《火星报》做点捐献，聊以自慰。自革命以来，他曾想返回俄国。他对我说：“你愿意为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们接受我的表店和我吗？……”我说：“你真傻，钟表应当在莫斯科制造。”……这是我首次想到在莫斯科开办美国表店。普劳斯是一个瑞士籍俄国人。他的表店是我们最大的财产。

接着我们办起了牙科器械商店，这是科根建议的。他告诉我，莫斯科非常缺乏牙科器械，我们可以用我们学校的名义免税进口这些器械而大赚其钱。他的朋友沃尔夫森可以带来一整套设备和一辆道奇汽车。在组织工作忙完之后，科根自己也可参加生产工

作。我在圣路易斯时又发现一名牙科技工，他愿意捐献价值二千五百美元的设备，但是科根断然拒绝了。“我们不需要三个人；沃尔夫森很能干。”到头来，沃尔夫森的设备不合用。科根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便从我的资金中抽出二千美元购买了新的牙科设备。接着，他又把沃尔夫森的道奇汽车卖掉了，作为其个人的费用。我想，如果他开办一个好的商店，也没关系。

我们第三个企业是完全机械化的木工厂。莫斯科教育部特别提出这个项目，目的是为少年之家制造家具。我在加利福尼亚发现了一个人，他声称自己能熟练地做橱、柜、木匠活和一般活。他答应带上他的福特车、自己用的工具和几个帮手以及一些电动工具。我曾经有一点不放心，因为他没有雇主的推荐信。但是，激进组织的几个人推荐他，并且解释说，他由于持激进观点，失去了许多工作。当他来到纽约时，我获悉，他卖了他的多数工具和他的福特汽车，用来购买衣服和车票。他已把他的行李托运到欧洲，而不是运到俄国去。他的钱不够。我已经为他的工木厂买了价值二千美元的机器设备。我只得为他的行李付了运费，希望他能很快开始生产。由于资金不够，我遗憾地砍掉了其他商店，集中精力办好表店、牙科器械厂和木工厂，后来又增加了一个小型修鞋店和一台洗衣机。

在莫斯科，科根失掉了我的房子，他被赶了出来。我并不感到惊奇。此房间本是一个苏联机关的职工用房。我是侥幸得到它的。有两次，他们要把我赶出来，给我软磨硬顶过去了。我只好住在塔拉索夫卡的棚房里；而在莫斯科，我则借住在朋友的房间里。出乎我的意料的是，科根在一座新的合建大楼里得到了一套两间的房子。我没有时间去问他怎么弄来的。看来，他相当能干。他总是应付裕如。只是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没有这份本事。

他发现，根据法律，塔拉索夫卡的男孩子们不能制造牙科器械；这必须由卫生局所属的一个职业学校经办。莫斯科有这种学校，它欣然接受了我们的设备，并为科根和沃尔夫森找了工作。沃尔夫森去了。科根则还没有定下来。他告诉我，他在一个新牙科器械工厂做计件工作，其收入可以大大超过那里的最高工资。他愿意回到生产岗位，再次做一名“无产阶级”。莫斯科职业学校和无家可归的儿童没有关系，我是为这些儿童筹集款项的。但是，科根由于赠送这些设备而在那里备受尊敬。

普劳斯与科根有些不和。科根起初对我说，普劳斯的铺张浪费简直要搞垮我们，只是由于科根的经心经营，才使我们免于破产。我谴责了普劳斯；在我的盛怒之下，他收敛了。他根本不象科根那样有责任心。他解释道，这是购买机械和手表零配件的大好机会，在俄国弄不到这些东西。甚至我也能看到，普劳斯添置的设备，其价值超过我已花费的许多倍。他说不出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部分来自他那个旧表店，但是现在“它全部属于我们大家的了”。即使那部分财产也不能概括全部新设备。

普劳斯夫人解释说：“他每月寄一百美元和他所要东西的清单。我们拿不到全部东西。”

这是一个真了不起的表店。它仔细地选购设备，让精明的瑞士人采购东西。然而远不止如此。用每月的汇款来买这些东西，普劳斯的家庭就得喝西北风。他们没有在俄国过冬的衣服。“是的，他告诉我们弄些衣服，但是，看起来他认为手表零配件更重要……”多年以前，普劳斯为了家庭而放弃了革命。是他们感到内疚了？他们是否在尽力加以弥补？在以后的若干年里，我看到他们被艰苦生活折磨得精疲力尽。但是我从未听到他们发牢骚。

整个冬天，普劳斯一直在塔拉索夫卡埋头工作，拼命搞燃料和

电。他把他的车间建立在桌子上、长凳上、任何他能够找到的地方。他开始教育孩子们了。教育当局为之震惊。极其贵重的手表零配件没有人看管，到处放在那些曾经偷门窗、废铜烂铁的孩子中间。这种精致的行业和俄国唯一的手表厂竟交在这些小流氓手里！但是，他们喜欢做表；也许他们喜欢普劳斯。人们突然发现，扒手掌握的那套技巧现在转用于制表行业了。教育委员会参观了我们的车间。莫斯科报纸报道了我们。莫斯科苏维埃由于普劳斯的制表工作而表扬了我们。

木器厂还没有成功。机器来得晚了。我们的木匠没有用手工工具组织孩子们去修理房屋，却在莫斯科找了一个临时工作。他开始向那里转移他的和我们的工具。生产开始之前，他有权从我们这里领取吃的，但无权领取工资。他和他的那个大家庭的开支费用超过我们的最高工资。要维持他的生活标准，这些钱还不够。看起来，他的生活标准比我的还高。他和科根都是党员，他们一起使塔拉索夫卡党组织通过一项决定：“必须立即发给美国工人工资”。

他们把此消息带到我的病床前。我曾奔波于华尔街百万富翁和伏尔加之间，竭力使雅辛的菜园避免毁灭。我在码头等了通宵，得了流行性感冒。我挣扎着赶回塔拉索夫卡，又转为肺炎。我知道，党的决议结束了我们的公社。我们的库存枯竭了。我们曾为我们的设备向国家银行借了八千卢布。这也快完了。我们工厂的自主权使科根有权把普劳斯的表厂抵押出去，以开支他自己的和木匠的工资。党的决定责成他这样做。

我不能起来斗争；我只有一个选择。我写信给莫斯科教育局，恳求他们撤销我们的自主权，没收我们的财产。“赶快没收吧，以免我们的非生产人员挥霍出去。”我知道莫斯科教育局的工厂效率

低,它将把我的木工器械,分给十几个儿童之家。但是我知道他们珍视表厂,因为它已赢得名声。

沃尔夫森和木匠不满地返回美国,首次散布对我的诋毁。科根在职业学校得到了新工作,他把我们的洗衣机给了他们,从而加强了他的地位。但是,普劳斯仍然坚持在表厂工作。他因设备没有清单被逮捕,当他们看到索要的费用符合实际时,第二天早晨又释放了他。这使普劳斯大为伤心,他搞的革命逮捕了他。新的莫斯科教育局管理部门用他的表厂盈利来弥补十几个工厂的亏损。他们用完了他那些不可代替的零配件和机器,他为莫斯科教育局工厂工作了两年,便离开了,因为他们从他的徒弟身上牟取暴利。他们拒绝给这些徒弟发工资,也不给他们发毕业文凭,因为当局需要这些人工作。一个被普劳斯从小偷改造成好工人的男孩子离开了表厂;他由于无家可归,饥寒交迫,不得不在苏哈雷夫卡市场干一些粗活。

普劳斯发火了。他家庭的长期艰苦生活,他自己的被捕,他一生装配起来的表厂付之东流,这一切都没有使他如此动肝火。他愤怒写信给《真理报》,引起轩然大波,情况稍微有所改善。后来他对我说:“我打算参加正在筹办国营表厂的新托拉斯。我被委托到国外购买设备。我们将在那个工厂开办一个更好的学校。国营工业部门珍视他们的学徒,不会把他们赶到苏哈雷夫卡去。”普劳斯是对的。新的国营工业比莫斯科教育局工厂好,甚至在关心孩子们方面也好些。他们最终负责举办各种职业训练。今天,普劳斯在俄国的第一个造表厂给数百人上课。普劳斯和他的学生把“时间”带给了苏联人!

“我能组织美国人!”我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们给了我各种机在教育方面,他们对我提供了最大自主权,而我又把这种自主

权交了回去。我曾得到六座房屋、一个扩展的机会、市里的一份表扬决议——这就是莫斯科给我的东西。在地区负责人的帮助下，我从大量自愿来俄国的美国人中挑选了最优秀的人。但是，我在做什么呢？是给苏联输送一些寻求天堂的小商人吗？他们“把一切都贡献给革命”、他们一片真心实意，又落得什么下场呢？革命是一团火，它把人烧得只剩下骨骼，透露出他本人也不知道的东西。

“我能组织美国人！”我这样做了。我的工作有什么结果呢？失掉的房间、在莫斯科流传的诽谤、分散在莫斯科教育局工厂里的好机器和一个瑞士籍俄国人的工作！

第十九章 在革命的广州

我现在开始了几年的自由、冒险和孤单的生活。我在莫斯科丢掉了我的房间。虽然苏联仍是我计划做一番事业的中心，但我很难在那里定居下来。我与约翰·里德学校、美国教育实验班和特许权委员会的联系已经断了。我不再相信我在苏联能组织任何活动。我在生活中追求的是个人效率，而这种信念最后已被打得粉碎。在那最后的一个发了狂的冬天里，我进行了八十四场演讲，为技术设备筹款一万美元以上，挑选了技工师傅，写了数十篇文章，调查了萨斯喀彻温小麦联营到摩根银行和特许权——然而所有这一切并没有给我带来成功，只是使我患了肺炎。我仍然打算住在莫斯科，因此，我加入了一个房屋合作社，并且为我两年后才能得到的一套公寓房间事先付了钱。但是我不再梦想成为一个乱世创业者。我伤了心。我不再想有所作为。

然而，我可以一直写点什么东西。每一个人告诉我走这条路。别的美国记者一向认为，在把时间浪费在这

些项目上真是愚蠢。“他们永远不会让外国人在这里搞点事业，”他们说。他们的意见与我见到的俄国共产党员的劝告相类似。他们总是怂恿我继续为他们痛斥的资本主义报刊写作。

看来，我只适合于为资本主义报刊写作。资本主义世界对我的欢迎使我受之有愧。我到了纽约时，主编们很高兴地来见我。在美国各个城市，许多人邀请我吃饭。美国这种不费什么力气的好客之情是基于处世的圆滑和好奇心，他们伸出手来抚摸那只羽毛鲜明的过路候鸟。另一方面，他们的确也在不同程度上渴望了解那个新世界的情况。他们想象我已被那个新世界完全接受了下来。

就这样，我开始走向革命，为美国报刊写关于革命的情况。我的工作成了主编和我之间的一场游戏。我想要写的东西，有多少可以见报；研究一下这个情况是很有趣的。我知道，“稿费高的杂志”不会接受我的文章。那些写各种故事和文章以微妙的方式捍卫资本主义的人，才能得到他们的高稿酬。但是，也有许多出版物是可以打进去的。我懂得我这个行业的奥妙。我研究了主编们的特殊兴趣。我把文章卖给这个人，是因为他喜欢“旅游”或“女人”；卖给另一个人，是因为他在其亚洲政策中反对英国。有些主编们咒骂我写的东西是宣传品，但是又要了它，因为它写得很生动；然而他们把攻击苏联的文章放在其后边。他们“提供了一个问题的各个侧面”。有些主编们喜欢我的文章，帮助我使报纸老板“接受它”。但是，他们并不能始终保持自己的位置。好在这个人不见了，另一个人出来了。看起来，在这场游戏中，主编有最后决定权。他们修改我的稿子。作者并不反对人家修改他的稿子；难道不是照付稿费吗？但是，对于那些改稿子改得令人生厌的编辑们，只要我能找到改得少的人，我便再也不给他们写稿了。但是，如果某一

天万一找不到这样的编辑呢?为什么自找麻烦呢?目前,我有最后决定权。我是“自由”人。

这个“自由”是什么呢?有时,在孤零零的旅馆房间里,我总是琢磨它的意思。每个人都渴望自由,但还没有人给它下个定义。那些在毫无回旋余地的斗室之中盛赞自由何不象我一样,横跨重洋呢?请作这样的豪言壮语吧:“下个月我将去墨西哥、广州或莫斯科;谁管得了老子!”要找一个没有限制的工作,海阔天空地畅想创业盛举。何况,我父亲在西雅图的家早被抛弃了,我在莫斯科预购的那套房子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完工呢。要么,拎起手提箱,踏进旅馆,等着下次的巡回演讲吧。有时我又觉得,任何束缚也比这样在全世界漂泊好。

自由?我陷入了沉思。它自由,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干。我想成为乱世创业者,但是,某种东西阻止了我,也许是我自己的无能吧。那么,自由是否意味着,你有能力做什么事,就去做什么事?简直是一派胡言!如果你真正有能力,你不必要得到允许;没有人可以制止你!那么,自由是否意味着,在不受外界干扰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呢?不是,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克服障碍的过程。没有障碍,既谈不上自由,也谈不上生活。那么,自由是否意味着没有暴君?这只是消极的一面,不过,这倒有点儿接近于自由的真谛。谁是“暴君”?怎样才能消除他;是逃避,还是推翻他?其实,暴君的日子也不好过,因为他想不受约束地实行残暴统治!但是人民不允许他那样做!

我现在知道自由是什么意思了。自由就是你做任何事时,都不要妨碍他人。不对,这同样是胡说八道;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都会牵涉到别人。所以我要说,自由是相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观。工厂厂主认为他们的自由是:挑选他们的工人和决定他

们的工资,尽管工厂已经太多了,他们还可以开办他们喜欢开的任何工厂,以便在不触犯法律的情况下击败竞争对手,使自己发财致富。但是,当他们有了钱之后,他们则要“法律”来保护他们的财产。工人们认为他们的自由是:改换老板,有组织的工人希望有罢工的自由。但是,他们并不认为自由就是有权选择工作和有权夺取工厂以生产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已不是“自由”,而是“非法行动”;这两者之间除了互有联系之外,还有什么不同呢?

政治家、知识分子——我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自由是什么?按我所喜欢的那样去谈话,去写作,去表达自己。按我所喜欢的?噢,不对,我有权去寻找尽可能少改动我的文章的新主编,有权使自己适应主编的要求和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我的最早的祖先把自由看作是离开压迫人的社会,争取一个新的艰苦的但却是有希望的境界。在所有这许多种自由中,看起来自由越来越少。世界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把自由挤掉了。那么,自由是意味着减少组织性吗?难道一个人不能既有组织,又有自由吗?在经过了许许多多令人痛苦的岁月后,我终于发现,自由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了。

我们所选择的这个自由,最困难的方面不是它的孤单,而是缺乏稳定性。人类的思想要求在习惯的大海里不断进行选择,象变动不定的水泡一样。现在我的习惯处在大动荡中,我生活在不断选择的海洋中。任何一天的任何时刻,这样的建议都可能打动我:下次我应当去访问广州或撒马尔罕;演讲比写文章更重要;在海边某个朋友家里呆上一个月比以上两者都愉快。由于我没有一个固定的追求自由的基地,所以我觉得哪一个选择都可以。有时,这种无休无止的选择弄得我精疲力竭,我宁愿采纳最后一个不断给我提忠告的人的意见。如果任何地方或个人需要我,我就是越过千

山万水也要去。

我特别愿意接受俄国共产党人的意见。而美国共产党人的意见，我几乎从来不接受。我认为他们是容易犯错误的人，他们对我的生活和工作不了解，还不如我自己更有自知之明呢。但是对于俄国，我从未歧视过它。我对俄国和它的共产党员抱有神秘感，认为他们是乱世创业者，我怎么努力也不能加入他们的行列。他们在自己的国家可以创造奇迹，而我却不能开办一个象样的工厂，因此我几乎把他们当作超人。美国人是易动感情的，他们请电影明星谈政治问题，让没有什么文化的政客就科学或妇女问题发表意见。我也有同样的心理，简直把俄国共产党员奉为神明，不只请他们谈革命问题，而在个人计划和个人生活的细节上也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随便说一句话，往往被我当作权威性的意见而照办，只有美国那种讲求实际效果的精神才使我清醒过来，免走老路，落得痛苦的结局。最后一拍把网球打入空中——看起来这就是我的绝对“自由”了。

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无政府状态之下，一直有一股行动本能的溪流，它朝着它选择的大海流去。从外表上看，在俄国问题上以及其他开始出现的革命问题上，我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有名望的权威作家。但是在内心里，在下意识中，我却正在寻找一个成功的革命，以便我可以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无需忍受开始阶段的痛苦。只是我一个人有这样的想法吗？难道今天半个美国不是都象我一样吗？当时看起来，这种革命在美国还遥遥无期。另外，我说不准我是否会在美国参加革命，因为我的朋友站在错误一边的太多了。除了写关于苏联的文章以外，在德国、墨西哥、中国这些地方，我也可以成为“革命的记录者”。

选择和孤独这两种痛苦交替出现，人的心灵无法忍受。一旦

我开始踏上征途，新的情感便涌上心头。我非常兴奋地得知，一个非常伟大和生动的世界已经展现出来。广大的农民群众在亚洲动起来了，欧洲政府不断更迭，墨西哥的雇工们正在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所有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作家——演讲家来说，很快就可以亲身前往了解。有什么孤独呢？为什么孤独呢？难道我现在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好同志吗？过去我在西雅图见到过的同志和匆匆来去莫斯科的同志，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虽然我很少同他们在一起生活过，但是，我在世界的此端热爱着他们。既然已经作出痛苦的决定，那就迈入这个生动而可爱的新天地吧。通过荒无人烟的西伯利亚平原，越过半个地球，到革命的广州结识新朋友，何其乐也！

就这样，于一九二五年秋季，我从莫斯科到温哥华的路上第一次来到中国。从蒙古的暴风雪到炎热的广州，我只能给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在我前面还有一个严峻的冬季呢；关于这一点，我在最后一章将要谈到。然而，在这一个月里，我发现我在苏联四年的奋斗——战胜饥荒和创办约翰·里德公社——使我能够用新眼光看待美国人很少看到的亚洲大陆。我无心欣赏异国情调的神龛和古老的宫殿、可笑的法律和古怪的宗教。我看到了农民群众，在地球这个最大的陆地上，他们何其相似乃尔！我这才认识到，乱世中发生的俄国革命不仅开拓了一个新天地，而且是唤醒亚洲、使亚洲工业化的第一阶段。

在跨贯西伯利亚的火车上，我天天看到以莫斯科为起点的大平原穿过乌拉尔，横过富饶的西伯利亚土地进入大森林，沿兴安岭而下，到了哈尔滨、沈阳、北京。俄罗斯人、鞑靼人、布里雅特人、中国人相继展现在眼前——所有这些有着悠久历史的农民群众都落在世界前进步伐的后边。当年那些骁勇善战的部族曾经西向而

击，穿过俄国和波兰的黑土地带，直逼罗马和西班牙。那些征服荒野的冒险家乘风破浪横过大海，来到了美洲。新的环境和富饶的未开垦的土地激发了他们那富有创造性的天赋，他们创造了日益发达的工业文明。

人类的这个旅行现在已兜了一圈，三千年以后，又转向亚洲。亚洲是人类的发源地，然而这里的人民挤在农村，绑在农业和家庭的琐碎生活中，多少世纪以来都没有变化。现在，他们受到了冲击。西方的铁路、工厂和工业文明传到了这里。经过不可调和的战争之后出现了两种文明：来自南方的是世界帝国主义赤裸裸的剥削，来自北方的是俄国革命。

我记得一位记者用一句冷嘲热讽的话概括了他对苏联力量的估计：“对亚洲人来说，苏联是令人敬佩的！”那么，让我来看看它是如何适合于亚洲的情况吧。我暂时把西方放下。这里的广大农村地区备受饥荒之苦，因为原始方法对付不了干旱。弃农从工的农民涌向新建的工厂，挤在工棚里。家庭生活受“老人”主宰，被迷信折磨——家家挂着名称繁多的神像。所有这些情况在广阔的大陆上重复出现，都是出自同样的原因：原始的生产方式，隔绝的状态和落后的交通。在整个亚洲大陆上这一古老制度正在崩溃。不仅在莫斯科是如此；在广州亦然。

难怪俄国革命搅动了这些人民群众。北京学生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国商人向莫斯科讨好，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伟大的农民和工人群众运动正在华南兴起。帝国主义国家大骂“俄国的宣传”。但是，这些国家曾经花了数十亿美元，牺牲了数以千计的人命来传播基督教，但是，他们宣传了一个多世纪也没象俄国革命那样搅动中国。基督教宣传是由外来的剥削者进行的，而“俄国宣传”却产生于他们自己的历史，适应了他们的需要。

用现代的观念来衡量，一九二五年在中国并没有什么“政府”。军阀暂时称霸一些省。全国农民的贫困滋长了土匪。较强的土匪发展成了将军，他们把掠夺合法化了。他们中最强大的人成了许多省的首领，在外国的帮助下掠夺人民。你可以看到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开始了，西方中世纪一些互相敌对的贵族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联合成了国家。但是中国不会重复那个历史，因为世界上有了新的力量：世界帝国主义力量和世界革命力量。

世界各国的外交官当时都同北京打交道，但是，北京不是政府，它更象国际联盟——在那里，一些有实权的使节会晤谈判，纵横捭阖。每个人都在北京的各种集会上发表意见。我也应美国人、中国商人和学生等六个团体的邀请发表了演说。在这以后我听说，他们多数人认为我是“被收买的苏联代理人”。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每个在北京演说的人都是被收买的代理人：分别代表一个将军、一家烟草托拉斯或是一个教堂。中国人讲求实际。他们不能想象你不要钱，白白发表演说。他们不知道我们美国人喜欢谈想法。

那时中国北方的军阀是容易记住的：他们是张、冯和吴。张作霖是受日本支持的一个阔气的将军。他住在沈阳一个富丽堂皇的宫殿里，在有宝座的房子里接见来访的人。这间房子装饰着假老虎和价值五十万美元的珠宝玉石。他有十几个妻妾，外国人传播了他的许多风流韵事和丑闻。

从北京出发，向东北走两天路程便到了冯玉祥的营地，它设在被暴风雪席卷的蒙古平原上。冯是一位“简朴”的将军；他有意识地表现出严于律己的高尚品质。腹地是沙漠，又没有港口同外国联系来取得资金来源，所以他把自己的力量建立在开辟新地盘上。他一直让士兵修路，拨给他们蒙古牧场作为酬偿。他禁止他的部

队吸鸦片、喝酒、抽烟。他发现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信仰在这方面有用，在一段时期内便参加基督教，让基督教青年会的人给他的部队教体育和清教徒式的道德。他还利用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宣传，甚至共产党的宣传，后来，他发现他们是敌对的势力，便予以取缔。

冯表面上的现代主义颇获那时西方自由派的好感。他的“外交部长”用美国的行话对他们大谈公路、学校和灌溉。但是，“老中国通”津津有味地谈论着冯如何朝秦暮楚，不断倒戈，讨好政敌的轶事，他们称这是典型的中国作风。不过，我则认为，他的所为类似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时代抢劫过往行人的贵族。当我在蒙古营房访问冯时，他正在忙于给他的主要对手张作霖拍一封含糊其词的、彬彬有礼的电报，答应把他的一些士兵调给他，“如果你需要他们为你办事的话”。我问他，在他看来，用他现在的部队可以掌管多少省，他圆滑地回答道：“鄙人才疏学浅，管理一个省尚感吃力。”其实，他正在抢夺三、四个省呢。

离开冯，我南下华中，到了长江之滨的汉口，访问“儒将”吴佩孚的总部。两年之后，我再访问时，它已成为“红色汉口”了。吴得到旧中国富商、绅士和知识界的支持。和多数军阀一样，他也得到了贪得无厌的外国政府的资助。吴在中国是名门出身的贪赃枉法者的中心。他被认为是“诚实人”，他的朋友都可以分得一杯羹。他信奉儒家道德，重友情，轻国家或阶级。吴的“盟友”比任何其他军阀都多，但是这些盟友很不稳定。此刻，他们和他一起在著名庙宇里“讨论经学”，转眼之间又会互相争夺地盘了。

吴对我大谈外国影响的问题。他以儒家之风说：“良莠俱存也。”所谓良者，指其建工厂、创财富；至于莠者，则圣贤所树立社会风尚，侍父母、敬长者、忠丈夫、尊长兄，荡然无存焉。我问他，难道

不能存良去莠吗？吴回答道：“难矣哉。”

在北京，我碰见了鲍罗廷夫人，她是我在莫斯科的老相识。她和丈夫大约一两年之前离开了那个城市，我过去一直不知道他们的去向。现在我才听说他们在中国。据所有的外国人讲，鲍罗廷是俄国宣传的秘密力量，他在幕后策动广州罢工。因此，有人崇敬他，有人咒骂他。我从他夫人那里得知，他是在华南建立的新国民政府的顾问，他是被孙中山邀请来的。“你一定要到广州看我们，”她说。“从北方你不能了解现代中国。”她告诉我，香港到广州的交通已断。一只英国小船从香港开到沙面（它是英国控制的 连结广州的一个岛）。但是，广州罢工委员会不会让广州的船与英国的汽艇相会。

“我请罢工委员会破例让我会见你。你应该看看广州，这是很重要的。”

他们果然为我破例，我从香港来到广州。当配有武装卫兵的英国汽艇进入沙面避风处时（我们都以为到终点了），从遥遥相望的广州船群里驶出了一艘小机动船，上面飘扬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国民党的旗帜，这种旗将插遍全中国。鲍罗廷夫人坐在船尾。好几个月来第一次一只广州船同那只英国汽艇相会。我迅速上了那只船，在水手们惊愕的目光下离开了。

我突然从古代的亚洲来到了现代世界。在整个中国北方，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弄得我越来越迷惑不解。有人唉声叹气：“要是我们能除掉军阀就好了”，也有人把中国的贫弱归咎于缺乏关税自主权。人们的彬彬有礼更增加了我的迷惑不解。如同其他外国人一样，我开始说，“一个不可思议的民族，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他们。”即使那些满口摩登词藻的北京学生也相当难以理解。也许他们也不

理解他们自己吧。他们谈论民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但同时又请求美国或日内瓦帮助他们。

然而，广州的罢工是艰巨的、无情的、的确的。它和西雅图、汉堡、匹兹堡、伦敦——世界任何地方有组织的劳工罢工一个样。我一进入罢工总部，就感受到了这一点。我毫无异国之感，倒仿佛到了家里。这里的农民出身的工人已工业化了，并且感觉到了他们的力量。我甚至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皮肤是黄的。

主要由海员领导他们，海员是他们资格最老的“现代工会”。苏兆征是海员和罢工的主席。他对我说：“有一百四十个工会参加。这不是种族斗争，这不是中国—英国之战。请告诉西方工人们：我们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斗争展开了，十多万工人罢工的矛头指向英国占领的香港。无家可归、身无分文的罢工者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住。四万工人来到广州。广州位于珠江口，从香港乘汽艇几个小时便可到达。广州是新国民政府的中心，其目的是从这里扩展到全中国。鲍罗廷是他们的正式“顾问”。在整个中国政府里有过许多外国顾问，但是，这是第一个革命的俄国人。

当年，西雅图比较小的商人起初曾同情那些反对纽约发号施令的罢工工人，如今广州的中国商人更是如此。几十年来，他们受英国对手的气，因此，他们同情把矛头指向香港的人。在鲍罗廷的指导下，这种同情转变成合作。广州把一些最近清查赌场腾出来的空房子和六个被赶走的将军留下的大军营交给罢工者们住。

罢工者们以广州为基地，沿一百英里的海岸线，组织了二千五百个纠察队，他们阻止物资和工贼进入香港。他们没收了企图冲破封锁线的物资，扣押了走私者。流血冲突发生了。英国领事向广州政府提出抗议，政府婉转地回答说：“我们感到遗憾的是，我们

无法控制我们的罢工者，正如你们在伦敦无法控制你们的罢工者一样。”罢工者要求在英国控制的香港“有言论自由，有权开设工会办公大楼，废除对工人的体罚；在法律面前，中国人和美国人一律平等；在香港政府里要有中国人的代表，因为中国人占香港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九。”这充分反映了香港的情况。

这次大罢工整整进行了六个月，在罢工的冲击下，香港变成了一个死港。香港的银行请求伦敦帮助，避免破产；它一天损失一百万美元。香港领事馆的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在西方，你知道采矿高潮过去时的死城；整个夏天我都担心，那种情况是否会在东方的这个最大港口发生。”这就是以广州为基地的罢工工人们的力量。

但是，基地本身是一个奇怪不稳定的联盟。身着绸服的官员对工人的力量感到不安，但又尽力利用他们来抵制老敌手和统一全省。工人们绸服官员也不满，但是又利用他们的友好态度取得一块基地来反对英国剥削者。广州本身存在着磨擦；这种联盟能持久吗？

“暂时没有问题，”当我问鲍罗廷时，他回答道。“这些商人希望有一个稳定‘独立’的中国政府，也就是在他们控制下的一个政府。他们希望清除土匪，修筑道路，开办工业，有一个稳定的货币以及办有益于他们行业的其他一些事情。这使他们与英帝国主义发生了冲突，而受剥削的工人与英国帝国主义更有着不可调和的冲突。”

“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我说道。“问题是怎样才能建立这种政府，应该由什么人来控制；在这方面有不同意见。在上海和香港的所有资本家也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政府；他们抱怨说，中国的混乱不利于商业。”

“是这样，”鲍罗廷微笑着说，“但是混乱却使外国人可以控制

商业。中国越是混乱，香港和上海越能利用自己独有的稳定而谋取更多的利润。将军们把他们的资金存在外国租界里；百万富翁跑到那里寻求庇护。中国轮船挂着外国国旗，向外国人致敬。中国的混乱使外国人有可能掠夺这个国家。”

我记得，一位美国领事曾经告诉我，银行家们是怎么阻止新政府建立一个可能使中国货币稳定的造币厂。他说，这些银行家从不稳定的货币中得到好处。但是，我想这些仅是一些腐败的银行。不能想象普通商人会希望混乱。他们的口号就是“法律和秩序”。“你认为有多少外国人有意识地希望中国混乱？”我问道。

“很少，”鲍罗廷承认。“只有一些最上层的人在分析他们的所作所为。但是很多人宁愿资助这个或那个土匪，而不去管混乱不混乱。当租界的房租上涨时，他们多数人是高兴的，庆幸自己守纪律，不象中国人那样乱搞。所有这些，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内心深处渴望中国混乱。”……他没有说服我。我认为他的话自相矛盾。一年之后，我到墨西哥城时，又想起了这次谈话。

在此期间，我会见了广州的中国妇女，她们有些人也开始讲世界劳动妇女的摩登语言了。我会见了廖仲凯的遗孀。在中国，妇女死了丈夫，她要闭门服丧数年。但是，廖仲凯在工人斗争中被暗杀后，他的遗孀却利用他的死在群众大会上进行宣传鼓动。她脸上显露出深刻矛盾的痕迹；她是一个中年妇女，人的本性是不易改变的。但是，她通过给她当翻译的女儿坚定地对我说：“廖仲凯最支持工人们。这就是他被暗杀的原因。但是他的事业仍在。”在她的房子里没有传统的服丧标志，而是挂了一面写有“永垂不朽的精神”的旗子。

在一个群众大会上，一千五百名妇女请我给她们讲讲俄国的情况。我在什么地方曾看见过这些面孔——斗争的坚强面孔？我

记起来了——基辅妇女！我向她们讲了俄国搞革命时所处的环境，古老家长制的家庭、无知的农村、受奴役的妇女、过着军营生活的工厂。接着，我讲了莫斯科附近的一个纺织工人杜尼娅革命前后的生活情况，工厂里的妇女们是如何把厂长的住所改为日托站，她们是如何组织医院和工厂午餐餐厅的。这些妇女懂得俄国革命的细节，而我的美国听众都没有谁能听懂。我讲的是她们自己过去和将来可能的生活。

我在广州呆了四天之后，便启程前往美国。我乘汽艇先到日本，在那里停留一天半。我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出席招待会，发表演讲等活动。这些都是由基督教青年会的斋藤先生安排的。目睹了苏联人人平等和广州生气勃勃的情景之后，我对日本下级对上级毕恭毕敬的气氛大为吃惊。当我在日本的一家银行采访涩泽男爵时，看到他只要一点头示意，服务员就赶快哈着腰走过来。日本劳工联合会主席给我提供的枯燥统计数字使我厌烦。但是，后藤子爵的谈话使我颇感兴趣。他说，他打算征得苏联的同意，在阿穆尔河附近的苏联土地上安置日本人定居，苏联愿意在那里建立一个“日本族苏维埃自治共和国”。

“我们的政府不会这样做，”后藤说。“他们害怕这个日本族苏维埃共和国对东京产生影响。但是，我把生物学放在马克思之上！”他又说：“也许这一代会给东京政治家带来麻烦，但是，从现在起二百年之后，世上的所有政府和社会制度都将变成一样的，那时，日本儿童将在亚洲大陆扩展。”后藤颇有世界眼光呢！

《朝日》这家大报安排了一个群众大会，请我讲一讲苏联问题。主编意识到了他的勇气；这是第一次谈苏联问题的群众大会。关于苏联，流言蜚语甚多；实际情况如何，谁也不知道。他对我说：“我们希望你讲话时要冷静，不要煽动听众。这里的状况是，听众

很容易突然骚动起来。如果你煽动群众欢呼布尔什维克，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我答应“只讲事实，不带感情”。当我看到会场里布满了军警时，我确信有必要保持冷静。有一些听众以仇恨的目光瞪着我。也有一些人看起来则随时准备爆发出欢呼声。我不希望发生无谓的屠杀，因此我用冷静的语气给他们讲了两个小时的“不带感情的事实”，我讲一句，翻译一句。《朝日》把为数不多的讲演费装在一个漂亮的信封里放在银盘上递给我。

就这样，我结合我在俄国四年的经历，在一九二五年年底观察了东方。地球最大的大陆上，落后的农村被洪水和饥荒、地主和土匪这些天灾人祸所困扰；美国的农场各异，而它们彼此却很相象。高踞于这些农村之上的是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他们彼此不相同，他们是互相冲突的国家和文化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人物：张、冯、吴、北京学生、后藤子爵……但是，在外国港口和现代化工业的影响下，从这些农民中分化出来越来越多的人，他们讲着世界工人的共同语言！

第二十章 混乱中的墨西哥

在墨西哥，我看到了一种从未见过的、充满浪漫情调的革命热情。人们都在谈论革命——农民、工人、政府官员、甚至美国大使馆的官员。他们口中的革命，各有各的含义。农民谈论的革命是指“土地与自由”，工人谈论的革命是要过“美满幸福的生活”，卡莱斯政府官员谈的革命则是保持官位，而美国大使馆官员谈论的革命是指石油大王雇用的私人军队准备推翻卡莱斯政府。

我在克里米亚病愈之后六个星期，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到达墨西哥。当时，我正在美国进行一年一度的巡回演说。我父亲从墨西哥城写信给我。他是随同一个自发组织的“友好委员会”去墨西哥的，该委员会旨在设法了解墨西哥，缓和美国国务院与墨西哥总统卡莱斯之间存在的那种可能导致战争的紧张关系。他的来信引起了我对墨西哥的极大兴趣。看来，卡莱斯不仅在与天主教作斗争，而且还与美国石油帝国主义者作斗争，其实这两者都不是他的死敌。美国撰写墨西哥问题的作家卡尔顿·

比尔斯说，“墨西哥工人是南北美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在得克萨斯州的巡回演说结束之后，我请求演说局准我十天假，去墨西哥城访问一次。

我还想会见苏联驻墨西哥大使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女士。她被剥夺了穿越美国直接去墨西哥的权利，不得不乘坐一艘缓慢的轮船绕道前往墨西哥城，这使她与美国自由派新闻界打上了交道。我把她看作是能够帮助我清理满脑子糊涂思想的人。我从未见过她，但我知道她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曾在西方国家居住多年，因此她了解我们西方。我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要人在莫斯科是没有时间与我交谈的，但是他们一旦离开俄国，就经常感到孤独，很乐意同刚从俄国回来的人交谈。所以，我一到墨西哥城就结识了柯伦泰女士。这是一个聪明的主意；从此以后，她便成了我的好友。我开始考虑怎样才能弄到我需要的材料。

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女士在墨西哥城经常生病；高原气候引起了她的心脏病复发。她只好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库埃纳瓦卡——这是外国人常去的平原疗养胜地。她平易近人，在墨西哥人民中享有盛名；她的魅力和热情赢得了这个友好热情的民族的好感。一位墨西哥人对我说：“可惜的是，他们不能给我们多派一些这样的人来。我们不喜欢板着面孔的布尔什维克。”墨西哥人不喜欢死板的论理；对于理论，他们甚至比我们还漠不关心。在莫斯科，我感到我自己陷入了各种对立意见的旋涡中，而在墨西哥城，我似乎变得超脱了，可以进行独立分析。

柯伦泰女士很高兴认识我；她说我是她的莫斯科最新消息的提供者。我惊奇地发现，在这次漫长的演说旅行中，我比俄国人跑得还快。那时，在通讯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俄国和墨西哥之间能互相了解些什么呢？然而，美国国务卿弗兰克·凯洛格向全世界

宣布，卡莱斯政府是布尔什维克，它与莫斯科有密切联系！

凯洛格只是把事实弄错了，但他的阶级意识是对的。墨西哥人民对俄国的确很友好；他们就象盼望粮食一样向往俄国。我多次出席了在墨西哥劳工联合会大楼举行的劳工大会。在每次会议上，我都应邀发表即席讲话。一个在苏联生活了五年的美国人的发言立即博得了掌声！地方事务且放在一边吧，我们要听苏联的消息！我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看见过反应如此强烈的人民；虽然我的发言是经过翻译的，但他们似乎能够在翻译之前根据我的声调作出反应。我尤其对几个工会联合举行的一次妇女代表大会记忆犹新，历历在目。过去，我在哪里看见过这样专心致志的、生气勃勃的面孔呢？在苏联基辅，那里的妇女代表度过了十六个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在中国广州，那里的妇女为北伐战争组织了红十字会。生活在世界三个地方的劳动妇女啊！

在每次会议上，人们都能感觉到生气勃勃的革命热情。他们没有比较冷静的北美人民的那种疑问。他们没有我年轻时代逃避阶级斗争的心理。这些人都准备为“土地和自由”而献身。他们甚至不问他们的死是否值得，他们的领袖是否忠诚！

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没有提出这种疑问……在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一间屋子里，我看到了一块纪念塞缪尔·冈珀斯的匾额；匾额旁边是托洛茨基的画像；在另一间屋子里悬挂着托尔斯泰和列宁的画像。他们还为芝加哥草市骚动中遇难的无政府主义者树立了纪念像。……我在墨西哥城听到了一个普通墨西哥工人的故事：他被投入美国的监狱后，写信给苏联驻墨西哥的代表，请求营救，因为他一贯“遵循列宁、托洛茨基、巴枯宁、克鲁泡特金、高尔基和托尔斯泰的谆谆教导”！

那就是墨西哥人的气质！他们热情款待所有的朋友；只要你赞

扬工人，只要你认为享受劳动成果的应当是工人，而不是资本家，那么他们就会把你当作朋友。热情好客的墨西哥人愿意为朋友而捐躯，愿意为所有的朋友而献身！

我很快就弄清了产生这种思想混乱的历史原因。墨西哥的第一批工会组织是由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创立的。这些工会组织劳工联合会时，社会主义者占了优势，但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把红旗当作工会旗帜。墨西哥的劳工旗帜是由红与黑两种颜色组成的，代表社会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联合。后来，他们又加入了冈珀斯组建的泛美劳工联合会。他们认为，美国资本主义是他们的头号敌人，也是美国工人的头号敌人。这样的看法并不错。冈珀斯是一位精明能干的政治家；他们竭力使自己的言论适合墨西哥人的胃口。在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举行的美国劳联大会上，他谴责英国劳工竟敢干预政治。但是第二天晚上，他穿越墨西哥边境之后，便祝贺墨西哥工人采取的政治行动，并且敦促他们“使用他们掌握的一切力量去夺取政权”，他说的力量就是指军队。就这样，冈珀斯也成为墨西哥工人的“朋友”。

墨西哥劳工联合会主席莫罗内斯是有名的歹徒和恶棍。甚至他的支持者无意中透露过他利用私人刺客“干掉”对手；还有人说他花天酒地和珍藏珠宝。他们还说，“莫罗内斯是一个不惜搞法西斯政变的歹徒。”在我访问期间，墨西哥全国最大的工会联合会——墨西哥劳工联合会本身正在公开参与破坏罢工活动，企图搞垮与它争权夺利的铁路工会组织。它无情地把共产党人排斥在它的分会组织之外。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一位负责人对我说：“我们不让共产党人就业，要用这个方法饿死这些该死的共产党人。”

然而，在墨西哥劳工联合会的大厅里，各个工会的会员们都在为苏联欢呼。墨西哥劳工联合会发出的每一封信都是以“亲爱的

同志们”开头的，也都是以“祝你健康和社会主义革命”结尾的。我看到了成堆的信件，它们都是寄自遥远的乡村，勤劳勇敢的农民这样写道：“我们唯一的帮助是来自工会。”莫罗内斯已担任卡莱斯政府的工业、商业和劳工部长。我在他的外厅等待采访时注意到，昼夜兼程，风尘仆仆赶来的各州农民代表比等候数小时的美国商人优先受到莫罗内斯的接见。据说，任何想见莫罗内斯的重要石油巨商，在乘坐私人轿车到达之前，必须先拍电报，才有可能在莫罗内斯的家里受到接待。但是，他在办公室主要是接待那些穿工作服和草鞋的人。这些工人和农民怀着一种傲慢和藐视的神色，瞧着那些排队等候接见的小资本家，而他们则直接走进莫罗内斯的内室，以“同志”相称。莫罗内斯就是这样既破坏罢工，又使自己成为“劳工的朋友”。

这些墨西哥工人，从莫罗内斯到莫斯科，向所有的“朋友”欢呼。苏联电影一进入墨西哥就立即获得成功。苏联工人农民的形象实际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占领了学校、阅览室、工人俱乐部。他们在这里受到的欢迎远远超过了在影院受到的欢迎，在那里，苏联工人农民似乎是衣衫褴褛的怪人。在墨西哥人看来，这些苏联人衣着自然，一身工农打扮，就象他们自己一样。他们看到这些工人和农民在争取“土地和自由”之战中取得了胜利，苏联人正在建设一个他们所期望的世界。他们只是从电影里看到了这个世界。但是，如果在电影之外进行理论分析，那么他们就不懂了。墨西哥人不加区别地欢迎每一个人。正象我第一次知道苏联时那样——正象我们过去举行西雅图总罢工时那样，欢迎每一个人。

我们是有文化的美国人，而不是易动感情的文盲！难道我们不是也曾经为每一个人，为列宁、英国工党、甚至甘地欢呼吗？难道我们没有出版过他们的小册子吗？我们认为他们都带头朝着“同一个

总方向”前进。这种为每个人欢呼的特点显然不仅仅是劳苦大众所独有的；它也许不是哪一个国家所特有的，而只是一个发展阶段。几年以前，我本人不是曾对共产国际的报告感到反感吗？那是因为这些报告谴责了德国社会党和英国工党，而我则认为他们都应该成为“朋友”。现在，我不再象过去那样崇拜英国工党了；他们使总罢工象我们的罢工一样以失败而结束。他们甚至不仅没有逐步取得进展，似乎反而倒退了。仅仅攻击资本家，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严明的纪律和明确的方向。共产党攻击社会党，不是没有道理的，目的是使阵线分明。列宁有明确的方向和策略。但是，能为墨西哥和其它许多国家运筹帷幄的伟大天才在哪里呢？在那些国家，最优秀人物似乎都无能为力。

卡莱斯显然不是那种天才。他分给农民一小部分土地。凯洛格国务卿从华盛顿给他发出强硬的照会，分配土地的工作便马上停止了。接着，农民再次起来造反，又从卡莱斯那里分到一点土地；而凯洛格一发抗议照会，便又偃旗息鼓了。卡莱斯无法实施自己的土地法。墨西哥农民和工人是非常革命的，以致任何一届墨西哥政府都必须谈论革命，否则，它就维持不下去。一九一七年通过的墨西哥宪法规定所有的自然资源都是国家财富，并把剥削者掠夺去的土地归还给印第安人村庄。这是一个非常革命的宪法。如果中南美洲的工人们在公众场合阅读这部宪法，就会被捕。在所有讲西班牙语的国家里，工人们从墨西哥那里吸取鼓舞力量。但是，由于“北方巨人”，卡莱斯却不敢实施那部宪法。

当时不是有一位伟大的领袖、艺术家迭戈·里韦拉吗？他是墨西哥最著名的革命者。在墨西哥，似乎没有革命纪律和革命理论可言，但有迭戈·里韦拉的艺术，农民和工人从遥远的外地蜂拥而来，朝拜他的艺术。

在墨西哥，人们很重视艺术。它植根于古代群居生活。贫穷饥饿的印第安人，这个受压迫长达四百年之久的苦难民族，有着自己的传统艺术。他们的艺术反映在陶器上、舞蹈中以及他们的披肩毯上——这种毛毯也可当作外套。在他们中间，不大重视个人生活；人们为了作出某种姿态，可以置个人生活于不顾。但是，艺术是至关重要的，它可以导致严重的斗争。一位可能接替卡莱斯的总统候选人说：“我希望当选，这样我就可以把里韦拉的作品从总统府的墙壁上全部清除掉。”

我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仔细观看了那些壁画。自从迈克尔·安赫洛时代以来，还从来没有过一位如此伟大的画家在教育部大院四周高大的圆顶走廊上画一幅数百英尺长的油画。这位名叫里韦拉的艺术家在走廊上画满了普通墨西哥农民、矿工、森林工人以及被当作奴隶的劳动者。画家笔下的大地和劳苦大众栩栩如生，他们历尽了人间沧桑，不大意识到他们身上的潜在力量。在矿井里，一个工人弯着腰，吃力地挥舞着铁镐，表现了人类顽强的斗争精神；矿山的奴隶举起双手等待工头搜身，蒙受着极大的耻辱；妇女们世代地碾米，表现出强大的忍耐力。壁画里还有集体节日、印第安人生活中的古怪风俗以及喜气洋洋的工人和农民高举红旗、红星旗、红色铁锤镰刀旗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情景。丧事筵席消除了哀悼者的悲伤，变成一种庄严的和谐。画面上一再出现劳苦大众，他们劳动、战斗、牺牲和取得革命胜利。

难怪革命的敌人希望毁掉这些壁画！难怪劳苦大众步行几百英里来看这些壁画！壁画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使我第一次见到这位艺术家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在这些壁画面前，语言显得软弱无力。后来，我们经常讨论艺术和革命，他认为，这两者是浑然一体的。他说：“只有热情反映时代强烈愿望的人，只有善于

用有意义的形式表达这种愿望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里韦拉是身材魁梧的墨西哥印第安人，他的面庞与体格都说明了他出生于农民家庭。他说：“艺术已是团结我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古往今来，它赋予我们忍耐的力量。在西班牙人到来之前的远古年代里，我们人民生活的土地比现在辽阔；后来我们人民的土地一点点地被夺走了。但是，他们委屈求全，满足于最低限度的食物和住房。他们靠歌舞来保持他们的集体精神。盎格鲁撒克逊族人也无法使我们成为别国的奴隶。即使今天，我们也是不可征服的。”

“我的艺术就是要表达和增强我的人民的灵魂，我的人民是指那些印第安农民和刚刚抛开农田的工人。在我的画面上，工人和农民总是拥抱在一起。资产阶级知道这些画为什么故意选择下等人作为主题——画中的印第安人太多了。因此，他们要毁掉它们。外国艺术家的来访也许能够挽救我的壁画；全世界都在谈论我的壁画。此外，每一届墨西哥政府都必须装出革命的姿态，因为人民有这种要求。但是没有任何一届墨西哥政府可以算是真正革命的，因为美国人太强大了。当领导人们悄悄妥协时，他们总是对人民说：“瞧，我们保留了里韦拉的画，我们是革命政府。他们甚至用我的画来掩盖他们的妥协。但是，一旦他们真正明白艺术是怎样团结人民和唤醒人民起来斗争的，他们就要毁掉这些壁画。”

“我们所有的政治领导人都是不稳定的。西班牙征服者的血同印第安人的血流在一起，他们受到美国大亨与印第安人的夹击，他们自己也希望不断发展获得好处。他们既有忠诚的，也有不忠诚的。我认识一些人，他们为革命工作多年，但后来贪污腐化，谋求私利。我还认识另一些人，他们为资本家服务多年，但后来转变思想，突然为革命卖命。这就是我们知识分子的不稳定性。”

“但是，我们的农民是真正的革命者；他们一向是革命队伍的

中坚力量，然而他们总是受骗。两万三千个村庄需要土地，目前已经得到土地的只有五千个村庄。最大的庄园尚未分给农民，因为它们实力雄厚，收买了州长。在这些大庄园，农民仍然遭到鞭笞，农民领袖被暗杀。然而，由于北方巨人，我们对他们束手无策。”

但迭戈·里韦拉不是领袖人才。正如我在西雅图总罢工中所认识到的一样，他也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和未来的工人世界的美好，可是他却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途径。农民的土地越来越少。他赞美农民，通过艺术保持其灵魂的独立性。在垄断集团趾高气扬的进军面前，难道独立的劳动者只有象过去那样，节节退却，没有更好的办法？难道他的艺术不是如同宗教那样，只是一种安慰，虽然表达了理想，却不知道如何实现吗？艺术能够团结人民，艺术能够唤起斗争，但艺术却找不到一条正确的革命途径。

我到美国大使馆去参加谢菲尔德大使每星期三举行的茶话会。美国人——当然是衣着考究的美国人，都可以参加。他们在美国大使馆里谈论另一种革命；我发现他们都在计算着日子。大家都认为，由于“总统对墨西哥极为不满”，所以谢菲尔德先生随时都有被召回的可能。召回大使和撤消对卡莱斯政府的承认，就意味着石油巨商们可以放手武装他们的私人军队。那就是他们所说的“革命”，由被收买的军队来推翻墨西哥政府。

一位石油富商对我说：“卡莱斯是一位狂热的爱国主义者，他宁愿使墨西哥贫穷，也要使国家独立。”这位石油巨商认为这显然是一种极其愚蠢的作法。

“需要另一种革命，”一位妇女说。“你们美国人没有认识到，墨西哥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换换政府而已。革命并不都要流血牺牲，至少在墨西哥城不是这样。”显然，这个国家的劳苦大众是无关系要的，左右墨西哥政局的是被收买的军队。

另一位石油商人对我说：“正当激动人心的消息即将传来时，你为什么要离开墨西哥？也许一周以后，你只能乘飞机回北方去了！那好，如果你一定要坐火车，必须在明晚之前离开！”

大使本人没有公开发表这些预言，显然这些预言都是欢呼这个睦邻国家政府倒台的。这位大使明智地走进了里屋，只是偶尔出来迎接某个大资本家，他可能同这个资本家一起撤回美国。毫无疑问，这位大使正在密室谈论着茶话会上热烈议论的主题。

由于一封介绍信，我应邀出席了一位最著名的美国石油巨商家里举行的晚会。大多数宾客是墨西哥的大地主，其中有些人在最近的土地分配中失去了土地，但是有许多人置法律于不顾，仍然保留着他们的全部地产。当晚会结束时，主人留下我继续交谈。整个夜晚过得非常快活，主人显得格外坦率。他希望我知道——他不怕我知道——美帝国主义有多么强大。

“一个月前，你从纽约给你父亲拍来一份电报，建议他去拜访柯伦泰女士，我一刻钟之内就知道了电报全文，”他挑战似地说。“半小时之内，所有报社的记者也都知道了。普通的私人电报我们是不过问的，但这是拍给‘友好委员会’成员的电报——我们称他们是‘该死的友好使者’、美国的敌人。电报中提到了美国的另一个敌人柯伦泰的名字。所有诸如此类的电报在到达墨西哥后的半小时之内都落到我们的手里，我们还经常比收报人先拿到电报。在你抵达此间一个月以前，我们就知道你想来这里了。我们知道，你将何时到达，你会与谁联系。我们了解所有来这里与美国的敌人进行联系的人。”关于美国的敌人，他提到了《民族》周刊的欧内斯特·格里宁博士、弗兰克·坦纳鲍姆、卡尔顿·比尔斯以及所有同赤裸裸的石油帝国主义作斗争的人。

他说，“在墨西哥，最头痛的捣乱分子就是美国的这些进步团

体。他们不了解墨西哥人，他们用自由思想来腐蚀他们，这只能驱使劳苦大众发疯。靠这些墨西哥人是无法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经过了几百年，他们仍然没有进化成为一个具有自治能力的民族。这就如同两条腿的动物与四条腿的动物有很大差别一样。你能够把狗训练得很懂事，但却不能把猫训练成这个样子。进化的过程附带产生了猩猩，但是猩猩却永远不会进化为人。这些墨西哥人没有接受直接进化，他们是永远不会进化到文明社会的。

“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的真正差别是，西班牙人极少，所以他们只能与印第安人通婚，把他们当作奴隶使用。我们美国人则把他们杀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文明，而他们只有动乱的原因……这些中美和南美国家如果想要得到自由，非得美国给予并加以保护才行，否则，他们就会土崩瓦解，他们的农民就会欺凌他们，欧洲国家就会掠夺他们。今晚来参加晚会的那些大牧场主都有足够的智慧去组建一个政府；但是他们缺乏勇气。他们害怕他们的农民！”

“但是，如果有可能使墨西哥人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的话，那必然是美国的敌人一手造成的。沿着格朗德河有一条很长的美墨边界线，它比德法边界线还要危险。这两个有着不同传统的民族是不可能友好相处的。谁要是使墨西哥变得强大和有秩序，那就必定会促使美国发动一场战争。”

“你自己的行为在促成战争，并使整个拉丁美洲憎恨美国，”我气愤地说。他却笑了。

“是的，憎恨我们！但是，只要他们弱小和社会动乱，他们是不能伤害我们的。这些该死的友好使者却想使他们强大和社会安定，用强大的敌人取代软弱的敌人！这简直是对美国的背叛！”

他还告诉我“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美国并吞墨西哥北方各州。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块比法国大几倍的、人口稀少的土地。我反对占领人口稠密的土地，因为同他们混杂在一起，就会使自己的种族退化……你会认为我是作为石油商贾才需要那些州的吧。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我可以从墨西哥为我的石油搞到比美国法律赋予我的更优惠的条件。卡莱斯上台，我可以做到这一点；但是他不会长久。我的这番话不是站在石油商人的立场上说的，而是站在美国爱国者的立场上说的，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领土不断扩大，日益繁荣富强。谁要不这样想，就是美国的敌人。”

在这次谈话过程中，他的妻子出出进进，时而坐在她丈夫的身旁。有一次，她竭力想使丈夫的言词缓和一些。他之所以言词激烈，主要是因为他对客人傲慢无礼，倒不是由于他不谨慎。他对妻子置之不理，他非常强硬，根本不在乎谁在听。“我们知道卡莱斯总统要垮台，你有什么看法？我们在墨西哥的每个角落都有汽油站，他们都给我们传递情报。他们现在都给我们写信，报告各地反对卡莱斯政府的情况，有小规模起义，地方性起义。当华盛顿撤消对卡莱斯政府的承认，派军队向边境移动时，就不会只是地方性起义了。华盛顿已经很厌烦了。”

他的直率使我大吃一惊，所以我在那天晚上睡觉前记下了他的谈话；我仍然保存着这次谈话的副本。我能轻易地用普通邮件穿过华尔街向苏联特许权委员会寄送报告，至今思之，不禁捏一把汗。多么悬啊，我岂不是在悬崖边上行走吗？我之所以没有把俄国人牵连进来，大概因为我是一个没有公职的人吧。我记得，鲍罗廷在广州曾对我说过，在一个受剥削的国家里，一个安定而强大的政府是不会受到剥削者的欢迎的，因为只有社会动乱，他们才能牟取暴利，巧取豪夺。美国石油巨头们显然和他有同样的观点。而小商人和小企业家则说：“一个正直而安定的政府是有益于发展贸易

的。”他们为抢劫和腐败“有损于贸易”而悲叹。这的确损害了他们的小生意。但是所有的大人物、对抗力量的领导人却对此非常清楚。

然而，这些“该死的友好使者”的顽强精神超乎美国大使馆里的商人的预料。他们把自由主义者的大批抗议信件源源不断地寄给华盛顿，以致邮车阻塞了交通，使邮件耽搁了一天多。这些写抗议信的自由主义者憎恨石油商贾和堕落的牧师的干涉。这确实是一大成就。所以华盛顿不仅没有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反而委派摩根财团的德怀特·莫罗担任美国驻墨西哥大使。莫罗比前任大使谢菲尔德还要聪明能干。正如很久以前，当展览被垄断时，伦纳德·艾尔斯曾教给我如何保持“独立”一样，狡猾的莫罗也想出了一个办法：既使墨西哥“独立”又使美国资本家攫取墨西哥石油和土地。这些“该死的友好使者”不再抱怨了；他们不是已经达到目的了吗？

在墨西哥，来自北方巨人的帝国主义者是如此强大，以致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毫不在乎。在墨西哥，革命的农民和劳苦大众准备献身，准备为卡莱斯献身，为里韦拉的壁画献身，为莫罗内斯献身，以及为任何给他们以希望的“朋友”献身。但是，卡莱斯是飞蛾扑灯，里韦拉只有感情，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奋斗目标。墨西哥的革命领袖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墨西哥农民工人需要有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来提供理论、纪律和明确的方向，并体现群众的强烈愿望。这样，才能如卡尔顿·比尔斯所说的那样，实现以下理想：“墨西哥成为南北美洲大陆上最强大的革命力量。”

总有一天，在各民族的交响乐中，拉丁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奏出自己的乐章。总有一天，当全世界都成为墨西哥劳苦大众的“朋友”时，他们会热情地奉献自己的礼物。石油商贾们曾嘲笑：“我们

有文明，他们有动乱……”墨西哥的劳苦大众不要资本主义的文明；但是，当社会主义的文明到来时，他们会热情欢迎的。他们愉快地生活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并使生活中最简单的东西成为艺术品。当人类征服了地球之后，他们必定可以学会去享受它。为了古老的北方民族，为了各种族的“朋友”，墨西哥的劳苦大众经历四百年的受压迫的生活之后，仍然保持着共享节日快乐的礼物！

第二十一章 红色汉口

我在上海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向我建议，如果我想看到真正的革命，就必须马上沿长江而上到汉口去。《福西克贝报》的德国记者冯·萨尔兹曼刚从汉口回来，他对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充满了感情。“别为南京浪费时间了，”他对我说。“不管它能拖延多少年，但它不会长存。它将在外国金钱和中国上海富商的压力下妥协。汉口将坚持下去，如果不是指人的话，至少他们的信念将永存。如果汉口政府被推翻了，它也会名垂青史，东山再起。那是一种什么信念呢？它不象共产主义思想那样明确。它是推动一切革命的信念——长期受压迫的人民突然获得的希望。”

宋子文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当国民党政府分裂成两大敌对营垒时，他在两者之间举棋不定。他身穿一件雅致的浅蓝色长袍，在上海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对我说：“南京没有什么值得了解的，穿新鞋走老路，用华丽的词藻掩盖中国惯有的腐败无能。汉口倒有看头！”然而，

他本人却离开汉口，同新的南京政府调情了；不过，他还没有下决心。他曾两次买票想返回汉口，但最后还是找借口没有去。他让我转告他的妹妹——在汉口的孙中山夫人，他很快就会返回汉口。可是，当我告辞的时候，他无意中脱口而出地说：“再见！我们北京见。”他说话前后矛盾。他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种犹豫不决的痛苦神色。他知道群众运动是伟大而光荣的。要放弃这种运动是痛苦的。但是，他很清楚，要离开上海的金融家将是更痛苦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我访问墨西哥后不久来到中国。我当时以旅游者的身份奔走于各个革命的中心。中国的局势成为世界报刊的头版新闻。因此，我在美国停留的时间不长，我在佛罗里达州巡回演说结束后，为霍尔德曼—朱利叶斯蓝皮书出版公司写了七本小册子中的最后一本，后来到纽约去会见了一些编辑。然后，我从旧金山坐船来到上海，我心里很清楚，我下一步必须到汉口去。英国半官方规定，禁止妇女在长江旅行，但是我搭上了德国的一艘远洋货轮溯长江而上到达汉口。去年十二月，我还在克里米亚医治肺炎，今年二月便访问了墨西哥城；五月又来到中国工业中心的“红色首都”。因此，我现在觉得我们的世界显得小了。

一年半以前，我在广州看到了国民革命。现在，它已引人注目地向北发展，达到长江，半个中国掌握在“国民革命军”手里了。北伐之所以发展如此迅速，是因为代表中国中上阶层爱国者的国民党同组织工农群众的共产党结成了联盟。工人农民以“人民政权”的名义举行的起义为北伐军开辟了道路。我在广州革命军队中看到了两种对立的因素——穿丝绸长袍的商人和饥寒交迫的工人。他们已经分裂为两个敌对的政府，一个在上海附近的南京，另一个在沿长江走三天路程的武汉三镇、主要是汉口。

造成这种分裂的近因是蒋介石在上海血腥屠杀工人。在孙中

山时代，国民党执行委员会批准的北伐计划，第一步是巩固中国内地，然后再向沿海进攻，这样就可以避免与帝国主义接触，直至中国统一，消灭匪盗和军阀。当前的计划是要求南方军队立即北上，与冯玉祥的西北军会师。蒋介石这个趾高气扬的大元帅无视本党和政府的命令，擅自挥师，直取金融中心上海，他本人是上海黑社会的歃血结盟兄弟。上海的革命工人举行起义，迎接他的到来，并为他夺取了这座城市。他掌握了他们给予的权力后，立即下令封闭工会和屠杀工人领袖。在上海富豪的支持下，他成立了南京政府。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仍然呆在从上海沿长江而上要走三天路程才能到达的原定目的地汉口。他们宣布：“要文治，即民治，不要武治，”并任命了一位新总司令来取代“叛变的”蒋介石。蒋介石既有钱又有军队。可是在我到达汉口的时候，汉口仍然享有爱国运动的道义威望。他们是中国的“进步力量”，在他们的行列中有国民革命的著名人物。他们仍与共产党合作，并通过共产党把工人和农民组织起来。与他们在一起的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廷。

关于汉口的各种谣言不断传到长江下游。在被压迫人民起来反抗压迫者的斗争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的谣言的。人总是制造一些关于两性的传说，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强烈反感。例如，谣传汉口的妇女为了庆祝获得自由而举行了妇女裸体游行。还传说汉口政府强行给十六岁以上的女子分配丈夫。一个名誉扫地的传教士油印和散发了这些荒唐的传闻。这是非常典型的。在这些传说中，最温和的、有点事实根据的是：工会和农民组织夺取了富人的财富。

真正布告的副本也传到了长江下游，基督教女青年会的一些

开明分子散发了它们。这些布告给中国的战争注入了一种新精神。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事呢？一支取胜的军队在攻克一座城池后发布如下的公告：“虽然我们为得到这座城市而高兴，但我们看到民众的苦难而感到忧伤。……革命军一定要解救人民的苦难。我们与人民休戚与共，同生死，共患难，共同扫除一切障碍，共同致力于建立美满之生活，共同铲除帝国主义和军阀。”

在汉口，人们在中央银行的楼上给我们安排了住处，隔壁是宋庆龄的卧室。她是我在世界上结识的人中最文雅、最敏锐、最刚强的女性。她接受了中国严格的传统礼教训练。她非常敏感，在我看来，根本不在意的一些小事，都会使她感到不快。然而，她却顶住了中国的习惯势力对妇女所施加的两大社会压力——家庭的影响和对名誉的诋毁。南京方面散布了许多可耻的谣言，企图毁坏她在中国人民心目中作为孙中山遗孀的名声，她的亲属把这些谣言都告诉了她，劝她为了已故丈夫的声誉而到上海去。她坚持留在汉口，并坚决执行与工人、农民和共产党合作的政策。鲍罗廷后来说：“她是国民党左派中独一无二的人物。”

苏联顾问鲍罗廷在广州得了疟疾，大部分时间生病；在几次病重时，卧床不起，不得不在病房会见各个委员会成员和来宾。他对中国革命的重要贡献在于他根据以往的许多革命经验和教训，对中国的经济力量、社会阶层和革命方法进行精辟的分析。上海的自由派人士对我说：“鲍罗廷希望中国陷入混乱，以期实现共产主义。”这是一种糊涂的看法。

“中国已经处于混乱之中，几十个军阀混战使中国四分五裂，”鲍罗廷对我说。“希望保持这种混乱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者，因为这样他们才能控制和掠夺中国。但是问问：在中国，什么社会阶级才有足够的勇气、凝聚力和纪律来把这个国家从混乱中解救出来，建

立一个稳定的政府和现代化的独立国家呢？”他在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工人和农民中找到了这种必需的素质。同国民党的联盟，为这项组织工作提供了机会，因为国民党包括了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汉口政府比我在墨西哥看到的卡莱斯政府要进步得多。它有理论，有纪律，有很大的权力。然而正如石油巨商象一把利剑似的悬在卡莱斯头上一样，在汉口，长江上的外国炮艇都已做好战斗准备，如果革命搞得太过份，他们就会开炮镇压。商人纷纷顺流南下，带走了武汉的就业机会和黄金。中国的“工人中心”实际上成了一座嗷嗷待哺的失业者的城市，日益迫切地需要粮食。

饥饿的工人面对着外国炮艇的威胁，并没有畏缩。他们集合起来，占领了汉口的英国租界，把它永远置于中国的控制之下。在一些革命的省份，农民承认中央银行印刷的纸币，人们可以用它购买大米。无耻的德国商人们对我说，他们乘机在这些交易中牟取暴利，用低值兑换纸币，而按票面价值购买大米。他们说，“只有这一时期，中国人民才愿意接受纸币来购买他们的大米。”他们嘲笑这些农民：用牺牲了的信任来支持“人民政府”。

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劳动大会在汉口的一个大礼堂举行，出席这次大会的有三百八十一位选举产生的代表，他们来自中国十八个省中的十四个省，代表着四百万组织起来的工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越过封锁线，来到汉口，为的是加强和巩固他们的国家，以抗击世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的力量。代表们共济一堂，举目四望，只看见一张张面孔：有的翘首仰望，有的神情严肃，有的面露笑容，有的焕发着青春的容光，有的透露着生活的艰辛。但是，在所有的面孔上，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精神抖擞的、不屈不挠的决心。

在这些代表中，我会见了一些人。一位姓余的代表是来自上

海的久经考验的组织者，在他的领导下，许多运输工会得到了加强。一位姓马的代表是广州的老印刷工人，他正在创建中华全国印刷工会。一位年纪较大的姓唐的代表是湖南的矿工。唐仍然怀念帝王时代，希望资本家回来，但他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会来摆脱承包工头的欺压。上海纺织厂的女工们不顾生命安危溯流而上，置生死于度外，想方设法通过封锁线。这些代表们代表了各行各业的工人，从落后村庄的苦工到武汉兵工厂的先进铸造工人。他们讲着各地不同的方言，所以开大会时经常需要有人作翻译；只有中国的书写文字是统一的，口语的发音则因省而异。大多数合法成立的工会还不到一年的历史。在国民革命军管辖的地区，它们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它们是中国最强大的、最富代表性的人民力量。

革命力量很大，也很复杂。许多兄弟组织派代表出席了劳动大会，就说明了这一点。其中有：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农民协会，国民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其它十一个全国性组织或省市组织。

苏联工会派了一些兄弟工人代表来参加大会，其中有：冶金工人、铁路工人和教育工作者。中国人围住他们，如饥似渴地询问一些关于如何治理国家的实际问题。“在你们进行革命时，你们对破坏政府工业的行为采取什么态度？是鼓励、容忍，还是惩罚？”……“在你们的革命中，钢铁工人是什么时候开始得到物质上的好处的？是在剥削者一被打倒就得到好处呢，还是在为革命作出许多牺牲之后才得到？”苏联人取得革命成功，享有很高威望，他们可以提供这方面的知识。与此同时，主要由帝国主义大国的工会组成的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则拒绝承认中国工会的存在。

共产国际的代表罗伊（印度人）给这次大会定了基调。他说：

“过去，你们在国民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现在则要求你们起决定性作用。前三次劳动大会的任务是进行组织和宣传工作，而这次大会的任务是领导中国工人从事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国革命的成败将决定现时代世界革命的命运。”这些并非空话。汉口政府的垮台使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并至少决定了此后十年世界形势发展的方向。

在这次大会上，我并不觉得他们是异国的黄色皮肤的中国人；他们的面部表情、语言和行动完全与世界上有组织的战斗工人一样。但是，作为会址的这座城市仍然秩序混乱，中国封建军阀气焰嚣张。大会闭幕的那天，国民革命军一个主要将军（指唐生智——译注）的一些军队占领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开始抢劫代表们的行李。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城；在汉口，象在全国各地一样，军队也开始镇压工人了。在鲍罗廷的办公室里召开的紧急会议增强了“国民革命政府”的勇气；国民革命政府的领导人汪精卫“说服”这位将军撤走他的军队，以“挽回政府的面子”。当苏兆征带领大家清扫歹徒抢劫工会而留下的垃圾时，我采访了这位精疲力竭的劳动大会主席。他说：“我们今天可以在大楼里工作，谁知道明天又怎样呢？”那天晚上，工人和士兵按原计划举行了盛大的联欢会。工人们充分利用了汉口政府给予他们的喘息机会来“教育”士兵。

附近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象工人一样坚定和艰苦。在苏联人还没有前来帮助他们以前，他们就成立了上百个自发性组织，其中有红缨枪会、黄肚子会（意译——译注）等，目的是保护农民，对付土匪和军阀。随同北伐的国民革命军来到北方的苏联顾问告诉这些拼命的农民怎样才能使他们的力量发挥更大作用。“清除你们队伍中的二流子、土匪、鸦片鬼、地主和放高利贷者（以前所有的农

民组织都被这些人腐化了)。在你们建立了地方组织后,从你们的村庄派代表去同另一些村庄联合起来。这种联合要不断扩大到全省和全国,这样你们就有力量抵抗土匪、控制军阀和建立‘人民政权’了。”

农民纷纷赶来参加会议,聆听这些道理,数百万人参加了农民协会。他们采取了行动:“人民的粮食、人民的法庭和人民的学校。”他们没收了富人从饥荒地区运出的大米,成立粮站,按固定价格向穷人出售大米。我在湖南农村认识的一些德国传教士告诉我,农民是如何小心翼翼地记帐的。他们还对我讲了“人民的法庭”,在那里举行群众大会,对那些收买土匪来保护自己的地主和贪污饥荒救济款的人进行审判和定罪。“人民的学校”如雨后春笋,迅速发展了几万所。过去,每个村庄都有教富人子女念书的家庭教师。现在,农民命令他们开办穷人学堂。他们征用了一些房屋,让学生们自带凳子和学习用品。中国人很重视的读书写字技术很快就被农民的子弟掌握了。

为饥饿者提供粮食,处决贪污分子和为穷人开办学校——这些都是农民起码的合理要求。他们力求过个好日子。此外,他们还要求制定新土地法,这种土地法因地制宜。新土地法规定了地租的限度,规定在饥荒年代免交地租,而且提出了统一的土地税,“不得预先征税”。更先进的农会组织还要求监督地租,甚至要求重新分地。但这不是他们所追求的、准备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冯·萨尔兹曼说得对:这不过是从中世纪奴隶般生活迈出的第一步而已。

取得胜利的革命军队是由各种各样的成分组成的。它开始时以广州军校纪律严明的毕业生为骨干,在北伐战争中迅速吸收了大批工人和农民。他们在受压迫的农村地区点燃了希望之火,唤

起了盟友。农民的脊背成了他们的运输工具，对当地情况熟悉的农民帮助他们包围城市。但是，北伐军也吸收了一部分地区的军事冒险家，他们看到革命力量强大，就迫不及待地投靠革命。这些武装力量必须被当作盟军接受下来，否则，把他们留在后方，就会成为隐患。

为了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分子教育成为一支纪律严明、而又忠诚的部队，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设立了政治委员制。大部分政委是共产党人。他们很快给这些士兵上读书识字课和政治课。这个方法确保国民革命军在攻克半个中国时所需要的革命热情和组织纪律性。但是随着节节胜利，军队扩大了，军人之间的矛盾加剧了，政治教育工作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况且，国民革命军中的军官大多数是商人和地主的儿子。当农民与压迫者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尖锐时，这些军官开始转而反对革命了。国民革命军又开始分裂成旧军阀派别了。他们驱逐或杀害政治委员，在各省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工农组织。

尽管有这些互相争斗的因素，文官政权——国民党左派政府毕竟在汉口建立了。这个政府的劳工部长和农业部长由共产党人担任；其他各部长由中国知识分子和小商人担任——自孙中山时代以来，他们一直是国民革命的领导人。他们中有许多人在外国留过学。他们是当代中国的进步力量，充满爱国激情，争取实现“民治”，要求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要求推行政府所有制，以确保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繁荣。由于我参加过西雅图总罢工，所以我能理解他们。

几个月前，这些知识分子在北伐热情的鼓动下，发表了革命演说，其激昂程度比工农犹有过之。孙中山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保守派实业家孙科曾高喊：让农民“杀死绅士”，因为农民更有理由要

求控制粮食和处决少数贪污分子和土匪。年纪较大的司法部长徐谦发表了充满无政府主义词句的激烈讲话，以致使共产党都感到不安。革命政府主席汪精卫是最雄辩的演说家，长期享有爱国者的声誉。他向中华全国总工会劳动大会致以武汉政府的革命敬礼，并向他们保证说，政府将永远支持他们组织全国工人反对剥削的斗争。

然而，就在我到达汉口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政治家开始动摇了。在巨大的困难面前，农民和工人表现得很坚定，而那些意志薄弱的知识分子却慌了手脚。汉口工人利用群众的巨大压力夺回了英国租界，并把它交给武汉政府，这件事立即在全国和全世界赢得了威望。可是武汉政府胆小如鼠，只是在鲍罗廷竭力规劝下，才勉强接受这份厚礼。他们被世界列强吓坏了，他们想把租界还给英国人。

他们也害怕自己的将军们。不过这些进步分子倒也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文官必须控制军队。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因为他们本身是文官，他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相信这一点，因为他们在国外看见过现代政府。他们谴责蒋介石不服从党和政府的领导。他们还经常对我说，武汉的最大光荣在于它是中国唯一的一个由“人民代表”控制军队的政府。然而，当他们的将军们开始屠杀农民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来制止他们。

这就是农民和工人一直为之卖命的“红色汉口”的“进步政府”。然而，这个政府的“外表形象”给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我问鲍罗廷：“如果这个文官政府很坚决，军方会不会退让呢？”这就是美国的传统：政府是强有力的，军队得服从它。

鲍罗廷笑着说：“你可看见过在蟒蛇面前的兔子吗？兔子吓得发抖，知道自己要被吞掉了，然而它却呆在那里不动。我们的文官

政府在军阀面前也是这样。”我认为，这大概是鲍罗廷长期患病使他过于悲观了吧。我也看出，汪精卫对将军们太迁就了，湖南军人对政府的命令置之不理，恣意屠杀农民。要恢复那里的正常秩序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仍然认为汪精卫是一个爱国者和杰出的进步人士。虽然他不象我在劳动大会上见到的工人那样生气勃勃，但毕竟得有他这样一位受人尊敬的人担任政府首脑。难道“红色汉口”不是一个政府吗？

鲍罗廷把我介绍给他旁边的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时讲了一番话，当时我并不理解。他说：“斯特朗女士在她的革命中不够幸运。她去俄国太晚了，而现在来中国又太早了点。”我认为这是富有哲理的话。当然，中国革命刚刚开始，但是，难道它不会自然而然地发展到全国吗？我当时不了解革命政府内部存在深刻的分歧，这些分歧正在加速政府的垮台。我当时认为，政府内部的派别越多越好，这样就更具有代表性。甚至连许多将军，只要变得驯服一些，具有爱国心，忠于第一个真正代表国民的政府，还是可以团结的。我认为，将军们应顺从于思想，而不是思想顺从于将军们。

我同汉口的官员们一起去郑州出席由冯玉祥将军参加的著名军事会议。在专列上，餐车非常豪华，有冰镇汽水、罐头龙须菜、卡耶牌巧克力糖和森基斯特桔子——这表明美国已经渗透到这个美国化的左派政府。我们经过了一个躺满“铁军”英雄尸体的战场。在中国军队之间展开的第一次大战中，他们同张作霖的精锐部队交火，用高昂的士气战胜了他的炮兵。他们的勇猛为冯玉祥的西北军杀出一条路，从而使两支“人民军队”会师，现在这两支“人民军队”将挥师直奔上海。这就是他们所讲的北伐的情况。

冯玉祥过去以倒戈出名。如果汉口政府希望冯玉祥帮助他们占领上海，那么他就会要求他们帮助夺取北京。在这次军事会议

上,冯唐二人究竟谁占上风呢?自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湖南的唐将军成了当时汉口军队的首领。再不然,汉口的文官革命政府是否会战胜这两位将军们,使他们听从政府的号令?它能表明自己真正是“人民政权”吗?

汪精卫和汉口的领袖们在对付将军们方面手中握有一张王牌——组织起来的工农力量。农民和工人把权力交给他们,使军队胜利北伐。如果依靠工农力量,他们本来是可以占上风的。但是,他们来到郑州后,却就农民的“不轨行为”向将军们表示歉意。冯玉祥认为他们无论作为敌人还是朋友,对他都是无关紧要的。于是,他客客气气地表示愿意合作,但是一星期之后,他一反前言,同蒋介石会谈时,同样客客气气地保证忠于蒋。国民革命的力量立即分裂为三个地区。千千万万工人和农民流血牺牲,把国民党的旗帜插遍半个中国,到头来却使三个新军阀坐地分赃。

然而,在虚伪的圆满成功声中,我们的火车向汉口疾驰而去。不论是美国进步人士、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还是麦克唐纳,都不如中国的政治家善于挽回面子。我对优柔寡断的气氛感到迷惑不解。但我高兴的是,大家都联合起来了,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们也欺骗自己,故意作作样子,高兴地聊天,可是他们在思想上正在设法适应新的任务:不要再玩弄表达工农希望的美丽词藻了,而要提出维护“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这样才能安抚正在崛起的湖南军阀。在这一点上,所有的将军们都是一致的。于是,革命的文官政权道歉了!

当列车在一片爆竹和欢呼声中徐徐驶入汉口火车站时,他们还在欺骗工人。在车站,迎接他们的有劳工组织代表、革命妇女代表、学生代表以及反帝同盟的缠头巾的印度代表。他们都来迎接他们派去创立新中国的使者。武汉的进步官员昂首挺胸走过欢呼

的人群时，居然象英雄一样。他们把与冯玉祥达成的妥协说成是一大胜利。……几天以后，汉口工人举行了总罢工，抗议“郑州会议上的背叛”。

然而，革命并没有完。将军们分成三派，互相厮杀，争夺地盘。武汉的进步力量向将军们的意愿屈服了。但是在这些将军管辖的地区内，组织起来的农民正在为“人民政权”而展开斗争。我南下来到湖南访问。唐将军禁止武汉政府的文职官员进入他的管辖区。他正在镇压所有的农民组织。然而，在每个村庄里，农民们用长矛和少数左轮手枪迎战，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要他们放弃梦寐以求的人民政权、人民的粮食、人民的法庭和人民的学校而向将军们投降，并非易事！当他们被装备精良的部队打败后，他们就撤到山区，隐蔽起来，保存实力，重整旗鼓，准备东山再起。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今天，在中国抗击外国统治的坚强力量，不是轮流给美国和日本当走狗的南京政府，而是从有组织的农民中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中国苏维埃。蒋介石发动了六次围剿也无法消灭他们。

许多省份的农民组织早就要求给他们武器了。他们曾对他们的汉口“人民政权”说：“让我们武装起来打土匪，保证政府决议的贯彻，对付这些自称同我们是一家人的半封建军人。我们的力量就是你们的力量，让我们武装起来保卫政府吧！”他们纷纷加入了“铁军”，因为铁军的指挥官享有最革命的声誉。这样一来，武汉各军之间的磨擦增加了。胆小怕事的政治家动摇不定，一会向他们提供一些左轮手枪，一会儿又要求他们归还枪支。

湖南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但表面上，它仍然是所谓革命的武汉政府的一个“省”。我从湖南返回武汉时，发现鲍罗廷和所有的俄国人都正准备回莫斯科。出了什么事？国民党领导人在车站为

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他们恋恋不舍地站在他旁边，似乎不愿意让他走。有些人的脸上的确露出了遗憾的表情。他们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是为了顾全中国人和政治家的面子呢，还是他们觉得自己的权力正在失去，而又没有勇气抓住不放呢？宋子文对我说过：“汉口了不起，”然而他又不能去汉口。他们象宋子文一样，也都知道伟大群众运动的力量和光荣。这种群众运动使他们成为领导人，后来他们对革命发生动摇，从这个将军转而投靠另一个将军。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来到长江下游，投靠了上海富豪支持的更大的军阀蒋介石。

我得到鲍罗廷的许可，同俄国人一起坐汽车经过中国西北诸省，到了蒙古，转乘横贯西伯利亚的火车。当鲍罗廷会见冯玉祥时，冯问他：“武汉政府与蒋介石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

“没有，”鲍罗廷说：“没有。他们曾经有过不同之处，但现在没有了。”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在交战？”冯玉祥问道。

“为了赵王爷，”鲍罗廷没精打采地说。“就是为了赵王爷，”他指掠夺上海的财富。

几年之后，我从中国人的回忆录中才了解到汉口当时的详细情况。共产国际代表罗伊对汪精卫说，共产党人奉命武装工农，以保卫“人民政权”。有些人认为罗伊是以印度民族主义者的身份讲的，他向这个亚洲人说莫斯科的坏话；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去找一个不太热心的盟友，使之支持武装工农。难道汪精卫不是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者吗？难道他不是曾经为工人们敢于与压迫者作斗争叫好吗？共产党盟友提出的这个尖锐的要求是否会使得整个国民党左派强硬起来，使他们接受（即使是很勉强地）工农武装呢？工农的忠诚曾使他们获得统治权力，而现在工农正遭到军队的屠

杀。

汪精卫和中国的进步分子曾经热烈地欢呼革命，曾高喊“杀死绅士”和发表过比共产党还激进的演说；现在，当他们动摇的灵魂面临这一难办的抉择时，他们突然觉得：武装自己的追随者，比在军人面前蒙受屈辱和失败更可怕！最好是同华中地区的封建军阀讲和，或者同蒋介石和上海的金融家讲和，甚至同外国帝国主义者讲和。难道汪精卫夫人不是在印尼的苏门答腊办橡胶厂赚钱吗？外国列强是讲人情的。如果难以同南京和解，毕竟还可以到巴黎去住嘛，反正不能同那些被叫作“同志”的、粗鲁的、武装起来的群众相处。对汪精卫来说，那是最可怕的事！

皓月当空，在陕西的一个果园营地，鲍罗廷坐在折叠椅子上向一位逃脱冯玉祥镇压的陕西省副主席讲解了中国革命力量的问题。这是我听到他讲的最全面的阐述。他在汉口时，病得很重，无法讨论这些问题，而且也没有时间。

他说：“在中国有三种力量：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小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大资产阶级、地主和他们的国民党将永远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并不真正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同他们勾结，并通过他们谋取私利。汪精卫代表的小资产阶级也不能统一中国，因为他们动摇于广大群众和大资产阶级之间，在大资本家的压力下，最终是要投靠大资产阶级的。只有工人和农民才能统一中国。

“当国民党人依靠群众夺回了长江一带的外国租界时，他们是‘胜者’。当中国资产阶级镇压广大群众时，帝国主义的剥削也会变本加厉。但是，不要灰心，中国革命并没有完蛋。”

月光撒满了果园，陕西的这位同志面向南方，似乎在眺望红色的汉口。那里的中国进步分子正一个个来到长江下游，同蒋介石讲和，或者逃亡国外。在远离长江的广东，共产党领导的“铁军”开

始向汕头进军。在江西和湖南的山区，农民正在重整旗鼓。华南的工人也在重新组织新的斗争——广州公社。

但是，我这个美国进步人士，逃脱了西雅图的冲突，然而仍然拿资本家的钱，并希望得到苏联工人的信任，我还能相信自己吗？难道我不是曾经用比汪精卫更华丽的词藻赞扬过革命吗？

第二十二章 准备新战斗

出了中国中世纪式的、有抵御历代外侮的喧嚣城镇；跨越土匪横行的陕西山脉，那里光屁股的小孩在讨饭；穿过荒无人烟的蒙古，这一片蓝绿色的山艾丛、黄色的沙子、红色的悬崖和广袤的黑色砾石平原；我们终于从无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来到了开始人类所生活的地方。蒙古游牧牧民把荒野开拓为草原。衣衫破烂或穿着肮脏僧衣的懒惰的和尚掠夺着牧民；神圣的库伦已经改名乌兰巴托，意即“红色巨人的城市”，因为“红色”战士是反对信神的。我们看到了收音机、电报和飞机，这是这个中世纪地带北部边疆文明的第一个迹象。走过三十英里之后，看到的农场愈来愈多了；在那里终于有了牛奶、黄油和鸡蛋。我们越过边界进入了苏联，令人震惊地发现有了盛汤的盘子、叉子和报纸。

在乌京斯克有两家旅馆、一家银行和几家百货商店。“请会见我们女党委书记，她是布里雅特族与蒙古族的混血儿，”他们没有料到我们马上要到伊尔库茨克去。在拥

挤的火车站上，有二十家报纸在出售，其中包括四家德文报纸和法国的《人道报》。车站对面的大街上，一家小而整洁的食品商店门上写着：“伊尔库茨克联合工人合作社第八十五号”。自从去年四月我离开美国的联号杂货店以来，我还从未看到过这样干净的货架，货架上放着那么多整洁的小型罐头。在我离开苏联九个月的期间里，合作社迅速得到巩固和加强。

每到一站都有西伯利亚人进入我的车厢。“猎人协会”的一个代表说，北部猎人们把皮货卖给国家毛皮托拉斯。伐木工人一直在大森林里采伐铺设西伯利亚—土耳其斯坦新铁路的木材。运输工人工会的组织者协助一个会议临时解雇四百多工人，以保证那些最需要工作的就业人。火车里既不奢侈，也不寒酸。车上坐满了修筑铁路和建设工厂的工人，他们谈论着黄油和毛皮。它如同当年美国人开发西部地区的火车，但是所不同的是，这里没有人吹嘘自己将如何发财。他们所大声谈论的是国家如何发展。“这些小火车站的十字路口，五年之后将变成一个大城镇！这就是西伯利亚！”

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火车站，二十个妇女代表上了火车，她们是要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妇女代表大会，政府要听取她们的意见和建议。她们中有的人从未坐过火车，只有一个人离开过西伯利亚。她们全是村主席，是从数百名村主席当中选拔出来的，因为她们干劲大，比别的主席更有名。其中的一个妇女说：“她们选我，是因为我知道如何强烈地反映我们村里一些腐败的事情。”

她们还谈到每年夏天，渔民们沿着大河走数千英里到卡拉海捕鱼。她们谈论着要建立更多的学校、医院和合作社。当讲到她们是如何战胜落后的农民而在政府里取得地位时，她们笑了起来。“他们讥笑第一批进入苏维埃的妇女，但是现在该我们笑他们了。十月革命后，我们妇女进入了一个新世界。”……我不禁想起了缠

着小脚的陕西妇女和死在军人手里的华南姑娘。在她们和这些掌管国家大权的充满信心的妇女之间，不仅隔着半个大陆，而且隔着整个时代。然而，她们之间的差别仅仅是十年革命而已。

她们的小组领导人安纽西亚·乌斯季诺夫娜扎着红色头巾，虽然已经中年，却充满活力。她是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相当于美国的参议员。“你肯定是共产党员吧，”我问道。

“不是，”她回答道，丝毫没有感到不好意思。“我是代表广大非党群众的。列宁说必须吸收这些人参加管理工作。”……几年之前，看起来只是一些分散的共产党员在进行非常艰苦的斗争。重建他们的国家，使其摆脱贫穷无知的极端混乱状态。这一大群曾经是最无知最愚昧的人现在也正在起来斗争。

我对莫斯科的一个共产党员谈了我的印象。他说：“是的，我们在中央工作的人，几乎难以想象，革命激发起来的群众力量有多么大，他们能够克服多么大的困难，他们是多么勇敢。现在他们终于自由了。”我同意他说的前半部分，但是，他最后一句话没有打动我。“自由？”为什么再提那令人动感情的幻想？什么地方有自由这种事呢？在昔日自由的西部未被资本家瓜分之前，在美国还有一点自由。老板们之间可能有一半自由选择的余地。但是为什么要空谈自由呢，特别是在众所周知的专政制度下？难道我们大家不是象汹涌澎湃的大海中的泡沫一样随着风浪而飘泊不定吗？尽管有崇高的感情和情操，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是跟着那不可逆转的茫茫客观法则行事吗？

然而，我看到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强大，组织得越来越好，到处是勇于创造的充满信心的伟大人民群众。他们正准备——他们和我都还不知道为什么——进行新的斗争。在群众活力的养育下，在共产党内正在孕育着即将诞生的五年计划。

我在莫斯科仍然没有房子。我好不容易才在旅馆找到一间一天租金四美元的房子。我难以这样维持下去，我必须准备搬走。这时，国家出版局得知我有关于中国的材料；他们向我预订了两本书，并且事先付了稿酬。苏联报纸也用高价预约我的文章。我不再为旅馆房间的费用发愁了。苏联愈来愈富裕了，它的群众把他们的首批盈余用在阅读上了。我可以提供他们需要的读物。我不再需要纽约了。

然而，我一写完我的书^①就回纽约去了。我途经柏林时，还安排了出德文版事宜。我再次在美国各地演讲，然后返回莫斯科。现在我要在苏联旅行了。在中国、墨西哥或德国，革命没有什么希望。有希望的革命发生在这个占世界面积六分之一的辽阔地方，在这里，讲着一百多种不同语言和属于一百多种民族的农民和工人正在推翻中世纪。

我先到伏尔加，看看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们怎么样了。三个人在艺术学校学习，原先的十个开拖拉机的孩子正在上机器制造课；其他人在沃尔斯克不断扩大的水泥厂里工作。一个叫苏比娜的姑娘举行了“红色婚礼”，他们两口子站在教员和学生的面前，保证两人要毕生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但是，我们勇敢的莫罗索夫得了肺结核，住在伏尔加一个小城镇上。他有妻子和一个小孩儿，他们在挨饿，他在一个小合作社商店里的工资是不够用的。我们的二十位姑娘仍然忧郁地赖在萨拉托夫儿童之家；她们早已超过年龄，但萨拉托夫没有她们做的工作，而教育当局又不愿直截了当地把她们赶走。

伏尔加恢复得不够快。它治愈了战争、外来干涉和饥荒造成

^① 在美国出版的两本书，其中一本名为“千千万万中国人”。——原注

的创伤，达到了战前的生活水平。但是沙皇时代的水平能满足苏联青年的需要吗？到处是不满情绪，怨声载道。数以万计的失业者在质问：这就是革命吗？我们是否是无产阶级国土上的新的专政者？请给我们专政者创造财富的权利吧！”在伏尔加感到有一种产前的隐隐阵痛。

从伏尔加，我骑马跨越高加索山岭。苏联旅游组织，如同其他事业一样，在新生活的压力下正在扩大。千千万万工人、学生和机关工作人员也在全国旅游。新的无产阶级旅游组织领导人沃尔斯坦计划到达吉斯坦各地寻找一条新的旅游路线。他邀我同行。因此，我看到了切奇尼亚的落后山村，那里的妇女在石臼里碾谷子，把我给她们看的一个别针当成宝贝，喋喋不休地谈论它的精巧。那里仍然实行抢婚制，城市长大的苏联年轻姑娘，壮着胆子在切奇尼亚附近走动，但时时担惊受怕。这是可以想象的，因为“抢婚”可以省去婚娶费用。

我们在达吉斯坦继续旅行。达吉斯坦保留了古老的阿拉伯文化，这里说着十几种不同的语言。山区人自豪地指给我们看城堡似的村庄。他们说，在这里，“我们的沙梅尔曾誓死抵抗俄罗斯征服者。”来这里参观的俄罗斯工人视牺牲的沙梅尔为他们自己的英雄之一。这位皮肤黝黑的高加索山区人不是也曾同他一样，跟他们的敌人——老俄罗斯帝国主义战斗过吗？这是苏联各民族新的同志关系的基础，他们推翻了共同的压迫者。

山村里的部落斗争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征服者，即十字军东侵时代。每逢村子有节日，穆斯林山民便向深谷对面几个世纪以前“堕落”的犹太山民投掷石头和诅咒对方。年轻党员学生从新的学院回家，帮助山区修建道路、罐头食品厂和小型工业。他们就是否参加这些“体现了最低级的迷信，甚至宗教仇恨”的部落节日活动

进行激烈辩论。青年们会起来反对许多世纪形成的民间风俗吗？不管怎么说，道路、罐头食品厂和学校在增加和发展，发展经费来自大片山区果园的收入。

在第比利斯，为找旅馆我花了七个小时，最后才在一个旅馆房间里得到了一张帆布床，在一小时内就接连推掉了四十名申请的人。“在苏联，每个人都在旅行，他们都来第比利斯，”心烦意乱的旅馆工作人员咒骂道。我看到了一些新建的宽敞的工人俱乐部和公园，快乐的年轻人在公园里散步到深夜才走。我碰见了一个外国工人代表团，团员有美国人，也有其他国家的人。许多苏联人邀请他们在第比利斯俱乐部里发表讲话。但是旅馆职员提醒我，我的帆布床只能用一个晚上，因此我离开第比利斯，到亚美尼亚去。

亚美尼亚的农村同样脏，同样受到了国内战争和外来干涉的破坏。但是，它们的新生活已在稳定提高和充满青春活力。埃里温开办了一个电厂和十二家工厂，列宁纳坎开办的小型工厂超过十二家，许多民族的人都参加工作了。在这里，犹太人、土耳其人和俄罗斯人在亚美尼亚人领导下工作，而在第比利斯，土耳其人、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格鲁吉亚人的领导下工作。各民族之间进行过几个世纪的宗教战争，以最近六年的种族屠杀达到了高潮。然而现在，它们则没有人们所预料的那种磨擦了。在自由发展文化和扩大经济的政策感召下，高加索人的世代仇恨逐渐消失，而在欧洲，旧的仇恨却在复活，正在酝酿着一场新的战争。苏联也有新战争要打：向落后和官僚主义开战，进行一场组织和建设的战争！

掉转方向沿格鲁吉亚军事公路正朝莫斯科方向走时，我突然产生了要爬山峰的强烈愿望。旅行开始阶段，每天晚上我都精疲

力竭；我是第一次骑马旅行。一个月的旅行使我变得坚强了。由于新的健康状况，我在考虑攀登卡兹别克山了。“我一定要爬上去，”我大嚷道。但是，我没有爬山的衣服，我甚至连灯笼裤也没有。

我找了一位向导，借了他一条破旧的裤子，当我穿上时，我发现上边有不少大裂口。我既没有遮挡强烈阳光的墨镜，也没有擦皮肤的油。向导只给我一块黑色面纱。至于脚上穿的，他用打结的网状皮带在我脚上绑了一些稻草。结子防止我从冰上滑下来，稻草是垫料，网状能使冰水和干风自由地穿过我的两只“鞋”。一旦稻草薄了，锋利的冰刺我脚时，他便给我续一些稻草和山上的植物。遇到最陡的滑坡，他使用更结实的皮带把铁齿板绑在我的脚上，铁齿穿过稻草紧紧扣住我的脚踝。向导带着一件沉重的羊皮袄，专供我晚上御寒。

这样装备好以后，我和向导便一起开始攀登海拔一万六千英尺高的鞍状卡兹别克山了。爬山过程中，我们与暴风雪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搏斗。当铁齿板都不能抵挡狂风时，我们最后只好返回来了。我们在海拔一万三千英尺的高处度过了一个夜晚，我们躲在大岩石后面，一半身子在雪里。尽管整个夜晚我因寒冷、疲劳和高山气候全身发颤，但我还是异常激动和兴奋。谁说伤寒和肺炎使我元气大丧，再也不能象青年时候那样征服山峰呢？没有任何好的美国装备，只带着一个落后的村庄修修补补的东西，我爬的高度比美国最高的山还高一千五百英尺。比旧雪尼尔也高一千五百英尺！疾病并没有搞垮我；从卡兹别克山峰，我几乎和老练的向导一样，轻松地走过大冰川。如同我周围的伟大土地一样，我恢复了我的力量。我也在准备新的战斗！

*

*

*

两个月之后，我来到苏联的中亚细亚地区。因没收土地而复杂化了的地方选举正在这里进行。正在塔什干召开的妇女党员大会宣布：“我们在落后农村的党员被污辱、被折磨、被杀害。今年我们一定要制止对妇女的这种残害，这一年必定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

在新首府撒马尔罕，各种代表大会泛滥成灾。我在一个旅馆走廊里坐了一个晚上，接着又成为乌兹别克斯坦主席阿库恩·巴巴耶夫家里的座上客。午夜以后来到撒马尔罕的所有乌兹别克的农民看来都要走到他那六间房屋的官邸，在他的地毯上过夜。为了优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在他的说俄语的秘书的办公室里给我找了一张长沙发。

十一月的撒马尔罕，天朗气清，阳光明媚，它既有古色古香之美，又正在追求现代化。我走进一家大饭店，抬头便看见一张措词尖锐的招贴画，上面的人伸出谴责的手指，说，“你们，你们现在还没有参加合作社！”在农民合作社代表大会上，一个农场工人气势汹汹地说：“在我们村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富裕农民得到新的机器，而我们穷人却得不到！”他说话时的激烈样子活象下战马的成吉思汗。

阶级斗争还没有过去，不象我刚来苏联时那样天真地以为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了。它同中国农村地区的斗争一样激烈，问题也大致相同。相当多的地主脑子里满是旧宗教思想和新鬼点子，他们靠放高利贷收租和剥削劳动者来发财致富。雇工和贫苦农民组织起来与地主作斗争，反对多年的压迫。匪徒与地主狼狈为奸，鱼肉农民。蒙面纱的妇女展开斗争，争取自由，反对宗教、地主和压迫她们的丈夫。而她们的丈夫也受别人压迫。斗争复杂而困难，愚昧无知的程度比中国还要严重。

苏联中亚细亚的农民和雇工只有一件事有利：国家政权掌握在他们手里。而武汉的进步力量则夺走了中国农民手里的国家政权。然而，仅仅掌握国家政权，斗争并未结束。剥削者对远离铁路线的农村地区的控制十分严密。年轻的共产党员深入落后的农村，发动和教育农民，给他们讲解他们应当享受的权利。这些党员中数以千计的人被杀害，成为烈士。

塔什干学校的一位女学生自愿利用其假期做发动群众工作。结果她被杀害，她那被砍成碎块的身体用马车运回学校。一名妇女拒绝了当地地主的殷勤，与一个雇工党员结了婚。在地主的煽动下，十八名匪徒在她怀孕八个月时强奸了她，并且把她扔进河里。在州政府得知之前，在一个地方就发生九起杀害妇女的事件。

这些暴行激发受压迫的农民和妇女采取更大行动。他们要打出一条活路来。他们把烈士尊为英雄。新战士奋起战斗。当争取妇女自由的战士米尔菲娅·汗彼毛拉(伊斯兰教的阿訇)被活活烧死时，她村子里的妇女们为她写了悼词。

啊，女士，世界将永远铭记你为自由而战！

他们别想用火焰烧死你！

烧死你的火焰成为我们手中的火炬！

革命已十一年了，怎么会继续发生这种暴行？为什么政府不镇压他们？然而政府又是什么呢？到目前为止，是有胆量组织和行使政权的当地雇工和农民组成政府的。贫苦农民和雇工分地主土地的法律在苏联已有十一年历史。但这种土地法在中亚细亚还未实行。当地农民希望得到他们的权利吗？

在选举中，土地委员会就此问题听取了群众的意见，并且向全体农民宣传了国家的土地法。名字和财产列入花名册的地主一个又一个地放弃了他们拥有的财产。名单准确吗？肯定不准确。有史以来从未丈量过土地；中央政府从未敢于彻底调查这些所有权问题。由于村规，由于害怕报复，人们总是仇视外来者，保护“他们自己人”。亚洲每一个村庄都如此。

但是，现在农民把谁看作是“他们自己人”呢？当地阶级斗争有多么激烈？穷人和富人都坐在一个大厅里，他们了解当地财产的真象。一个无地的人敢站起来，当面谴责借给他钱的地主吗？“你撒谎！你的土地多得很！我知道，因为我在地里干活。我已交了你地租。”如果他敢，他可以从国家手里得到土地，国家法律有此规定。他也可能被地主从背后捅一刀。这些农村的绅士不象俄罗斯贵族那样，让外国部队进行干涉。他们是自己出面搞暗杀的。政府都无法保护雇工，除非他们组织政府，自己保护自己。

我曾经在其秘书的沙发上睡过一夜的那位阿库恩·巴巴耶夫是雇工出身，他的勇敢、直率和智慧使他担任了主席职务。他经常巡视农村，孩子们热烈地称呼他为“阿库恩爷爷”，老人看到象他们一样的人成了领导者而高兴得流泪。当我问他土地改革进行得怎样时，他满意地点点头。

“进行得很顺利，”他说道。“我很高兴地看到雇工们组织得那么好，他们在揭露政府名单上没有名字的地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对于阿库恩·巴巴耶夫来说，在整个没收土地工作中，雇工参加政府是最重要的事；它是新政府的标志。

我参加了棉花日庆祝活动，阿库恩·巴巴耶夫让我看到了新的道德规范。一位妇女哀求他赦免她那被捕的儿子。他后来对我说：“我一定去看看他。如果他没有压迫过穷人或贪污过，他毫无

疑问要被赦免。”对于我来说，这件事突然展示了犯罪新标准。偷盗或谋杀不是主要罪行了。这些可能是出于贫困或义愤。犯这种罪的人仍然能变成有用的公民。然而，如果谁剥削穷人或在政府贪污腐化，那么他就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坏人了。新社会不能用他了……阿库恩·巴巴耶夫是一个亚洲的雇工，他比我更了解新社会的道德规范，尽管我获得过哲学博士的学位！

但并不是所有的亚洲雇工都了解这一点。他们一旦掌握了新政权，有的变得专断和贪污起来，在当地做出了一些惊人过火的事情。夏·穆拉托夫原是雇工，因干劲大，当了全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开始杀自己的仇人了。他自豪地告诉当地农民：“作为中央执委会成员，我有权随意杀十个人。只能杀十个人，不能多杀。”检察官处理了他，把他送去改造八年，以治疗他的自大狂。另一个山村的共产党官员不反对女儿搞买卖婚姻——这种不法婚姻仍然很普遍——，而且利用其领导人的地位牟取暴利，过分地抬高女儿的身价！他的过分贪婪引起了上级领导的注意，停止了他的党内职务。

为了缩小中亚细亚农村现状和新社会标准之间的巨大差距，国家政权采取了许多措施。广播节目不但传播了新法律的知识，并且把“时间”带给了遥远的村庄，那里从未见到过钟表。对罪犯进行公开审判以教育群众，使他们树立前所未有的信念：丈夫无权杀害不带面纱的妻子。全国各地的学校正忙于对优秀青年进行教育。他们是曾参加红军打过仗的男青年和曾冒着生命危险为妇女权利而斗争过的女青年。对于他们来说，新的工人政权具有伟大而辉煌的意义，尽管他们在理论上了解得很少。离开遥远农村的危险的斗争第一线，他们来上学，把注意力放到了书本、铅笔和纸张上，尽力理解他们准备为之献身的事业。过去坐在闺房里一动

不动的姑娘们学会了奇妙的体育运动；过去从未听到过任何自然科学原理，甚至不知道科学概念的青年人在攻读达尔文和马克思的教科书以便了解其含义。

苏联通过工业化来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政策，使雇工和农民在建立新生活的斗争中获得了有力的武器。资本家从来不愿意使一个从属的民族工业化。帝国主义国家榨取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原材料来加强其本国的工业。爱尔兰和印度在实现自己的工业化时曾遭到英国的反对。美国资本家在墨西哥拥有油井，但却不在那里发展工业。然而，苏联的原则是“使落后地区赶上中央地区”，从而使它那广大国土的每一个地区都有无产阶级在执政，都有大工业创造的财富。

我在老波卡拉参观了一座新的丝绸厂。厂长属于我过去熟悉的那种类型，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为了创建新工业而废寝忘食。他告诉我，丝绸厂根本不赚钱，但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了。“我们正培训农村妇女，使她们成为将来土耳其斯坦丝绸厂的新职工，”他说道。“我们厂是自觉应用的力量，它首先在波卡拉打破妇女蒙面纱的习惯，我们要求妇女在工厂里不蒙面纱。”

按人口比例来说，在撒马尔罕施工的建筑物远远超过在莫斯科施工的建筑物。新的轧棉厂和大纺织厂正在老费尔干纳山谷拔地而起，在中亚细亚各地正在建起新灌溉工程和新的大型棉花农场。年轻女纺织工人共同写诗，赞扬她们生活的新意义。

在我去工厂的路上，
我发现有一块新的手帕，
一块红手帕，
一块丝手帕，

这是我自己的劳动所获！
工厂的隆隆声在我心里回荡，
它给我节奏，
它给我力量！……

*

*

*

世界上其他国家刚听到苏联的五年计划时，认为莫斯科的规划不切实际，订得过高。我们这些在苏联偏远地区旅行过的人却看到，此规划在农村、工厂、城市和各州正在具体实施。我们看到，它是出自雇工要转变成工业工人的需要，出自失业青年创业的需要，出自当家作主的工人热切地要亲手把广大未考察、未开发的草原和山脉资源变成财富的需要。我们看到，它随着农村地区粮食的增长而得以加强，随着富农与雇工间争夺粮食的斗争而变得更迫切了。我们看到，这个国家越来越强大，它在恢复农业和工厂的几年喘息时间中得以休养生息，然而，亿万人民对新生活的渴望仍然很强烈。随后，我们看到，他们的激情被共产党的智囊人物变成了法律计划，使苏联工业化不再受资本主义大国的摆布。

我在苏联中亚细亚第一次听到五年计划，这并不是偶然的。塔什干报纸七栏大标题写着：“五年以后中亚细亚将变得不可复识。”标题下是一张地图，标有新建筑物、新铁路和新工厂及其动工和竣工的日期。这是中亚细亚各个组织的联合建设项目。莫斯科还要对这些项目加以审批，并使其与苏联全国各地的类似计划相协调。

连续几年，我先后四次访问苏联中亚细亚。在撒马尔罕旅行的第二年，我登上了帕米尔高原的“世界屋脊”，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居住着吉尔吉斯部族。我访问过刚建起第一年的夏季临时管理机构高原“流动政府”。在一个毛毡帐篷里，一位当地法官盘腿坐

在破旧的地毯上，躺在他旁边的法院书记员正在翻阅记录。他们是在执行法律，反对剥削雇工，反对把妇女出卖给遥远的游牧民族。

越过铁路线，我骑着骆驼沿着小道旅行了几天。途中，我停下来与一位乌兹别克老修路工聊天，他只知道三个俄文词：“五年计划”，“公路”和“汽车”。他对“汽车”的发音很怪，我靠他生动的手势才能看懂。他用这三个词和许多自豪的动作告诉我，骆驼小道将变成汽车路，一直通到边陲伊尔克斯坦，而骑马需十天时间。五年计划能做到这一点！

又过了一年，我于一九三〇年五月一日出席了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典礼。我是在三年之前从采购木材的人口里听说建这条铁路的消息的。曾在美国进行过上百人次争取言论自由斗争、并在俄国参加内战多年的我的老朋友比尔·沙托夫是这条铁路的指挥者和建设者。他铺设的一千英里长的铁路线，穿过亚洲南北地区的平原和沙漠，使西伯利亚的小麦与土耳其斯坦的棉花互相沟通，从而促进了这两个地区的发展。

“五年计划巨大项目中的第一大工程完工”——横幅标语和报纸用这样的词句庆祝这条新铁路建成通车。从列宁格勒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从北冰洋到高加索和帕米尔亚热带山谷，整个大地上都呈现出繁忙的建设景象。前一个冬天大规模集体化运动的巨大变化震撼了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现在处在混乱状态，冲突贯穿在“布尔什维克第一个播种季节”。我一天又一天地奔驰在这个国家的广阔土地上，越过城市和农场，我们又来到到处是骆驼、绵羊和油毡帐篷的茫茫草原和荒无人烟的沙漠。

我们的火车没有时刻表。时刻表尚待搞出，因为我们坐的是刚开出的第一趟火车。在新铺设的铁轨上，我们的火车象醉汉似

地东摇西晃，这列庆祝通车典礼的火车漆成了绿色。这是奥列阿塔的铁路修理厂赠给这一庆祝活动的礼物，它是由工人们自愿在业余时间不要报酬修理好的。火车上到处闪耀着横幅标语和题辞。一颗银光闪闪的钢星取代了火车的前灯，钢星上方书写着内战时期的战斗口号：“还我西伯利亚”。从自愿修理工中挑选的火车驾驶员荣幸地在他们的火车上度过了日日夜夜。这是他们的新战斗，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通车是他们的胜利！

“我一生中给资本主义的最大打击莫过于这条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了，”沙托夫对我说。这不是他当年勇敢地进行的争取言论自由的斗争，也不是内战，更不是组织金属进口和石油出口。这条铁路把小麦和棉花沟通起来了，促进了中亚细亚的农业和大草原游牧部落的工业化，使苏联的贸易可以越过其边界进入亚洲的落后民族，并用一条薄薄的钢铁防线加强了苏联遥远的东南边界防务。

坐在我们这列火车上的工人们了解这一点。他们是五十个工厂的代表，因他们的出色工作特邀请他们乘坐这列火车旅行，以表示对他们的奖励。车上的外国记者也了解这一点。其中三十人来自美国、德国、英国和意大利。他们知道这条铁路改变了亚洲的历史，把几个世纪以来分别流淌的两段生活之流联在一起了：一条生活之流沿着北部的森林之河流淌，一条商队生活之流穿越南部草原。他们知道，这巩固了苏联在亚洲心脏的政权。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要用电报发回消息去，然而，他们大发脾气，因为在一千英里之内竟找不到认识拉丁字母的报务员！

沿铁路线，新的城镇已经兴起，这是开路先锋的男人和大无畏的妇女的简陋居住区。年轻开拓者擎着横幅标语欢迎这列火车。他们在修建这条铁路的速度方面创造了新的纪录，比开始预计的时

间提前一年半，比沙托夫修改了的估计快半年。沙托夫在车站集会上发表讲话，扼要地回顾他们英勇斗争的情况；在沙漠里，他们缺粮缺水，夏天是迷眼的大风沙，冬天又是暴风雪，尽管“中央”的官僚主义者未能送来暖和的衣服，他们仍然坚持工作。他注意到母亲怀里抱着的婴儿，这些婴儿“比这座城镇的年龄还大”。他讲到他们正用劳动创造一个新世界，对所有国家的工人们来说，这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位憔悴的妇女嘴角上挂着微笑，眼里含着泪水，我听见她喃喃自语地说：“我们的上司是了不起的人物！”两年的沙漠生活消耗了她的全部青春，但却使她变得无比坚强！

在艾纳布拉克炽烈的阳光下，俄罗斯，哈萨克人仍在庆祝他们的节日。游牧的哈萨克人随处安营扎寨，旅行数百英里，以观看这匹大“黑马”的到来。当火车接近南北线交接的新枢纽站时，他们开始与火车赛跑。年轻人在铁路上欢蹦乱跳，唱起称赞“这匹黑骏马比一百匹马还快”的新歌曲，这定能使他们战胜部落酋长。

一万人旅行到了这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亲自看到了南北铺轨工人把最后一条钢轨铺设好。打最后一根道钉的有：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副主席里斯库洛夫，哈萨克共和国主席伊赛耶夫，沙托夫，日本共产党领导人片山潜和共产国际特地派来的代表。

片山潜？为什么有片山潜呢？他打这根道钉的意义是清楚的。这条铁路不仅仅把小麦和棉花连接了起来，它也不仅是年轻牧人反对部落压迫者的武器，这条铁路同时是进入亚洲的世界革命！

沿线的工人，因感觉到了他们这一成就的重大意义，他们急切地向我们这列火车打听：是谁来参加通车典礼的。不是斯大林吗？不是加里宁？都不是吗？于是，他们只好满足于较低一级的领导人，满足于他们自己举行这一大型庆祝活动了。他们知道，往返莫

斯科仍然需要两周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还有未完成的同等重要的大项目呢。在西部，位于第聂伯河上的世界最大的发电厂大坝正加速建设。在遥远的北部地区，库兹涅茨克这座新钢城即将诞生。在斯大林格勒，世界上最大的拖拉机厂差不多就要开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世界最大的重型机器制造厂正在建造中。

“巨大项目中的第一大工程完工”——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赢得了这样的荣誉。然而，它只不过是振奋人心的五年计划中数十个大型项目之一而已！

第二十三章 布尔什维克的 第一个春天

苏联仅在一年中获得了一次大丰收，便进入了世界强国的行列。一九二九年，人们普遍认为，苏联仍是一个落后无能的国家，正在进行一种空想试验。由于一九三〇年获得了大丰收，它一下子成为世界市场上令人畏惧的贸易大国。一场难以置信的动乱一下子变成了一支征服世界的惊人力量。

农业上的革命带来了这种难以置信的变化。从一九二九年秋至一九三〇年秋收，占地球六分之一的国度好象发生了一次地震似的。我曾经听到了伏尔加河两岸的农民的抱怨声；我曾经目睹被压迫的中亚细亚人民经过浴血奋斗建立起来的新政权。现在，我看到这些地方被淹没在更大的斗争中；农业集体化的风暴。

一九二九年秋，我再次来到伏尔加河畔。在开往萨拉托夫的火车上，还有几十个“粮食中心”的小伙子，他们被派到农村去预售拖拉机，一旦成交，他们就能得到农民预付的粮食。“所有的农民都参加了集体农庄，”他们对

我说。“所以他们都需要新机器。”

早在三年前，我对类似约翰·里德公社那样的少数分散的公社略有所闻，大多数公社已经陷入困境和消亡。一些最强大的公社生存下来，成为农民的灯塔。我还注意到一些分散的农村“劳动组合”——十几个或更多的农民把他们的土地、牛马和农具集中起来，组成更强大的农业生产力。这两种农业集体生产的形式都得到政府贷款的扶持。他们得到了第一批农业机械后，扩大了集体生产。尽管我看到了这些农业劳动形式，但是我对我今天在农村看到的这股风暴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

阿特卡斯克县集体农庄联合会主席——过去还没有过这样的组织——在我眼前挥动着一大堆电报说：“十一月二十日，我们县的农业集体化达到了百分之五十；十二月一日达到了百分之六十五。今天，十二月五日，电报还源源不断地飞来。到十二月十日，毫无疑问，它将达到百分之八十。”

巨大的热情和极大的不安震撼了这个国家。在巴兰达镇，一千匹马同时耕地。一位老农跑到一位新闻摄影记者面前说：“请给我和这群马照张像。现在我死也瞑目了！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到这一天。”有一天，一个村庄决定成立一个联合农庄；一周之后，它联合了五个村庄；第二个星期联合到十三个村庄。

一年以前，他们既疑虑又明智地讨论过办集体农庄的事，估计了可耕面积的收益和每公顷的粮食产量，还讨论了向国家贷款购买拖拉机的可能性。而现在，农村似乎都发疯了。人们说话的口气就象打仗的士兵一样：“如果有人挨饿，咱们大家都一起挨饿。如果某人有毡靴，让大家一起穿。让我们在沃尔斯克至阿斯特拉罕①

① 从沃尔斯克到阿斯特拉罕，轮船要航行三天，它是伏尔加河的整个下游地区。——原注

的整个伏尔加地区建设一个大农场吧。”

城市组织者参加了这些讨论会。不懂农业、但有组织能力的人也来参加了。头脑冷静的农业专家有时也会被这场风暴吹得不知所措，但还是努力提出建议，加以引导。一个农场应该有多大？一千匹马同时在一块田里耕地，恐怕太多了吧？后来莫斯科严厉谴责了那种“喜大症”。可是眼下，头脑发热的热情者称这些小心谨慎的人为老古板；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没有被指控为反革命分子。雇农和年轻的农民紧跟着这些青年热情者；妇女们都畏缩了，她们害怕落得家畜那样的命运。稳重的老农民既有家小，又有相当数量的农具，他们半信半疑。他们获得了丰收，本想通过艰苦的劳动超过他们的邻村农民，但是农业集体化的浪潮也把他们卷了进来。

比较富裕的农民——富农——长期向贫农出租土地，或出租奶酪机、脱粒机和其它机器，他们总是设法逃避革命的土地法，所以他们激烈地反对这场运动。他们甚至铤而走险，杀人放火。奥尔基纳村刚刚结束对富农的审判。那个村庄的十二个富农密谋杀害了本村的党支部书记。当证人讲到库德拉谢夫同志时，热泪盈眶……“他为我们组织新生活，工作有多辛苦！”也许，这是他们第一次真心赞扬他！附近村庄纷纷通过决议，要求处决凶手。为了表示对库德拉谢夫的敬意，成千上万的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农业集体化的浪潮越来越高涨了。

阿特卡斯克县有五个教堂，其中一个教堂最近被改为学校。现在又需要把教堂改为关押富农的监狱；原有的监狱已关不下所有被捕的人。……在一次农民会议上，一个白发苍苍的妇女站起来说：“过去，在我们的土地上曾有妖魔鬼怪。而现在，苏维埃政权已把他们全部打入地狱了。现在没有什么妖魔鬼怪了，甚至连上

帝都不存在了。所以我摘下了圣像，挂上了列宁像。”

在这次农业集体化的浪潮中，共产党员在指导、操纵和组建集体农庄。五年计划既要加速实现工业化，也要求开始制造农业机械。他们决心通过组织工作和机械化使地球上最落后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很快进入比美国更先进的农业现代化行列。他们的农业计划是废除所有制的旧界限，只有这样利用土地，才能最有效地发挥农业机械的作用。

农民本身也不复存在了。新兴的大农庄必然取代黑暗的、文盲的农村，它是建立在劳动分工与机械化的基础上。实现这种变化，不能采用资本主义国家的农业工业化办法：土地由聪明能干的人耕种，农业工人逐渐痛苦地转变为城市的失业者。苏联必须实行新兴农业企业的公有制，在产量增加的基础上，共同安排更富裕的生活，这样才能把城市的优越性带给农村，最终消灭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对立——历史上由来已久的“土地问题”。

现在，这个问题必须马上加以解决。苏联的中世纪耕种方法已经阻碍城市的发展。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已经吸收了千百万农业工人参加大型建设工程，而且人们对农产品的要求也提高了。富农们竭力想垄断本地的粮食供应市场。富农的耕种设备往往要比别人的先进。他们想赢利，但是他们从增产中获得的利润远远不如通过购买别人的粮食而获得的利益。往好处说，他们把土地分散地掌握在私人手中，使农业机械化不能很快实现；往坏处说，他们在猖狂地破坏农业，因为他们不是鼓励当地农民进行有效的生产，而是抬高粮价。

贫农和雇农组成的小集体农庄对政府非常忠诚，因为政府向他们提供了机械和贷款。中农自己拥有生产工具，但不剥削别人，他们多年来一直动摇不定。他们希望富裕起来，但不知道走哪条

路较好：是压榨贫农，积累财富，慢慢变成富农好呢，还是加入由政府提供贷款和农机的新生集体农庄为好？

现在，根据五年计划建设起来的新工厂为国家生产了更多的机器，中农最后看到了他们的出路。广大农民向往拖拉机，羡慕得到国家补助的雇农取得的成功，又对政府向富农征收的较高税金感到担忧，所以世代安于现状的农民如今突然象雪崩似地整村、整乡、整个县、整个区都加入了集体农庄。这就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冲突，引起的社会动荡不亚于一九一七的十月革命，而这是那场革命的必然结果。

这次农业集体化的地震不仅动摇了古老的亚洲村庄的经济基础，而且也动摇了古老的家长制。我在布明娜的陪同下访问了一个村庄。她原是一位农民的妻子，由于不堪忍受公婆的压迫而离开了她的丈夫。现在，她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组织者，在短短的几年里，她被提升到阿特卡斯克县第三把手。我们访问了一个落后的村庄，村里的一些年轻人组织起来的一个集体农庄，因遭到村里长辈们的反对而被解散了。布明娜在全村大会上宣讲了儿媳的权利。儿媳们同高效率的农业生产有什么关系呢？当我看到她们是怎样聚集在布明娜的周围时，我就明白了。家长制家庭的儿子们通过他们的妻子感受到“老头子们”的严格管制。新型的农业生产使她们获得了自由。布明娜凭此唤醒妇女，教她们如何组织起来。

在那些处于发展后期的村庄里，人们在谈到效率问题时说：“贫农的小劳动组合使我们免遭饥饿，但是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农具。如果全村的农具都集中在一起，我们便可以抛弃所有的木犁，让三匹马拉一把最好的犁耕地，这样就可以耕得更深更快。我们耕地不分地界，一直朝着地平线耕去；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富农和神父们企图利用两性关系和恐惧心理给农业集体化蒙上一层阴影。在每个村子里，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新建集体农庄的所有男男女女都被迫合盖一条大毯子睡觉。还谣传婴儿、马和犁都将“社会化”，这使妇女们忧心忡忡。我听到一个声音沙哑的年轻人嘲笑一群妇女：“难道婴儿是生产资料吗？谁要你们的孩子？”

一位妇女反驳说：“我不识字，我怎么能知道神父讲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呢？我的父亲是个有文化的人；他既不怕神父，也不怕魔鬼。所以我的孩子们也将如此。但是，我们是愚昧无知的文盲，怎能不信上帝和所有这些谣言呢？”另一位妇女说：“两个月前，我还分不清字母和数字。可是现在，我认识了字母和数字。我们还能学更多的东西。我们已经学会了小农庄生产，还可以学习大农庄生产。有人说，在其它地方，人们把几百头牛关在一个大牛棚里饲养，但是他们并不缺牛奶。”

少数集体农庄已经进入更高级的发展阶段。在巴兰达地区，过去曾拥有几百公顷土地的富农与一直为地主干活的贫农之间的阶级矛盾非常尖锐，群众大会纷纷要求“清除”那些已经加入集体农庄的富农。他们甚至还说，要把富农清除出村。“我们留着这些剥削者有什么用呢？他们到处散布谣言，还放火烧毁我们的粮仓和干草堆。”

在我离开农庄的时候，我问萨拉托夫的一位组织者：“关于这些事，莫斯科有什么指示？”他匆忙而又自豪地回答说：“我们不能等候莫斯科的指示。莫斯科是根据我们的所作所为来制定计划的。”但是，在我回到莫斯科后，外国记者都把它称为“来自莫斯科的命令”和“斯大林的反农民战争”。

莫斯科正在加紧制定计划，这与从伏尔加河下游、中游、高加

索和乌克兰等地源源传来的消息是有联系的。莫斯科正在调整其宏大的五年计划以适应农民的这些活动。该计划要求到一九三三年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可耕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和机械化。今年秋天的这场风暴使百分之六十的可耕地仅仅在一个冬天的时间里就实现了农业集体化。虽然报纸公布的第一批数字表明集体化的实际播种面积只有百分之三十，但是对此仍然没有准备充分的农业机械。

莫斯科把原棉进口缩减到最低限度，这使苏联人民注定要多穿几年旧衣服。莫斯科取消了从巴西进口廉价咖啡的合同，并视巴西为敌。莫斯科增加了农业机械和拖拉机的进口量，并与亨利·福特建立了友好关系。哈尔科夫市决定建造一座“计划外”的大拖拉机厂，因而面临着原材料、资金和劳力方面的巨大困难，所有这些都是由国家统一分配的。哈尔科夫发动全市人民在假日参加拖拉机厂的义务劳动。

正如萨拉托夫的那位人士自豪地说的那样，斯大林正在根据农民掀起的这场大风暴来制定计划。党的总路线正在加以调整，把广大群众的这种新意志包括进去。全国人民是根据党的路线了解政策的，党的路线凌驾于政府和工人之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农业专家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讲话：现在不仅是“限制”富农，而且是“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的时候了。集体农庄在国家的机械和贷款的支持下，即使没有个体剥削者的帮助^①，也能养活这个国家。世界报刊都报道了斯大林下令取

^① 1929年，苏联从农民手里征购了1千万吨粮食，其中86%的粮食征购自个体农户。1934年，全国征购了2千5百万吨粮食，其中92%的粮食征购自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从而表明它们的粮食足以满足这个国家的需求。

——原注

消富农的消息。其实，斯大林只不过是分析和批准了雇农已经本能地在做的事情。

象莫斯科，象斯大林，象其他大小要人，象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农民组织的二万五千名工人一样，我也根据农民所做的工作开始拟定计划了。甚至影响很大的《真理报》也想刊登一些有关我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见闻文章。这场农业集体化的风暴使报纸感到记者不够了。国家出版局请我写一本关于我的所见所闻的小册子，共印刷二十五万册。我是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评价新农场的，并介绍了巴兰达区的农民把“异己分子”从他们的农庄中清除出去的政策界限。从敖德萨到堪察加半岛，都在销售这些小册子，我还在新开辟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的书摊上看到了这些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出版后，我以前的著作就显得失色了。当我可以向二十五万农民提供他们用于改造生活的信息时，我为什么还要为二千美国读者写书呢？他们的思想随着每部新书的出版而发生变化。

接着，我到敖德萨区去参观舍甫琴柯拖拉机站，这是为使农民的耕种合理化而进行的十几次努力中的最好方法。拖拉机站开办了一家中央机械商店，有两百台拖拉机和所有必要的辅助零件，为十五万公顷土地上的农民服务。拖拉机站还有一所培训乡村拖拉机手的学校。它还出租农业机械，收取百分之一的收成作为租金，并要求那些希望采用轮作的农民向拖拉机站的专家们请教。农民仍然生活在他们熟知的古老村庄里。然而，他们的田地则与别人的田地交错在一起，一直伸向遥远的地平线，进入大工厂似的流水线，但生产出来的不是布匹和钢铁，而是粮食。贷款、流动图书馆、卫生知识展览、葡萄藤、牛、猪、果园都是通过舍甫琴柯拖拉机站进入这些中世纪式的农庄的。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整个苏联只有一

个这样的拖拉机站；到一九三四年，全国共有三千五百个拖拉机站，为苏联三分之二的农业地区服务。

国家出版局也想出版一本关于这个拖拉机站的小册子，所以我开始为苏联出版单位写更多的书。有一段插曲使我对我的美国编辑大失所望。一年多来，莫斯科似乎对我有些疑心。后来，为从事经济研究而阅读英文报纸的蒂维尔坦率地对我说，我被当成了托派分子。我思索了一下回答说：“不对，我很难认为我是托派分子。我几乎忘记了托洛茨基。我从不明白他为什么被开除出党。在那些理论中，我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每个人都希望建设他的国家，对不对？大家都要搞世界革命。在我看来，只是侧重点不同罢了。但是，我在西雅图的劳工运动中，汲取了许多经验，所以我不会由于一个工人运动开除了一位我喜欢的候选人而去反对它。”

蒂维尔露出了不满的表情。“那么你发表在××报纸上的那篇文章又是怎么回事呢？”他直截了当地问。

我感到迷惑不解。他提醒我说，一九二七年初，我在纽约的一家报纸上曾发表过一篇把斯大林同托洛茨基作比较的文章，那时托洛茨基仍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但已遭到猛烈的攻击。我写完那篇文章后就到中国去了，后来我没有看到那篇文章的发表。中国革命的雷声早就淹没了我对那篇文章的记忆。

我一边回忆一边说：“那篇文章不会有错的地方。那不是讨论他们的观点，而是描写他们的个性。有些共产党员读后认为那是一篇好文章。”

“不可能，”蒂维尔说。我们两人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让我们看看文章内容吧，”我说。

我们一起找到了那篇文章，刊登在两年前的一张报纸上。在我

署名的文章中，加了两段对俄国共产党人不礼貌的话。我的文章有一段话谈到了斯大林的组织工作。“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这个国家的工作效率正在日益提高”这句话被删掉了。这些改动使文章的语气变成了讥讽苏联和赞扬托洛茨基了。

我记得，我还特意给那位主编写了一封信：“你请我写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这关系到我的政治准确性和判断公正性的声誉。因此，我坚决要求：如果你一定要修改，那么你至少不能增添内容；如果你要删节的话，决不要删掉对比的一方。”

当我把此事讲给蒂维尔听时，他越听越生气。“那个人毁了你的声誉，”他说。“你不能写信要求撤消那篇文章吗？”我苦笑了一下，我比他更了解资本主义新闻界。我说：“他们甚至不会理解我的要求。对他们来说，关于政治准确性的声誉只不过是一种赚钱的手段。而我在布尔什维克心目中的声誉对他们来说，就更无所谓了。”

我与蒂维尔的谈话使我受到了启发。我说：“你知道我曾经给托洛茨基上过英语课，而他则给我讲讲政治。他主要是给我讲了一些轶事。不过，这个主意并不坏。尽管我在这个国家居住了八年，但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人。没有人有时间向我解释，凡是了解情况的人又都很忙。难道你不能帮我找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我教他英语，他给我解答我所遇到的问题吗？这样我会见了最近刚从乌克兰来莫斯科的经济学家佩尔奇克，他在就任新职以前，有点时间学习英语。他帮助我了解了农村地区和一九三〇年头几个月所面临的困难。

我在伏尔加看到的这场农业集体化的秋季风暴，很快就发展为一月雪暴。荒唐的谣言潮水般地拥入莫斯科，就象在农村流传的谣言一样多。最有趣的传说是关于一个富农的妻子，当她的丈夫被关进监狱时，她用最后一卢布买了老鼠药，毒死了她本人和她

的七个、十个或十三个孩子。可靠消息说富农的房顶被扒掉了，受难者在混乱中被流放了。这似乎是不必要的混乱和残暴。这就是私刑呀！难道富农就没有人权了吗？

当我随便表达我的看法时，佩尔奇克说：“我认为，最使你不安的不是野蛮行为，而是无政府状态……”他说对了；他很快就分析了我不了解的事情。他接着说：“的确存在着许多无政府状态，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必须做自我批评的。它是党内分歧造成的。斯大林已经阐明了党的政策——消灭作为一个阶级的富农——但是党内和政府里的右派分子竭力抵制这一政策的实施，因而迟迟不能形成准确的法律。在没有法律指导的情况下，我们地方同志中的一些左派分子按照他们自己和雇农认为正确的原则去做，因而造成了无政府状态。我们希望政府尽快颁布法令；这样，社会秩序将会好转。”佩尔奇克多么聪明啊！而我却本能地同情右派分子，希望事情发展得慢一些，在我看来，这样就能更有利于社会秩序。现在我明白了，他们拒绝对受压迫的群众表达的革命愿望作出反应，实际上引起了无政府主义。我也第一次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坚决要求加强党内团结——“百分之百”的团结。因为最高领导层的分裂意味着国家的混乱。

第一批法令是二月五日颁发的，明文规定，流放富农的做法只能在“集体化得到巩固”的区实施，必须由当地农民大会通过，经州政府批准。滥用职权的行为一下子就减少了。但是地方上仍然有许多过火的行为。组织者用威胁的手段强迫农民参加集体农庄；他们把鸡、羊、内衣和饭菜全都实行“共产”。当地富农火上加油，煽动农民杀掉和吃光他们的牲畜，“光着屁股参加集体农庄”，因为今后在农庄里人人平等了。斯大林为什么不采取行动？驻莫斯科的外国人从这种局势中认为布尔什维克有一种喜欢动乱的奇怪癖好。

佩尔奇克说：“在集体农庄的种籽还没有存入集体仓库和安全播种之前，我们不能攻击我们的地方同志。否则，可能出现普遍的饥荒……”我完全不理解他说的话。难道种籽不在村里吗？种籽落到谁的手里又有什么关系呢？不管个体或集体，不都会播种吗？然而，美国人对待公共财产的态度使我认识到：刚刚摆脱中世纪状态的农民可能会偷卖自己的种籽，”“因为种籽是属于集体的，”农民希望国家来照顾他们的生活，而并未意识到他们自己就是国家。在动乱的一九三〇年春天，如果不是严格控制种籽的话，就可能发生饥荒，使这个国家毁于一旦，而苏维埃政权也会在饥荒中垮台。

二月底，当种籽存入集体粮仓时，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讲话：《胜利冲昏头脑》。他说，农业集体化的迅速发展冲昏了“某些同志的头脑”。他提醒共产党员和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必须是完全自愿的，现阶段所提倡的集体农庄的“劳动组合”形式只把马匹、土地等生产资料收归公有；但是，牛、羊、鸡等家畜则仍归个人所有。

这个讲话印成小册子后，一下子卖出了几百万份。农民赶到城里花十五卢布买本小册子，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当地组织者面前挥动这本被当做自由宪章的小册子了。几个星期来，斯大林成为千百万农民的个人英雄——支持他们反对地方共产党员的英雄。斯大林立即制止这种英雄崇拜。他发表了《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他说：“有些人以为是斯大林个人的创举。我们中央委员会所以存在，并不是为了让什么人在这种事情上表现个人的创举。这是中央委员会所采取的深入探查的办法。”

经过几个星期的播种之后，中央委员会继续组织集体化运动，这场风暴是由于饥饿的雇农和贫农希望尽快过上好日子而引起的。这是一股强大的旋风，可以使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政府感到紧张。在所有驻莫斯科的外国大使馆里，在所有同苏联毗连的国家

里，人们象猎鹰一样注视着这场农业革命，猜测它将如何收场。在春天的时候，我到美国驻里加领事馆去更换护照，发现他们整天都在研究十几种苏联报刊关于农业集体化的详细报道。他们向华盛顿发出了几千页的报告。外国人普遍预料苏联将发生饥荒而垮台。据说在与苏联接壤的边境上，不只一个邻国作好了武装进军的准备。

三月底，我南下去迎接春天。从莫斯科出发，经过二十四小时的旅行，我在通往斯大林格勒沿线上看到了春天的景象。午夜，我在阿列克西科沃站下车，等凌晨三点才开车。在车站候车时，我听到了许多吓人的传说。二十个农民围着我，向我诉苦。“有一个土匪混进了党内，并统治着我们的村庄。”……“斯大林说集体农庄是自愿参加的，但他们却不肯归还我们的牛。”第二天上午，我坐在菲洛诺沃镇的镇长办公室里，听到了人们从早到晚向一位疲惫不堪的秘书诉苦。“镇长不在”，他对我说。“他下乡去了，昨晚那个村的富农放火烧掉了一个马棚，里面有二十七匹马，这是集体农庄用来进行春耕的马。”

在一系列的压力下——神父的攻击、富农的捣乱、本地干部的愚蠢、中世纪俄国的无知和无能，集体农庄眼看要土崩瓦解。农民们参加集体农庄后又很快退出，以致人们不知道集体农庄明天是否还有土地或马匹。当我向佩尔奇克提到我所看到的种种困难时，他说，我发现的困难还不到一半，不成熟的组织者伤害了农民的感情，土匪混进了政权机关，并利用新法律进行个人报复，到处是无政府状态。

他说：“我们就象一个踩着雪橇站在陡坡上的人一样。我们加速度往下滑，非常可怕，并且越来越快。我们既不能停止，也无法控制速度或距离。我们只能引导跳跃，恰当地着陆。……我们必

须成功,否则,一切都完了……”然后,他又慢吞吞地补充说:“但是我们是共产党人。”我突然想起了苏尼娅。几年前,苏尼娅在面临内战和饥荒时说:“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

我坐火车一到内地,就觉得混乱消失了。后来,我才明白为什么所有沿铁路线旅行的记者判断错了。苏联的所有麻烦都传到铁路沿线,所有的抱怨者都要求城镇中心予以调整。远离铁路的地方,人们正在取得成功;他们象约翰·里德公社那样,正在拼命耕种,为的是在大地上建立自己的乐园。他们没有时间到铁路沿线去,甚至没有时间去议论。混乱让位于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播种。这是我在集体农庄里看到的第一个春天。

在一块几英里长的肥沃土地上,几十个村庄的农民在一起劳动。农业专家提出了庄稼轮作计划,生产队轮流劳动,马、牛和拖拉机实行了工厂的分工作业。夜晚,星罗棋布的营地撒满了田野,三角琴的旋律悠扬四起。一位来自列宁格勒的白发天文学教授巡回给各个生产队举办幻灯片讲学。莫斯科的歌剧演员来这里为庆祝集体农庄“开战”举行演出。工厂委派机修队来这里修理农具。千千万万的农民在城市工人、教师、农业专家、艺术家和记者的帮助和组织下,正在用一个春天的时间建设社会主义的农业基础。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一次春播。

* * *

在这场伟大的播种运动中,有三个人给我留下了突出的印象:雇农乌斯京娜,记者梅尔尼科夫和区委书记科瓦廖夫。乌斯京娜是“共产主义堡垒”——这个大集体农庄的养鸡女工,该农庄距菲洛诺沃不远。她八岁开始做仆人。十月革命后,她是艰苦奋斗的一个小公社的第一批社员之一。她非常贫穷,既没有毯子,也没有衣服,只好用麻袋和报纸裹着她的新生婴儿。早期的公社社员发扬惊人

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逐步建立了一个健全的农庄。他们有了拖拉机和孵卵机，乌斯京娜在孵鸡方面成绩显著，受到莫斯科的嘉奖。他们的农庄近两年来日子过得不错，最近又吸收了几百个一贫如洗的农民，比原来的规模扩大了几倍。他们必须把这些新成员养活到收获季节。公社社员再次吃不饱了。乌斯京娜说：“这是我们的第二场战斗。真正的大战是要死人的。这场战斗虽然死不了人，毕竟也是一场战斗。因此，我们必须再次奋斗，帮助新来的人。”

《旅行斗争报》是在斯大林格勒以外办的，在第三节车厢里出版。去年冬末和今年春天，这家报纸从这个区旅行到另一个区，在每个区停留两个星期，出版一期报纸，主要报道当地滥用职权的情况。这家报纸影响很大，仅在一个季节里就使二百多名有贪污和偷抢行为的地方官员被捕。该报精明能干的记者梅尔尼科夫每天能处理十起耸人听闻的贪污案。这些情况没有使他沮丧，反而促使他起来斗争。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土匪佐捷夫混上村长的职务，把一位揭发他的红军战士列入被流放的富农名单。他还谈到了一个头脑发热的组织者，他跑遍了卡尔梅克的七个村庄，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的财产登记注册，就告诉他们这七个村庄现在是一个集体农庄了，用了七天的时间就使整个卡尔梅克地区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欧洲的所有沙皇报纸上，任何一个编辑捏造的“布尔什维克暴行”都不会超过梅尔尼科夫在帮助“自我批评”方面所记录的“布尔什维克暴行”。

但是，当我问梅尔尼科夫，由于新组织所面临的混乱、贪污腐化、宰杀牲畜等行为，今年的收成是否会比去年减少时，他惊讶地瞪着眼睛说：“减少！不，一定会大大增加！难道你没有看到拖拉机站使耕地面积成倍增加吗？难道你没有看到，雇农和贫农在没有拖拉机的情况下，利用富农的马就增加播种面积百分之七十吗？富农

们破坏农事，因为他们仇恨苏维埃政权和害怕征税。但是这些新主人干起活来简直不要命。”

雇农和贫农对新生活的渴望——这就是被人们称作“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春天”所释放出来的伟大力量。这股力量是由共产党员组织和领导的。尽管他们经验不足，干过一些过火的事情，尽管他们由于莫斯科制止萨拉托夫的发展太快而受到震惊，但他们毕竟是一个纪律严明、不屈不挠、坚强的组织。我学会了如何在每个农庄里找到这些共产党员；在生产队里，根据他们聚精会神地要把工作搞好的那股劲，我就能够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我学会了识别和赞扬那些优秀的区委书记，他们总是废寝忘食，充满自信和精力充沛。在区委书记中，我没有看见中年人；只有年轻人才能承受住他们那种快节奏。

因此，我想起了斯大林格勒南区的党委书记科瓦廖夫。他对十个走投无路、想要离开集体农庄的农民阐述了农业集体化的必要性。这是我听到的最简明、最透彻的分析。这十个农民决定退出集体农庄。一个农民说：“我没有棉衣，可他们硬让我在夜里下雨的时候去放牧牲口。”另一个农民说：“他们让我的骆驼饿着肚子干活，最后它死在我眼前。”第三个农民说：“由于我加入集体农庄，我的妻子不想同我过日子了。”（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受妻子的影响。他们都希望在附近的拖拉机厂建设工地上干运输的活儿，那里挣钱多。）

在我看来，他们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但科瓦廖夫却不这样看。他说：“你们没有充分的理由，这种情况你们总会遇到的。在集体农庄里，是没有现成的金饭碗的。我们的管理工作有缺点，必须加以改正。农民在夜里干活，当然必须穿得暖和点。由于去年干旱，干草问题难以解决；即使个体户，他们的情况也不比我们好。我们

要让那些想在建筑工地赚钱的人知道，春耕一结束，集体农庄就要承包运输工作。因为整个苏维埃政权都在支持集体农庄。退出农庄的人，日子是不会好过的！

“我也是农民，整个春天没有吃过一口肉。一个农民，即使他希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人。他的农田要依靠整个国家，整个国家也要依靠他的农田。我国处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中。我们必须加速建设强大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否则我们会灭亡。斯大林格勒的那家大工厂今年夏天就给我们农庄送来大批拖拉机。斯塔尔格雷斯发电站今年秋天将给你们的家庭输送照明电。这些大工程还没有竣工，我们需要粮食。面包的需要量将大大增加。如果每个农民坐在家里决定何时春耕的话，这些能办到吗？今年，苏维埃政权和每个公民的任务是加强集体农庄。就象一九一七年我们拿起武器夺取政权一样，今年我们必须把农业战线攻下来。”

科瓦廖夫经过两个小时的耐心说服后，他们的妻子在外面尖声喊他们。科瓦廖夫请她们进来，她们谢绝了。她们已经下定决心，她们的绵羊般的丈夫只得乖乖服从。科瓦廖夫没有再说什么话，立即转身向着屋内的五名共产党员说：“富农正在生产队里捣乱。你，你，还有你们，明天都到地里去掌握犁耙。”就这样，他派了三位年轻老师和一个图书管理员到地里去干活。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鼓舞士气。他给斯大林格勒打了电话，要求派一位鞑靼族女组织者来做妻子们的工作，并要求紧急提供干草。他命令图书管理员把流动图书送到农业第一线。

这样，他很快调兵遣将，展开了进攻。他是一位将才，应有更广的天地施展自己的才能。然而，这是贫瘠土地上的一个落后的鞑靼族村庄。党的组织者于一九三〇年春天深入到每个这样的村庄，为苏维埃小麦而战。

梅尔尼科夫猜对了。种籽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由那些在一年之内冲出中世纪的人播种下去的。他们的新觉醒的意志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力量。最后，当庄稼丰收时，全世界的工人和曾经象猎鹰一样注视着苏联的外国代表才知道，苏联在最广大的面积上播下种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

那次大丰收改变了世界农业的历史。

第二十四章

我们创办了 《莫斯科新闻》

一九二九年和随后的若干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涌向苏联，他们是五年计划期间新来的美国人。有些人因世界危机跑到苏联寻求避难所；有些人多年就想来，终于由于苏联工业的发展而找到了机会；而另外一些具有不同才能的人则是被苏联国营托拉斯请来的，它们需要专家，愿意付给这些人美元。最后这一批人被称为“外汇专家”。

来苏联的多数美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强烈愿望——在荒凉的地方开创新事业的决心。这一点吸引他们来苏联。不管是为在库兹涅茨克建一座大型钢厂而奋斗，或者在斯大林格勒提高一部机器的效率；不管他们爱社会主义，或者爱美元，或者正如一个通常的美国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有有效地工作，上帝才允其生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各种各样动机奇怪地交织在一起。许多人希望能够干点事情，在这个新的国家生活和发展下去。我看到，他们正在经历着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想在新的条件下有所作为。

出于我过去的经验，我想帮助他们。和他们一样，我希望苏联工业和农场有效率。但是，我已经放弃大展宏图的希望，只好当个作家。

从参加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通车典礼回来不久——在这次旅行中，我还参观了库兹涅茨克巨大的土坑，计划在这里建的钢厂正在用原始的铁锹挖掘地基——我来到鲍罗廷的办公室，他当时担任报纸托拉斯主席。

“你不是曾想在莫斯科办一份美国报纸吗？”他问我。“如果你现在想干的话，我想你可以得到支持。”

“我有这种想法已多年了，”我对他说。“如果你想办，我将承担找人和发行的工作。但是，在这个国家，我不想做任何组织工作。我知道我的局限性。”

鲍罗廷笑了笑，便不再提它了。两天之后我又来到他的办公室。“我知道我要使你为此而烦恼，”我说。“但是一是谁在想办这份报纸呢？”

“有些同志正在处理美国人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需要有一份报纸来帮助他们。”他把这些人的名字告诉我，为首的是以前库兹巴斯自治工业公社的拉特格斯。他目前在一个负责处理外国人意见的新机构担任领导工作。

我找到了拉特格斯。看起来，一小部分对报纸有兴趣的人并未能使此事很快办起来。有的人正在写报告，有的人在休假。我越来越耐不住了。难道我不认得某个大人物可以很快拍板定案吗？突然，我想到了全苏工业副主席瓦莱里·梅希劳克，他过去几次赞扬我的书。我给他写了一份详细计划。董事会里应有雇用美国人的所有主要经济机构——工业、贸易、运输和农业机构的代表，这些经济机构通过大量订购报纸来提供资助。

“但是，我不知道苏联是如何进行组织工作的，”我对他说。“请告诉我三件事。你喜欢这种想法吗？如何进行组织？象我这样一个外国人，又不是党员，可以做这种工作吗？”

“你不是党员，办这份报纸更方便，”梅希劳克回答道。

我也看到这一点。然而他的话并不完全使我高兴。看起来，他们想把我永远置于党外了。我既想入党，又怕入党。至少我希望他们争取我入党，帮助我下决心……“在我为资本主义报纸写文章时，我不能加入党，”我为自己开脱，“但是在我办起这份报纸后，我便能入党了，是不是这样呢？”

梅希劳克和蔼地说：“你会发现入党是困难的。而且也不必要入党。象你现在这个样子，不也很好吗？”

原来如此！他们不要我。他们不把我当作一个创业的同志，而仅仅看成是一个有技术的雇员，这与资本家对我的态度没有什么不同，好吧，我宁愿为他们卖力，而不愿意为资本家干活。至少，他们正在为未来的世界从事建设。年轻时代的反抗又冒出来了：“他们不要我。好吧，那就让他们看看我可以干出一番什么事业吧。”

“这种想法很好，我马上采纳，”梅希劳克说。随后他提到赞助人的名字：农业人民委员雅科夫列夫，工业界领导人古比雪夫，以及铁路和工会里的重要人物。人们在谈论董事会还可以吸收哪些人。我的心在歌唱！我不是终于可以见到真正干事的人了吗？

我开始在全莫斯科宣传这种想法了。美国著名工程师休·库珀、考尔德和弗雷恩对此很热心。比尔·沙托夫打来贺电，“祝愿苏联工业采用美国的效率。”当时在莫斯科的两个美国主要记者沃尔特·杜兰蒂和尤金·莱昂斯答应为此报写稿，“如果它是按照你们的计划办的话。”在外交部新闻司我竭力劝他们同意这种想

法。他们对这种想法也感兴趣，表示他们会把它当作“他们自己的报纸”。从此，我再没有找他们。自从创办俄国—美国俱乐部的事情失败以后，便与外交部无关系了。最好把这件事全部交给梅希劳克，他一句话顶过我任何巨大的努力。根据他的建议，我休假了。当我回来时，我听说三种不同的英文报纸不久都要开办。这是我广泛宣传的结果。

“那么多人想办报，”我对梅希劳克说。“请不要找我。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我甚至还没有听到这些谣传，”他回答道。“我们的报纸已经定下来。推迟是因为难以找到合适的主编。我们现在找到了瓦苏廷，他是我们工业计划局的领导人。中央委员会请我问你一下，你愿意做什么。”

“他们想让我做什么呢？”我问道，因为看上去要改变计划，弄得我相当为难。

“他们想让你出面组织，把事情办成，”他说道。

“那么，瓦苏廷又干什么呢？”我直率地问道。

“他负责与工业部门联系联系，”梅希劳克回答道。“他没有时间办报；一周之内你最多只能看到他两次。你找人办报，他给你出点主意。星火出版社奉命根据你的预算给你拨款，并提供办公地点。”我因看不到来自农业、贸易和交通运输部门的代表而感到遗憾。梅希劳克说：“过些时候他们会派人来的。眼下，他们迟迟不肯同意。”

事情办成了。根据我的第一个要求，星火出版社拨出了钱。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相信报纸能办成。有许多次我曾想有所作为，但却一事无成。看起来，这一回是真的成功了。我从住在莫斯科的美国人当中找了编辑人员。在梅希劳克让我筹办之日起过了

十五天，我们的第一期报纸便于一九三〇年十月五日与读者见面了。住在苏联全国各地的美国人纷纷来电祝贺。哈尔科夫、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伊尔库茨克，甚至遥远的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地区的阿拉木图的记者都自愿为报纸写稿。住在莫斯科高级旅馆的工程师们的夫人们主动要求打印邮寄名单。没有人提出要报酬。她们是借此解闷的。对她们所有的人来说，办报是一件乐事。

我们开始时办的是五天出一期的周报，以庆祝当时在工业部门正在试验的一周五天工作制。第一批编辑人员包括：马克斯韦尔·斯图尔特，他曾任《中国展望》主编，现在是纽约《民族》周刊主编之一，他处理世界新闻和严肃文章；埃德·福尔考斯基，他在美国劳工报刊很有名，他负责地方新闻和处理工业战线上的工人和专家来信；赫伯特·马歇尔，他是伦敦电影公会的秘书，他负责图片和艺术。业余时间为本报撰稿的有：陈依范，他是一位年轻的漫画家；莱姆·哈里斯，他是一位有才华的青年，为了全面了解苏联，他在全国各地从事各种工作；《新群众报》的乔舒亚·孔尼茨，他正在莫斯科搞戏剧。当沃尔特·杜兰蒂看到我们的主编是俄国人时，他精明地采取观望态度，看看我们的办报方针如何，但是尤金·莱昂斯利用这个机会，为我们写了一些不取报酬的游记文章。路易斯·费希尔也答应经常写稿。

我们早期的工作人员都有一种努力献身的精神。当星火出版社提出要给我每月工资六百卢布另加稿酬时，我不屑一顾地拒绝了。“办自助报纸，不能开支那么高的工资。我只领取苏共的最高工资三百七十五卢布；这包括我写的所有东西。”在我带领下，全体工作人员作出了同样的决定，并且把它写在“突击队保证书”里——工资永远不超过大伙的最高标准。我们厌恶苏联人认为美国人都是

爱钱的；我们要做高尚的人。这些共产党人把我们当作雇用来的外人。我们要向他们表明，我们跟他们一样高尚！

我为我们的头几期报纸确定了编辑方针。陈依范的第一幅漫画是：一些钢厂正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蓝图里兴建起来。漫画的说明文字是：“苏维埃政权加美国技术建设着社会主义。”我们没提世界革命，因为我们的读者包括一些很有名望的商业公司。然而，任何不赞成“苏维埃政权加美国技术建设着社会主义”的人没必要看我们的报纸，也不必同苏联打交道。

看起来，梅希劳克的诺言兑现了。瓦苏廷没有进行干预。他喜欢我们这伙快活的年轻人。我们的热情干劲压倒了一切困难。第一期报纸大部分都是我亲自打的字；我编排和写标题。我们大家都看大样。我们甚至违反印刷车间的规定，坐在排字工人旁边，指点还不习惯于拉丁字母的工人如何排字，用美国香烟和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期报纸来鼓励他们。午夜，我们带着铅版穿过滑溜的工地来到遥远的印刷车间。世界上许多国家报纸的办公室里都在谈论我们办第一期周报的情况。

第一天晚上，我那信心甚至使政治主编^①大为震惊。他照例审阅了我们的八版报纸。看着看着，他忽然发起火来，抓起了一支蓝铅笔。“这是诋毁，”他大声嚷了起来，指着福尔考斯基写的描写我们到处寻找房子的幽默文章《莫斯科的流浪者》。我竭力争辩说这是幽默。通过我们的争论，我开始了解到我们美国人的幽默感是建立在夸张基础之上的，对于一个具有不同幽默感的人来说，是难以向他解释的。埃德讲了莫斯科的一些糟糕的事情，由于有点夸张，

^① 审稿部主任，审稿部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审稿部主任被称为“政治主编”，他最后审定所有出版物。——原注

所以很有趣。如果认真对待，的确是极大的诋毁。

我十分恼火地抓起电话，半夜给我认识的每一个人打电话。我把瓦苏廷从床上叫了起来。他劝我“今天晚上先服从，明天再提意见”。但是，我已经给那位检查官留下深刻印象。“你是否真的以为美国人会把这当作乐趣，而不认为是在攻击我们的莫斯科工作人员？”“我是这样认为，”我说。他软了一些，我们商定删去甚至我自己也认为可能引起误解的两小段文章。我们分手时，彼此已经消了气。我想，他毕竟是编外的主编。

象这样的五日周刊出了七期。我们写作，打字，同一群热心来访者谈话，都挤在一间小屋里。我们都到印刷车间去，教印刷工人英语。我们听到：“这张英文报纸定会成功。只有星火出版社才有印刷工人。”只有我们才真正关心印刷工人的截稿时间；这一点是我们从美国学来的。我因工作紧张而发烧，精疲力尽，但是我的头脑工作起来还是清醒的，其他人没时间做的事，我都去做。我终于可以在这个国家高效率地干工作了。我听到星火出版社的一个秘书说：“斯特朗那么拼命干，是为了什么呢？她又不是共产党员。”我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让他们找一个比我工作更卖力的共产党员吧！

此后，我赴美国进行巡回演说。梅希劳克鼓励我这样做，他说：“你可以扩大报纸的发行。”我一离开莫斯科，该报就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寄文章去，他们不予发表。我打电报去，他们也不复电。我从寄到美国的几份报纸得知，瓦苏廷已被阿克塞尔罗德所代替，我不认识此人。文章愈来愈索然无味，充满革命理论，很明显，这是从俄文译过来的。苏联设在纽约的苏美贸易股份公司拒绝让这份报纸进入他们的办公室：“它侮辱我们的顾客—美国商人，”他们说。在美国出售苏联图书杂志的安柯尼加告诉我，他们

讨厌出售此报纸。“它太枯燥无味了，简直没有人想看它。请回去改变一下吧。”

“回去？”有什么事值得回去呢？报纸不给我复电，我是否还是那份报纸的工作人员？因精疲力尽，我的身体垮了，我在休养所呆了一个月。在此期间，我写出了《苏联人征服小麦》这本书的初稿。随后，梅希劳克便来到美国。我在布林马尔的苏珊·金斯伯里博士家里与他见了面。

“你离开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说道。“请回去，好好整顿一下这份报纸吧。”

“我对那份报纸有什么权力？”我问道。

“全权，”他回答道。“指定你负责把报纸办好。”金斯伯里博士笑了起来：“现在你有了你想要的东西。我们目睹你的权力，”她说道。

我赶乘赴纽约的早班火车，当晚转乘轮船，我利用最后一天访问了几个人，并且写信给我认识的美国作者辛克莱·刘易斯、厄普顿·辛克莱、西奥多·德莱塞和刘易斯·甘尼特，请他们为报纸写文章。我写信邀请两位新闻记者比尔·普罗梅和米利·米切尔来莫斯科，我在“红色汉口”时代就认识他们两人，当时他们主办《人民论坛报》。米利·米切尔来到莫斯科，加入了战斗，并且活了下来。比尔·普罗梅从亚利桑那来到纽约，我打电报给他不要再来了。我在莫斯科发现，我根本什么事也决定不了。

在海上的时候，梅希劳克打来的无线电报使我感到振奋。在纽约时，我曾留给他一封信，把我最后一天所做的一切告诉他。他在给我的电报中说：“预见到《莫斯科新闻》的远大前途。”这证明我所做的一切是对的，梅希劳克同意这样做。

我给《莫斯科新闻》打电报，说我要回来。没有人去接我，我走

进办公室，没有人认识我。在我不在的四个月里，已换了一些新人，一大批领高工资的翻译和打字人员。在第二间房屋里，我看到美国工作人员，他们正等着我去救他们。他们的突击队保证书并未受到称赞；它从未传到工会或党的组织那里去，因为星火出版社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不重视他们。但是星火出版社的营业办公室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按照美国人要低工资的奇特愿望照办了。在自己的国家承担负责工作的我可爱的工作人员，他们的收入仅约翻译人员的三分之一。有些人已在动用他们的美国存款了。从这一点来说，我的理想主义出卖了他们。然而，他们的保证和彼此互助来提高最低水平的人，使他们团结在一起，坚定地献身。如果我告诉他们怎么办的话，他们决意为办好报纸而奋斗。

比低工资更糟的是他们的地位也低。同时兼任六个主编职务、在俄国颇著名的新主编阿克塞尔罗德一直是这样办报的：所载文章首先译自俄文，然后让我们美国人从文字上加以修饰。他们发现，这些文章冗长、无味，而且要花较高的稿费。他们认为他们自己能写出远比这更好的文章来。为了使报纸自负盈亏，他们牺牲了自己的工资收入，他们憎恨把时间和金钱花在他们认为不屑于一顾的稿件上。

我开始时把阿克塞尔罗德视作好同志，他开始时也以友好态度对待我。他有一副诚恳、严肃的面孔，在破旧的阔边帽不露出紊乱的卷发。从早到晚，他拖着沉重的脚步从一个编辑室来到另一个编辑室，去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长期肺病使他身体虚弱。很清楚，他是拚命工作的忠诚革命者之一。他期待着用我的作风改善报纸，我也抱着同样的期望。阿克塞尔罗德不知道该如何从美国人那里吸收好的东西。我想：“如果他能够弄到好的英文文章，就没有人会去印那些长篇理论性翻译文章。”

很快我便发现，我们对好文章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他接受我的大多数文章时，总要稍微修改，为了“准确”，冲淡一些生动活泼的词句。在我看来，他总是使文章变得索然无味，直到我担心丢掉我自己的风格。然而，主要使我忧虑的是他对待我那些可爱的工作人员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人仅适合做些琐碎的工作。我为他们的风格和在美国的地位而争论不休，然而白费力气。“没有一个外国人对我们的国家有充分的了解，能够把它写好，”他最后说道。我的天下崩溃了。自此，我把阿克塞尔罗德视为敌人。

我们彼此从未分析过我们对报纸的不同观点。我们是从我们不同的经历形成这些观点的，并且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对于我来说，首要的原则就是要有趣味，按印刷工人的要求定时截稿。准确是重要的，我不愿错误地报道任何人，特别是不愿错误地报道重要的苏联官员。我完全尊敬他们。但是，不可否认，他们的讲话太冗长，需要编辑修改——突出其重要论点和有趣的情节，压缩其理论。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做，我们都必须按时截稿，符合版面要求。

阿克塞尔罗德毫不考虑截稿时间，版面或有趣的情节。他认为压缩理论、突出趣事，有损于“准确性”。他认为“准确性”最重要。为了把一句枯燥的话弄得更准确，他分析呀，打电话呀，同别人商量呀，让整个印刷车间都停下来等着他，气得工人什么似的。其实，在我看来，改不改，都一样。“如果他非要政治上准确才行，”我十分恼火地说，好象我屈服于阿克塞尔罗德的恶习，“他也应赶在截稿时间以前。这些共产党人，他们为了‘考虑考虑’，不惜让工人赶不上末班车，步行回家！”

他对独家新闻所采取的态度激怒了我。我自己参加了一个盛大的代表会议的开幕式，把第一个讲话摘要写好就跑回来。我们

要赶快付印，甚至要赶在《真理报》前边。而阿克塞尔罗德则不采用它；我们必须等塔斯社的报道，要经讲话人自己修改定稿以后才行。他是否怕我引错了讲话人的话呢？那倒也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要等，甚至等五天以后下一期采用也行，反正得完全准确。任何一个美国主编能够理解这一点吗？而俄国人同样被我弄糊涂了。

我们的冲突由于组织工作的混乱而加剧了。当阿克塞尔罗德生病时，他通过所谓“业务秘书”丘马克进行工作。丘马克力图独断一切；他把我送到排印车间的文章取走，送给外边的人去批准，这样一来，严重破坏了我们原来的工作日程。他到底是什么人，仅仅是一个秘书吗？名义上，我是主编。他不服从领导，我就可以辞退他！

我怒气冲冲地去找阿克塞尔罗德。“丘马克是我的上级吗？”

“当然不是，”他说道。

“那么，丘马克是否属我领导？”

“不完全，他是业务秘书。”

“但是，当你离开办公室时，由谁来下命令？”阿克塞尔罗德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他将劝劝丘马克，我们应当友好相处。我们美国人认定丘马克一定是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特务，阿克塞尔罗德管不了他。我完全不懂苏联机构的组织形式，他们的工作是通过协商进行的，而不是靠下命令。我们难以看出丘马克的权力是从哪里来的。

过了许久，我才发现，苏联报纸的“业务秘书”相当于美国的主编。丘马克是俄文主编，而我是英文主编，彼此都不了解对方的职能！委派我的中央委员会在哪里呢？让他们明确谈谈我应负的责任！我打了几个小时的电话，但是从未找到他们。我无法到他们的办公楼去，只有党员才行。

我尚未被打败。我带着领取低工资的美国人到我公寓里来，有时在两个小房间里多达六个人。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到那里去睡觉。我太疲乏了，战壕里也睡得着。所有醒着的时间，我都花在办公室和排印车间里。后者是我的主要战斗岗位。我让阿克塞尔罗德批准一篇又一篇美国人写的文章。我不让丘马克知道这些文章。我亲自把它们送去打字。然后，我无情地利用我拼版的知识把阿克塞尔罗德喜欢的长篇翻译文章放在后面几版。我把美国人写的东西放在显著地位，并标上大字标题。我对他根本没有诚意。

实际上，我取得了一些胜利。阿克塞尔罗德常患病，丘马克上正常班，而我则干着十个小时的工作。我们的报纸开始象个样子了。有一天，我大获胜利。斯图尔特—詹姆斯—库克公司总经理斯图尔特就顿涅茨盆地煤炭工业问题向最高经济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煤炭工业是苏工业的一个薄弱环节。这是美国人首次向高级机关作报告。梅希劳克向我提供这方面的材料，让我加以传播。我亲自编辑这些材料，突出重点部分，用生动的文体全部登载于头版。斯图尔特向我们要了五十份报纸，寄回国内。“我对这次报道感到自豪，”他说道。美国资本主义报纸的记者数月来第一次注意我们；我们使得他们急忙去找斯图尔特；我们的新闻抢在他们所有人的前面。我扬眉吐气了。也许我挽回了我作为一个报人的声誉。

阿克塞尔罗德的身体不行了。我不断送给梅希劳克的用打字机打的长篇恳求，换来了新的主编，这些都是在幕后不让人知道的情况下进行的。阿克塞尔罗德病得很厉害，去休假疗养了。我肯定给他找了不少麻烦。他留下的不仅有《莫斯科新闻》，还有一份更小的报纸《工人新闻》，它之所以能出版，要归因于阿克塞尔罗德办报的热情。这份报纸登的文章更长更索然无味，在我看来，这是一

桩蠢事。阿克塞尔罗德已经离开我们，我们都认为两份报纸应当合并，这样我们的报纸便可以办成日报。同样的职工出版两份报纸。

新主编瓦索夫通过丘马克向我传达了他的第一道“命令”。他甚至没有请我打个电话，而是要把我送往他的办公室——“如同包裹一样”，我想道。很显然，他上任后，要实行严格控制。然而，我微笑着走进他的办公室，听取他的新组织计划。这个关于机构的方案，在我看来，适合于《纽约时报》这样大的报纸，而不适合于我们这种小报。依照此方案，所需翻译人员相当于过去的三倍。我解释了我们美国人比较简单的组织方式，其基础是依靠新闻来源和把材料迅速送往排印车间……“那样做根本行不通，”他说道，“是否让我介绍一下新部门的负责人？”

他让他们来一趟。在我来了之后的半个小时，他又把他们召到他的办公室里来。看上去，所有的事都已决定了。我想到仍然任职的四、五个美国人。他们虽然淹没在翻译的汪洋大海里，却正在为办好报纸而艰苦奋斗。除了翻译外，还来了一批新的领导人，这些美国人的地位是否会进一步降低呢？我谈到了这些美国人的业务水平；瓦索夫对此不感兴趣，但这些职工信任我。因此，我微笑着对新部门的领导人——三位能干的英国青年和美国青年——说：“今晚请都到我房间用茶，庆祝我们新的报纸。我将邀请讲英语的职工参加，我们大家都互相认识一下，在那里我们还要进行组织工作。”

在一片快乐声中，我们的庆祝晚会开始了，我们大家饮着茶，吃着糖果、点心，畅谈希望，都陶醉了。自从九个月之前与瓦苏廷相处的愉快时光以来，职工们是第一次聚在一起用英语交谈，他们不为新的部门发愁了，谁来领导都一样。只要能够办一份真正的报纸，在办公室用英语交谈，就够开心的了。不会再有俄国人写的

长篇文章了；阿克塞尔罗德办的第二份愚蠢报纸现在已停办了。看起来已为办日报扫清了道路。

瓦索夫发表了讲话，并请大家提问题。我说：“职员们希望我下命令，因为我被称为主编。然而，我发现业务秘书有同等职权。请告诉职工们和我：我的职权范围是什么。你不在时，谁下命令？”

他显得很尴尬。他说我的职务“很重要”，仅次于他本人。但是他不肯说我可以下命令。我说，“我知道很光荣，但职权不明确。请取消主编的名义，叫我‘副主编’好了，看看我到底配不配当主编，这样更明确一些。”

瓦索夫看上去不高兴。他不知道他是否有权改变我的头衔。“我有足够的权力这么做，”我说道。

如果我的工作明确清楚，他喜欢怎么安排我的职务都可以，我不想与瓦索夫争吵。他是我拼搏的最后一次机会。他是由梅希劳克挑选的，因此，我不能轻易向梅希劳克抱怨什么。如果我与他合作不好，我就永远不能在苏联做什么工作了，我将永远是一个局外人。

瓦索夫也不想与我吵架。他希望顺利地、愉快地管理这个集体。他与阿克塞尔罗德的革命者的外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平易近人，跟谁也合得来。他让外国朋友从国外给他带了一些服饰，他打扮得颇有几份异国情调呢。他与那些竭力想使苏联人付给他们美元工资的新来的美国人打得火热。他渴望别人喜欢他。为达此目的，他经常举办一些招待会，有时是同朋友联欢的轻松晚会，有时是以报社名义举行的盛大宴会。他邀请的是新的高级职工，而不是“早期的美国人”，后者看到他邀请的大多数著名俄国人不出席时，他们报复似地非常高兴。

在瓦索夫领导下，报纸文风有了改进。他善于找撰稿人。他在莫斯科找到一部分作者，又从伦敦找到一部分，他们是早就认识他的英国共产党人。他经常招待这些老朋友。他们可以很快弄到房子和外国食谱，而我们老一些的职工却等待很长时期也搞不到这些。我曾动员米利·米切尔辞去高薪工作，致力于革命。她在汉口时就倾向于革命。她现在同六个苏联人同住一个房间，挣的钱几乎不够吃饭的。瓦索夫聘来的人住在旅馆里，想工作就工作，想旅游就旅游，在全国旅行时有翻译陪同，坐头等卧铺。他们的生活水平比我们期待于共产党的要高得多。“阿克塞尔罗德至少是诚挚的，”我们说。现在文风改进了，而信仰却减少了。在阿克塞尔罗德领导下，人们是在战斗，怀有希望；而在瓦索夫手下，人们听天由命了。

瓦索夫给报纸办了一件好事：任命马克斯为业务秘书。马克斯年轻，没有经验，工作效率也不是高的，但是在任何办公室里也找不到比马克斯更好的同志了。他的工作招致我们最恨人的仇恨。他必须剪去记者报道的敏感问题，使其与党的路线一致；他在瓦索夫和那些恨瓦索夫的人之间进行调和。然而，每一个人都喜欢和尊敬马克斯。他明智、诚恳，对人體贴，总是愿意向别人说明他做某件事的动机。他不辞劳苦地整个晚上照顾某个记者，而在原则问题上，他则寸步不让。只要有助于把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团结起来，事无巨细，他什么事情都做。和马克斯一起工作，便使你相信共产党人，并且认为，即使个人能力不大，他们也可以组织好这个世界。

随后，共产党下命令，把他撤掉了。瓦索夫不在时，我代理主编职务，然而他们竟没有把这件事通知我。如果任何负责人对我说：“我们要调走马克斯，请你不必问为什么，”我将感到难过，但是

会坚决把这位好共产党人从我们办公室让出来。我蒙在鼓里，还以为马克斯去休假了。从打字员的闲聊中，我才了解事实真象。他们骗我了！在马克斯走的最后几天，我难为他们，故意谈论他回来时要做的工作。我不承认我知道他要走，他没有告诉我，我照样尊敬他。但是我厌恶通过打字员闲谈，含含糊糊从“幕后”向我暗示。

马克斯一走，办公室里的融洽气氛也消失了。我们新的领导人坐在里间屋里，利用被我们训练得会写作的、聪明的职工去为他办事。工资纠纷出现了。由于新来的人领取高工资，我们领低工资的老职工提出了抗议，最终得到在全国旅行的权利和额外稿酬，稿酬标准比别人低。在里间屋子里，他们为我安排了一张桌子，但我不坐在那里，我在家写文章。既然我的建议一条也不采纳，坐在那里又有何用？我一次又一次给梅希劳克写信，他没有复信。九个月以来，我无法找到他。给我安排了瓦索夫，事情就完结了。我再也不想加入党组织了。在我看来，每个人都在无耻地利用我的抱负来出卖我，使我陷入这个混乱的地方，使我失败，使我受到束缚。

最糟糕的是，我们真正失败了。我们没有把《工人新闻》吸收过来，扩大成日报。阿克塞尔罗德改组了该报，补充了新人。《莫斯科新闻》停步不前，而《工人新闻》却在发展。尽管它的文章长，英文很糟，但由于它报道工人们关心的事情，它得到发展。它设有一个庞大的由年轻人组成的“群工部”，负责调查读者的意见和不满。虽然他们的调查毫无结果，但不管怎样，它至少使美国工人相信，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总算有听取他们意见的朋友。那个朋友既不是我自己，也不是《莫斯科新闻》。当工人们带着问题找我们时，我们被告知把他们送往另一家报纸。我们在工程师俱乐部里做一些有

高度文化修养的人的工作，然而《工人新闻》则赢得愈来愈多的群众。

《工人新闻》称我们是资产阶级，而我们的作者则讥笑他们是文盲。两家报纸的职工几乎不说话。好吧，我们是资产阶级，不否认这一点。请看看我们那个里间屋的办公室吧。我看到了《工人新闻》办公室的混乱状态，挤满了一大群人。我们开始时也象那个样子，充满热情和朝气。尽管他们的文章长，英文不行，尽管他们称我是资产阶级，我还是想到他们那里去。大多数美国人谈我们这两家报纸时，责备双方职工不该长期作对。为什么两家报纸不可以办成一家好的报纸呢？好象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似的。其实，所有这一切是瓦索夫和阿克塞尔罗德两个苏联人之间的矛盾。我们仅是他们踢的足球而已。

“你在这家蹩脚的报纸失掉了你的名声，”外国记者这样对我说。曾两次办过日报的我，却对这个糟糕的周报无能为力。很清楚，他们并不真正“需要我”，既不需要我的干劲，也不需要我的效率。他们需要的只是我的资产阶级名声，想要就要，想扔就扔。现在他们对于其他美国人也不真心实意了。他们不让我有所作为，却又总是装着一副样子，好象责任在我身上……这一点可以对我的感情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一想到《莫斯科新闻》就十分激动，它是我十年的斗争和失败的高潮。

几次我要辞掉这家报纸的工作。瓦索夫说他“没有接受辞呈的权力”。

“谁有这样的权力？”我问道。

“你是中央委员会新闻部任命的。”

“任命我，”我嘲笑说。“我从未进过他们的办公大楼。”接着，他对我说，我的辞职是一个政治行动、“反苏行动”……天哪！无

论如何，我要离开这家报纸。两个月我不去办公室了。我到劳动人民委员部鲍罗廷那里去，负责处理突然涌入的大量美国移民。我的此举肯定使我离开了这家报纸！但报纸一直保留我的名字，付给我工资，并且写文章赞扬我做的移民工作。我现在了解了，对于一个苏联主编来说，这是正常的，然而我那时却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欺骗。我打电报给孙中山夫人，她邀请我到中国来。在中国，第十九路军与日本已展开了斗争。如果我离开莫斯科两年，他们就不得不撤消我在该报的工作了……是的，我真变得歇斯底里了。

然而，我一直清楚，对于我来说，只要我愿意这样做，有一条出路。美国记者已经看到了我们报纸的变化。如果我去对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说：“我早已脱离这家报纸的工作，但是他们不愿意去掉我的名字。我发布这个消息，”他会把它发出去。比如，杜兰蒂就会大肆张扬这件事，但不会耸人听闻。这样，我就能永远离开这家报纸了！我就可以永远离开那个折磨人的环境了。不只是《莫斯科新闻》将成为过去，而且我在苏联的全部斗争、十年的全部希望也要成为过去。十年吗？不，比十年还长得多！比这更久远的事情将要完结了。我的内心深处正在酝酿着背叛，不是背叛瓦索夫，也不是背叛《莫斯科新闻》……然而我的思想斗争很激烈，正如一个绝望的要自杀，而他的全部本能则大声要求他活着那样矛盾。

第二十五章 五年计划时期的 美国人

“出去旅行一趟，”在我不断要求辞职时，他们在《莫斯科新闻》这样对我说。“出去看看，写文章表扬一下为我们新工业工作的美国人。回来时，你的情绪会好些。”

我把这种旅行看作是一种笼络手段，但我还是将接受它。让他们保留着我的名字，为我支付周游苏联的大笔旅费吧。回来后，我仍要辞职。

我取道伏尔加到斯大林格勒，去参观巨大的拖拉机厂；然后前往罗斯托夫，抵达新建的农机厂和几个大农场，再到第聂伯建筑工地，在那里，一座大坝就要竣工；然后返回哈尔科夫，看看即将开工的第二拖拉机厂。这是第一条旅行路线。第二条旅行路线是：先到诺沃西比尔斯克和正在库兹涅茨克兴建的巨大的钢铁厂，再到正在车里雅宾斯克建造的第三拖拉机厂，然后继续前往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在那里的铁山周围，一座钢铁城市正在兴起。这两趟旅行分别在一九三一年的夏秋两季成行。现在旅

游者都走这两条路线。

我要写写在苏联工业部门中工作的美国人的问题；这是分配我的一个任务。我还为自己定下了另一个任务。“我想弄明白，究竟是我本人古怪，还是这个国家和美国人之间的整个关系有点不正常。在苏联，还有没有一个地方，那里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呢？如果有，他是如何处理的呢？”

我沿伏尔加河而下，一路寻找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们。曾经在萨拉托夫儿童之家呆了很长时间的那二十个姑娘不见了。五年计划一下把她们卷入了工作岗位。我们那些学过机械的男孩子们，也在新建的制造厂或国营农场迅速找到了优越的岗位。整个伏尔加一带劳力缺乏。

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简直不象一个工厂，倒象一个战场！为建立苏联第一条传送带而战！在美国，花了整整一代时间才建成工业传送系统。但是在这里，必须以战斗的方式立即建成。从全国各省、区按分配的名额抽调了年轻的共产党员来这里工作，以便使所有的农村都学会使用拖拉机。一年半前我在此考察斯大林格勒附近的集体农庄时，我曾遇见过他们，当时这个工厂尚在建造中。他们曾对我说：“请告诉美国工人们，我们要把青春献给这场斗争。我们不会象他们那样把青春浪费在跳舞和同姑娘们调情上。一切抱怀疑态度的人，都将从我们队伍中抛弃。我们将一鼓作气地把斯大林格勒建成一个社会主义城市！”

这次重访，我找到了在斯大林格勒工作的美国工人。他们在这里已经工作一年多了。有些人已经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有几个死于头年夏天的伤寒，当时还没有合乎卫生条件的饮水。为使斯大林格勒铁工厂尽快开工，强壮的男人们在炎热的夏天坚持工作而常常晕倒；在这些中间就有美国人。有三位美国人——白夫科

维奇、科维特和宁丘克，这些名字象美国人吗？——连续工作了六十个小时，抢修中断生产线的七号机器。我到达时，厂里正在颂扬他们的英勇精神，他们下班时累得要死，连走路的劲儿都没有了。

工作？那不是工作！简直象打仗一样！

在一个漫长的炎热的“休息日”，三百名共青团员聚在一起，整整一天讨论如何在九月五日青年节前完成第一万一千台拖拉机。随后，他们准备乘船游览，在轻松愉快中度过凉爽的夜晚。但是，船来得太晚了，直到夜里十一点钟，才在遥远的前方出现船的灯光。年轻人你一言我一语，要求放弃这一活动。“得回去了，太晚了。好好休息准备明天干吧。”

当“骆驼”挂到车间里时，坚强的男人也抽泣起来，抹着满脸肮脏的泪水。这个微笑着的“骆驼”是损坏机器和秩序混乱的标志，挂在落后的车间里。顽强的人们已全力以赴，作出了他们最大的努力，但是他们的车间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们重新开始奋斗。仅靠一个人或一百个人竭尽全力地工作是不够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需要献身精神，也需要很好的组织工作。他们顾了这头丢了那头，在集中力量处理某一问题时，另一问题又冒出来，妨碍了他们的工作。他们必须学会日理万机。这种事在俄国从未做过。美国人能否教教他们呢？

在工厂后面沿伏尔加河岸，有几十幢用砖砌成的公寓住房，住着一百七十名美国人和他们的家属。第一批美国人是一九三〇年五月到这里的，但是在我一九三一年八月到来时，只有五人留下了。其他美国人是后来的。霍姆斯是随第一批来的。他曾是福特汽车厂熔炉车间的总领班。在这里，他在铸铁炉上工作。

“在第一批人中间有坏蛋，”霍姆斯说。“俄国人受骗了。来了

一些在底特律混不下去的恶棍。这里的行政当局也该受到责备。我们到此一个月还不安排工作。行政当局和工会都不管我们。而妓女对我们却十分注意，这些斯大林格勒的旧女性从未见过这样一帮子恣意挥霍的外国人，即使在沙皇时代也未见过！醉醺醺的美国人敲破了有轨电车的玻璃窗爬进里面。等着拉客的妓女多得很！当警卫人员不让他们晚上拉着妓女走进工厂时，他们就打警卫。于是正派的美国人选举了一个维持治安委员会，并要俄国人驱逐那些恶棍。但是，俄国人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采取行动。在此期间，所有美国人都得到了一个坏名声。”

霍姆斯自豪地给我看他的“突击队员”光荣册，上面称他为“模范工人”。他获得这本光荣册，是因为有一次一座熔炉突然爆裂，他从餐桌上被拉去修理。当时他脱去衣服，带领工人奋勇抢修靠近一堆火红的铸铁的这座熔炉。

霍姆斯认为他的工作效率不高。“我在美国曾经干得很好，”他说。“我想我还算个人才吧——福特汽车厂冶炼车间的总领班嘛。但是，天哪，在这里一切都是慢腾腾的！他们既然以高薪聘请我们来，为什么不很好地使用我们呢？整个第一年，没有人采纳我们的建议。我为我的车间写了大量指导性意见，但是他们总是丢失。”

麦克莱恩是个有才干的翻砂工人；他每天工作十至十四个小时，创造了纪录。他有一段时间很不愉快。那是维津斯基刚来翻砂车间当主任那段时间。维津斯基公开声称，在这个工厂里没有一个有用的美国人。他当着麦克莱恩的面说：“你什么也不懂，什么也干不了。”麦克莱恩当过庞蒂亚克的奥克兰工厂翻砂车间的总领班，这个自命不凡的维津斯基简直把他气疯了。他闹了两天，准备回美国。他要“同俄国绝交”。

这时，有人劝维津斯基让麦克莱恩去搞飞轮工作，这道工序正影响着整个生产线。制造出来的飞轮有百分之六十五至百分之七十五是废品；麦克莱恩去后把废品率减少到10%，而且提前完成了四百个飞轮。麦克莱恩对我说：“我不能象在美国时那样监督这种产品。但是，只要我在场，碰到不合格的东西，我就加以制止。有时我甚至不得不站在火红的铁水和模子之间来制止废品。我很多时间都呆在那里。维津斯基是个好上司。当我制止废品时，他支持我。但是，废品率还是太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不高。”

鲍尔干了二十年的落锤锻造工作。他在斯大林格勒也在锻造车间工作。“我刚到这里时，这个工厂的工人分成两派，”他对我说，“一派制造拖拉机，而另一派则不让他们干。看到这种情况，难道不知道这是破坏吗？在美国，公司之间互相激烈争斗时也发生这种情况，这我看到过。但我不知到哪里去提意见。找不对地方，会找错人。但是我确实看到了这些人把机器弄成什么样子。在使那台巨大的曲轴锤运转前，我真想辞去不干了。他们一会儿弄坏水管；一会儿用乱七八糟的东西把下水道堵死了；再不然，又因为一下子充电过猛，把发动机给烧了。我对车间主任索科洛夫说：‘我没有办法了。他们总是把事情弄坏。’于是索科洛夫为这台机器专门派了一个警卫，后来那台机器才平安运转了。慢慢地他们似乎发现了那些家伙。起先车间里净是这号人，但是，后来他们把这帮人都弄走了！”

“事情还不仅仅因为有破坏者。那些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伙子更麻烦。其中有一个人把一台落锤弄坏了，这落锤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生产线将由此而受阻。我及时把它修理好了，并换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人来使用它。随后，车间委员会的头头带来了一个从哈尔科夫来的新手，他想学开那机器。”

“我不想让哈尔科夫来的家伙摆弄这台机器。但是，我的那位工人不敢违抗车间委员会的安排。于是我亲自操纵落锤。几个小时的紧张工作，我就干完了足够供生产线工作一天的零件。后来车间委员会的那位老兄又来了，并带来了支援的人，我就把那台机器交给他，让他交给哈尔科夫来的那家伙使用。我恶狠狠地说，‘把这该死的东西拿去，准把它弄坏。’他们接过去了！真的把它弄坏了！第二天我们又把它修好。”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现该去什么地方提意见。在三层楼上有一个党委会之类的组织。那些人管厂里发生的事情。每当我嚷着要找党委会时，那些妨碍我工作的家伙就蔫了。但是，即使党委会的人也常对我说，我们必须‘培训从哈尔科夫来的工人’，所以我想我们必须这样做。这对斯大林格勒来说真够呛！”

为在斯大林格勒的美国人做了大量工作的人不是一位技工，而是一位“政治工作者”。他叫盖勒，身体长得单薄、颀长，从来没有干过一次浇铸，可能连落锤也没有使用过。但是他知道在苏维埃社会里如何行事，并开始教美国人“怎样做”。他设法使美国人进入工会。过去，工会一直不管他们，尽管他们在美国曾是工会会员。他在每个车间组织美国人召开“生产会议”，为更有效地工作提出建议。盖勒并不清楚提出的建议是否有价值，但是他明白，假如车间里的美国人都支持这一建议，他就可以向“工人建议实施局”提出，并要求采纳。“盖勒来以后，他们开始采纳我们的建议了，”这些美国人说。

没有一个美国人认为他是“真正有效率的”。所有美国人都抱怨，他们无法象在美国那样发挥作用。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国家能够“在这一片混乱中”取得进展。……“我们能够动员的力量，他们不了解，”工厂党委书记特列古边科这样对我说。当时

他正躺在床上，发着高烧，然而还用电话召开会议，组织工作中的每一细节和严密的核算，而且接受了我的采访。

“为什么他们不去旅行一趟？”我问盖勒。“我就要去几个大农场。我将带一个代表团和翻译，让他们看看他们制造的拖拉机运往哪里去了。”美国人说，他们没有时间，也付不起路费。“这样做对你有好处，”盖勒说。“工会负担一切费用。”……“嗯，我想也许他们欠我们点什么，”美国人嘟囔着说。他们真去了。

大部分人看完大农场后变得热情起来。“你看，尽管斯大林格勒那么乱糟糟，他们还是在这个国家里有所作为。”……但是，在农场工作的美国人却也象拖拉机工厂的人们那样，感到效率低、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他们告诉我，没有人采纳他们的建议。他们说，那些顽固的头头们舍不得花钱买一把扳钳，却让昂贵的拖拉机扔在那里变成废物，其实，只要有几把便宜的工具，就可以修理好。“旅行一趟有好处，看看这个国家，”一位斯大林格勒的工人说。“你可以让他们出钱嘛！”甚至那时我也没有想到别人说过同样的话。

我来到第聂伯建筑工地。在巨大的水坝后面，河水正在上涨，人们正从基赫加斯村搬出，不久，这个村就将被河水永远淹没。一九三〇年一月我来访时，人们正在向河床的岩石上打钻，钻声轰鸣，震耳欲聋。现在，这一切都已过去。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力发电站堤坝，巨大的弧形坝壁横跨两岸，高出水面三十四米。满载水泥的火车，喘着粗气通过弧形堤坝，把水泥填进两层坝壁中。

我想起了铸造厂的一位热情的工人，上次访问此地时我曾见过他。当时我曾问他是否喜欢他的工作，他坚定地大声说：“你知道，我们将在一九三二年完成，”这似乎就算回答。我对此报之一

笑，他误解了我的微笑，继续说：“所有美国人都认为我们办不到；他们说要到一九三三年才行。但是，我告诉你，我们将在一九三二年完成。”铸造厂的一位普通工人在向库珀小组的工程师们挑战了！

是的，他们已进入了最后完工阶段；五台涡轮机将于一九三二年开始运转；这是肯定的了。特列古边科不是在斯大林格勒对我说过吗：“我们能够动员的力量，外国人不了解。”

来自纽波特纽斯的四位美国人对这种巨大的力量有所了解，他们在这里安装涡轮机。他们对俄国人开展的“突击队员”运动大为赞赏，特别是对姑娘们的干劲更加佩服。“我们真没有想到，姑娘们还能干这样的事！”他们自己也因为提前二个月安装完涡轮机上的九个涡形管而获得“突击队员”称号。当地还特为此设宴表彰他们。但是，他们对工作状况仍不满意。“每当你培训出一批聪明伶俐的助手后，他们就被全部调走，派去当领班，于是你又得重新使用新手，重新培养他们。”这几位从通用电气公司来的美国人对发电厂房顶迟迟不能完工十分恼火，因为这使得他们无法安装发电机，他们只好等待，而发电机是很容易被雨水淋坏的。

堤坝上方不远处是美国顾问们的居住区，他们是库珀小组中最后一批人，负责质量和设计——检查验收工作。但是，用他们的话说，他们“不直接属于第聂伯建筑工地的任何人管辖，”所以省去了很多琐碎事务的扯皮。但他们感到孤独。我停下来同普尔斯夫人交谈，一年半前她曾告诉我，她想熟悉这里的一切。“我们为俄国工程师举行了一个晚会，”她说，“也曾逐一拜访了他们，但他们从未来看过我们。我唯一的联系是通过我的保姆，她认识工人们；她带我去参观了一个有趣的日托站。”普尔斯夫人渴望了解她周围的生活；她想参观学校，又怕打扰别人。我曾向第聂伯建筑工地党

委书记提起过她的愿望。他说他也很希望“同美国人联系，帮助他们了解这些情况。”……一年半过去了；他们仍然形同陌生人。普尔斯特夫人即将返回美国，她对俄国英勇的、创造性的工作满怀敬佩，尽管她在那里一直异常孤单。我们这些人都怎么啦？

在哈尔科夫，我发现在这里的拖拉机厂工作的美国人比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时愉快得多。他们中大部分人曾在斯大林格勒呆过一年。现在他们对苏联已有些习惯了。而苏联对他们也越来越熟悉了，苏联有意识地这样做。哈尔科夫工厂厂长对我说：“我们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中吸取了教训，学会了如何使用美国人。我们不让他们负责一般的行政工作，因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制度。我们也不让他们当‘顾问’，这个工作实际上意味着没有人同他们商讨事情，所以他们极不愉快，整天在厂里转游，想找点事干干。我们分配他们明确的技术工作，告诉他们如果碰到困难，去哪里寻求帮助；然后要他们负起责任。用这种方法，他们为我们做了很多有用的工作。”

一位美国人证实了他的这种说法。“从我在哈尔科夫的情况来看，苏联政府在我身上花的钱肯定是划得来的，”他笑着说。“这里不象斯大林格勒。”他很高兴，最终获得了“公平交易”。

我在哈尔科夫斯巴达克旅馆里遇见的伍德，看起来是一位愉快的美国人。他不搞生产；他的具体工作是调查轧钢厂出现故障的原因。出现故障是经常的事，原因众多，所以伍德干得很欢。他笑着说：“我为他们抓出破坏者。不是直接去抓；我并不认识张三李四。用起重机吊起钢制工作台，需花半天时间，我打开台下损坏的机器的变速箱一看，发现里面塞了九桶肮脏的铁屑。我对共产党的车间主任说：‘这种事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这个人不错，他虽然不熟悉轧钢厂的工作，但他知道抓谁。当我告诉他这些情况时，他两眼发光。我走到哪里，哪里准有人要倒霉了。”

然而，甚至伍德也不甚了解苏联的情况。在一系列紧张的调查中，他瘦了四十磅，后来因肺炎而躺倒。当局为他派了一个护士日夜照料，还另派了一位懂英语的护士当翻译，在病情危急时，一位大夫日夜守在他的身边。为此，伍德十分担心他的医疗费，在病体未愈时他就下了床，结果旧病复发。他跑到钢铁托拉斯办公室，对他们说：“你们必须分期从我的工资中扣除这些费用；一下子扣这么多钱，我可受不了。”令他感到吃惊的是，竟是免费医疗。伍德本来以为，即使一个人为苏节省了数十万美元，也应该支付医药费，尽管此病是因过分劳累而得的。他习惯于资本主义的那一套。

在第二趟旅行中，我东行来到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在那里，我看到库兹涅茨克钢铁厂正在混乱中建起。两年前，这里尚是一个安静的小村，仅有一千五百人。一年前我第一次来访时，还只有一个刚刚破土开挖的大土坑。现在，这未来的钢铁厂沿着山谷延伸四公里之长，在脏乱的废墟中，巨大的塔式建筑已建到一半。头二个高炉的八个壮观的“烟囱”直刺云端，滚滚浓烟划破长空。四周，七层楼高的发电厂巍然屹立，大型铸造厂的屋顶如海涛波浪起伏，还有平炉厂的幢幢建筑——美国人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平炉”——和已经动工的轧钢厂。右面一英里多处，耸立着耗资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耐火砖厂，它可以供应库兹涅茨克的所有用砖。这就是这个新兴城市的规模。

美国弗雷恩公司的工程师们正在库兹涅茨克工作，这个公司为这里的发展起草了基本图纸。负责建筑的高级工程师格伦每天要爬数英里堆积如山的水泥、钢筋和木材，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行美国的方法。他反对俄国工程师和新任命的领班们整天坐办公室的做法；他整天呆在脚手架上或土坑里。“每当在我负责的工作中

出现危险情况时，我总是带头去干，然后才要求他们跟着干，”他对我说。“我已经明白，在这个国家里，仅仅给领班下达命令是不够的；你得把情况向所有工人解释清楚。为了少加班，他们在冬天竟把冰块和冻硬的砾石扔进混凝土里。下命令也阻止不了。所以我召开了一个会，对他们说：‘你们整天在此干这个活，可我不能二十四小时都呆在这里看着。向混凝土里扔冰块和冻硬的砾石，其结果可能有损于我的名誉，但是，也损害了这个轧钢厂，而这个厂是属于你们的。在这样的冬天浇灌水泥，在你们国家是第一次；你们干活时必须小心仔细。’后来再没有发生这种事。我正在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宣传家呢！”

很多别的工程师也同俄国工人在一起干活，教给他们怎样做。齐默曼还写了一系列有关技术的小册子，其中三本已经在库兹涅茨克翻译出版。其他工程师则自愿去帮助教技术课；他们想参与周围的生活。他们同我遇见过的任何美国人一样，这样去做了。然而，他们与俄国人之间仍然捏不到一起。俄国人说，美国人“太被动”。什么！他们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翻越一堆堆如山的建筑材料啊……“但是，他们不向报纸、工会或党组织揭发存在的弊病。他们只是把这种情况告诉行政当局。他们实际上没有真正‘参与’。”

我开始考察这种被动性。一个美国人谈起他曾目睹了某些不按技术规章办事的情况，我问他：“你是否想过投书库兹涅茨克报纸揭露这种事？”他看起来感到吃惊。“那怎么行，那样做不合适。你知道，我们是为弗雷恩工作的，他是由这里的钢铁托拉斯雇用的。钢铁托拉斯为我们提供的知识而付钱。我们向行政当局提供这些知识，他们愿意要多少，我们就提供多少。但是，我们越过弗雷恩先生和钢铁托拉斯在报上揭露人家，是不合适的。”

“在这里他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回答说。“那些有影响和受欢

迎的人就是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那样做是在制造混乱和进行煽动,”他回答说。他的职业道德标准同苏联的标准恰恰相反。

有天晚上在一次圆桌讨论会上,这些美国人就有关苏维埃俄国的情况向我提出了各种问题,我只好承认自己“对共产主义不是权威”。会后,他们问我,“你认为我们能否请这些共产党人中的某个人定期来此呆一会儿,告诉我们一些情况,回答一些问题?我们不想让他们认为我们在插手他们的政治,但是,我们有些人很想知道我们在这里建设的情况,因为这里的建设情况跟我们知道的轧钢厂不同。”……我告诉他们,当地党组织将会很高兴为他们派一个人来。这人派来了。他们未曾想到“美元工程师”还会对这些情况发生兴趣。双方都不知道如何接近对方。

六个小时的火车旅程,穿过库兹巴斯山谷,把我带到了列宁斯克的煤矿区。这里住着一百多位美国矿工和他们的家属。他们来“建设社会主义,象俄国人那样生活”。分配给他们的住房和食品比俄国矿工的好得多,然而,他们之中三分之一的人只呆了几个月便离开了。美国矿工对食品和住房无所抱怨,但他们对混乱的状况不满。他们的不满是有道理的。

列宁斯克的人口在一年之内从三万增加到十万。他们狂热地开矿井,建标准住房。有些住房,还没来得及安装屋顶,就出现了裂缝。一百多名美国人只有一名翻译。这些人讲着各种方言,从南斯拉夫方言到威尔士方言,翻译自然不可能都懂得。他们遇到的第一次麻烦是由于护照问题引起的。这些护照被随便地从他们那里收走了,有的是在路过新西伯利亚首府诺沃西比尔斯克时收走的,有的是在列宁斯克收走的。有几份护照后来送回来了,但大部分毫无音讯。美国人对此并不介意;他们习惯于不带护照生活。

后来有人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持有护照。一些流亡富农的老婆在市场上对这些美国人的妻子(有些人能讲俄语)说：“你们的丈夫在欺骗你们。在这里，没有护照，就是流亡者！”于是美国人开始询问，每个俄国官员都彬彬有礼，他们都想给予回答，但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了解，所以他们作出的答复各不相同。

一位说：“但是，你不可能没有护照；你肯定放在什么地方了。”另一位则说：“他们留下了那些签有合同的人的护照，这样他就无法逃离了。”结果，惊恐之情传遍这个居住区。有人大声喊道：“这是强迫劳动！”一位神经质的男人竟吓得夜不能眠，在外面边走边哭：“我永远也出不了西伯利亚了！”我缠住了一位刚从新西伯利亚来的煤业托拉斯官员，问他为什么会出这种“粗暴事件”。“怎么啦，”他说，“他们的护照大都放在我包里，放在我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的办公桌里。大部分美国人没有交登记用的照片，他也太懒了，没有派人去要这些照片。”

这位官员曾去了解过那些要求离开的人。他厌恶地说，他们“根本不是矿工，而是一帮对什么事都没有恒心的人；他们什么活都干过，从煤矿到福特汽车厂——甚至还做过小买卖。”我说：“在美国大部分矿工都是这样。你对要离开的人有什么看法，我不同你争辩。但是，你在离开这里以前，应该同那些准备离去的人见一见面。这里没有人能对发生的事情作出解释。”

我们开了一个会。矿工们已经工作了一个月，但工资还没有到手；领班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忘记了把他们列入工资册。他们带着嘲笑，翻开了天书般的工资册。这位官员解释道，诺沃西比尔斯克已经知道这种情况，所以决定头三个月付给美国人一样的工资，等到他们了解每个人的工作情况后，再分别付酬。美国人对矿井设备之差和组织的混乱特别不满，认为与其说是靠技术，不如说是靠

体力出煤。他们不会使用被称之为铁铲的“那些木棍”，然而，就连这样的简陋铁铲也不够用。这些美国人为自己是高效率的矿工而自豪，但这种自豪感正在折磨中失去。他们来到这里是想把美国的方法教给西伯利亚人。但是，在列宁斯克的混乱情况下，西伯利亚农民挖的煤比他们还要多。

我同库兹巴斯的一位老干部谈起列宁斯克的状况，我是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同他认识的，那里正在建造一座世界上最大的重型机械厂。他笑着说：“听起来有点象过去的情况。一九二三年我们在那个山谷中也曾有过同样的问题。但是，现在不会象过去那样了，这种情况很快会结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经前进了。在未来六年中，列宁斯克将要建造二十六个新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碰到一点混乱。所有这些美国人真正需要的，是要有一个精干的政治组织者，带领他们在苏联的情况下进行战斗。他们自己也会成为第一流的指挥官。他们是矿工；他们懂得如何组织和战斗。”他若有所思地继续说：“我真想回去教给他们如何干，但是我在这里太忙了。”

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他们做了最伟大的工作。在同任何城镇都有五百英里距离的乌拉尔原野上，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迅速建起了一座拥有十八万人口的新兴钢铁城市。金秋之夜，晚风徐徐，散发着葡萄酒般令人沉醉的芳香；四周山丘，万家灯火，犹如虚无飘渺之仙境。我挤上一辆拥挤的卡车，这批人是柏林的工人，他们来此要“永远呆下去”。紧挨我的那位妇女靠在斜放着的一个人手提箱上，忍着挤压的疼痛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当剧烈的颠簸使她猛地碰上手提箱尖角时，她疼得尖叫起来。她无法在颠簸中保持平衡，因为她两手抱着一个婴儿。尽管不时地发出尖叫，她的眼光却欣喜地环顾着四周的灯火：“多美啊！”她赞叹着。“永远愿意在

这里工作!”……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俄国人、德国人、鞑靼人、甚至吉卜赛人,三十五个民族的人纷至沓来,每天平均三百人。整整一年半时间内,人群不断流向这里;这种势头还将持续多年。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出版发行十一种报刊,其中有四家日报,二份技术性杂志,一份文学双周刊。这里已经开办了十三所小学、两所技术大学,并建起了一所大型戏院、一个“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更好的马戏场”和六、七家电影院。一家木工厂每天生产的材料可造四幢标准临时住房,每幢住二百人;一家水泥厂已生产了二百万块预制板。化纤厂正在生产地板。石灰石采石场正通过山谷下新建的铁路输送着石灰石。从五月以来,世界上藏量最大的铁矿已向乌拉尔各地运送铁矿石。一座四分之三英里长的水坝已使荒凉的山谷变成湖泊。

然而,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尚未开发”!没有开发?没有!生铁还未出炉!所有这些工厂都在为此而全力以赴。

有四十位美国人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工作,他们来自麦基公司和科珀斯公司。其中许多人向俄国工人示范如何干好活,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的欢迎。诚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已完全适应。在工人中最受欢迎的人似乎同公司产生了摩擦。单独签订特别合同的考尔德,深受他周围的俄国青年们的敬佩。但是,他对他们毫不留情。他对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说,他们是一批吹牛大王。他故意刺激他们,要他们言行一致。他们热情地接受了他的挑战。他们要向这个美国人显示一下。于是他们偷了吊车,后来又被迫送回去。卡尔德记录青年们的工作情况,表扬好的,批评差的。卡尔德讲英语总是十分费劲,好让他们听懂。

在我的旅行中和在这个新建的大型钢铁厂的所见所闻,清楚表明,几乎没有一个美国人感到他是成功的。总是有些事影响着

他们的效率。这种效率没有发挥。这使他们耿耿于怀。对此，大部分俄国人的态度十分简单，有点玩世不恭：“假如我们用不着他们，就让他们走。假如我们要用他们呢，就多给些美元。”

这种态度使美国人十分愤慨。“这些家伙嘴上说在建设社会主义，但他们满脑子想的就是钱！他们能够少花钱而得到很多有用之人，假如他们能让这些人放手工作的话。但是，上帝啊，他们竟如此肆意浪费美元。他们对几个人的工资抠得很紧，却随意花数百万元买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设备。在机器方面，我本可以为他们节省百万元，但是他们的工程师一个个象喝醉的水兵……”美国人最虔诚的信仰受到了伤害；浪费对他们来说犹如魔鬼，我在年轻时代上学就已这样认为了。

我经常向俄国人提出抗议。“这些人不仅仅是‘雇用’来的。他们还想把工作做好。”

“他们对社会主义不感兴趣，”这是很现成的回答。“我们注意到他们拿了美元。”

是的，他们拿了美元。干吗美国人要拒绝拿美元呢？美元对美国人来说是表明他们价值的象征。他们来自资本主义，在那里，对人的标准是能拿“五千美元”。在他们身上，希望有所建树，渴望知道自己的工作是否有成效和希望得到美元，这三者是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无从区分。美元使他感到成功，体验到个人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当他担心自己的工作没有做好时，如果给他更多的美元，就会使他心安。难道我不是也用美元考虑问题吗？只不过是有一种奇怪的颠倒过来的方法考虑罢了。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我曾拒绝接受特许权委员会发给我的工资；理想主义的旗帜曾使我削减在《莫斯科新闻》工作所领取的薪水；而当星火出版社拨给我经费时，我开始相信我的权威了。难道这一切都是扭曲了的吗？

难道金钱不是真的具有某种意义吗？

对俄国人来说，美元不是价值的标准，而是笼络人心之物。由于他们从亚洲市场的道德标准一下子跳到社会主义的标准，他们没有学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高效资本主义才使美国人养成的以金钱来衡量一切人和事的天然标准。俄国人很快发现，他们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学会这种以金钱为标准来衡量人和事的办法。不久前还是农民的一群工人，需要按标准化的计件工作给予分等级的奖励。但是，俄国人把人基本上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自愿为社会主义工作的，另一部分是被迫或受笼络而工作的。美国不是强迫而来的，也不关心什么社会主义。显然，俄国人认为可以给他们以笼络。

笼络确有成效；笼络常常使他们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结果，由此证明，俄国人是正当的。但是，我却感受到了那些极想把工作搞好的美国人所忍受的无法理解的痛苦。我会同俄国人争论：“为什么你们不可以对他们作更多的解释，花更多的时间，更好地进行组织工作，使他们能够感到自己的工作有效率呢？这样做，你们既可以少花钱，又可以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是的，这是事实。后来俄国人开始作出更好的解释了。

回顾往事，我以及现在分散在世界各地有工作和没有工作的美国人，可以问心无愧地面对过去。我可以这样回答：“你在这新社会尽了你的一份力量——或多或少是盲目的。我也尽了我的一份力量，或多或少也是盲目的。但是，进行解释、花费时间、更好地组织是‘太昂贵’了；它们使那些杰出的同志们付出生命的价值。米哈伊洛夫不是为了征服斯大林格勒第一条传输带而献身了吗^①？”

^① 米哈伊洛夫是这个国家汽车工业的高级领导人之一。在几任厂长

米海洛夫能花更多的时间给我们以指示吗？用美元进行笼络是更便宜的。”对那些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对那些将永不回去的工人们，我将要说（假如需要说的话）：“你们自己闯出了道路。比起你的技术来，这个国家更需要你们的奋斗精神。”

五年计划是苏维埃俄国摆脱资本主义剥削世界而进行的“独立战争”。人们在这场战争中献出了生命。但是，他们赢得了这场战争。他们改变了国家的面貌，使它从一个只有落后的工业和中世纪农业、靠坚强意志保卫的国度，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国家。苏联从一个中世纪小农经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以工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二千万个小农场变成了二十万个大型集体农庄，而且部分已实现了机械化。在这个一度是文盲的国家里，建起了大量中、小学和大学，实行义务教育制。新的工业部门如雨后春笋迅速建起，包括机床、汽车、拖拉机、化工、飞机、优质钢、大功率发电机组、氮肥、合成橡胶和人造纤维。数以千计的新工厂建立起来了；数以千计的老厂被改造。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变成一个强大的现代国家，它的声音在国际社会中举足轻重。为了这一目标，成千上万的人象在战争中一样，不怕牺牲，艰苦奋斗。

诺沃西比尔斯克一年中所建的铁路，比整个土耳其斯坦——西伯利亚铁路还多。在那里，我偶然碰见了比尔·沙托夫。他病了；紧张的工作影响了他的眼睛。我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来，安一个家，这样生活更舒坦、更正常一些。比尔直愣愣地盯着，似乎我发疯了。

都未能使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完成生产计划后，他亲自抓这个厂，最终完成了任务。但是，过份紧张的工作使他身患重病，在拖拉机厂完成任务后，随即去世。……这种情况在地位比他低的领导人中很多。——原注

“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工作，”他说，“不，不仅仅工作！而是创造！生活在这样一个特别时期，我们有机会进行无限的创造。你想想，我能够放弃一个小时的创造，而去对妻子温情脉脉或按时回家吃饭吗？”

令人难以忘却的豪言壮语！它们在广袤的原野上回荡，变成了铁路、轧钢厂的阵阵轰鸣！在一无所有的土地上——一个个社会主义城市正拔地而起！在一片混乱中——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建立！不，这不仅仅是工作！这是创造！

比尔·沙托夫的话使我无比激动兴奋，然而，孤独和渴望又不时令我心绪不宁。我是怎么回事，我们所有美国人都怎么啦，为什么我们不能同这种创造很好地联结在一起呢？我们大家都能从我们工作的一片忙乱中，从《莫斯科新闻》、从斯大林格勒、从库兹涅茨克看到：我们周围的人——不仅仅是在我们呆的地方的那些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创造一个新世界。

第二十六章 向斯大林呼吁

在《莫斯科新闻》的境遇越来越糟糕。瓦索夫一味不理睬我的辞职要求；梅希劳克又很难见到。我突然想起了中央委员会，据说我是中央委员会任命的，但是，我从未造访过它。也许，我应该向他们提出辞职书吧。我给他们写了封信，结果新闻部长古谢夫接见了。我不清楚他是我的顶头上司呢，还是仅仅算一位顾问，但他似乎认为他有权力。他想知道我有些什么不满，有些什么要求。到这时，我反而讲不清究竟有什么不满意；似乎一切都不满意。我所要求的只是想离开。这使他有点疑惑不解，但他仍然友好地说他将考虑该怎么办，并劝我去同瓦索夫谈一谈。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我无法再见到他，所以，我判断古谢夫是位心地善良者，但他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

我发现一位俄国共产党人对在小册子上使用他的名字特别生气，于是我把我的麻烦对他讲了。他自然感到愤慨，说：“他们在利用你对我们习惯的不了解。他们没

有权力使用你的名字，除非你同意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在使用名字这方面，我们比你们更认真。假如你无法得到满意的回答，给斯大林写信。”

“仅仅是为了个人的事？”我吃惊地大声说。“我倒是想过给他写信，谈谈共产党为美国人出版的刊物，文风不好。”……他说：“两者都可以谈。”我这样做了。

三天后，斯大林秘书处打来电话，说他们正在调查我谈的问题，几天后将给我答复。第二天下午，瓦索夫告诉我，已经同意我的要求，删去我的名字。“我希望您继续为我们写文章”，他说。几个月的紧张关系终告结束，我感到宽慰。我答应不仅写文章，还将参加编辑会议，并提出我的意见——“因为我们终于以诚相见了。”

我想，我给斯大林的信起了作用，在幕后施加了魔术般的压力。令我更加吃惊的是，第二天傍晚，斯大林秘书处又来电话，说他们要召集瓦索夫、我和“有关负责同志”开个会，讨论我的意见。“干嘛要麻烦别人呢？”我对他们说。“问题已经解决了。”……“彻底解决了吗？没有别的事要谈吗？”……好的，我想，去就去吧。……害怕打扰负责同志的这种担心，几乎使我错过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半个小时。

瓦索夫郑重其事地打电话说：“我就去，接您到斯大林那儿去。”……大概又是瓦索夫虚张声势吧！我们当然只是去见某个秘书而已。在特维尔斯卡亚，他的福特牌汽车拐向了右面。

“我们不是去中央委员会吗？”

“不，”瓦索夫说，“我们去克里姆林宫。”

夜幕刚刚降临。曾在中世纪时代护卫着克里姆林宫大门的古老内格林卡河，现在已从地下流入莫斯科河。汽车沿着高耸的黑墙下凹陷的亚历山大公园疾驰。我们在白色大门处拐弯，通过了

现已变成马路的吊桥。华灯初放，公园已经落到我们下面，汽车通过一排排路灯，驰向古老的钟楼，楼顶圆式的大钟发着暗淡的白光。

一名士兵在入口处挡住了我们。

“你到斯大林秘书处那里去问一下，就知道我的名字了，”我的同伴不无自豪地说。“我叫瓦索夫。”

卫兵检查了一下名单，随后带着疑问的眼光看着我。

“斯特朗，”我回答说。

“对，”说完，他退后一步让我们通过。随后我们沿着马路盘旋而上，这条马路向右通向更大的宫殿，向左则到达政府大厦和克里姆林宫卫队老营房。

汽车开上了向左的马路；在一群大楼中间停下后，我们走进一个普通入口，登上小电梯来到楼上。我发现这里是一个灯火通明的大办公室，六、七名秘书正伏案工作。入口处站着几个人，其中一人随意向我打个招呼，指给我看已经在那里的梅希劳克和古谢夫。噢，这些人就是我要与之商谈的“负责同志”吧。我不想与梅希劳克多啰苏，他竟能九个月不管我，把我推给瓦索夫。古谢夫这个人倒不错。他有一次曾问过我有什么不满，当时他似乎对我的抱怨迷惑不解。在随后的两个月中，我一直未能再见到他。但是，两个月在苏联将意味着什么呢？不管怎样，我已经离开了那家报纸；他们无法让我再回去。

一扇大门打开了，出现一间长长的会议室，里面放着几张铺着绿绒布的桌子。在最近的一张桌旁，我看到斯大林、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他们正站起来迎接我们。这些人是“负责同志”吗？我真不好意思占用他们的时间。我们本该设法解决那份可怜的报纸的问题，不该打扰这些决定着占地球面积六分之一的国度之命

运的这些要人。从那个很随便的电话中，我压根儿未想这样重要的会见，以至当时我随便回答说：“不必费心了。”我觉得对我的事太认真了。我本以为作些解释，事情也就算结束了。

我快步走上前，同他们握手。我没有想到要等着给我介绍，不应有任何拖延。他们知道我是谁，因为是他们派人把我接来的；当然，从红场的游行和报纸刊登的他们照片中，我也认识他们。斯大林健壮结实，身穿黄褐色制服，脸呈古铜色，头发灰白。看起来他是一位不知疲倦、无需休息的人，尽管他工作时间很长，但还可以继续工作更长的时间，因为他懂得如何使用力量——安详，决不任意浪费精力。伏罗希洛夫则显得活泼、好动，不懂得节省精力；卡冈诺维奇高大、英俊、皮肤黝黑。

斯大林问我用俄语进行讨论能否听懂。他眼神严肃，但却友善，让你不感拘束。随后大家在盖上绿绒布的桌旁坐下。伏罗希诺夫坐在桌子一边的顶头，斯大林在离他较远的一个地方坐下，从那里可以看清每个人的脸。我们坐在桌子的另一边，第一个是卡冈诺维奇，我的位置几乎同斯大林相对，然后是梅希劳克、古谢夫和瓦索夫。桌上的灯似乎挡住了瓦索夫的视线；他经常站起来，站到我的身后，把一只手放在我的椅子上。就这样，开始了我们无拘无束的谈话，没有明确的主持人，也不作任何记录。

斯大林立即转向瓦索夫。“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位同志抱怨说，你不给她决定报纸事务的权力，但却又坚持在报上保留她的名字。假如她要求去掉她的名字，就说是反苏行为。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粗暴的做法呢？”……好一个开门见山！我甚至感到对不起瓦索夫。

然而，瓦索夫竟能随机应变，我笑了。他总是这样应付裕如。他说，他已把此事报告了中央委员会，必须等待他们来决定。随后斯大林转向古谢夫，询问他拖延的原因。我想：“既然问题现在已经

解决了，为什么还要麻烦古谢夫这位正派人呢？”我打断他们的谈话，告诉斯大林，昨天晚上已经同意去掉我的名字。瓦索夫为强调我们之间的融洽关系，拿出了我的信，上面写着 I 同意继续为报纸撰写文章。

伏罗希洛夫笑着说：“什么时候同意的？昨天晚上？这是在我们调查后才这样做的！”卡冈诺维奇接着说了句打趣的话。古谢夫说：“您还没有过问，我们就办了。我们不知道您正在调查。”……是的，这是很可能的。但是斯大林转向了我。

“您写这个东西是出于您的自愿呢，还是受到了什么压力？”

“是出自我的自愿，因为他们同意去掉我的名字……”

“您还愿意继续为这份报纸撰写稿子？”

“是的。”

“您愿意在您的文章上署名吗？”

“是的，我想是这样……”

“只是不为报纸署名？^①”斯大林坚持问道。为什么他要了解这些细微末节呢？不管怎样，这事已经解决了嘛。

带着胜利的快意，瓦索夫站起来，打开一份《莫斯科新闻》，并翻到最后一版。我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斯大林从来没有读过此报，瓦索夫在炫耀表功。“她的名字已经从编辑名单中删去了。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

室内出现了短时间的沉默，似乎他们正在理解是怎么回事。随后斯大林用分析的语气，平静地问：“这样做对她算不算是一种降级呢？”……什么！显然，他洞察一切！我的心狂跳起来，脸上露出了

^① 在俄国的报纸上，主编的名字署在最后一版的末端，以表示他对报纸的内容负完全责任。——原注

笑容。他明白，假如一位有用的工作人员希望工作，但又努力躲避承担责任，那就说明有什么问题。双方达成的协议没有能瞒住他；他看到我已不抱任何希望了。他想知道，在此之前我有过什么希望；从他的语气中，我听出了这一点。

“那么您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了吗？再没有了吗？”对我这样说话的，是斯大林。有两、三次，他抓住机会用不同的方式以询问的、安慰人的口气讲着这一点。他的语气好象在问：“那么，您对生活就没有要求了？”对面前的这个人，你可以把心掏出来，无话不谈。他体贴人，你未张口，他就知道你想说什么。他希望更清楚地了解情况，并给以帮助。我从来还没有碰到一个人，可以如此无拘束地与之倾谈。

蓦然，我那已经死去的意志重新复活，象火焰般熊熊燃烧起来。现在我明白我想得到什么；两年来我一直怀抱着这种憧憬。两年？哦，何止两年，要长得多！它来自遥远的过去。但是，它已被歪曲了的繁琐生活所埋葬；它被歪曲得使人不再怀有希望。现在，我又一次希望把美国的效率带给俄国；我想办一份报纸以帮助在苏联艰苦奋斗的美国人。我朝思暮想，何时不想办成这件事呢？

我侃侃而谈；他们必须了解这一情况。我谈到了两份报纸，一份为工程师而办，另一份供工人阅读。它们互相争斗，组织竞争活动，使美国人产生混乱。“结果哪一份也不可能坚强有力，哪一份也办不好。”

“当然，工人和工程师之间是有些不同的，”我承认说。……斯大林用深沉而坚定的语气说：“存在着不同。”……刹那间我心慌意乱，只有这时，我才感到谈话难以进行。他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是说我没有看到这种不同吗？他是对的。虽然我谈到这一点，但我强调得不够。他的意思不一定是说，我们无需出一份合并在一起的

报纸。

“在苏联工作的美国人和美国工程师虽然彼此有不同之处，但还不需要为他们出版两份报纸，”我抢着继续说。“这些美国工程师大部分来自工人；工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恰当地利用他们的技术。我不是指那些所谓‘外汇专家’，他们反正不看苏联报纸。而其余的人却愿意在这个国家有效地工作，但他们又不了解这个国家的生活。他们都需要知道发生的事情和各种情况，而不是长篇大论和理论性文章；他们需要了解日常生活和斗争中产生的问题。应该告诉他们如何做才能在这个国家的工业中发挥作用。他们需要一份报纸，把他们团结起来，而不是两份，使他们分离。他们自己也不喜欢有两份报纸。他们跑到我们的驻地，又到《工人消息》驻地，总是问为什么我们要出版两份互相争斗的周刊，而不是出一份统一的日报呢？”

瓦索夫支持我的建议；他要求出“一份强有力的日报”。我想：“他想吞并阿克塞尔罗德，但那是不公平的。”……我本该清楚事情在怎样发展。瓦索夫总是会站在胜利的一方的。

古谢夫随后解释了为什么出两份报纸的理论根据。难道真有一种理论吗？我认为这是阿克塞尔罗德想保持不变的一种愿望。不，阿克塞尔罗德是一位好共产党员；他肯定有某种理论。

他说：“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工程师，为了在国外发行，我们需要办一份多少带点自由派色彩的报纸……”

“你说的‘自由派’是什么意思？”斯大林问。

我纳闷，这是不是在纠正古谢夫，犹如为纠正我而说“存在分歧”那样呢。但是，斯大林并不要求得到回答；他是以此来引导人们的思想。

古谢夫继续说：“但是，到我们工业部门工作的美国工人越来

越多，我们需要为他们办一份比较严肃的报纸——类似于党的机关报。”

出现一阵沉默。斯大林似乎在考虑。“不，甚至为他们也不需要这样做，”他说。

卡冈诺维奇接着说：“事实，明白无误的事实对他们也有好处。”

“如果他们同我们在一起呆的时间很长，”斯大林说，“他们就将学会俄语，从我们俄国的报纸中汲取他们的理论——这些报纸上充满这种理论。”……什么！他也不知道对刚刚开始学习分析的人来说，理论是令人厌倦的吗？他了解长篇大论的乏味吗？

梅希劳克接着说，〈莫斯科新闻〉最初是为工程师们创办的刊物。梅希劳克一开始就打算把它办成仅供工程师阅读的杂志。那末，正是他背叛了我。但是，现在他却说，情况可能正在变化。主要麻烦是阿克塞尔罗德——这位主编很难被美国人接受。后来，由瓦索夫代替了他，瓦索夫是一位“容易相处”的人。

“你认为瓦索夫容易相处”，斯大林说。“也许，斯特朗同志有不同的看法吧。是不是这样？”他转向我，微笑着说。“瓦索夫容易相处吗？”

对我的敌人发起反击的机会已经到来。但是我不能这样做。瓦索夫倒无所谓。既然我已知道存在着反对合并的理论，我担心这事可能通不过。在我思想深处，我清醒地意识到，如果合并成一家报纸的问题能够解决，瓦索夫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我默然了，我感到左右为难。我不想谈论瓦索夫，甚至不想回答斯大林。“我并不认为瓦索夫的个人作风是问题的要害，”我脱口而出。接着我很快说下去。“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份刊物原打算为工程师办的。过去说是为所有美国人办的，要慢慢发展成日报。”

“是谁这样说的？”伏罗希洛夫问道。

“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我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出来了两份报纸。”……我继续说着，但是，突然我感到问题已经解决了。似乎人人都明白这一点。

“一份报纸？”……有人问。“一份报纸，”另一人回答说。……“不是一份党的报纸？”……“不，不是一份党的报纸。”……“但是，总是一份苏联报纸吧？”……卡冈诺维奇说，“至少不是一份反苏报纸。”大家都笑了起来。看来大家都心照不宣了。

“假如我们要办成这样一份报纸，”瓦索夫对斯大林说，“您得告诉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不要干涉我们。他们甚至审查我们的工人来信。一位美国水兵给我们写了一封很好的信，他在奥德萨港呆了四天，我们知道那里的情况并不太好。他发现那里很有希望，印象深刻。他写道：‘我在奥德萨看到了一些悲惨的情况，象我在世界上所有港口所看到的一样。但是……’”瓦索夫在此停住没有谈下去。

“他们从奥德萨挑出了‘悲惨’的情况，”斯大林用一种完全理解的语气说。这不仅仅包含着对我们、对审查员也会犯错误的理解，同时也包含着对奥德萨和它的苦难的理解，包含着对这种“悲惨”能如此容易地被“挑出来”而感到的高兴。突然，我甚至也理解了这位审查员：他不是主宰一切的独裁者，而是一个权力有限的人，他试图在一个布满敌人的世界上保护他的国家。人们必须懂得怎样同他合作，何时同他争论和斗争，何时对他让步。

我们都站了起来，斯大林向卡冈诺维奇点点头。卡冈诺维奇晚些时候将召集我们，同阿克塞尔罗德等人一起制定出改组的细节……所有那些气得我发疯的冲动感情都到哪里去了？一切痛苦已经成为过去了。

在我们下楼时，瓦索夫得意忘形地说：“现在您不会离开我们了。这意味着一次大扩充。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机会，为我们的报纸奠定一个良好的技术基础，获得足够的外汇向国外派遣记者。”……他是不是认为他能当这样一份大报、包括所有工人在内的头头呢？情况是十分清楚的！

我必须婉转地向他暗示。为什么要损害他呢？毕竟，一切争论都已过去。“你不能认为这仅仅是扩大《莫斯科新闻》，”我对他说。“阿克塞尔罗德办起了另一份报纸，他的工作人员比我们的要多。”

“对，”古谢夫坚定地说。“这就是说，必须新的基础上彻底改组。”我愉快地明白了，古谢夫会保护阿克塞尔罗德——我的老对手，他创办了一张生气勃勃的报纸，而我们的报纸却奄奄一息了。

* * *

我一直试图搞清那次小型会议的实质，但我想不出任何语言来表达。会议上发生的一切都是那样的平淡；它所涉及的事情又是如此琐碎。个人的品格和语气所产生的效果，大大超过了所说的话语。在我离开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斯大林做了什么事。似乎这是我们大家做的。伏罗希洛夫决定性的点头、卡冈诺维奇风趣的幽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斯大林似乎不比任何人，甚至不比小人物更突出。“您这样一位重要人物，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我这样想。“和他交谈是多么无拘无束啊！”似乎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只要偶尔找他谈谈，他那比你渊博的知识就可以给你解开思想上的疙瘩，你的工作便可以永远明确、欢畅。

一切都发生得这样迅速！一切都这样突然变得清楚！以至我几乎无法跟上。那天晚上和整个第二天以及随后很多个夜晚，对那半个小时的记忆开始变得越来越深刻。我对那次会晤的理解与日加深。它开始解释我的工作；随后，开始解释苏联。用它，可以解

决新出现的问题；它给了我一种方法。我一生中令人激动万分的其他时刻、我敬慕伟大人物时所产生的激情都已消失；我无法重新回想起对他们的感情。然而，那半小时所引起的感情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年加深。即使今天，我仍能感受到那次会晤的气氛——它以富有同情心的、但不是感情用事的分析，来寻求根本的实质及它们的关系，并采取行动把它们解决。

我首先开始考虑这些人们。他们所有的人都暴露无遗。瓦索夫，这个愉快的吹牛家！假如要搞一份专门供工程师阅读的杂志，瓦索夫倒是个不坏的人选。他有办法使“美元专家们”感到自在满意；对他们来说，他倒真是个“容易相处”的人。他办我们报纸的方式，就好象他办过《坎卡基吹捧杂志》似的，上边的人虚张声势、任意挥霍，而下面的工作人员则拼命地工作。这种做法在莫斯科把我们搞垮了。而那些“美元专家们”也被莫斯科搞得呆不住了。他们纷纷回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报纸搞不下去的原因。

阿克塞尔罗德是个什么人，变得清楚了。我曾为他采用从俄文翻译过来的长文章而同他争吵过。我要让美国人来写作，运用生动活泼的文风。但是，假如阿克塞尔罗德是奉命办一份用共产主义来指导工人的报纸，那么他刊登俄国人的这些文章是对的。美国人那种活泼轻松的文风肯定无法指导工人们。

我也考察了梅希劳克。但是，不是把他作为能赐给我一份大报的上帝，也不是把他看作九个月拒绝同我谈话的魔鬼，而是看作一位担任全苏工业副主席的大忙人，我曾向他大力宣传办一份报纸的主意。他马上就注意到，这能帮助他解决一大问题——安抚不满的工程师。随后我用打字机打下了一篇很长的祈祷文，把他当作上帝，恳求他解决我的一切问题。他给我派来了瓦索夫做工程师的工作，然后他埋头干自己的工作，不再当我的上帝了。难道

他的工作——全国的工业——还不够多吗？我怎么会期望他来解
决每个人——美国工人、我和工会的工作呢？

为什么这些人会变得这样清楚，不再令人感到痛苦？究其原因，是因为我不再用不加分析的、激烈的感情冲动来看待他们。而是把他们同一个明确的新的共同目标联系起来。他们都在某一范围做着某一工作，都是需要加以考虑的因素。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找出一条明确的路线和方向。一旦找到了它，人们就变得清楚了。

几年来，我第一次记起了拉特格斯和他周围的一小批人，他们调查了在苏联工业部门中工作的美国人的意见，曾谈到过要出版一份报纸。由于他们无能为力，我曾寻找一位“大人物”来促成此事。正是我，怀着对上帝的感情，为了他们的需要，去为梅希劳克工作。我对他们遭到挫折的面容记忆犹新，当时，我告诉他们，梅希劳克和我已着手办“他们的报纸”。他们勉强保持礼貌，但我曾期望他们会为此消息而感到高兴。他们不是一直想办自己的报纸吗？他们果然做到了——那份称为“工人朋友”的、但写作蹩脚的《工人新闻》。我对梅希劳克鼓动的结果，出版了一份为工程师服务的报纸。我甚至跑到外交部，几乎使他们同意根据我的愿望办一份受到“广泛支持”，但没有“明确路线”的报纸。正是我把一切都搞糟了！

是的，正是我吃了苦头，这倒也不是坏事。两份报纸各有特点，并不全坏。专家和工人之间的确存在着不同的兴趣爱好，随着大多数美元合同的结束，现在这种差异变得更大。我是自寻苦恼，引起许多感情上的痛苦。但是，现在我们将合并这两份报纸。我们的“路线”已经清楚。

但是，这不是很有趣吗？他们把我们全都组织在一起——把阿克塞尔罗德、瓦索夫和我同鲍罗廷撮合在一起。鲍罗廷，是我要求

他来当“负责主编”的。他们当然不是用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法进行改组的；在那里，胜利者把原先的头头全都赶走。这次改组意味着我们谁也不是胜利者；我们都应该为那份报纸作出贡献，相互之间应该和睦相处，共襄盛举。我们能够这样。因为我们都已明瞭我们的路线。看起来，重要的是路线，而不是人。

但是，且慢！这条路线是由这些人制定并实行的。并不是斯大林把这条路交给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参加了制定。我们分析了过去的经验，并由此指出了前途。毕竟，我们都想做同一件事——通过美国工人把美国的效率带进苏联工业。这就是使我们团结起来的原因。

但是，在我们互相争吵的情况下，是什么东西把我们团结起来呢？现在，我终于看清了斯大林的作用。我记得他在向我们四人提问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他对瓦索夫的正面进攻曾使我大吃一惊；这是瓦索夫罪有应得！对待梅希劳克，他则采取友好的挖苦语气，暗示梅希劳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但他很可能不了解瓦索夫。而对我，则十分温文尔雅，数次问我有什么要求。他知道我已失去希望。他要从中发现尚存的东西。他是如此巧妙地很快抓住每个人的要害，使我们大家都看清共同的目标。是斯大林的分析使我们团结起来了。好一个善抓人心的专家，我对他敬佩之至，实在是一个专家！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整个苏联的问题吗？

我恢复了我意志的力量，它熊熊燃烧起希望之光。我想：“十多年来，每当他们运用这一方法时，我都亲眼目睹了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发生的情况。我曾从外部看到了它，现在我又从内部看到了它。这种意志不是外力强加的，它蕴藏于人民之中。这是一种要进行创造的意志。共产党人懂得如何去挖掘这种意志。”

我想起了特列古边科的话：“我们能够动员的力量，外国人是

不了解的。”我想起了美国那些惯于冷嘲热讽的观察家们的话：“这些共产党人是怎样促成的？他们怎么能使一亿六千万人愿意忍饥挨饿，玩命地工作？这将是一个值得了解的秘密！他们怎么能使这些人支持那个五年计划，并且喜欢它？”……不，他们没有“促成”；他们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发掘了它。

外国人说，他们不“民主”；他们没有依靠“人民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什么？我的意志曾经死亡；我曾想逃避我的工作及其令人烦恼的难题。我曾乞求过，也曾威胁过。但是，在意欲逃避的懦夫之心的更深处，有我已忘却的意志——要进行创造的意志。由于路线被歪曲而遭受失败，它感到厌倦。然而，当清楚的分析为它指出一条道路时，它又一次燃起了炽烈的火焰！

群众的意志就是如此产生的，它蔑视逃避斗争的懦夫愿望。我年轻时代常见的那些雄辩家也未能激发这样的意志。这些共产党人分析了世界形势以及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必要性；他们指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以及达到此目标的艰难道路。我记起了斯大林在党代会上的讲话、对工业界领导人或对农民积极分子的讲话；这些讲话从来不是诉诸感情，而是分析困难，指明方向。于是，那些贫穷落后、愚昧无知和没有效率的人民群众中的意志被唤醒了，这些人民群众过去还没有意识到在他们中间存在着这种意志。在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化运动的日子，我曾看到这种意志如狂飙般席卷整个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它不再需要鼓动，反而需要加以控制。当他们看清明确的方向时，他们不是也象我一样感到可以放手大干吗？

是斯大林为每个人做了这件事。不，不是为每个人。在斯大林办公室里开会的我们这一批人之所以能够联合起来，是因为在我们内心深处隐藏着同样的意志。明确的分析把我们团结在一起

了。但是，在你对人类进行透彻的分析以后，你会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愿望和感情下发现两种意志是永远无法联合起来的。权欲熏心的剥削者的意志和争取自由的广大被剥削群众的意志是不可调和的。在受剥削最深重的群众中间，他们的意志最强烈；这种意志在墨西哥劳苦大众和中国农民身上强烈地爆发出来。当然，这种意志在他们身上的反映并不一致，有人是为反对财富而斗争，有人则是为获得财富而努力。在现代化工业中，组织起来的工人的这种意志变得越来越清楚，因为他们个人永远无法占有生产工具。在他们身上，为实行公有制，为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意志能够变成自觉的行动，能够找到一条道路和路线。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成为领袖，而其他受剥削的群众则团结在他们周围的原因所在。

工人阶级的意志是要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新的生产工具，在几个世纪堆积的废墟上开辟出一条道路来！这就是斯大林加以分析并使之化为行动的深刻意志。

不是斯大林一人在做这件事。这是所有共产党人要做的事。每人在自己的范围内分析他周围群众的意志。布明娜之所以从农妇变成乡村工作的组织专家，是因为她从自己当儿媳所遭受到的虐待中，看到了集体化的必要性。住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科瓦廖夫之所以了解贫苦农民的需要，是因为他也曾是“一个春天从未见过肉的农民”。在矿上成长起来的人，能分析矿工的情况。我想起了红色卢甘斯克的党代会，这个大会增强了顿涅茨盆地煤矿工人的意志，并把这一意志传给哈尔科夫，最后传到莫斯科，同这个国家的所有其他行业工人的意志汇合在一起。每个行业的工人都制定了自己的方针路线，就象我们为我们报纸做的那样。每条路线都是通过分析而产生，并不断扩大，全部汇合在一起，就产生了党的总路线。

刹那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从未能在苏联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早在堪萨斯城，我就是个有才干的组织者。所有这年中，我一直认为，不管到哪里，组织能力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做组织工作不是凭个人的效率，而是通过反映人们成长起来的那个阶层的生活来做的。我同西方民主有着血肉的联系，而它已被纽约垄断集团们扼杀。这也是我为什么把纽约的控制作为暴行来斗争的原因。我曾运用诚实的分析唤醒大批人的意志来共同关心堪萨斯城市的儿童。那些城市的意志燃起的炽烈火焰，足以使当地政治家们胆颤心惊。

我已经抛弃了堪萨斯城古老的民主。甚至当我注视它的时候，它已经死亡；战争已把它彻底埋葬。有一段时间，我曾表达了西雅图工人们的情感。他们仍然亲切地记着我，我每次去西雅图，他们翻山越岭赶一天路程去倾听我的演讲。我不再了解他们内心深处的意志。如果我指导他们日常遇到的问题，那只会产生误解。我已把那一切抛弃干净。但是，在长期的孤独之后，我再次拥有了“我的群众。”数以千计的美国人正使自己适应苏联的生活；大洋彼岸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问着：那个世界意味着什么？在这两个世界中，我可以分别向它们作出解释，这是没有出过国门的人做不到的。这并不是由于我有效率或有天才，而是因为我曾在这两个世界长期生活和斗争，我来往于两个世界已有十三年之久。

不是吗，我就是这样做的！这就是为什么斯大林把我找去的原因。一位外国记者说过：“斯大林甚至也管个人的问题。”多么愚蠢啊！甚至我也曾认为，这表明了我的重要。这个看法又对，又不对，这不是因为我聪明，而是因为我同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美国人有联系，了解并能反映他们的愿望。因此，当我说美国工人和工程师都希望有一份统一的报纸时，指导着世界六分之一面积的党的总

路线也就在工人和工程师的问题上作了一点调整，以满足在苏联的美国人的需要。对我们这些美国人来说，问题很清楚，出版两份报纸是由阿克塞尔罗德偶然造成的。对古谢夫或梅希劳克这两位才智出众的人来说，问题却并不那么清楚。我接近这些美国人，所以我是清楚的。这样，甚至我这个非党外国人士，实际上也参与制定了这一著名的党的路线。

其他人可以表达更多人的意见。一位厂长曾对我说过：“这看你思路有多广。我可以为一个工厂考虑两年的事；其他人可以为某一行业制定五年计划。斯大林比我们任何人都深谋远虑。我们有些人能够考虑整个工业或所有工会的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可同斯大林相匹敌，他能分析苏联在不断变化的世界革命中的地位，给我们日常斗争中的每一个方面施加应有的影响。那就是斯大林的作用，我们国家中的最高职能。”……是的，那是很清楚的。人们从来不请求得到斯大林的“意志”或“命令”，象对待个人独裁者似的。他们问的是：“斯大林是怎样分析的？”只有在苏联，这种分析家的作用处于最高地位。为什么呢？因为苏联是真正寻求解放广大群众的意志的独一无二的国家。

谁是这个国家的大人物呢？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加里宁、奥尔忠尼启则、日丹诺夫——都是“大人物”吗？外国记者称他们为“斯大林的傀儡”，说：“他们甚至不会说外语。以前我们从未听说过他们。”为什么一定要他们听说过呢？难道在国外的名声是对俄国理解程度的检验标准吗？他们是一批始终生活在广大群众心目中的才智出众的人物！

曾经在国外住过的那些俄国革命者发现处境很困难，尽管他们也带回了一些有用的东西。他们常常违反群众的意志。我蓦然想起托洛茨基和随着他树倒猢狲散的追随者们。他们第一次回到

俄国时，全世界的工人们似乎燃烧着火一般的热情，跟随他们造反。在这种情况下，深知自己落后的俄国工人们应当寻求外国工人的帮助，并从这些回国的革命者身上看到希望，这有什么奇怪的呢？但是，一九一九年的世界性起义失败了，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未能爆发革命，而此时俄国群众的力量却在稳步增长，于是，俄国工人转向同农民建立同盟，高喊：“让我们一起来创业！”……然而，托洛茨基拒绝倾听他们的呼声；他决意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人民，以至于从来不想去了解他们究竟希望什么。

对了，他们究竟希望什么呢？他曾想为他们做些什么呢？回顾过去，看一看水流分界之处，事情就变得明白无误了。我曾经认为这些分歧微不足道。它们犹如正反两面上坡上的无数水珠，流向不同的方向，各自聚集着新的水珠，流入截然不同的海洋。俄国工人把农民当成同盟军，但托洛茨基却认为农民是反革命力量。

托洛茨基的水流本应流向什么山谷呢？是寻求同外国工人结成同盟，脱离近在眼前的农民吗？在工人尚未准备起义的国家里，这种做法导致冒险的闹剧。在变化不定的动乱中，它导致阴谋。这样的冒险行动不是导致投降，就是导致战争。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已经洒尽鲜血的非工业化俄国的无产阶级被在战争中搞得精疲力尽的农民所出卖，必将遭到灭顶之灾。他们将为朋友而死，象墨西哥的劳苦大众一样，为所有互相矛盾的、糊里糊涂的朋友而死。但是，是什么样的天才人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这一切呢？是斯大林——当然不仅仅是斯大林。是斯大林运用的方法！

人们决不应当把斯大林当成神；他对我们太宝贵了，不能那样做。他分析了使各种神得以产生和消灭的机械力量和人类的力量。抛弃托洛茨基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斯大林所分析的工人阶级的意志。当托洛茨基反对这一意志时，他也就把自己从工人阶级队伍

中抛出去了。我看到了这一意志的升起——它体现在约翰·里德公社艰苦奋斗的流浪儿童身上；体现在渴望得到农机的雇农身上；体现在同过去传统作斗争的乡村女主席身上；体现在无法进行创造的小工厂的工人们身上。我看到了智慧的共产党人终于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定了一条路线，五年计划在一亿六千万人民中间产生了，他们曾被无数的妥协所折磨，经历了产前的阵痛。

国外的人们感到惊奇——我曾听到过他们表示惊奇：他们怎么能十七年保持旺盛的斗志？英国独立工党的拉斯基教授曾经说过：“俄国革命的这种能量尚未消失；它将比过去的任何革命延续更长时间。”为什么他们认为它一定要消失；难道那是革命的规律吗？你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这种能量没有消失。相反，它正在日趋强大，对前进的方向更有把握。我再次想到托洛茨基，他曾经是一团火，激起了人们炽烈的感情。我想起了欧洲其他的火焰般的人物——昙花一现的领袖们！人们对个人的忠诚越来越厌倦；他们的意志因幻想破灭而困惑。然而，假如你不断地分析他们的意志，使之发挥作用，他们怎么会变得厌倦呢？

这不是稍纵即逝的火焰，不是能使一个人死亡的激烈的情绪。这是坚实的基础，永远在我的脚下——在世界的脚下！

第二十七章 纷繁的日常生活

我脚下坚实的土地从未完全离开过我。我对斯大林的方法的半小时体验，成了我工作和个人生活中的转折点。然而，新的观念同旧的习惯和感情仍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斗争。在前一章中描述的一系列思想，在以后的两年中不断发展。伴随着这些思想的是日常工作。

第一件要做的大事是把两家报纸合并成一份报纸。正式决定已经作出；命令我们在五月一日合并，立即变成一张日报。这是在印刷厂确定发稿期限两天后决定的。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他们。我们说，让这份合并起来的报纸在五月一日出版问世，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把这件事提交工会，并同意加班加点，放弃五月一日休假。我们拆了校样，写好文章后，重新排版，并想方设法使“市投递系统”同意晚些时候分发我们的报纸。五·一节这一天，《莫斯科每日新闻》如期出现在街头。两家工作人员高高兴兴地用木棍高擎报纸参加了游行。

接着进行改组工作。两家工作人员一直互相憎恨，

数月来双方唇枪舌剑，你骂我“资产阶级”，我指责你“缺乏教养”。鲍罗廷被任命为总编辑，同时任命了三位副总编辑：瓦索夫、阿克塞尔罗德和我。我是唯一的专职副总编辑。我用上了我在组织方面的平生技能。怎样才能使双方都满意，并顺利工作呢？《莫斯科每日新闻》完成了一张报纸的过渡，并给了它一个名字；那么就必须让《工人新闻》优先挑选工作。我从《工人新闻》中挑选了最强的人罗斯·科恩和施瓦茨泰因，通过他们来了解他们的人能干些什么。随后召开了数次会议，成立了新的部门，有些人因他们的漠不关心降了职，另一些人则由于他们的精明能干而得到提升。

在此期间，发生了一次发疯的争夺。为我们提供办公室的星火出版社利用这次合并的机会，把我们从《莫斯科新闻》的房间中赶出来，让给了另一家新的杂志。五一节休假期间，在没有预先通知我们的情况下，他们把打字机、桌子、纸张和报社印章全部突然拿走了。当我们休假后回到办公室时，才发现我们的地方被一份新杂志占领了。鲍罗廷打电话威胁说：“你们这些破坏分子，把你们的爪子从我们的办公室缩回去，否则我要控告你们搞破坏。”我一面撬开落地玻璃窗上的锁，一面发动工作人员通过窗户把桌子椅子和打字机所用的一切设备搬进去。有些稿子永远丢失了。大概八天以后我们才找到报社印章。这一事件发生在改组后的第三天；但是并未影响每日出报。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过去，象在很早前在堪萨斯城那样，我感到集体生活已在混乱中逐渐走上正轨。我能感觉到它的最远的触角，因为它是由我形成的。血液流过打字员这根触角时，极不畅通；我把他们召集到一起，重新作了安排，让干劲最大的人来负责。明天，翻译人员又成了弱点。各个环节开始比较顺利地运转；现在我感到欢欣鼓舞。随后有人说：“斯特朗把报纸搞

成个人的独立王国；一切都由她自己决定。”此话实在伤人。难道我不是在使它成为大家的共同事业，而丝毫没有考虑我自己吗？

鲍罗廷说：“假如我知道你几乎不写文章的话，我就不会来负责这个报纸了。”我每天花十八个小时做组织工作，我哪有空再写文章呢？那么，他是否不愿意我做组织工作？逐渐地，我的决定权越来越少。我任其减少；我的自尊心使我不愿提出任何抗议。“好吧，”我说。“他们不需要我了。他们只需要我不费力气地写文章。很好，我很容易做这种事。”

我坐观他们把组织工作搞得一团糟；我看着他们把文风搞得低劣粗糙。我凡事往后退，不提任何建议。既然他们不需要我，那就让他们去干吧！但是，尽管文风蹩脚，组织工作粗糙，我却从来没有再次要求去掉我的名字。很长时间以后我才明白，我在我的名字问题上所怀有的一腔愤懑，是我自鸣得意办事有效率所产生的偏见，它隐藏在我灵魂深处。实际上，我对名誉并不计较；我之所以这样忿怒，一则是因为我看到同我有关的一份报纸以我所不能理解的方式慢慢地垮下去，再则是因为我感到我受骗了，在他们显然根本就不想要我的时候，还许诺我享有充分的权威。我曾对此作过合理的解释，说：“他们收买了我的名声。”现在，我知道了，他们至少需要我的写作，而那是我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我仍然不明白，充分权威对一份苏联报纸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难道它同能下达“命令”很少关系。

一段时期以后，我看到，尽管文风蹩脚、组织工作糟糕，他们也慢慢用苏联的方式办了一份报纸。鲍罗廷召开各种会议，工会也召开会议，“生产会议”有时每天开几个小时。看起来，这是白白浪费时间。他们逐版、逐篇文章地进行研究，人人都提批评意见。其实，没有多少人有资格提出批评意见，不过，开了那么多会以后，标

题、文章和文风也开始有所好转。有时我也去参加会议，我的建议通常是被采纳的。他们甚至很高兴我提出建议。但是，即使在那种情况下，我也看不出，我的知识和经验就是我的“权威”。我用带点儿玩世不恭的口气说（我曾听到其他美国人说过）：“这是个很有趣的国家；你越不干活，他们越赞扬你。你啥事也不管，他们反倒采纳你的建议。”……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虽然我一直试图把报纸办成“为每个人服务”的，但是，“每个人”一直想把报纸办成他们自己的。

在此期间，我再次外出旅行，为这份报纸撰文。现在它已变成固定的日报了。在各地工业部门中工作的美国人在变化，甚至比我变得更厉害。库兹涅茨克已变成一个欣欣向荣的钢铁城。“美元专家们”已经开始回国。在列宁斯克的美国矿工有一半已经离开；留下来的仍然满腹牢骚，但不感到惊慌。早来的人对新来的人说：“我也曾象你那样谈论过该死的、效率低下的俄国人。但是，你不能只靠自己，这样你将一事无成。你首先得了解你周围的集体生活。”各处的“老库兹巴斯人”特别乐于助人。人们说：不管是人是鬼，他们不害怕；他们在此已十二年了，知道该怎么办。

* * *

在去库兹涅茨克以前，我结婚了。他是我的一位老相识，我们已经数年未见面了。我对他谈了我对斯大林的印象，最后热情地说：“我愿接受这样的人的命令，不管他们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我觉得，在我自己认识到我必须这样做以前，他们不会给我下命令。”我仍然从“命令”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我想，”他微笑着说，“您一定准备加入我们的党了。”我点点头，但随即感到一阵慌乱。每当我将要作出最后决定时，我总有这种感觉。我倒是愿意斯大林当我的领导，但是他们不会把斯大林

给我的。我应该服从办公室里的某一位官僚。不，我不能！但是，站在这里的是我十年中遇到的第一个可信赖的共产党人，他十分信任我。我十分需要有这样一位同志。友谊恢复并加深了，很快发展为终身伴侣。我们一同前往库兹涅茨克旅行。

这样，我在苏联的孤独寂寞开始结束。这种孤独感使我十年来无比痛苦，它比我在本书中描述的为寻求工作所产生的痛苦更甚。数月以后，我丈夫使我了解了这种孤独的底蕴。“你总是吸引着我，”他说，“但是在前几年中，我一直不敢肯定我们是不是站在街垒的同一边。”

街垒？那就是其他人——男人和女人们所追求的吗？对这些人，我曾长时期地渴望得到他们的同志情谊，然而却是徒劳的。很多美国理想主义者希望在这块新的土地上开拓事业，愿意作出他们的贡献。他们常对我说，他们不怕艰苦，也就是说，对吃、住的好坏并不计较。我怎么能对他们谈我的孤独感呢。他们期望以不费劲的姿态赢得大批同志，认为他们设想去“热爱”的那块土地也将会同样爱他们。让他们看一看美国的第一代移民们吧。那时，他们自己就会认识到他们试图跨越的鸿沟要大得多。

在苏联的十年中，我结识的两位朋友有时间同我交谈。她们是两位同我气质相仿的非党妇女、勤奋工作的理想主义者^①。在我敬佩、并希望得到其友谊的很多共产党人中，有些人只不过是顺手牵羊地利用我，有些人很难说一两句鼓励话。有些男人对我从未有寻觅伴侣和建立家庭之意愿，却有从一个迷人的外国人身上进行冒险之图谋。

我学会从这些短暂的接触中得到启迪，琢磨一句句稍纵即逝

① 关于这两位妇女的情况，请参阅第三十章《圣人之死》。——原注

的话语。从这个人口里,我了解了农民的某些情况;从另一个人身上,我学到了需要进行仔细的分析。还有人建议我给斯大林写信,这件事对我生活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事情都大。每次我怀着新的希望寻求朋友,结果总是失望,重新陷入孤独。我学会说:“在这个充满同志的土地上,对我来说却似乎没有一个同志,但是,这里的知识,是值得我为之付出任何代价的。”然而,有时看来,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健康受到损害,神经变得衰弱,感情上经历的风波简直超过合理的限度。

我最终学会理解我的孤独,尽管我仍然无法忍受。我们的灵魂是在旧的社会制度中形成的。如果我们不改变每一根神经的反应,不改变所有的习惯和“理想”,是不可能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制度的。纵观历史,没有哪一代人跨越过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跨越的如此深宽的鸿沟。只有通过殊死的斗争,才能跨越它。那些成功地跨越过来的人们,在遥远的彼岸找到的却是需要重新建设的废墟。紧密团结起来为生活而斗争的工人们,是最容易跨越这条鸿沟的;他们的冲突是表面的。资本家是永远无法跨越的;他们将随着旧世界的灭亡而灭亡。我们这些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只有在摆脱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一切——我们称之为真理、美德、友谊、自由以及组成我们极珍贵的“灵魂”等等——的时候,才能跨越这条鸿沟。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达到建立在这一街垒上的新的真理、美德、同志情谊和自由。

这种跨越对于一切想要跨越的人来说,是痛苦和困难的,但是,当我们用我们年轻时代的速度和我们熟悉的思想方法,同大步行进的工人队伍一同前进时,这就变得比较容易了。我是在一块陌生的土地上跨越这条鸿沟的。这块土地上的习惯、思想方法、运动效率是从不同的历史传统形成的。我对客观的认识更快、更深刻了。

我作为一个外国人来到这个国家，这里的每个人都在冲突中经历了长期的考验，分清了阶级面貌。这个国家接受外国人还没有几年。我对“友谊”的概念是在美国形成的，在那里，我们通过几小时生动的谈话，就可以找到共同的理想和感情。而在俄国，即使是亲密的同志，一年中也只能有个把小时来交谈。他们要在巨大的混乱中重建，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他们分享的不是感情，而是劳动、危险和胜利。在这样一个国家里，我仍然以一个为美国资本主义报纸撰文的作家所抱有的相反的目的行事；抱有这样的目的，怎么会分担劳动和危险呢？

来自顿涅茨煤矿的一位工人自愿地试图跨越我们之间的鸿沟。我是在一所工人疗养院里遇见他的，他并不知道我是一位著名的外国作家，而不过是“一个曾经写过东西的漂亮女人”罢了。他说：“我离开了我的第一个妻子，因为她坚持做一位无知的农妇，每天晚上我去参加党的会议时，她都哭哭啼啼。我负责党的工作，我希望有一位明智的、参加工作的妻子。我不知道您能否忍受顿涅茨的条件，但是您不妨试一试。至少，您能了解我们工人的很多情况，同时我也能学到文化和美国的效率。”他的现实主义震动了我这个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我认为我根本不能同他“相爱”。现在回想起来，这是诚实坦率、工人式的求爱。

我选择在苏联定居，从而在这致命的鸿沟上又增加了一个裂口，这就是早期的思想方法，这种思想方法已经定形为现实生活和未来憧憬的毕生象征。对阶级斗争的分析已是十分困难，而我又增加了异己的表达形式所产生的困难。我深沉的、未加分析的感情，产生于不同的传统。绝大部分象我这一代的聪明的俄国人是根据一九〇五年的街垒来感受生活的。顿涅茨那位工人象旧式农民一样，最迫切的是渴望学习文化。我丈夫的女儿和今天的苏

联青年在钢铁厂和建筑工作中找到了最深刻的现实象征。我曾遇见过几个人,他们最终的现实象征是某些五彩缤纷的大节日,以及和谐的音乐旋律。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对我说:“我的最深刻的现实,仍然是发展人类的心灵。但是多年来我们没有时间从事这个工作。”

他们这些最终的象征对我来说都是些装饰品,我曾注意它们,分析它们,但未留下深刻的感受。每当感受最深时,我的现实的象征仍然是:尚未开发的荒野中有待于探索的小径,到西部人迹罕到的区域的长途跋涉,人类征服星球的兴奋冒险!这也是从芝加哥向西到太平洋的人们的感受。同他们在一起,我也许更容易“守住街垒”或“敢于跨越鸿沟”。

尽管在我们年轻时就已形成我们终生的象征,但是,它们的内容是会随着环境的激烈变化而不断改变的。面对新的环境,我们的心灵费很大劲才能适应,重新塑造自己,并帮助重新塑造环境。就这样,我们创造着我们的未来。我就是如此挑选了苏联这样的环境的,它也许能使我变成我理想中的人。我就是如此选择我的丈夫的,不是出于美国浪漫主义者称之为爱情的感情冲动,而是出于一种深刻得多的需要——为我的前途着想的、深刻的、本能的需要。对那些在迷惘的激情中虚度年华的美国青年,需要把我花了多年时间才弄懂的东西告诉他们。谈恋爱是十分容易的,保持爱情也并不困难。我们人类的孤独所产生的问题够多的了。但是,找到一位同志,由于他的存在而使你不断地变得更理想,这种艰苦的寻求是值得的。我找到了这样的一位同志,并与他共同生活下去。

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思想,然而,在现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大家只有一种选择。要么加入操纵机器的人的行列,要么加入拥有机器的人的行列。要么为全体工人夺取一切生产资料,共同建设

社会主义；要么为我们自己攫取私有财产，小则争夺地位、名誉或住房，大则攫取银行和工厂。对所有这些不同思想的人来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的抉择。在我们一生中所发生的各种冲突中，我们要为自己选择“街垒”的一边。

第二十八章 为面包而斗争

一九三二年初冬，我们从库兹涅茨克返回后，从南方开始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那里正是收割季节。在《莫斯科新闻》工作期间，我同农村地区失去了联系。我曾想，一九三〇年的特大丰收已解决了小麦问题。其他比我重要的人物也与我有相同的错觉。面对在五年中生产翻了番的国家工业的一大堆紧急的问题，他们忽视了农业生产。巨大的干劲赢得了一九三〇年的丰收。像我们约翰·里德公社的饥饿、光脚和装备极差的社员那样，凭着一股愿望的力量在阿列克谢耶夫卡农场大干了一场。他们由于组织困难而退却。同样，整个苏联一九三一年和一九三二年的收成也倒退了。

在三年时间内，苏联对百分之八十五的农村地区进行了彻底调整，把一千四百万个私有小农场合并成二十万个由农民集体所有的大型农场。原始的工具迅速地被机器所代替，农民实行了劳动分工。到哪里去为这么多新的大型企业寻找优秀经理呢？由于新的建筑业和新的

工业部门在四年内招收了一千一百万工人，而且大部分是农村中最精明能干的人，这一任务变得更加困难。经济作物的扩大也减少了粮食作物的种植面积。

一九三一年五个主要产粮区发生的干旱，反映了这个国家农业工作中的两大缺点：一是用现有技术耕作的粮食面积不足以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需求，二是在新的大型农场中严重缺乏经营管理人才。一九三二年的收成情况更加严重。庄稼的确长得不坏，但是收上来的较少。有抱负的农庄主席们不愿承认效能差，声称他们正在收割。有抱负的区委书记们则单凭乐观主义办事，而不去了解实际情况，他们按这种说法向莫斯科作了报告。当莫斯科清醒过来，发觉实际情况时，大批庄稼已经被雪覆盖了。

于是，人人都根据自己的主观见解来解释这种形势。外国资本家点头称快了：“集体化失败了；它无法给人以刺激。”……但是，我看到，正是这种刺激，激发了农民的干劲。当地的农民们不满地说：“都给政府拿走了。”而习惯于寻找耸人听闻东西的记者们则连发消息，报道官方的过火做法。……但是，问题不在于政府征购的粮食多了，而是由于大批庄稼被压在雪中。当地共产党员大喊大叫说：“这是富农们的破坏，他们根据自己的意志来煽动影响无知的农民。”……然而，这种说法也不能成立，因为尽管流放了大批富农，农业仍然越来越糟。

我用我的效率观念对此事作出了这样的解释：“这是前进中不可避免地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是无法为二十万个大型农场搞到优秀的经营管理人才的。这些农民不可能被组织起来。所以，他们中很多人失去信心，让庄稼糟蹋在地里，而自己跑到建筑工地找工作。这样的农民家庭将因为他们没有效率而消亡。也许，这种情况并不比美国的坏，我们在使农业实现工业化的

过程中，一百年来把剩余农民推向失业行列。不管怎样，我并不责备政府为提供机器而征购了些粮食^①。为什么制造了很好的拖拉机的有效率的工人，要为无法收割粮食的无效率的农民而死呢？”

这一观点似乎能够向美国人把问题解释清楚。那些在农场工作的其他美国人也持有同样的观点。当局让一些老库兹巴斯人管理北高加索的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因为农场以前的主任正在服刑。其中一人来到了莫斯科。“老太太们正在国家升降机下捡小麦，”他厌恶地对我说。“但是，我不同情她们。她们全村破坏了收割。我倒同情我们农场的工人们，他们今年之所以整年挨饿，就是因为他们那个主任是个酗酒的盗窃犯。由于他，我的体重减了三十磅。”

当我对我的丈夫谈起我的观点时，他摇了摇头。“你对农民比我们更无情。我们共产党人应该负责。你难道还没有理解斯大林的报告？”

是的，斯大林比任何人都看得更深些，正如很早前一位厂长对我说过的那样。斯大林研究了所有其他人的看法后，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而不是象我那样采取宿命论的观点。在一九三三年一月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他分析了所有困难：富农的活动、官员们的愚蠢、农民的落后，但是他说：“共产党人通常把责任推给农民；他们声称农民该受到责备。但是，这是绝对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当然也是不公正的。农民根本不该受到责备。假如我们要讲责任和责

^① 在四年集体化运动中，政府借给农民粮食和种籽1亿5千7百万蒲式耳，贷款11亿6千8百万卢布（不是贬值了的卢布，而是所谓“硬”卢布，其中，早期的4亿3千5百万贷款后来没有要求偿还），以及通过各拖拉机站向农机投资了48亿卢布。由此可见，政府在这几年中对农业的拨款大大超过了农民从前所占有的所有生产资料价值的总额。（摘自莫洛托夫1935年1月对第七届全苏代表大会的报告。——原注）

备的话,那么,这个责任完全彻底地应该由共产党人来负;我们,只有我们共产党人,要为所有这一切受到责备。

“在世界上现在没有,过去也从未有过象我们苏联政府那样一个强大和有权威的政府,……没有象我们共产党这样的一个党。假如我们不能始终按列宁主义要求的方法去管理集体农场的事务,假如我们常犯赤裸裸的、不可宽恕的错误,比如在收购粮食方面,那末,我们,只是我们,该受到责备。”

根据斯大林对困难的分析,立即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订立新的粮食征购法,在拖拉机站建立政治部,以及召开农村突击队员代表大会。

以前,粮食征购(不是税收,但是必须把正常收获量的四分之一左右以固定价格卖给国家,而国家商店也以固定价格提供商品)是根据庄稼尚在地里时的估产决定的。这一法律有利于较差的农场。但是,效率高的农场越来越不满意,因为他们需要弥补那些效率低或者不忠诚的农场的不足,这些农场很少或根本不交售粮。按照新的法律,政府根据土质和气候的不同,预先规定每英亩所要征购的明确限额,不受实际产量的影响,从而刺激效率。这种规定鼓励有效率的农场,鞭策落后的农场。^①

这种鞭策也许会搞垮早期比较差的农场,但现在已被三千五百个拖拉机站证实有效。这些拖拉机站是在四年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四年以前只有一个舍甫琴柯拖拉机站。这些拖拉机站是

^① 实际上这一法令在执行中是灵活的。如果确实遭到雹、干旱或其他自然灾害,粮食征购可以减少或全部免除。甚至效率不高的农场,只要表示要改进,也可以推迟到第二年偿还债务。但是情况是否完全如实,就看农场了。——原注

为新农场提供机器的中心，在不同程度上为三分之二的集体农场服务。在这些中心，还成立了政治部门、领导机构以及组织和文化中心，它们由一批在俄国农村从未见过的有能力的男女组成。工厂厂长、生产主任、军队指挥员、大学教授等差不多有两万多人——进入这些政治部门。他们对农场工作还需要学习，但是他们懂得组织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调查农场中行政和会计人员的品质，把工作无效率和营私舞弊的农场经理撤职、有时甚至追究刑事责任，组织职工学习农场经营方法，使农场更符合政府的计划，效率更高。

为了提高农民们为获得好收成而奋斗的热情，二月初在莫斯科召开了一次农业突击队员大会，他们是从最好的农场挑选的积极分子。一月份进行的选拔积极分子工作被用来促进农场收集种籽、修理工具，把牲口养壮实。随后，各地英雄云集莫斯科，他们中有耕地最多的女拖拉机手，使全队创造纪录的队长。这些去年获得成功的农民，聚在一起为整个国家的成功安排领导人。

他们是全国注意的中心。代表们在铁路上畅行无阻，一路上有乐队迎送。莫斯科派代表团前往迎接他们。农业出版社出版了三十卷“突击队员丛书”。博物馆、工厂和天文馆为他们组织了参观游览。农民和工人在莫斯科的工厂里至少举行了一百次联欢会。全国报纸每天至少用一个版面详细报道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以及他们详细说明别人如何效法他们。

斯大林向代表们发表了演说，这是他第一次出席一个非党会议。他把代表们的困难同十月革命时产业工人所遇到的困难作了比较，说：“把你们的困难和生活品的匮乏，同工人们遇到的困难和匮乏比较一下，你们就会明白，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最好的土地已划归集体农场和农庄，并牢固地属于它们。……我们的拖拉机厂

和农机厂主要是为集体农场和农庄服务。政府……坚决支持工人和集体农民，坚决支持城乡的所有劳动者。因此，你们拥有一切条件来发展集体农场和农庄建设和摆脱旧的道路。对于你们，只有一个要求：诚实地工作，按劳分配集体农庄的收入，很好地管理拖拉机和机器，好好照料牲口，完成工农政府确定的任务，巩固集体农场和农庄……你们现在不是为富人、为剥削者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

大会特别提到了三年集体化运动所取得的很多成绩：播种面积扩大了七千五百万英亩，向农场农庄提供了十五万辆拖拉机，国家提供了数十亿卢布的贷款，在农村培训了数以千计的农艺家。大会呼吁所有农民加强集体纪律，团结在新的政治部门的周围，为提高产量而奋斗。

农业突击队员代表大会在莫斯科的暴风雪中闭幕。代表们举首南望，那里春天已经开始。第一批政工人员冒着暴风雪前往南方各区，以组织第一批政工部门。拖拉机工业部门报告说，零件生产计划已如期完成，工厂派出了数千个工人工作前往农场农庄帮助维修机器。罗斯托夫附近的积雪正在溶化，飞机正在准备为“巨人”农场和“骆驼”农场播种。为全苏联的“特早”播种，总共动用了二百架飞机。气象局宣布，今年的天气预报将根据一千个气象站的资料整理，通过电台向所有农场农庄播送。……土库曼的代表急忙赶回家；他们那里的小麦播种已经开始。但是，北乌拉尔的代表们还得乘雪橇走五百英里的路程。

* * *

我参观了莫尔维季诺的播种运动。莫尔维季诺是北方的一个区，位于北方沼泽和树木繁茂的丘陵地带，离莫斯科有一个晚上的路程。在这个离铁道五十英里的贫穷土地上，当地三百一十七名

共产党员正在鼓动、组织和促进五万五千名农民为夺取伊凡诺沃省的“红旗”而奋斗。这面红旗是德国共产党的报纸《新路》赠送的。莫尔维季诺头年夺得了它。他们现在这个省（五十个区）居第五位，所以党委书记电告莫斯科，邀请一个德国和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来，以鼓动这里的播种热情。我随代表团前往，看到了留着胡子的男人和头扎方巾的妇女瞪着眼睛，倾听欧洲白色恐怖的情况。

当地共产党人利用这个机会说（正在访问的代表团根本不知道播种的事）：“我们的外国同志为了革命而受拷打，被杀害。我们为了革命就是要多种粮食。我们必须豁着命干。”三天中，在十个最差的村子里进行了这样的鼓劲活动，以使它们赶上来。新办的区报每天清晨发表消息，这份两页的报纸全部刊登有关播种的报道。

在沙皇时期，这个落后的区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文盲，酗酒和打闹是唯一的娱乐，结核病和梅毒在各个村庄蔓延。现在，由于当地共产党人的努力，这个区正在迅速地向现代化推进。五千个成年农民在头年冬天参加了各种进修班，学习算术、几何、土地丈量、农业劳动组织、谷物轮作、耕作技术。还有数千人进入政治班学习，七千孩子上学。参加各种学习的人数差不多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在以克罗托夫和新政工部领导人费奥多罗夫为首的共产党员们的带领下，有组织的播种，成绩卓著。发愁的农民第一次不再根据古老的海伦节^①耕种，而是根据新的农业专家们规定的原则进行耕种。早苗已破土而出；田野上新苗翠绿，生气勃勃。正常庄稼

^① 由于世代代宗教日历史季节的缓慢变化，东正教的这个节日比播种季节晚 13 天。——原注

的播种还要进行几日。学校学生报告说，他们收集了数以吨计的用以肥田的草木灰和鸟粪。一百年来，莫尔维季诺的男人们冬天总是进城打短工糊口，现在，他们第一次可以靠种地维持生活了。没有组织起来的农民纷纷要求参加集体农庄，说：“布尔什维克的种籽优良。那些乡亲们丰衣足食了。”

克罗托夫对我讲述了莫尔维季诺成功的秘诀。“首先，我们坚持了我们党员的质量；假如一个共产党员自己的工作不突出，我们很快把他清理出去。第二，我们的组织计划工作起了作用，时刻同播种联系在一起。群众相信我们，无限地相信我们。你看，在特早播种问题上，他们同我们站在一起，反对世代的老传统和宗教。他们抛弃了圣海伦。原先他们是有担心的。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看到了小苗！”

当我陪同国家银行当地分行主任，在凌晨两点前往一个仅二十户的小集体农庄去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的时候，我看到了克罗托夫所说的“组织计划工作”的实例。我们越过沼泽，翻过丘陵，徒步走了三英里来到这个村庄时，天已破晓。这位银行工作者在附近的田野上行走，在农庄主席家呆了一会儿，检查了他们的播种情况，对他们的会计工作提了一些建议告诉他们这个区其他地方的情况，讨论了组织工作中的一些小问题。清晨六点他回到镇上，九点开始在国家银行工作，一直工作到下午三点，然后晚上又前往另一个农庄完成党的任务。莫尔维季诺的每个共产党员在播种时期都担负类似的任务或者专门做党的工作。

莫尔维季诺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不是播种工作的显著成就，不是对中小学生的出色的组织工作，也不是新建的医院，这些医院一年中从未碰到过一个患性病的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坐在一辆颠簸摇晃的卡车上进行的一次发疯似的夜行，当时，莫尔维季诺的

五位“大头头”同其他一批人挤在卡车上，准时赶到伊凡诺沃出席省代表会议。由于其他人的落后和他们内部的办事不力，他们不得不这样做。但是，这次由于工作中的失误而造成的夜间赶路颇富有诗意，它证明了：虽然莫尔维季诺人也存在缺点，但他们那超人的意志仍然是所向披靡的。

莫尔维季诺甚至没有一辆汽车。它靠科斯特罗马区解决运输问题。科斯特罗马在铁路沿线，是莫尔维季诺的一个竞争对手，它有时应要求派去一辆卡车。那天晚上，莫尔维季诺党的代表们本该从科斯特罗马赶乘夜间火车前往伊凡诺沃出席一次代表会议，但是，卡车在大雨滂沱下到达漆黑一团的科斯特罗马镇时，火车早已开出多时。我本来也要同他们一块乘这趟火车前往莫斯科。

“我们应当穿过科斯特罗马到内列赫塔枢纽站，那里开往伊凡诺沃的汽车一直等到凌晨五点呢，”克罗托夫说。“假如那条新筑的四十英里泥路能够通行的话，我们会成功的。”

司机在驾驶室里嘟嘟囔囔发着牢骚，说他已有十个月没有能好好睡觉了，从今天早上六点钟就一直开车。他说谁也不认得到内列赫塔的路，费奥多罗夫在汽油上很吝啬。他还说正下着雨，道路不会好走，在树林里还出现过土匪抢劫。他累得直打瞌睡，每当汽车一阵颠簸，就把他摇醒。坐在他旁边的费奥多罗夫则注视着他，不让他睡得太死而出现危险。

大雨不时倾盆而下，迫使我们在汽车后座上支撑起帆布帐篷，这个帐篷平时就放在车板上。四位去伊凡诺沃附近野营的女少先队员用唱歌来暖和身子，唱着唱着竟进入梦乡。她们蜷缩着睡在克罗托夫的身旁。她们是几个挑选出来的幸运者，由受人尊敬的年轻党委书记陪同前往参加野营。一个黝黑的年轻人对着她们露齿发笑，并开始嘻皮笑脸地唱起奥德萨的民间小调，歌词唱道：“所有姑

娘都爱我。我得到她们，未花一分钱，因为我长得十分漂亮。”这没有使克罗托夫不安；他知道这些姑娘们崇敬他。为播种而进行的斗争使他两颊消瘦下去，然而，他的笑容仍然是爽朗的。甚至我这个婚姻满意，四十五、六岁的妇女，也敬佩这位不可战胜的年轻人。

科斯特罗马的伏尔加河渡口一点钟就已关闭，我们叫醒了工人，让他们把我们送过河。他们建议我在科斯特罗马下车，并为我找一个住处。什么！离开这个征服困难的卡车？不，除非他们把我扔下车去。这里简直成了我曾经热爱过的美国，“我的”战前的美国，在这里，地方银行工作人员同农民打成一片，民间小调为我们的战斗助兴，男人们驱车夜行，冒雨前进。但是，昔日开拓时期的美国，却早已丢给了投机者！这里已不是一个睡眼惺忪、发展缓慢的半亚洲国家。在这块土地上，到处是充满斗争精神的移民区和仍未征服的山丘。他们是一批奋勇前进的人，虽然夜不能眠，汗水淋漓，一身尘土，但是，却正在赢得胜利！

克罗托夫躺在车板上呼呼大睡，头枕在一根铁棍上。他们踩在他身上，坐在他身上，跌倒在他身上，竟没有影响他睡觉。他正抓紧这两个小时的时间，以弥补六个星期所造成的睡眠不足。我没有经历过他的情况，不需睡觉；我坐在车上，不停地被摇晃着，注视着东方在雨中渐渐变成灰白色，黎明来到了。当我们爬上伏尔加河对面的山丘时，天边出现了短暂的朝霞，我们踏出了一条新路！我挤干了头巾上的雨水，把它猛地高举在卡车上方，它象一面旗子在黎明清新的晨风中哗哗作响。我唱歌，我高呼；我们大家都高声歌唱，大声欢呼。歌声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欢乐心情！

克罗托夫醒来了。他微笑着起身，并开始考问几位少先队员。“喂，孩子，什么叫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有什么不同？我们的五年计划具有什么国际意义？”就这样，在摇晃中前进的卡车上，在

大风呼呼的凌晨四点,开始了这堂政治课程。“现在,看这里,孩子们,”克罗托夫摇着他的手指说,“在党进行整顿,共青团进行整顿以后,我们还要整顿少先队员。要是你们不懂得少先队规则,就要被清除出去。”

是美国?不,不是美国。房地产标志在哪里?那个大喊大叫招揽肥皂生意的广告在哪里?那个在所有罗曼史中总是被单枪匹马的年轻人打败、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根本没有这回事的大垄断集团在哪里,很多年前我曾对伦纳德·艾尔斯说过:“要是有一个中心来集中我们的最佳意见,并代表我们大家讲话,那该多好啊。”当时,他缓慢地微笑着向我揭露了大垄断集团。但是,莫尔维季诺人有一个“中央”;那就是他们给莫斯科起的名字。这些胜利者中的某些人将在伊凡诺沃会议结束后前往那里,他们的同事选派他们去广泛宣传他们在播种中的最好办法。这是“我的”美国,然而,又不是美国,它是一个更新的“新世界”。

现在,卡车沿着凹凸不平的山路和岩石颠簸而下。费奥多罗夫坐在司机旁,把瓶里的最后一点汽油直接注入汽化器里,汽车开开停停,停停开开,当我们到达高耸的白色的内列赫塔时,唯一的一列客车已经开出,司机犹如挨了一枪,一下倒在卡车里,还未躺到车板上就已睡着了。这些莫尔维季诺人同车站站长进行了交涉。

“让我们搭乘那列货车吧。”

“不行!这是违犯规定的。”

“谁比你地位更高?”

“在这个车站,没有人比我的地位更高了。”

“我们一定得赶到伊凡诺沃,这是党的命令。”

“无能为力,同志。这是铁路上的安全规章。”

“要是我们上了车呢？”

“不会卖给你们票的。”

“要是我们无票上车呢？”

站长转过身，走向车站的一端。莫尔维季诺人上了车。有些人呆在平板货车上的农机下面，有些则呆在棚车两头狭窄的过道上。那五位大人物把其他人从平板货车上支走，在那里召开了他们的预备会议，因为在莫尔维季诺没有来得及开。我们顶风冒雨，手拉着手提醒不要掉下车去，向着伊凡诺沃前进。当旭日高照时，大家唱起了歌。有两次，车站官员要我们下车；我们同他们争辩，继续赖在车上。最后，我们在离伊凡诺沃三英里处的货场下了车。大家肩扛行李，徒步越过田野，穿过条条石子铺的小径。人人气喘吁吁，腿脚疼痛，满身发热，转过最后一个弯，向省委那高大的建筑物走去。

中午十二点差五分，一批满脸污垢的流浪者，手拿雨水淋淋、满处煤黑的帆布雨衣，对外屋办公室那位整洁漂亮的秘书说：“从莫尔维季诺来的代表团。什么时候开会？”她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对这种疯人已经习惯了。“十二点，”她回答说。“这是给你们留的住房。”

十二点刚过，这些已洗过澡、刮了胡子的莫尔维季诺人走进了会议室。他们显然睡眠不足，但精神并不比其他人差。他们留下的卡车，汽油已干，无法再开；司机精疲力竭，困得要死，十分恼火；站长被弄得很难，破坏了铁路规章。但是，他们按照命令如期参加了会议。

这就是在一九三三年春天胜利完成播种的人们。

* * *

农村各区的人们，也象莫尔维季诺人那样，为未来的收获而奋

斗。与此同时，由于上年歉收而感到匮乏的粮食被严加控制，以尽可能确保这个国家的基本生产。一九二八年以来就实行了定量分配制，以较低的固定价格向基本工业部门的工人提供食品；五年计划的工资和工业成本就是以此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制度现在进一步加强，变成了一条铁的法律，几乎每家的面包供应都被削减了。

除了定量供应面包外，在“自由市场”上也有面包出售，但是，由于粮食短缺，这种面包的价格疯狂上涨，比配给的面包价格高出好几倍。粮食配给的多少及工厂食堂的质量比工资更为重要，它们被用来刺激生产。优秀的工人和突击队员，在工厂得到额外的配给和特殊的伙食。游手好闲者则吃得较差；那些经常变换工作的工人则从他们离开工作岗位之日起停止配给供应。当时流动工人很多。

人们必须想方设法找理由继续领取定量；无关紧要的人们，其定量不是削减，就是被取消。即使在工人家庭中，那些不从事生产的成员，食品供应卡也要被停发。他们要么被迫参加急需工人的工业，要么从有面包供应卡的成员那里获得微薄的一点食品维持生存。家庭主妇不工作的家庭，其所雇保姆没有供应卡。我们的达莎保住了她的供应卡，因为她为四个有工作的人服务。但她为了搞到证明文件，伤透了脑筋。外国专家们发现，他们的合同因细小的原因而不再延续或者被取消；苏联以此节省下外国人的食品和工资，因为向他们支付美元就必须出口谷物来挣得外汇。北方农业地区被告知：“吃土豆吧。今年夏天生产自己吃的粮食。”那就是莫尔维季诺区一直在做的事情。

一九三三年的春天蹒跚进入夏天，全国的紧张局面日益加剧。各处谣传四起；外国记者大喊大叫，说这是饥荒。共产党人保持沉默，或者说：“这是同粮食短缺进行的艰苦斗争。我们现在正集中

全力争取下季的收成。”乌克兰一些地区的庄稼没有收上来，那里的孩子们来到莫斯科乞讨。从这些地区来的农民家庭，在城市市场上出卖他们所有的一切来换取吃的。很多地方发生伤寒；在莫斯科，有人死于此病。乌克兰、北高加索和哈萨克的情况最严重，因为这些地方收获的组织工作最差。政府从其他地方调拨粮食到这些地区，由政治部门作为储备粮掌握，供应给那些必须参加耕地、播种和收割的人。这种做法甚至也在头年歉收或遭到破坏的农场实行。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人们必须组织好现在的收获。

那年夏天进行的声势浩大的运动之一，是同伏尔加河流域从古以来周期性发生的干旱作斗争。苏联在这一欧亚地区的中部平原似乎被地球慢慢退去的冰河期注定要不断发生干旱^①。沙皇时期的个体农民对这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束手无策，只好拜神求雨。集体化的农民找到了对付的办法。在五年计划中，苏联政府投资十几亿卢布兴修水利，使灌溉面积扩大到一千四百万英亩，比沙皇时期增加了四百万英亩。一九三二年发布的一项新法令，批准在伏尔加河上修筑大坝，又可增加一千万英亩水浇地。集体农民没有袖手等待，他们也组织了当地的水利建设，声称：“筑坝每个深谷，保住每滴雪水、利用每条小溪。”就这样，在同大自然进行的历史性战斗中，仅在伏尔加河中游地区，集体农民就在两年中，依靠自己的双手，灌溉了十万英亩的土地。这不过是那年夏天进行的一百个抗旱运动中的一个。

由于从代表大会返回的突击队员的鼓动，由于新的粮食法的促进以及政工部门的领导，组织起来的农民开始了夺取粮食的战斗。这一斗争起初发展缓慢，但是，随着组织的加强和希望的增

^① 请参阅《在废墟中的乌托邦》一章。——原注

加,变得越来越有效。外国新闻界称这场战斗为“斯大林反对农民的战斗”,而苏联新闻界则称为“我们为夺取高产丰收而进行的战斗”。他们分析了优秀农庄成功的方法和落后农庄失败的原因。他们推动南方消灭杂草的运动,这些杂草在无人管理的田地里长得齐腰深。在那年夏天,学生、老人、共青团员和用车运来的城市自愿人员,用双手拔除了八千五百万英亩粮田中的杂草。一亿四千万车肥料运进农田。从中世纪以来,这些农田一直以古老的条播制耕作,而且从未很好地上过肥。

那年夏天成功地赢得了丰收,从巨大的灾害中夺取了胜利。以上所述仅仅是为此而采取的很多措施中的几项。一九三三年的最后收成,超过了苏联一九三〇年创记录的大丰收。这一成就的取得,不是依靠半自流的巨大热情,而是依靠永久性的组织工作,它正在不断得到加强,并向着夺取其他胜利而前进^①。

^① 1933年的总收成达到8千9百万吨,比战前收成最好的一年1913年增加1千万吨。但是,在随后的1934年,尽管气候条件不好,但由于改善了对农民的组织工作,以灌溉战胜干旱,改进耕作,在干旱地区重播庄稼,所以避免了损失,实际上比1933年增收了4百万到5百万吨粮食。(莫洛托夫1935年1月全苏代表大会的报告。作者注:在粮食供应同人口作比较时,要考虑到:A、粮食出口从1913年的1千万吨减少到1934年的1百万吨;B、人口增长了20%;C、饲料的消耗量由于牲口的减少而降低。)——原注

第二十九章 加利福尼亚 解释莫斯科 ——真实问题

作为一个记者,我认为,一九三三年为赢得丰收而进行的艰苦斗争的最严重方面,是隐瞒了真实情况。我非常反对这种做法。不过,当我不得不开来分析的时候,却发现很难说清楚我的意思。

人们很难说苏联的新闻界保持了沉默,当时他们每天用许多篇幅报道除杂草运动,说明施肥的必要性,分析优秀农场和落后农场的特点等等。他们也没有忽视困难,他们全力以赴地同它们作了斗争。但是,他们对待困难的方法,我认为不是新闻所应采取的态度。他们没有讲出我所认为的全部情况。为什么他们不承认事实,不讲出困难的严重程度呢?

甚至我丈夫也没有这样做。千千万万共产党员在组织政工部门以前就看到了这个“新的战线”。他就是其中的一人。由于他的顽强努力,他成功地调换了工作,离开了城市的舒适岗位,被派往农村落后地点做新闻工作。

“是不是有很多人快要饿死了?”我有次这样问道。

“我不掌握用以作出判断的全面数字，”他回答说。“我最近访问了两个村庄，按报道说他们‘都快饿死了’是‘全区最糟糕’的村庄。我发现他们集体农庄的庄稼长得还可以，但没有全部收上来，因为富农混进了管理机构，进行了破坏，造成了组织混乱。农民把富农赶走了，政府送去了种籽和食品，今年大有前途。所谓‘他们都快饿死了’，这个谣言是从村子里赶走的富农们散布的。”

收割季节，我亲自访问了北高加索落后地区的两个大型农庄。我本想再访问一些其他农庄，但是我看到，需要为我提供交通工具，这使运粮卡车司机感到担心，而每天工作二十个小时的农庄主席把床铺让给了我，他们累得憔悴不堪，甚至同我谈话也要费很大劲。耸人听闻的故事比比皆是，但是它们总是虚无缥缈的，后来一核实，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

在别列扎诺夫卡国营农场，一批旅苏美国人正在为夺取丰收而同五万英亩粮田中的杂草进行斗争。地里之所以杂草丛生是由于一个酗酒农场主任贪污成性，从庄稼到建筑材料，什么都往自己家里搂，他已被逮捕入狱。新的主任和工人们主要是靠国家借给发霉的谷物度过冬天的。这些谷物埋在富农的地下壕沟里，被当局发现。一位消息灵通的农场官员告诉我，“别列扎诺夫卡村似乎快要死光了。我们正在买下那些空房子。”

当我向为这个村子服务的拖拉机站核实这一消息时，他们对我说：“我们只知道播种面积，不知道死亡率，但是，我们怀疑这一说法，因为今年这个村的播种面积大大扩大了。去年，别列扎诺夫卡村在收割季节进行破坏，后来一些人逃出去搞建筑工作，把房子卖了。”

西雅图公社在苏联是经营管理得最好的农庄之一，它反映了那些管理较好的农庄的观点。他们头年获得了丰收，因而粮食征

购任务增加了六倍，以弥补全区征购数额的不足。“强迫我们？”在回答我提出的表示同情的问题时，农庄主席说。“任何人无权强迫我们。每次上缴超额征购粮，我们都是开大会投票决定的。每次都出现热烈的辩论，因为这意味着贡献出一年的猪食，意味着我们的高级奶牛吃不上粮食。但是，国家为你提供信贷，工人为你提供拖拉机，你不能逃避大家面临的紧急情况。我们讨厌那些逃兵，他们一走了之，让我们去完成他们那一份任务；特别是那些乌克兰的甜菜种植者，他们使我们两年吃不上糖。但是，我们有蜂房，没有食糖生活也能过得甜蜜。”我写下了西雅图公社的英雄事迹，但是，即使是这样的材料，《莫斯科每日新闻》处理时也十分小心谨慎。

我向鲍罗廷提出抗议。“为什么每个人都守口如瓶呢？当你同共产党员提起饥荒时，他们个个怒目而视，似乎你在谈论叛变。甚至我丈夫也不告诉究竟有多少人饿死。他说他不知道。”

“他不会知道得更多，”鲍罗廷说。“这不是他的事。什么东西使你认为，这是你的事呢？”

此话简直要把我气死。难道报道这样的真实情况不是每个记者的事吗？“为什么不允许人家讲出事实呢？”我说。

“你写的关于莫尔维季诺的报道不就是事实吗？”他温和地问。“那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并且报道得很好。”

“是的，但这只讲了一面。我报道了好的情况，而对糟糕的情况则只字未提。你能说，这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画面吗？”

“我认为，我们向任何有理解能力的人提供了一个清楚的画面，”鲍罗廷说。“我们的读者从他们自己的食品供应卡和斯大林报告中了解食品匮乏的情况。他们知道，我们党正在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一形势，发动两万最优秀的人来克服困难。我们告诉他们，问题在于组织管理工作，由于他们自己在工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对

此十分理解。我们讲了所采取的各种措施、组织政工部门和确定新的粮食定额等。报道耸人听闻的饥饿情况，或者我们困难的细节，这对谁有利呢？这能为谁得到额外的食品吗？难道我们不是在竭尽全力来克服困难吗？”

作为新闻工作者，我要讲出实情，这种想法使我对他产生反感。“我们根本没有报道事实真相，”我大声说。

“你喜欢讲什么呢？”鲍罗廷问。“你能分析分析吗？”

“我并不只想那些可怕的事，”我慢吞吞地说。“我不是专门搜罗血淋淋事实的赫斯特记者！现在，他们全都跑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寻求一场恶战。我所目睹的是在铁的纪律下进行的最英勇的斗争。如果不讲困难，便贬低了这种英雄主义。没有效率的农民、进行破坏的富农、愚蠢的官员正在使这个国家挨饿。尽管如此，你们正在想方设法度过难关。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有难同当、甘苦与共的情况。由于农民不收割庄稼，北方森林中的人死于坏血病，中亚的人死于伤寒。但是，有人在国外写文章，说什么你们进攻乌克兰人；他们煽动在芝加哥的乌克兰人游行示威。托洛茨基分子说：‘斯大林不会承认他五年计划的失败。’你的沉默使他们有机可乘。但是，我知道，有些奄奄一息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还在努力拯救无家可归的孩子，身患伤寒的工人们仍在组织农民救灾，车里雅宾斯克的一位美国专家说，从草原来的一帮子人在他住的那条街上杀害了一个男人，抢劫他身上的衣服。”

“是的，”鲍罗廷说，“乌克兰自然会被资本家所利用；这是波兰和德国所觊觎的领土。托洛茨基的攻击是意料中的事；在国外的工人们必须象这里的工人那样学会对他进行分析。这些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你希望告诉他们车里雅宾斯克的情况吗？”

不，那样也许走得太远了。车里雅宾斯克不是制造了履带拖

拉机吗？“难道我们的敌人不是已经知道了吗？”我反击道。“他们不是已经得到特务的报告吗？我们是在对我们的朋友隐瞒。拉斯基教授说：‘宣传是欺骗朋友的一种方法，但不可能欺骗敌人。’”

“拉斯基很聪明，但不准确。”鲍罗廷说着，笑了笑。“我们的朋友知道我们斗争的主要情况；他们可以等着了解详细情况。我们的敌人有怀疑，但他们实际上什么也不知道。我们尽力告诉他们，尽管有困难，我们的工业仍在稳步前进，我们的铁路仍在运行，我们将取得丰收，但是他们对此也怀疑。这难道不是基本事实吗？你为什么要想交给他们一份有关我们困难的可靠单子，从木材场到车里雅宾斯克呢？”

我想起了国际形势：日本人正更深入地侵占满洲里，尽管他们对帝国的下一步扩张还举棋不定，是北进攻苏呢，还是南下侵华。欧洲诸国意欲促日北进，让他们自己攫取中国。美国尚未承认苏联。“我们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讲真实情况，是吗？”我说。

鲍罗廷思考了一会。“讲真实情况，是的——所谓真实情况，就是清楚地描述我们斗争的总情况，指出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和它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但是，不该泄露耸人听闻的、未加分析的‘事实’。这样的‘事实’不会产生什么好处。”

在我仔细考虑他的话时，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随后，鲍罗廷说：“我们布尔什维克认为，尽管俄国技术落后，可是拯救世界文明还得靠这个国家。我们不同意和平主义者的幻想，认为靠期待就能够取得和平。我们也不同意其他和平主义者的盲目，他们忘记了现代战争是多么可怕。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有一半正在回复到中世纪去。

“上帝是无法保证人类进步的。文明在以前曾几度兴衰。象世界大多数国家那样盲目地漂流，只会漂向死亡。我们在牢固的边

界以内，建立符合文明世界的生活方式。我们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为和平而计划、组织和斗争。但是，我们无法预言哪些国家会联合起来反对我们，这样的进攻何时发生。人们的进攻能力在迅速增强；我们可能看到世界的很多地区，我们自己的很多城市被毁灭。但是，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世界也不会沉沦到过去所经历过的黑暗时代。我们所建立的体制能够挽救它。”

他停了下来，我记起了那些新兴的城市，库兹涅茨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钢铁城市以及横跨在它们之间的西伯利亚西部富饶的粮田。即使国家崩溃，这些地方也会由于遥远的距离而保存下来。假如发生最坏的事，生活也将再次兴起，正如我从一片废墟的伏尔加平原上，从忍饥挨饿进行建设的、四处漂泊的革命的流浪者身上所看到的那样。这些社会主义的钢铁城市将会帮助他们……为了这样的建设，可以不惜任何代价。

鲍罗廷说：“你观察乌克兰人的时间太长了。他们并不是世界上唯一的民族。你将去美国进行巡回讲演。你可以利用经过德国的机会观察一下法西斯主义，在华盛顿观察一下新政。这对你有好处。”

“你是在搪塞我，”我回答说。“俄国的收获是当前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

他点点头。“但是对我们的收获，你是无能为力的。在这方面，你无法帮助我们。”

“我可能会爱上美国‘新政’的，”我警告他。“罗斯福的这些措施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鲍罗廷笑了。“美国人是伟大的人民！他们总是吸引着我！他们认为他们能够打破任何已知的经济规律。但是，你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十二年；我相信你的判断力。”在我启程前往美国时，我仍在

抗议我们在农业报道上的政策。但鲍罗廷说：“嗯，我们已经赢得了收获。现在你想讲什么就可以讲什么。”

在柏林，我参观了纳粹宣传总部。一位来自新奥尔良的聪明的德籍美国人接待了讲英语的新闻界人士。“世界上正在谈论你们的暴行，”我说。“不过，我对暴行不感兴趣。每一个政权都无情地镇压它的敌人，大概它必须这样做吧。我想要了解的是，你们将做些什么事来使德国摆脱混乱。”

此话似乎使他不知所措。他的技能全都是准备用来否认暴行的。但是，他还是提供了一些细节，并安排我进行一些采访。他们声称，他们正在作出巨大的努力来解决失业问题。怎样解决？对那些无法进入工业部门的年轻人，已经准备好了劳动营。他们在帐篷里食宿；有些人如果衣服破旧，还可能得到衣服，但是，这没有最后定下来。我猜，估计他们一直穿着父母给的衣服，直到无法再穿为止。自然，他们没有工资。他们修筑横贯全国的、与一般公路不相联的公路干线……

“我明白了，”我想。“这是由奴隶劳工修筑的大规模战略公路。嗯，这是一件事。还干什么？”

其次是招募东普鲁士的失业者，办法是关闭边境，不让波兰和立陶宛的农民入境在大庄园干季节活。“我们要求地主雇用优秀的德国人；让他们为祖国作出贡献。我们敦促他们在冬季维持这些雇工的生活。当然是只发部分工资。为此，我们把雇工们领取的失业救济金交给地主。这种做法减少了成千上万的失业者。”

“也减少了你们的失业名单，”我说，“这当然是很好的宣传材料。但这也减少了你们用于失业救济的开支吗？”

“嗯，没有，”他说。“同以前花得一样多。我们从名册上除去妇女和犹太人，节省了一些开支。但是，东普鲁士的做法，也有好

处，能使这些人不再聚集在城市，他们在城市里只能引起麻烦。”……“是的，”我想，“他们用国家的钱把雇工们变成地主的奴隶。这也是一种手法。”

他们还提到一、两种次要的、彼此相仿的方法。我想要把失业问题搞清楚，便问道：“你们对整个失业有什么计划呢？你们希望通过劳动营和给地主付钱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缓和失业；对全部失业能减少多少，能在多长时间内加以解决呢？”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他们全都茫然不知所措。“嗯，我们没有这样的计划。我们只是推行了这些方法。我们怎么讲得出哪一种最起作用呢？”我非常习惯于以百分比表示的明确计划。所以当他们说没有任何计划时，我花了一段时间才适应。我从未见过办事如此毫无计划。在柏林的一位美国人告诉我：“他们所说的美国失业人数下降，实际上不过是季节性的变化而已。”住在柏林郊区棚屋里的一些妇女恼怒地说：“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失业名单上减少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头天晚上，她们的丈夫被痛打后，送进了大牢，因为在他们的东西里发现有共产党传单。

虽然他们说不出任何计划，但有一件事是所有纳粹分子都同意的。“至少，我们从布尔什维主义中拯救了德国。我们拯救了所有欧洲，他们应当为此而感激我们呢。”……欧洲有什么值得我们感激的呢？挽救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这就是全部含义。其实，即使革命可能也比滑回充满中世纪憎恨的农奴制好。

德国怎么会变成这样？它曾经是“社会主义德国”。但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只是纸上谈兵，空话连篇，从未付诸行动。他们曾阐明了他们的力量和弱点，然而，却消极被动。倒是对他们担心的资本家采取了行动。如同我几年前在西雅图所做的一样，那次总罢工失败了。

但是,难道美国不能做得更好些吗?我害怕革命。鲍罗廷曾经说:“美国人认为他们可以打破任何经济规律!”……嗯,也许我们能够。我们的国家辽阔博大,人民生气勃勃。什么是经济规律?难道它们是布尔什维克所特有的吗?尽管有那么多失业者,我们仍然使人民吃得比他们好。美国已经对付到了今天;难道她不能继续对付下去吗?

在华盛顿,看来我们是能够做到的。在那里,人们进行着火热的活动和大量的计划。多么令人宽慰!你可以马上见到地位相当高的官员。我在三天中就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约翰逊将军,华莱士部长,珀金斯部长,民用工程局局长哈里·霍普金斯,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布利特大使,这比我在莫斯科为见一位小官员所花的时间还少。莫斯科使我感到我无足轻重;华盛顿让我高兴地感到我十分重要。

当然,我并不是一个个单独地见到这些高级官员的;我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见到他们的。我站的地方离罗斯福仅三英尺远。上百名记者被允许随意围着他,就象一群猎人对着围栏后的一头大狮子。他们提出一个个不礼貌的问题,这些问题能促使任何一位欧洲官员把他们赶出去。但他却谈笑风生,机敏地一一作答,犹如一个网球运动员回击着来球。他们两眼闪光,崇敬他在美国大型接见中如此运用自如的技巧。我注视着他的面容,想知道他正在思考什么。他是真的在思考,还是应付一下记者的问题?这些记者不在乎他想什么;他们只想得到头条新闻!他使他们在华盛顿的工作容易做好,有利可图。他总是有东西值得刊登在头版的两个专栏上。

我们离开了。记者们心满意足,感到接近了政府的中心。他们是不是打听到了一切东西呢?约翰逊将军是否参加了宴会?他对美元打算怎么办?这是罗斯福进行宣传的技术。发现伟大的人物

坦率、容易接近，我心灵感到宽慰。我希望在莫斯科的人们也有一点这种技术，在那里，官员是很少会见记者的，而且从来不给予直截了当的回答。当然，也有另一种情况：边远城市的一位普通工人能够告诉你五年计划的整个政策。

有人能告诉我罗斯福的政策吗？他最亲密的顾问们说：“我们还不知道总统的意见。”斯大林格勒或库兹涅茨克的工人们能够告诉你斯大林的想法。这想法概括在一些长篇报告中，他们在大会上学习了这些报告。这称之为党的路线。他们讲不出斯大林究竟怎样去分析某些新出现的紧急情况；他要比他们看得更深远。但是可以肯定，整个苏联都详细了解他的总路线，同华盛顿的人们了解罗斯福的政策相比，他们做得更好。在华盛顿，人们可以把个人的细节告诉你，而在莫斯科，人们讨论的是国家的计划，我想，这就是我所说的“真相”和“坦率”吧。

我怀疑罗斯福本人是否清楚他自己的意见。他是我们从前的进步人士之一。如果说我对汪精卫、我本人等等进步分子有所了解的话，那就是，我们总是在前进，但从来不太清楚我们走向何方。我们从这边摆到那边，但不清楚为什么这样摇摆，直到我们突然停止——通常是停在大头目一边。我们并不想站在大头目一边；我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想要保持独立。难道罗斯福是世界上最高超的多谋善断者？这样解释他眼中发出的机警的、挣扎的闪光吗？他象一头走投无路的狮子一样抵挡着上百名猎人的追捕。但是，难道他本人没有在电台的谈话中对“我的朋友们”说过这样的话吗：“我采纳我能发现的最好的意见；假使这些意见不起作用，我们再试试别的。我对伟大的美国人民是有信心的。”……如果这是耍政治手腕，那是多么聪明啊！如果一个伟大的人民的总统果真是根据信心，而不是根据分析来行动，那是多么可悲啊！这就等于承认了在

他国家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他看不清道路。而全体人民也因此而信任他，跟着他进入茫茫的黑暗中！

我也逐个见到了罗斯福的“左翼”。他们是我过去的进步朋友。同他们在一起，我无拘无束，开着玩笑。跟他们交谈是件愉快的事；他们希望了解俄国。苏联当时正是举世瞩目的中心。李维诺夫已到华盛顿，两国的外交关系刚刚恢复。左翼分子开俄国的玩笑说：“与其来一位苏联大使，还不如来一位苏联顾问。”

华盛顿第一次有了懂得经济、有头脑、会计划的人。国务卿华莱士对我解释了他削减农业生产的计划。他说，“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外国市场的需要，必须削减以适应国内需要。”他承认各方都表示反对，他的坦率令人高兴。他说：“加工工业反对税收；铁路部门反对减少货运量；出租房屋单位反对减少利润；城市居民反对提高食品价格；农民的反対是很自然的，因为减少生产违反了人的本性。”

我笑着说：“人们曾说布尔什维克反对人性。看来你走得更远。”

“我想是这样的，”华莱士国务卿微笑着说。在我离开时，他又说：“美国政府在制定一项计划，这是不是有点可笑？”

但是，他干练地、精力旺盛地制定各种计划。华盛顿人人都如此做。这个国家数百名出类拔萃的人都前往那里，制定各种计划。自耕农场、民用工程、民间节约措施——任何能够减轻目前仍在绝望中挣扎的人们的困境的计划。但是，所有这些计划都互相矛盾。农业计划提高了食品的价格，城市计划增加了市区商品的成本。没有一项统一的总计划来进行协调。也许有吧？来自哪里呢？来自每个人的美元，来自每个人的工作时间和工资，但不来自大商人。“我们是让穷人帮助挨饿的人，以保全富人，”华盛顿一位聪明的人

说。……而在苏联，则是穷人支持挨饿的人，以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国家。

他们能操纵多长时间呢？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有两位内阁官员出席晚宴，一位客人说：“我认为，我们的克伦斯基时代不会持续很久。”另一个回答说：“那么，选择你的后台吧！”不是被这方搞垮，就是被那方搞垮——看来，这就是进步分子的最后归宿。他们将选择哪一边呢？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这个国家的命脉——银行、土地、生产资料等掌握在谁的手中？实行新政的人不是宣布过吗？所有那些使人民穷困的巨大开支，都是为了促使工业运转起来，以使掌握经济命脉的实业家们重新获得利润。让国营企业增加利润和加强集体所有制工厂，这不是美国的做法。国家只为失业者、为农民、为工业提供廉价动力而花钱。国家基金用于施舍救济，而全部利润则归私有企业所有。人们议论纷纷，谈论政权从华尔街移向华盛顿。华尔街也曾有一段时间担心它的垮台，表示愿意接受某些限制，以便稳定它的地位，或者仅仅是排挤一些小的企业。除非罗斯福准备进行一次真正的攻击，为人民夺取经济命脉，否则，他能有什么作为呢？

在芝加哥，我记忆最深的一位教授，他对我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我读书时代。他被阿米巴痢疾搞得奄奄一息。这种疾病如瘟疫般在这个城市蔓延，但是当局却不准提及，因为害怕吓跑参观世界博览会的旅游者。罗伯特·莫斯·洛维特仅仅是这一沉默政策的数千名受害者之一，甚至医务人员都同意实行这种政策——不是为了边界地区的平静，而是为了芝加哥商人们的私人利润。我想，至少没有人能说苏联的沉默增加了一个人的死亡或增多了一次疾病。在一个充满危机的世界里，耸人听闻的荒诞故事能够动摇一个国家的信誉，甚至会引起入侵，但是很难带来宽慰。

在加利福尼亚，我看到了令人惊异的群众运动。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农业罢工在圣华金和英皮里尔地区爆发了，后来变成一场持续很久的战斗，这些流动的农业工人是随着季节性农业生产而流入的。共产党人领导了这次罢工。罢工随着花生、樱桃、梨子、桃子、葡萄、棉花等不同的收获季节，向北发展到加利福尼亚“天堂”地带，随后一月份又在最南部的莴苣产地再次爆发。总计四万五千名工人参加了这次罢工。

在冲突中使用了催泪弹和步枪；治安维持人员向手无寸铁的罢工雇工们开枪射击，婴儿们在罢工者的帐篷中死去。政府委员会建立了“秩序”。我想起了在中国、在中亚、在俄国等地农村进行的斗争。加利福尼亚州政权号称美国的“中立政权”，它究竟站在哪一边呢？这是很清楚的。在中国，国家权力机构杀害贫苦农民；在苏维埃俄国，它驱逐富农；在加利福尼亚，它驱逐雇工纠察队员。

在洛杉矶，我发现了一个运动，乍一看，它比农业罢工更引起我的兴趣。五十万人通过由失业者自发组成的一百多个合作救济协会，在一年多时间里靠以工换货维持生活。他们出卖剩余劳力换取剩余产品，以劳动换取躺在地里霉烂的农产品，换取面包店里发霉的面包，换取无法在市场卖出的脱脂乳、干酪、骨头，换取拍电影抛弃的戏装、拆除工厂时留下的破皮革传动带。他们显示了惊人的独创性，用这种方法为自己创建小工业和提供相当数量的食物和衣服。他们组织缝纫店，妇女把抛弃的戏装改成孩子的衣服；她们把皮革传动带做成鞋底；她们甚至搞到小车库、汽车修理店、重型卡车。洛杉矶的失业者用这些卡车运输剩余柑橘换取弗雷斯诺失业者的剩余土豆。

这些人令我着迷。他们是我这类具有开拓精神的人。他们没有堕落到参加纽约可怕的领救济食物的队伍和住进芝加哥的廉价

房屋,在那里,人们在酗酒和绝望中沉沦。他们仍怀有希望,并组织起来;他们发展了一种哲学。他们中有些人为了他们的集体一天工作十八个小时。他们自夸说:“资本家组织不起来,我们工人能够办到!看看这些资本家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看看我们白手起家干的事业吧!”有些人谈起了国际产业工人联合会的口号:“在旧社会的躯体上建设一个新的社会。”

难道不能从中得出些什么吗?他们的情绪使我激动,勾起我在西雅图所产生过的激情的回忆——我们工人的企业,我们要在不可抗拒的前进中不经战斗、和平地建立工人政权的梦想。但是,华盛顿一声令下,关闭了我们的造船厂,五万人的梦想破灭了。洛杉矶大有希望的工人们进行了如此英勇的斗争,为什么资本家仍然对他们容忍呢?原来他们使资本主义更省钱,更安全!他们是在加利福尼亚的垃圾堆上,靠慢慢降低生活标准来维持自身生活的,既大有希望,又没有骚动!他们甚至还不死心,渴望并随时准备为资本家卖力!

但是,共产党人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们反对我们的组织。”这激起我感情上的愤慨。美国共产党人看起来没有能力,不能同美国工人打成一片。那一小批接受莫斯科命令的共产党人对五十万美国人的运动作了些什么指导呢?

我不禁思索起来。这些共产党人至少明白,这一运动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知道,制高点掌握在敌人手中,他们可以任意促成它或者搞垮它。十五年以前,西雅图没有人懂得这一点;我们大家都象绵羊似的。现在有人懂得这一点,这是好事,即使只有几个人也罢。但是,他们是怎样懂得的呢?我用了十四年时间,经历了三个国家的革命才懂得了这一点。他们仅仅是在加利福尼亚,从马克思的一本书中弄懂这一点的。

他们从“理论”中明白了这一点，而我曾经鄙视这一理论，无法理解它。我曾学着理解斯大林；人们必须理解他，才能了解俄国每天发生的事。但是，列宁和马克思已成古人。我常想，马克思只不过是个宣传鼓动家，他的思想是建立在六十年前的德国和英国的基础上的。我受到的教育给了我这种看法。即使俄国对马克思那么崇敬，也未能改变我的这一看法，因为我把这种崇敬看作类似宗教。马克思难道不是一种教条吗？现在，我第一次明白，马克思是科学。人们是通过马克思的理论理解加利福尼亚的这些运动的。人们并没有因为伽利略是意大利人而拒绝他，也没有因为达尔文是六十年前的人而拒绝他。当然，人们对伽利略或达尔文的理论加以解释、发展或改善，以适应新的生活和新的发现。

我开始思考马克思。我曾经避免读他的书，因为他总是促使我从各方面考虑问题，而在我没有阅读俄国共产党人的理论的时候，我反倒更敬佩他们。“工人阶级和雇用阶级毫无共同之处，”他首先这样说。而我则一向认为：“一开始就撒谎；他们有共同的人性。他们都遭受疾病、洪水、萧条的苦难，他们都爱妻子和孩子。”假如你把马克思当作教条，这样的回答是很聪明的。但是，假如你把他作为指导你的行动的科学理论，那就不同了。

假如一位图画老师说：“红、蓝、黄是最基本的颜色；它们毫无共同之处。”那我会反驳说：“不对，它们都是颜色。人们将用油或水把颜色调匀，用笔划在一块油画布上。”这也许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回答，但它却无助于我学习绘画。学习绘画，你必须分析各种颜色，懂得哪些颜色可以混在一起，红色加蓝色将产生什么效果。

所以，当我说：“资本家和工人都是人”，这当然是的。但是，这种说法没有告诉我怎样对待资本家和工人，或者他们互相之间会采取什么行动。这种说法没有给我以改造人类社会的武器。马克

思的分析则是一种武器，是有助于预言社会中不同阶层的人是怎样行动的一种有用的科学分析。由于害怕理论书，我失去了所有这一切。我花了十四年的革命时间，才理解我自己的加利福尼亚。

如果美国共产党人真的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当作一种分析方法来使用，那末，他们就不是仅仅根据莫斯科的命令来领导美国工人，而是试图根据马克思、列宁、斯大林以及其他经济学家提供的理论，来分析他们自己的激烈斗争。难怪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懂得这一点！我突然也把他们看作混乱中的创业者了，这种混乱比俄国更复杂。这是一种昼夜不分的混乱，毫无计划的混乱。这种混乱，不是产生于俄国原始农村，在那里，反对新社会的势力主要来自旧的习惯力量；这种混乱产生于地球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和最具有进取心的资本主义，它刚开始蹒跚地走向深渊。在任何一种混乱中，最重要的是找到正确方向，而不要在一个接一个的、必然要失败的运动中浪费生命和精力。如果他们找到了正确的路线，他们就会去加以解释。

但是，在共产党人和那些沿海创业者之间，必须设法互相理解。我在美国西部的那些战友们，是如此勇敢大胆，充满乐观主义，善于组织，不惜冒生命危险，同时又是这样的盲目。看着他们盲目飘流，从一个幻灭飘向另一个幻灭，我感到十分痛心。难道找不到一个桥梁，使他们能够大规模地相互交流吗？他们必须站在街垒的同一边！

我曾离开了他们。我逃避了他们的错综复杂的环境，来到一个外国创业。难怪我在莫斯科感到无足轻重。除利用我的写作能力以外，莫斯科的工人还能利用我些什么呢？嗯，我曾为他们专门写文章；现在我是一个作家了。但是，美国工人本可以利用我的一

切——我的写作，我的组织能力，我对美国背景的本能的反应，我那善于分析的头脑。我二十三岁时就“征服”了哲学，后来认为它不符合生活需要而抛于一旁。

我不是一下子就想到所有这些的。有些是后来想到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产生了一系列想法。有些想法我在卡梅尔访问林肯·斯蒂芬斯时曾对他说过。我在青年时代认识的这位出色的记者是在他的病榻上会见我的。我怀疑他患了不治之症。

“现在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他突然说，“是写你的自传。讲讲你从生活中学到的东西。你是从我的起点开始的。你从未有过我当年的幻想，认为让诚实的人掌权，就能拯救世界。你开始时有自己的幻想。你们的西雅图是我们最进步的城市；一九二〇年它就处于美国今天所处的阶段。你一开始就碰到了公用事业的公有制，工人组织、合作社以及走向社会主义的模糊意识，看到这些事情失败后，去了莫斯科。你在那里找到了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会讲述些什么。我未去那里生活过。但是我知道，以后你应向美国讲讲这些。”

“这也许有助于建立一座桥梁？”我说。斯蒂芬斯回答说：“这将为这座桥梁加一块非常好的石头。”

停了一会儿，我又说：“我早就想写这样一本书，签合同已经几年了，但是有一个麻烦。我在莫斯科没有象您想象的那样融洽。我的很多时间花在《莫斯科每日新闻》上。”

“是什么样的麻烦呢？”斯蒂芬斯问。

“我不会天真地说，那份报纸不讲实话。我是一个记者，完全懂得没有所谓绝对真实。真实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就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当我说要讲实话，意思是我要说出我的看法。《莫斯科每日新闻》不反映我的真实看法；它讲的是另一套。我有权讲

出我的看法。”

“您做了吗？”斯蒂芬斯微笑着问。

“我知道这很困难。编辑们总是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我可以给予世界什么呢？当我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的观察描绘出最清晰的图像时，难道不也就产生了共同的真实吗？我要为苏联描绘一幅非常好的图象。这就是：一个工人巨人奋力通过沼泽。他必须设法通过，否则就是死亡，跟在后面的人们将迷失道路。他陷入齐腰深的泥潭；岩石从峭壁上滚下来，砸到了他头上。他浑身是血；他不是一个人讨人喜欢的人。他肮脏、粗鲁、坚强，但是，他披荆斩棘，为全世界开辟一条道路。

“我想，这一形象将唤醒全世界英勇的盟友。我认为这是一个真实的图象。我们已在《莫斯科每日新闻》上画了一部分——我们工人的来信和我们同官僚主义者进行的斗争。随后，正当我心情愉快，以巨大的干劲完成这整幅图象时，我发现它被另一幅我不喜欢的图象所阻止。在这幅图象上，一位奇迹般的处女身披白衣骑在一匹白马上，世界上贪婪的恶狼从四面包围了她。所有恶狼都想吃掉她，但她却端坐不动，泰然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从未有一点泥浆玷污她的白衣，她也从不愿意伤害任何人，甚至也不想伤害狼。

“我不是说这幅图象是一个谎言。资本主义国家的确是恶狼。苏联的经历的确是一种奇迹。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在本质上是正确的，而且相当强大和聪明。但是，那位一身洁白的天使令我讨厌。现在我看清了她来自何方；过去我从未见过。这是李维诺夫的苏联，它自我克制、彬彬有礼，为全世界创造和平。她也是真的，同我的巨人一样真实。但是，我不是一位外交官。我必须画出我的图象，而不是李维诺夫的图象。”

我停了下来。林肯·斯蒂芬斯正在说话。“您很幸运，幸运的

人，”他说。我屏息等待他说下去。我们的谈话快要结束。这也许是他对我说的最后遗言吗？

“您是一位难以置信的幸运人，能有机会帮助李维诺夫使苏联免遭战争。这是整个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这就是这位曾经如此热情地报道美国五十年的伟大记者对我的工作的看法。我俯首窥视我的心灵，吃惊地发现我观察的深度。在我身上仍留有长期给赫斯特系报当记者的痕迹。我把“我的图象”举得比世界和平还高。

第三十章 圣人之死 ——平等问题

我回到莫斯科时，那里正在修建地下铁道。美国已在那里建起了使馆。各方面都有很大改善。一方面在大都会饭店为外国人举办了更多的爵士音乐会；另一方面，更多的街道被挖开修整。美国大使布利特对我说：“这个月我无法外出到阿巴特去；下个月他们又把去伏罗夫斯克街的道路给堵了。他们总是为我留下一条窄道。这个街区的房屋都推倒后，从新的使馆就能很清楚地看到克里姆林宫了。但是，他们何时才能建起这个街区呢？他们不是一开始就使用了中世纪时代的方式吗？”

市场地区中央的古老教堂都被推倒了，空地上铺上了柏油。几天以后，警察手戴干净的白手套已站在那里指挥混乱的汽车，交通的轰鸣声震荡在另一个广场。我的公寓的一面被地铁施工阻断，另一面被苏维埃宫所挡。原先从窗口能看到莫斯科大教堂的金色圆顶——为纪念击退拿破仑而建立的华丽古怪的建筑物，现在只能看到一个大土坑，同在库兹涅茨克见到的一样。如果我在家

连续呆五天不出门，我就不认得到闹市区的道路了。有些街道不通了，有些街道新开辟了。在你等车的时候，标志就更换了。

全国以各种形式提出一个口号：“打好下一个质量和超产仗！”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生活水平要提高一倍或两倍。去年为收成进行的战斗，使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是要提高农场质量就需要增加牲畜。猪，猪，猪！^①“每户农户一头牛！”由于粮食剩余，建起了一个个大型集体养鸡场。每个城市增开了百货商店，工人们在商店里怒气冲冲要求买到更好的外套。一列列火车正在向西伯利亚运送香水。大学开除成绩差的学生。莫斯科关于质量的口号是这样写的：“我们无产阶级首都必须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佩奇克跑来看我，他说：“现在我是莫斯科市计划机构的头头。请尽量想法为我从美国搞些书。我们必须把十七条主要街道拓宽一倍；如果临街建筑物太好不能拆，我们将在离开半个街区处拆除小房屋，建一条平行线。我们正在打通上伏尔加河，同莫斯科河联结起来，以便引来更多的水。市区南部将成为工业港口，还要把多余的河水通过游览运河输送到城市其他区域。斯大林说：‘要治理好莫斯科河。’它将成为美丽的水道，两岸建设大批工人公寓。

“卡冈诺维奇是我们计划工作的总头目。我们叫他：‘未来莫斯科的主要设计师。’他甚至给院士们出点子：这里应建立体交叉桥，各条线路不要都交织在地面上；那里要为工人搞些阳台。城市周围的老区将建起环形公园，由绿色辐射线同中心相联。你的大公寓也要推倒；我们让你住了八年了。然后，你将住得离市区更远，那

^① 1934年1月1日至1935年1月1日生猪增加了118%（增加了一倍多）；长角牛增加了21%（牛犊增加了94%）。1930年至1934年，商品流通增加了二倍。（莫洛托夫1935年1月对全苏代表大会的报告。）——原注

里交通比较好。”

“我已经住在建筑工棚里了，”我说。“我不愿失去这些迷人的古老教堂。那些壮丽的中国式城墙，真的要拆除吗？它给莫斯科中心以完整的情调。”

“你等着看新情调吧，”佩奇克笑着说。“我们将把中世纪时代留下的最佳部分用栏杆隔开，作为博物馆。但是我们不能把莫斯科变成一个博物馆。宽阔的林荫大道，迷人的街景，空旷的场地——那就是未来的莫斯科。我们将拆除红场上的拱廊，从而把红场拓宽一倍。这样，伏罗希洛夫五月一日检阅莫斯科卫戍部队时就不用再走小巷子了。克里姆林宫红场对面，将要建起一幢二十层的国家工业大厦。”

“但是，红场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之一了，而且是这样美丽和谐。我总觉得那个三层楼高的圆柱拱廊为游行提供了很美的背景，”我说道。

“不过是十九世纪的贸易货摊而已，”佩奇克说。“下次庆祝时您再仔细观察一下那个广场吧。”

五月一日我站在看台上，观看一百万莫斯科工人声势浩大地通过红场。他们从尼古拉大街和历史博物馆两侧，以城市十个区组成的十个纵队，六十个人肩并肩地正步拥进广场，象一堵不断向前推进的巨大人墙。广场上红旗如海，人群似潮，犹如不可抗拒的大海波涛。在这行进的队伍中，一千个工厂乐队奏起了匀整和谐的乐曲。他们从广场这头洪水般卷向那头，随后在有很多圆屋顶的伊凡雷帝教堂处分开。在退向莫斯科河的这一红色波涛中，教堂犹如一堵峭壁矗立在那里。

在世世代代漫长的岁月中，克里姆林宫墙在这个广场上看到了些什么啊！它们目睹了古代同鞑靼人进行的战争，骑在驴背上庆

祝棕树主日的主教们，十七世纪嗜杀成性的沙皇亲手杀害人们所用的林立的绞刑架。远东商队沿着尼古拉街来到这个商业中心同南方鞑靼“金帐汗国”的商人以及同来自诺夫戈洛德和特维尔的蓄着胡子的北方人做买卖。这些城墙看到了拿破仑的胜利和退却、现代君主的豪华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战灰溜溜的士兵。最后，它们看到了十月革命：赤卫军士兵从工人郊区蜂拥而来，直捣克里姆林宫。

十三年来，我观看了来自莫斯科日益扩大的工业区的工人们每年两次席卷这个广场，以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显示了世界革命的每一新阶段。我记起了最初几年，当时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旗帜，高呼口号，反对彭加莱和寇松，呼吁世界工人给予援助。在那些日子里，干涉似乎迫在眉睫。随后开始了以建设为重点的五年计划，一年以后重点转向生产，这时广场上出现了林立的标语，反映完成工厂计划的百分比。不久，这些东西变成为推行个人责任性和提高质量的斗争。游行者庆祝的不仅是他们的工厂，而且包括工厂里的车间，他们举着创造了纪录的模范人物的画像。莫斯科郊区的集体农民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游行队伍中。外国人说：“他们放弃了世界革命。”然而，每个工厂都明白它们是革命的一个岗位，每一个集体农场都要求做到：“你们对世界革命承担的任务就是多打粮食。”

今年，一九三四年五一节游行队伍的口号是：富足、质量、丰富多彩！数百架飞机从游行队伍上空轰鸣而过。在飘动的红旗海洋中，出现一个个用充气橡皮制成的高大模型：火车头、住房、飞船。十几个男子汉肩扛着苏维埃宫模型徐徐行进；数千人举着象征滚珠轴承、纺锭、新机器的模型。过去是一个人向天空放气球，现在是成群的人向天空放气球。成千气球挂着画像和题词飞向天空，数

百万条彩带扔向人群上空，随后落下被踩在游行者的脚下。游行的调子暗示：将发生世界性资本主义危机，出现战争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释放台尔曼。”“中华苏维埃万岁！”

十五世纪建起的克里姆林宫墙目睹了这一壮观的群众游行。城墙下身是一座座革命者之墓和列宁陵墓。在那里安息的还有美国共产党人：约翰·里德，海伍德和卢森堡。沿着城墙的观礼台上，站着一万名观礼者：工人模范、外交官和记者——他们是世界的眼睛。广场对面，矗立着坚固的拱廊建筑，那是一位百万富翁为莫斯科建筑的最豪华的贸易场地。应该把它拆除！这里没有它的地位！把广场扩大一倍，让它从十五世纪的堡垒变成社会主义工业的二十层大厦，连结莫斯科的过去和将来的是创造未来的人——列宁和他的在坟墓中安息的战友们。

* * *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瓦连京娜的一封信。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姑娘，二十四、五岁就担任了莫斯科第二大学英语系主任，领导着一大批老师和数千名学生。她在我的公寓里住了两年。我俩曾坐在我的会客厅里，长时间地、反复地讨论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对男人的看法和我们对党的态度等问题。据我的记忆，我们对党的过去的工作充满敬意，但对它的现状感到不安。对那些不是“管事的负责党员”来说，我们毫无用处。我们一直想着总有一天要入党，但总是在最后一刻发现我们灵魂深处或党内存在着缺点而又一次推迟。

因为我对周围生活的反应，总是凭感情而不是用逻辑分析来概括事实。我们看到某个工人被开除、某人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或者听到某个农民挨饿，我们很快就联想起过去十年中我们所看到的每一件不公道的事。我们立即就说：“这个国家比资本主义还

坏，它开除工人，使农民挨饿、逮捕无辜百姓。”于是，我们为此激动不已，直到看到一位优秀工人得奖，或一个集体农场取得成功，或者干了越轨事情的人受到惩罚，我们又摆向另一个极端。

最后，我发现阅读《真理报》能部分地帮助我改正这种态度。这与其说是对成就的热烈报道起了作用，倒不如说是由于报道骇人听闻的犯罪行为起了作用。这些犯罪行为之恶劣超过我的想象，相比之下，我所抱怨的事可谓微不足道。《真理报》不回避这些问题，但不是发泄感情的抱怨，而是坚决地与之斗争，这种态度也对我产生影响。他们似乎认为可以征服一切，甚至可以改变自古以来的人性。……“让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做到，”我说。“人类需要这样。”……即使是表示我最热情的希望时，我也是说：“他们”，而不是“我们”。

瓦连京娜已经入党了吗？我可保证她肯定会极力促我加入。我曾对她说过：“加入吧！这是人类的最后机会。假如这些俄国共产党人失败了，那就只好进入黑暗的时代。至于我，我有自己的理由。他们也许会让我去参加毫无效率的美国共产党，我不能同意。”我对美国党的态度正在改变，但现在我还有别的有力理由不参加。但是，由于瓦连京娜在普特洛夫工厂担负着向工人教授马克思主义这一社会工作，她实际上具备了入党的条件。任何人从事这种工作两年都会取得很大的进步，可能她已加入了。

瓦连京娜在信中一开头就责怪我不给她写信。我认识到，这是一种强烈的感情爆发的开始。她继续说：“你已经加入我们‘伟大妇女’的行列呢，还是仍然是一个‘左翼人士’？……这里乌云密布，气压很低，等级森严，特权很多，骄傲横霸。人们要么当一个党的圣人，象你的丈夫那样，一见有人批评就坐立不安；要么成为钻营投机向上爬的贪婪之徒——不管事态怎样发展。党的圣人越来越

少,越来越不时兴,而对贪婪的家伙却变得习以为常,容忍接受。……不管怎样,我马上就要到莫斯科去,那时我们就可以进行只有两个非党群众才能够进行的倾心交谈了。”

什么?我不喜欢她提到我的丈夫。当一个男人在飞机上度过四十四天来报道收获情况,为了挽救数千蒲式耳谷物而瘦了三十磅时,他对瓦连京娜的激动情绪有权感到不安,即使对我的这种情绪也会感到不安。把非党群众看成什么了——“只有他们才能够进行的交谈。”党员回避推心置腹,这是事实;他们给你一本马克思的著作。然而,是不是瓦连京娜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个年头,我还会为党的过失而痛哭吗?

不过,来信仍感动了我。在三年时间里,这个国家一直在奋斗,努力做到斯大林关于效率的“六个条件”,其中包括:在经营管理中增加工程师,有组织地招收劳力和减少流动性,改善生活条件和实行不同等级的奖励。难道这种不平等真的在危险地增加吗?是的,确实有人由于物质的不断增加而变得势利起来,谋求特权,要求更大的公寓和夏季别墅。“难道人们一定得今年为饥荒担忧,明年又为粮食过剩而发愁吗?”我叹着气想。但是,难道过剩真的引起了问题?

我忧心忡忡,不得不向柯伦泰提出了此问题。她是苏联驻瑞典大使,从斯德哥尔摩返回莫斯科休假。“这问题还没有新经济政策那样糟糕,”我说。“但是,它是不是更微妙呢?看起来,问题甚至出现在党内。”

“我们吸收了一千一百万农民加入产业工人阶级行列,很大一批人加入了我们的党,”柯伦泰说。“他们带有私有财产的观点和以物质条件来判断生活的习惯。他们是我们新生力量,但是他们不可能一下子被改造好。”

原来是这样！不是新的弱点，而是新生力量！大批群众现在正涌进来，他们的意志一定会反映出来。他们仍然需要额外的刺激——不同等级的奖励。但是，问题仅仅是这些新群众吗？“这些农民的要求很简单，”我直截了当地说。“攫取了别墅的是那些官僚主义者。”

“对，”柯伦泰从容地微笑说。“这种情况甚至发生在某些没有想到的地方。克里姆林宫疗养局有个人竟问我为什么不要一幢夏季别墅。我大声说：‘什么！当我还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嗯，你总有一天要住在莫斯科的，可能需要一所别墅！’……‘如果党叫我回来，我对他们说，‘党将知道如何安排我的住房。’……怎么能想象住在斯德哥尔摩，而在莫斯科留有房产。……但是，这些官僚主义者还只是在群众允许的范围行事。我觉得我们的确在产生一些弊端。如果他们走得太远，毫无疑问，我们将同他们作斗争。但是，这当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在此期间，农民本身也在得到改造。”

“什么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呢？”我问她。

“您自己知道。您读过党代会的文件。这就是：质量，超产，掌握技术和把生活水平提高两倍。还有争取和平。”

她的这番话使我放心，直到雅沃斯卡娅去世。雅沃斯卡娅是由于对不平等感到不满，含恨而死的。不象瓦连京娜，雅沃斯卡娅是我最亲密的女友。瓦连京娜与我同住一套公寓，有共同的语言，但是，雅沃斯卡娅与我曾为约翰·里德公社共同战斗过，共同照看过公社的很多孩子。我觉得她有点多愁善感。但是，她曾给四处漂流的公社社员提供了多么大的帮助啊。他们全都如同雅沃斯卡娅的亲生子女一样，同她商量工作和婚姻问题。

雅沃斯卡娅属于中世纪时期的真正圣人，她太大公无私了，不

能适应这个世界。甚至在丈夫主宰一切的沙皇时期，当丈夫不同意她收养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孤儿时，她同这位富有的丈夫离了婚。自此，她一生奉献给了无家可归的孩子们。她住的房间破烂不堪，还接收流浪儿童。尽管没有雨衣和胶靴，她仍然四出奔走，风雨无阻；她总是把她的最后一件外套送给更需要的人。她没有来得及看到五年计划的成就和任何愉快的事。她在最令人气馁的“战线”上工作。她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丹尼洛夫斯基流浪儿童接收站。只要有人想去参加游行，她总是顶替值班。一九三三年夏季，她长期忙于安排乌克兰的孩子们，组织他们住进农场和帮助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创建新生活，她竟放弃了来看我的机会，因为她知道她满身是虱子。有一次，她在我会客室里因精疲力竭而倒下，我们用了整整一天时间，才把毯子上的虱子捉净。

在她去世一星期前我见到了她。她闷闷不乐。“他们把我们的接收站作为‘模范’。您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我们必须拒绝接受这些孩子们，除非能为他们提供床铺；我们必须让他们躺在街上！然后让人们来看我们的接收站管理得多么好；看我们怎么分班，教导有方。其他市区也就照搬我们的做法。

“我想，去年是最糟糕的，当时这些乌克兰儿童把我们忙得不亦乐乎。这十年可算是多灾多难，我们征服了饥荒，又遇到了预料不到的水灾。我说：‘再碰上这样的一年，我就没法熬过去了。’现在我们站已经没有乌克兰儿童了，他们全都返回家园，回到他们父母的农场了。今年，西部省和部分莫斯科地区遭受了暴雨，淹没了庄稼。但是没有很多流浪儿童；也没有发生伤寒。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接收孩子了。我宁愿收容满身虱子的孩子，死于伤寒，也不愿把孩子们拒之门外，保持这个可怕的‘模范’站的名声。

“我们的站长契尔冯泽夫心肠太硬，尽管他本人也曾是个流浪

儿。他说：‘不要这样担心，雅沃斯卡娅。这次不会象去年夏天那样费劲了；只有在收割前的七月份忙一些。呆一个月，他们就全回家。现在莫斯科粮食充裕，在城市公园里呆一个月，那是什么景象？只不过是一次美好的野营；我当过流浪儿！我们的站以质量著称，人家照着我们办哩。’

“最糟糕的事是不平等。他们关闭了我们专为工作人员开设的食堂；他们说它太小了，不好调节。有几个站长在办公室里吃特殊饭菜，但是我拒绝这样做。在我那些很好的工作人员步行半小时去大食堂吃饭的情况下，我不能这样做。……不过，我还真没有时间去呢。”我了解雅沃斯卡娅，我知道她准是常常挨饿；她只有在家里有时间喝杯茶和吃片面包。

雅沃斯卡娅始终拒绝“特权”。她拒绝任何她认为只有党员才能享受的巨大特权。有一次她曾对我说：“我的生命是从有了苏维埃政权才开始的；是苏维埃政权给了我为孩子们而奋斗的机会。”但是，当接收站工作人员推选她为优秀工作者，说她“完全够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时，她回答道：“我一生中只关心党的成功，但是，由于他们的迅速变化使孩子们无家可归，我无法心安理得地加入。对我来说，他们走得太快了。”

雅沃斯卡娅比我年长几岁；她象一位母亲。最后一次见面我离开时，她还紧握我的手不放；她病倒在床上。“您是我能与之交谈的几个人之一。人们不能把麻烦告诉外人。常常也不能对党员讲。我最好的一位同事是个党员，他们让她干别的工作去了。她现在也不愿听我诉说麻烦了。她说：‘我已为孩子们工作了十年，如果我了解他们的情况，会影响我的新工作。’我能够理解，但是，这使我感到孤独。”

八天以后，雅沃斯卡娅就死于斑疹伤寒。我看到她时，疾病使

她脸色发黄，十分憔悴。她得病后还连续工作了五天，简直难以置信。“我们不能理解，”站上的人说。“去年很多人得了此病。但是今年我们没有人得。她是唯一的一个。”雅沃斯卡娅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她死于斑疹伤寒，是为孩子们操劳而死的。

她的遗体安放在接收站的红角，上面覆盖着鲜花。覆盖着红旗的光亮红色的灵柩上蒙着黑纱。墙上悬挂着她的放大遗像，比起她蜡黄的遗体，像片更象她本人。遗像面容酷似数世纪以来的圣母，她是孤儿们的永恒母亲。

六人组成的仪仗队轮流肃立在灵柩两头守灵。她教育过的流浪儿童和同事们轮流进入，握住盖在她头上的旗子默哀几分钟。在外面，由站上的孩子们组成的乐队奏着革命的葬礼进行曲，小一点的孩子们排成队伍带着严肃的神情来同雅沃斯卡娅的遗体告别。“我们将以她的名字来命名由她组建的这个接收站和另一个为孩子们新建的公社，”他们告诉我。“她的遗像将一直挂在红角。儿童委员会为纪念她将设立大学奖学金，授予各少年之家考入大学的孩子们。”……不，她不再是旧时代的圣母；她已成为革命的母亲。

然而，她是含着悲愤离开人世的。她的养女曾是一位流浪孤女，她满面泪水地讲述了雅沃斯卡娅的临终之言。“您们知道她说什么吗？她说：‘没有平等！永远不会有平等！一些人永远有特殊的饭食，而同时另一些人则挨饿。’后来在她失去知觉前一刻她又说：‘不要为我的死难过。我精疲力尽了，我对他们十分失望，我要在这个国家只有绿树的地方安息。’”

现在，那些使她耗尽精力、令她失望的人们都为她聚集到一起来了。那位曾经是孤儿，为质量而奋斗的“硬心肠站长”两颊挂着泪水。那位曾经与她共事，但入党后“不能再倾心交谈”的同事，扒在灵柩上抽泣。全体工作人员、办事无效率的女共青团员们也都

在那里。为了这些人，她曾放弃了“特殊饭菜”。那些爱吵闹的男孩子们现在也为她安静了一小时。她为他们耗尽了心血，他们全都爱她。

我们跟在巨大的红色灵柩后面，来到火葬场。儿童委员会主席致悼词，对她备加赞扬，宣布了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新的奖学金。少先队员的代表讲述了她向孩子们指出“走向人生的道路”。火焰吞噬了覆盖着大量鲜花的她的蜡黄的遗体。他们来到那个红角，把一堆人造玫瑰花和菊花放在一边。这些花是数百名热爱她的普通老百姓送的。他们的哀痛使这种俗气的做法显得高贵。

面对雅沃斯卡娅的去世，面对这位圣人在如此绝望中结束她一生，是很难过的。我对别人谈起了她的临终之言。一位老知识分子说：“毕竟，只有在我们的国家，人们才愿意为理想而死。”……这种回答令人讨厌；它是对雅沃斯卡娅的侮辱。但是，究竟怎样侮辱了她，我无法进行分析。

在她逝世十天后，有人打来电话。“您还记得莫罗索夫吗？”

“莫罗索夫，”我高兴地叫了起来，“是约翰·里德公社的。”

……

“我从外地来，”他说。“我在莫斯科过夜。”

等待时，我考虑着如何满足莫罗索夫的新需要，因为雅沃斯卡娅不在了。上次我见到他是在伏尔加，当时他和妻子都身患疾病，拖着两个小孩。在彼特罗夫把他逐出公社后，他失业数个月，得了肺结核。毫无疑问，由于雅沃斯卡娅已经去世，他才来找我的。

莫罗索夫显得安静、脸带笑容，满怀信心。我们谈到了分散在不同岗位上的老公社社员。“大部分都干得很好，”他说。“在那个公社里，我们学会了如何斗争。”他说他现在“在伏龙涅什搞土豆收购”，我猜想是做小职员的工作。他因为有公事要办，在莫斯科呆

一段时间。

“您觉得这个国家的现状怎么样？”想起了雅沃斯卡娅临终时关于平等的一段话，我问道。莫罗索夫年轻时曾梦想建立伟大的公社，他现在想些什么？

“我一点也不满意，”莫罗索夫说。“我们的‘质量’很差。我哪里都买不到一件象样的外套。但是，我们俄国人是能够做出高质量的东西的。几年前我在伏尔加买过一件很好的外套。但是现在，我们用尽人力物力，而质量还是很差。”

“有人告诉我比去年好多了，”我茫然地说。莫罗索夫梦想过伟大的公社，他竟会为了外套而不满吗？“据说，去年商店有什么，人们抢购什么，但是现在，工人们把次货退回去，还在意见簿上提意见。”

“我们比写意见簿做得更好，”莫罗索夫咧嘴笑着说。“我们把制造劣质外套的人抓起来。当然，现在比一年前好！”（这种轻蔑的话表明这一年有了很大变化。）“但是要掌握我们的新工厂，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我们实在太慢了！”

太慢！五年计划使这个国家的生产增加了一倍多，而对雅沃斯卡娅来说却令人痛苦地太快了！“您听说了雅沃斯卡娅的事了吗？”我问他。

“我随后就到她那儿去，”他平静地说。“只有在午夜才能见到她。”……

“雅沃斯卡娅已经故去了，”我告诉他。

他感到伤心，他是没有悲痛欲绝。他本来也只是想同她进行一次友好的交谈，对她是无所求的。随后我讲了雅沃斯卡娅是怎样死的，她努力接收每个孩子，对特殊饭感到痛心，痴心于平等。莫罗索夫开始不安起来。

“就象有些同志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那样死去了，”他伤心地说。“可怜的雅沃斯卡娅！我们本应该对她照顾得好些。她从不关心自己。她在沙皇时代生活得太长了。她感受太多。”

这是莫罗索夫在说话吗？这就是雅沃斯卡娅一直照顾着的约翰·里德公社的那个男孩子。她对平等的议论仅仅引起了他的怜悯。他那种无动于衷的态度使我恼火。

“她是我曾经认识的最好的妇女，”我强调说。我的意思是：她是最无私的妇女。

莫罗索夫点点头。“一百万人里挑一个，”他热情地说，认为他是在重复我的话。“在我们受彼特罗夫压制时，她给我们这些孩子们指出了生活的道路。我们应当更好地照顾这些老人。我跟您说了，我们的水平很差。要是那个接收站管理得好，他们就该迫使她提前两个月休假，并给她一个月病假。在她回来时，西部省的收割就结束了，孩子们也就都回家了。大批孩子流浪的事不会再发生了。她就能送走剩下的流浪儿童，愉快地安度晚年。”

对莫罗索夫来说，雅沃斯卡娅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她做了伟大的工作。她的多愁善感是一个可以原谅的弱点，因为她太累了。雅沃斯卡娅不是也把这归因于劳累吗？她说：“我对人们感到厌烦；我需要绿树。”

“您对平等问题，有什么看法？”我紧追不舍，不想放过他。

“平等不会马上实现，”莫罗索夫微笑着说。“我们首先必须有充裕的物资。”……他甚至没有把我的话同雅沃斯卡娅联系起来。他以为我嘲弄他早期关于伟大公社的梦想。

“但是，平等将如何发展呢？人们是更加平等了呢，还是更加不平等？关闭那个食堂，专为主任们做饭食，这是目前的一般趋势吗？”

“是这样，”莫罗索夫说，毫无担忧之色。“去年大部分地方为工作人员做特殊饭，但是现在只为少数时间特别宝贵的人这样做。再过一年可能就不需要这样做了。我们的物资越来越丰富。不要多久，普通合作社将为我们提供食品。

他仍未抓住要点。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不是一个道德观念。他没有看到雅沃斯卡娅担忧的新的特权；他只看到了取消特权的阶段。难道没有办法让他认识到我的问题吗？那么我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不是不平等正在使苏联滑向资本主义，或者滑向某种类似的存在着等级、特权和专横的制度呢？”那就是我想要问的吗？

我永远不能向莫罗索夫提出这样的问题。事情是十分清楚的。他一开始就不会理解我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但是，假如我硬使那个问题突破他无意识的防线，映入他的脑子，而他也认为我的提问是很认真的，那么，我能猜到他的回答。“您说的是反革命语言。那是唯心主义的货色。”莫罗索夫就会永远不再把我当作同志。

那么，我只好问我自己，再不问莫罗索夫了。人们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呢？雅沃斯卡娅是什么意思呢？“别人挨饿，你也不能吃得饱。”莫罗索夫也是那个意思。他把此叫做“剩余”和“质量”；他的语言是美的，是真实的。他考虑了明确的阶段：为粮食和钢铁奋斗五年；为质量、剩余、黄油和外套再奋斗五年。到那时，人们方可开始谈论平等。

莫罗索夫所说的“平等”是什么意思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莫罗索夫认为这还很遥远。但是，那就是“平等”吗？如果每个人的需要和能力都一样，那多可怕！岂不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蚂蚁窝！我突然认识到，建立大公社这种做法本身就反映了人类无数的不平等：诗人、科学家、探险者、工程师、技工，无数形形色色和互不

相同的人——最终全部自由发展为完全独立的个人，没有剥削，只有平等的同志关系。

那么，“平等”这个字眼只能使人们胡涂，如同“上帝”、“真理”、“自由”等所有充满理想的词汇一样，如同我年轻时代虚张声势的字眼一样，它们巧妙地掩盖着很多互相矛盾的意思。其中之一是说没有人挨饿、没有贫困，是人类的迫切需要；还有一些意思，则是裹着糖衣的毒药。对“平等”需要进行明确的分析，而不是感情冲动。

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憎恨那个人，他在谈到雅沃斯卡娅时说：“只有在俄国，人们才会为真理而死。”这样的人是必须打死的毒蛇！雅沃斯卡娅难道是死于“理想”，死于“平等”一词的毒害吗？决不是！雅沃斯卡娅是“一百万人里挑一个”的工作人员。她的死有其更体面的理由。她死于斑疹伤寒，死于精疲力竭；她在战斗中死去。对她作了正确纪念的是莫罗索夫，而不是我。我一直在维护她那神圣的感情。莫罗索夫则不苛求于她的弱点，但赞颂了她的力量。

“对于特殊饭，雅沃斯卡娅该怎么对待呢？”我问莫罗索夫。

“她当然应当吃啊，”他漫不经心地说。“她的力量是宝贵的；她的工作人员都是年轻人。任何时候，如果你能使党相信你的时间十分宝贵，应当享受特殊饭，那你就可以吃。在萨拉托夫，我就吃了，但是在伏龙涅什我就不能。到收割结束后，所有特殊饭都要取消。”

什么！莫洛索夫是吃“特殊饭”的主任之一？他干什么工作？我问他究竟做什么。“我想我已告诉您了。我在黑土地区负责购买土豆。我收购了差不多一百万吨土豆，并把它们运到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其他地方。”

“啊，莫罗索夫，多么令人吃惊！你是我们约翰·里德公社的孩子啊！”

“这没有什么，”莫罗索夫说。“我给您说了，我们过去的公社社员大部分都干得很好。收获过后，他们还给我送来蔬菜。中央委员会召集我到莫斯科开会；我们正在改组这个国家的蔬菜运输。我离开约翰·里德公社已经八年了；现在我该懂些事了。”

这就是我认为由于雅沃斯卡娅死了，而跑来找我帮忙的那个孩子。我不再打听以前公社社员的事，开始询问土豆的情况，就象向任何其他负责人了解情况那样。

“对，蔬菜处理是整个国民经济中的薄弱环节之一，”他说。“两年前，土豆在我们仓库里、铁路上和运到工厂合作社后腐烂掉。各地的土豆都腐烂了。去年我们解决了仓库问题，但是我们得到了特别命令，说消费者还没有做好准备，我们必须为他们储存大量剩余土豆。根据一项特别的理论，我们挖了很多深沟，但搞得不好。存放在里面的土豆大部分都坏了。‘质量’比前一年好，但还不行。今年消费合作社已经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就可以装运更多的土豆。我们还要挖几条深沟，进行试验。铁路上缺少冷冻车厢；运输还有问题。但两头的储存已经解决了。”

他侃侃而谈，讲到土豆，讲到土豆种得最好的区和黑土的土质以及每个区的定额。这就是莫罗索夫——阿斯特拉罕一位佣人的孤儿。他十岁时就看到了革命，目睹了戏剧广场的熊熊烈火，熬过了饥荒岁月。这就是十六岁来到约翰·里德公社建设伟大的公社的那位男孩，他曾经猛烈地捶击彼特罗夫锁着的门，因为彼特罗夫在里面非法掠夺孩子们的邮件。随后，彼特罗夫担心报复，便把他赶出去挨饿。

肺结核病怎么样了？“我两次进养疗院，一般来说饭食比较

好，”他随便地说。我又问道：“看到过彼特罗夫吗？”

“看到了，几个月前我在萨拉托夫看到他。我们为同一个托拉斯工作。他有点想躲避我，我也不愿见他。他仍在党内，但是最近这两次清洗中，他们把他搞得够呛。不是因为约翰·里德公社的事；那是老历史了。这家伙很鬼，他们刚要整他，他又溜到别的地方了。象这样的人是不可救药的；他们总会制服他的！”

事实已经证明彼特罗夫是个坏人，他曾经把莫罗索夫赶出去挨饿。但莫罗索夫没有时间计较这个私敌的事。他相信，当他恶贯满盈时，党会把这个坏蛋清除出去。但是，我却担心这样的人，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他们想要得到好的衣服，要威望，要夏季别墅，而由于这些欲望，他们总有一天会变成坏蛋。柯伦泰是对的；这当然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面临的重大任务是：组织、表达、满足一亿六千万人民的需要。

* * *

瓦连京娜来到莫斯科，坐在我的会客室里，要安下心来进行一次“长时间的友好谈话”。我说：“讨论思想已经过时！我们的思想已经解决十年了，现在这些事让我厌倦。您在搞什么工作：制外套、购土豆，编英语教科书，还是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

她回答得妙极了：“我到这里来，是要参加作家代表大会。这是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我们正在组织一个全世界知识分子反对战争危险的阵线。我们要改造人类心灵。”

我凝视着她。我曾有几个星期担心瓦连京娜可能引起感情冲动。过了一会儿，她表示歉意。“您知道，我写那封信时，我的心情相当坏。”……我讲不清，在过去的十三年中，我有多少次以坏的心情影响了正在奋斗的同志们。

* * *

在莫斯科市中心，尘土如云，遮蔽了秋天蔚蓝的天空。那堵十六世纪的巨大城墙正被推倒。一周后，人人都在说：“你见过那林荫大道吗？你见过那向鲁宾卡延伸的大片空地吗？你见过从中央委员会到诺琴广场的那片连绵起伏的丘陵吗？有哪个城市的风景可与莫斯科媲美呢？但是，你等到明年再瞧吧！”

《莫斯科每日新闻》的一位记者专程去了一趟西伯利亚。他返回后说：“你永远也猜不着来自库兹涅茨克的消息。他们正在同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竞赛呢——建立花园城市！”

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库兹涅茨克那个大土坑，那里的人们还用亚洲的古老方法用竹篮运土呢！一年以后，还到处是乱七八糟的临时工棚和土坑，人们满身是虱子，常患伤寒，拚命建立一个钢铁城市！他们在高炉方面进行比赛还行。但是，建花园城市，简直不可想象！

“这是事实，”这位记者说。“我让你们看看比赛条件，包括：林荫大道、公园和工人俱乐部。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草坪如茵，绿树成荫，有最好的公共汽车。但是，库兹涅茨克有有轨电车，从莫斯科去了个演出团，迈耶霍尔德公司正在那里演出呢。”

“在列宁斯克，有美国人留下吗？”

“是的，他们将留在那里。在全国比赛中，托姆利亚诺维奇队在耶米利扬诺夫大矿上获得第一。这个矿在库兹巴斯得了第二。有五个美国人列入‘优秀矿工’名字，但是，他们仍有怨言，抱怨没有人接受他们的建议。”

“我们要让你们大吃一惊，”从卡累利阿来的记者说。他负责报道在彼特洛扎沃德斯克郊外工作的六千名芬籍美国人的事务。“他们在北极圈北面的希比诺戈尔斯克为十一月节日修建了一个矿工文化宫，有自己的有声电影和电台。他们还为矿工修建

了三个娱乐公园、一个很大的技术图书馆和一个矿工博物院，这是北方的骄傲。明年他们还将开办一所矿业和化工大学。”

在库兹涅茨克竟出现了花圃！十年前，在这荒芜人烟的遥远北极冻土地带，里姆帕勒曾教目不识丁的当地人如何开矿，如今，在那里竟办起了一所大学，能看到有声电影……的确是由大乱走向大治。还要在哪里展开一场新的斗争呢？

我不禁想起了在莫斯科契留什金纪念会上一个男孩子说的话。他哭着说：“列宁进行了十月革命，我们的飞行员拯救了契留什金的队员，我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不，他太天真了！这个国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人们去奋斗。征服北极仅仅是它的第一阶段。作家们已开始改造人的灵魂；这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首席科技顾问瓦维洛夫曾对我说：“我们科学家曾经感到不受重视，但是，由于集体农民需要科学，我们把我们的工作看作千年大计。”

永远有新的难题需要去征服。当他们努力去战胜它时，他们就会感到生命太短了。对莫罗索夫来说，是不是足够快了呢？死亡是否仍然是我们最方便的方法，用以摆脱衰朽之躯，以便让新生力量前进得更快些呢？

第三十一章 自由的前奏 ——意志问题

“听说您正在写一本书，”鲍罗廷问我。“写您在生活中学到的一切。您在《莫斯科每日新闻》学到了些什么啊？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主要学到的是，尽管我进行了各种斗争，我看主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重要，”我嘲弄地说。

鲍罗廷露出关切的神色。“您取得了一个坏的教训，”他说。“而且这发生在我来帮助您管理这份报纸以后。”

他这是什么意思——帮助我？难道他不是这份报纸的老板吗？他是怎样“选择”到这里来的呢？难道不是党任命他的吗？然而，我的情绪缓和多了。“当然，同您一起工作比同别人要愉快些。您使报纸有了起色。但是，我想这是由于整个国家的形势正在好转。除您以外，似乎还有别的人在管我们。您曾经同意我的看法，我们需要美国式的生动文章，可是现在您走了老路，老是用俄文翻译过来的文章。我不知道是什么促使您这样做的；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在真正管我们。”

“您真的需要有这样一个老板吗？”鲍罗廷问。

“一个局外人甚至可能称我是老板。”我继续说，“因为由于我的斗争撵走了两位主编，而且应我的要求，来了一位总编辑。但是，我根本就没有管过任何事。我只是埋头于写我感兴趣的文章。也许你会说：‘您能在农业上帮助我们吗？’或者如范赞特说的，我应当为周刊做更多的事。既没有人听从我的命令，也没有任何人给我下达任何指示，因此我曾想，他们是在有意冷落我。但是现在我明白了，这不过是这个国家的作风而已。我真不明白你们是如何治理国家的。”

“其实，您明白，”鲍罗廷说。“您亲眼看了多年，而且就此写了很好的文章。”

“当然，我知道共产党当家作主。但有些事情我仍然不清楚。拿我们自己来说吧。我知道，党的新闻部在管我们，但是我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我们的上司呢，还是顾问。我知道，报刊公司是我们的出版单位，但是他们从来不看我们的东西。他们只知道同我们争办公室，偷我们的铜版纸，而我们也已变得强大，把他们挡回去。现在，新来的记者中有一位称我们是政府的喉舌，我觉得这样的说法不确切。但是我不知道怎样来反驳。”

“去问问他，他是否知道有哪一个政府部门愿意对我们的言论负责，”鲍罗廷笑着说。甚至我也对那种荒谬的说法笑了起来！

“假如您知道我在过去四年中对谁来管我们这一问题产生的很多想法，您会感到吃惊，”我说。“最初我想，这将是一个由雇用美国人的各工业部门组成的董事会。但是，他们只知拿去大量预订的报纸，报纸送不出去就抱怨。我有一年没有听到这种怨言了，所以我认为邮政工人干得比较好一些。

“有一段时间，我甚至认为国家政治保安部在插手管我们，因

为我弄不清业务秘书是从哪里获得他的‘权力’的。后来我又想，人人都在管着我们。排版工人可以改我的文章，陈依范的共青团员良心不愿通过我的社论，所以他在我不在场时自己作主……那是无政府状态。现在这种情况没有了。”

“这比无政府状态更严重，这涉及真正的利害关系。当然，我们必须摆脱这种组织混乱的状况。”

“谁真正在管着我们？”我问道。

“我们，”鲍罗廷说。“您和我。我做这个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为此花了不少时间和脑筋。您没有看到我同记者们开了那么多会议吗？假如您有时间时参加，那会给我们很大帮助。您比我更懂新闻业务。但是，我比您更了解我们的读者的需要，因为我视察了较多的工厂。我们的真正麻烦，是我们受管束太少了，太‘自由’了。也许您对这种说法会感到意外吧。”

“‘自由’这个词没有意义，”我不耐烦地说。“对苏联新闻肯定是不适用的。乌克兰出版社的头头曾对舍伍德·埃迪说，苏联新闻是世界上唯一自由的新闻。我愿意为苏联全心全意地工作，因为它正在建设一个比资本主义更美好的社会，至于说到‘自由’，我似乎觉得这不过是在玩弄字眼而已。有时我甚至觉得你们的社会主义也不过象一个蚂蚁堆，这使我感到很可怕。但是我想，你们将使这些小蚂蚁一开始就适应它。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我们在西部大草原幻想自由时，我们对它有什么感受。”

鲍罗廷似乎不想同我争论，他开始谈论我们的读者。“我们的真正麻烦，”他说，“是我们不很了解他们。我们比这个国家中的任何其他一家报纸都更难以了解自己的读者。我想，您的困难主要是由于这一点引起的。我们的读者包括各种类型，而且不太表现自己，他们不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方针。”

方针?我们的读者给我们方针?我知道, 每一家苏联报纸都有一个庞大的读者来信部, 很多主意来自这些读者来信, 并被广泛地运用到整个国家的各种政策中去, 有些甚至变成新的法律和条例。但是, 我从未把这一点运用于《莫斯科每日新闻》的读者。我把他们的信件当作活生生的材料, 但没有把它们作为“我们的方针”。事实上, 在苏联, 只有我们的报纸没有把读者当作我们的主人。他们应当知道什么, 是由我们作主灌输给他们的。

“我们的读者,” 鲍罗廷若有所思地说。“您了解他们吗? 我在工厂召开的‘《莫斯科每日新闻》读者’座谈会上经常见到他们。我问他们, 我应当使用什么语言。他们说: 俄语! 既然如此, 为什么他们要阅读一份英文报纸呢?”

“从出生来说, 他们既不是俄国人, 也不是美国人: 他们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匈牙利人、芬兰人, 是世界流动工人。他们在青年时代到了美洲的新世界, 现在他们则到这里寻找新世界。对我们来说, 他们是美国人, 因为他们在美国学会了阅读, 学到了我们之所以重视他们的技术。他们懂俄语, 因为在他们周围都讲这种语言。但是, 几乎没有人能够用英语写一封清楚的信, 很多人不会用任何一种文字写东西。他们在太多的语言环境中工作, 以至不会用任何一种语言写东西。”

“他们要求什么呢? 他们不可能轻易地告诉我们。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群众工作部’, 用三分之二的记者去了解他们的要求。由于资本主义使他们养成消极被动态度, 这一工作更为困难。他们只知道发牢骚, 但不知道怎样表达希望。通过艰苦的工作, 我们从他们来信中获得了有关地方上的压迫、官僚主义者、技术上的麻烦等方面的材料, 足够每天排满整个第三版。但是, 由于这份报纸在苏联发行两万份, 我们得到的读者来信应相当于目前的六倍, 才能把

我们报纸的方针完全建立在他们的要求之上。他们需要多少外国消息？需要多少美国罢工情况？他们要求有足球消息吗？他们需要了解苏联哪些情况以有助于理解他们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呢？

“我们的读者是不断变化的，我们自己也要不断改变以适应他们的需要。‘美元专家’们已经走了，我们不再刊登使他们感兴趣的软绵绵的东西。夏季旅游者来了，我们就要刊登比较简单易懂的文章。美国在此建了使馆，我们就加强国外政治情况的报道。我们最重要的读者仍然是在苏联企业中工作的讲英语的工人们。由于对他们很难掌握，我特别注意那些负责处理他们意见的俄国人的看法。假如我们能从读者中得到反应，《莫斯科每日新闻》就能指导这些俄国人。这样，我们将真正成为喉舌，但目前我们还没有做到。”

谁的喉舌？这是很清楚的，成为在苏联工业部门中讲英语的工人人们的喉舌，这正是我当初的想法。为什么我总是不知不觉地离开这一目标，随后又重新发现，似乎我根本不知道似的呢？

“至于你们这些作者，”鲍罗廷继续说道，“难道你们不是一直在试图使之成为向世界作报道的、聪明的年轻记者的喉舌吗？”

他是对的。那正是我长期奋斗的目标。我一直在努力吸收更多美国人参加我们的工作，突出他们的轻松愉快的文章。生动的特写、好的文风、艺术家的完美典型——这一直是我的理想。莫斯科的所有记者和来自国外的美国作者都证实我是对的。

“当然，他们证明您是对的，”鲍罗廷说。“他们的目的是精巧的写作；我们的目的是帮助美国人在苏联企业中更有效地发挥作用。您认为，我们这个缺少纸张的国家能为那些新来的记者们的多愁善感、闲情逸致提供纸张吗？他们想倾诉他们的灵魂，但是他们的灵魂没有什么用处。他们对苏联的一切无比地爱着，不加分

析,没有爱憎!您还记得我对记者们说的话吗:‘就把这些文章放在你们的咖啡里搅拌吧,你们就不需要糖了。’

“随后他们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引用整栏整栏的统计数字,或者根据两三个事实便进行毫无说服力的概括。这些新来的记者有几个能对工业、交通运输、政治生活或者农业给予清楚的、连续性的报道呢?他们把发生的互不相关的事,不管是愉快的,还是令人沮丧的,巧妙地搀和在一起,这是资本主义新闻惯有的手法。送给我的英语文章只要写得好,我总是比俄语文章优先采用。但是,不断更换的美国工作人员没有看到我们读者的水平变得越来越高,他们要求更全面的材料。这就是我为什么也刊登一些俄语文章的原因。作者的职能是学会反映我们的两万名读者的需要并给他们以指导。”

难道我们不是一直在这样做吗?对我来说,“自由新闻”意味着表达作者见解的新闻。但是,表达读者看法的新闻又是怎样的呢?那就意味着作者要去反映读者的意见。于是我们妄自认为自己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作过调查,也不懂得。

“他们读我的东西比读其他人的东西要多,”我自卫说。

“对,您文章生动,了解这个国家。但是,他们前进得很快,我们大家都必须不断前进。仅仅因为你能使人民感兴趣或者给他们以刺激,并不意味着你已经满足了他们的需要。假如你只是刺激他们,但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那么,长期下去,总有一天他们会发觉这一点而恨你的。”……对的,我想,这是知识分子、议员们惯用的伎俩,刺激但无意满足人家的需要,还把这种刺激称为人民的意志!

“但是,肯定,”我说,“除读者外,我们也对某人负责。我的亏损,谁来支付呢?”

“主要来自用于少数民族的教育经费，他们尚无能力自负盈亏。至于说到负责，难道您不感到负有责任吗？为什么您不再要求辞职呢？”

“当斯大林和卡冈诺维奇对这份报纸感到兴趣时，我就不想离开了，”我说。“但是，他们不管理我们。甚至新闻部也总是很难接触。”

“为什么要麻烦他们呢？您和我是有这个能力的。人家认为我们读过党代会的决定，懂得我们的总路线，知道如何把这应用到读者身上，从他们中间了解到他们的愿望，同全苏工人的愿望结合在一起。新闻部的任命说明他们承认我们的这种能力。我们不该打扰他们，不断要求给予指示。假如我们犯了错误，有很多方式来检查我们——批评报纸的杂志、《真理报》的新闻评论栏。我们应该阅读这些东西，跟上去。”

“我不辞职还有另一个理由，”我说。“我已经决定放弃理想主义，采取更加实际的态度。我断定，这份报纸不可避免地将越办越好，总有一天会闻名全世界，我将以参与这份报纸而自豪。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发展。我需要一个固定的岗位，因为我一天天老了起来！”

鲍罗廷露出感兴趣的神情。“不可避免地前进吗？”他反问道。“在这个国家中，很多事物在成长，但也有些事物在消亡。假如有更多的美国移民来，我们的报纸将变得益发重要。假如没有那么多人来，而目前的读者又将学会俄语，那么，《莫斯科每日新闻》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

这样说来，《莫斯科每日新闻》可能消失！我需要几天时间仔细考虑这件事。假如正当它的名声很大，我可以大展宏图时，它垮台怎么行！我是不是要重操自由撰稿人的旧业，在资本主义世界四处

寻找稿件出路呢？这倒可以自由自在地放松一下，然而靠这个过日子，那是多么的可怕啊！

几天以后，我顺道来到鲍罗廷的办公室。“写完我的书后，”我说，“我打算去参观一些工业。或许，最好给我分一项长期任务，使我同比如我们的大汽车工厂保持联系。在我参观农场和工厂的时候，也是我最喜欢这个国家的时刻。”

鲍罗廷奇特地看着我。我记得，这是他们常给共产党员分配这种任务，以使他们接触某一部分工人群众。我过去总是把这种任务当作一种额外的党的义务，现在我才明白，这是在苏联做好工作的必要条件。

* * *

就这样，我开始思考“谁在管事”的问题。在苏联，人们是按照老的方式下“命令”吗？我们总是进行“磋商”，通过磋商安排任务。我们去找主编，说：“我想旅游，看看这个国家。”假如几个人都同意，我们就去找秘书要一张小的证明文件，凭此可以报销所需的费用并在旅途受到照顾。我们把这称之为得到命令。多古怪的词！几年前我头一次听到这个词时，我想：“难道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不可以自由旅行吗？甚至他们要度假也必须得到命令和‘许可’吗？”但是这种纸上没有头头们的签字。你需要这种文件时，跟有关的人商量一下，就可以得到。

甚至我们的六位打字员也是自己组织她们的工作，分成不同班次，轮流上。主编们和编辑部变得无可奈何，说“我们刚熟悉一位打字员的错误，你们就换一个新的。”但是，这些打字员说：“我们喜欢不同班次，白班晚班轮流上。”随后来了一位新打字员，她想使工作更有效。一位编辑说：“斯大林说人们必须负责固定的机器和任务；这是党的路线。”于是这些打字员重新组织，进行了复杂的安

排,以便使人人满意。斯大林也“管”我们的打字员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独裁啊,我笑了起来。那位新来的打字员现在是她们的头头,但是,当我祝贺她提升时,她说:“这不是提升,我只不过是一个替身罢了,有人病了,我得找一个人来代替。因为我通常找不到这样的人,我只好自己顶上。她们说这是荣誉。”

其他工作是怎样进行的呢?我想到了集体农庄的生产队。乡村官员因为过多的指手画脚而被撤职;他们说这是采取的行政措施。一位好的队长应当说:“小伙子们,我们必须打破记录。我们怎样来分配工作呢?彼得在这里是耕地能手。”当彼得听说他是犁地能手时,通常他就决定去犁地。假如他不愿意犁地,他可以要求干别的工作,经常可以如愿以偿。但是,假如他对分配的任何工作都不愿干,他们就会把他除名。彼得可以回家挨饿去。

这些农民们学会这种新的方法是经历过一段痛苦时期的。现在他们还在学习。一九三四年,他们以科学为依据,互相磋商,结合,有组织地向自然宣战,从而战胜了那一年的干旱,就是一个证明。这些农民学会这种方法所花费的时间似乎同我们美国人一样长。他们甚至把我们当作少数民族来对待,这实在是大好事!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底举行了苏维埃选举。同往常一样,外国记者说:“他们为什么还进行选举?这不过是橡皮图章而已。”但是,我曾经在古林观看过一个村的选举,选举委员(他是共产党员)向我介绍了一次选举。在这次选举中,集体农民拒绝选举党提出的候选人。当时农民说:“我们对鲍里索夫并无恶感,但他执行任务完全象例行公事。我们认为卢博夫能够更加精力充沛地来执行我们的委托。我们需要一个公共澡堂、一个管弦乐队、一个小阅览室和有组织的学习班,不是建在中心村,而是分别设在我们的小村庄。要办成这些事,鲍里索夫太慢了。”

“这是一次好的选举，”这位选举委员高兴地说。“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让鲍里索夫和党组织知道，假如他们想要领导群众，他们就必须不断前进。让这些农民们努力工作，帮助卢博夫，以证明他们选择的正确。卢博夫当然也不会睡大觉！”

多么令人喜爱的人民！这真是一次“对有关各方都有好处”的选举！我在美国是无法解释这一点的。共产党员把抛弃自己党的候选人的一次选举称作胜利，而不是失败。我把这些告诉了莫斯科一位知名共产党员，他回答说：“我们要建立的东西，消极被动的人是建立不起来的。意志一旦觉醒，应给它让路！”

这是当然的！自从我访问巴库和顿涅茨十一年来，难道我不知道这就是工人专政吗？难道专政者就不需要意志？为什么我一想到这个字眼，总是认为我必须接受命令，从来不认为我可以发号施令呢？为什么我会把民主说成是“选择我的统治者的权利”呢？当这些人讲“苏联的民主”时，他们的意思是委托代表们办事，而他们则通过自己的工作对代表们给予支持。人人都说，今年的选举表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大大增加了。是不是因为这些人多年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现在他们越来越象专政者？“我们想什么，我们干什么，”由他们说了算。他们共同发号施令去征服自然，安排未来，把新意志强加于旧习惯的残余，毫不留情地对待一切挡道者。我的一位表弟在芝加哥不是对我讲过吗：“我看了苏维埃俄国的集体照片，给我的主要印象是一张张充满意志的脸。”我们这些生活在生产资料由老板们占有的世界里的人，甚至感到自由也只是选择老板的权利。

然而，我仍然是从外部而不是从内部来看待这一点的，直到蒂维尔碰巧来看我。交谈中，我说：“写完我的书，我将要求入党。”我著书立说的工作向我指明了我生活的方向，成为一个党员似乎是

不可避免的。

蒂维尔两眼突然发亮，随后很快掩饰了他的情绪，象在明亮的窗子上蒙上了一层窗帘。他以友好的、不带个人感情的口气谈论着我的书。他走后，我想：“为什么那个人会如此高兴，然而又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想法呢？其实，他的任何感情丝毫也不会影响我的想法和意志！”

但是，这些人确实已经变成新人，而且还在与日俱新！在我的记忆里，还没有碰到过一位共产党员，曾利用个人的感情来影响我作出政治决定。甚至我丈夫也不会这样做，虽然我希望有人控制我的冲动的感情，曾这样鼓动过他。每当我要他表示我是否应当入党时，他总是说：“是你要加入吗？”

然而，要我说“我要加入”，总觉得不好意思，有点硬要挤进去的味道。我期望他们首先表示要我加入。假如他们需要你，为什么他们不告诉你？我知道，尽管蒂维尔眼中出现了那一瞬间的闪光，他永远不会说这个话。刹那间，我明白了为什么我感到作出最后抉择是那样的困难。我早就不再自己做出决定了。

我被培养成一个“希望被人需要”的妇女。一个接一个教授把我培养成“逆来顺受”。我信仰的宗教使我养成虔诚地等待一个“更高”的意志。即使在我童年时代，我就被培养去做一个“好孩子”，希望人人都喜欢我，引起人家的兴趣，但不要强求。使自己被父母、一起玩的小伙伴、女大学生联谊会的同学们、男人，编辑们所喜欢、爱戴和需要，已经成为我生活的目的。而主动要求食物，异性或在未被邀请的情况下闯进晚会，都被认为是不合适的。我已被培养成希望有一个上帝，为之效劳的人了。他们把我变成一个多么顺从而又可怜的奴隶啊！我早期最愉快的事情是：为卑鄙的姑娘们找一些动听的借口，自我解嘲说她们的本意是好的。我甚至会为小

霸王们辩解！

探本究源，还可以追溯到孩提时代以前。难道那就是我们这些制定法律、从事艺术、维护理想、建立政府、从事教育的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吗？难道我们没有花费时间来“为卑鄙的姑娘们寻找借口”，并“解释她们的本意是好”的吗？我们从来就不是主人；我们只是为主人辩护。当然，对谁应当管我们，我们有选择权。我们称这种选择为“理想”；把选择过程中的举棋不定称为“自由”。我们重视理想，因为它使我们彼此之间有了差别，构成我们的价值。当资本主义开始衰落时，我们之中有些人会本能地靠拢正在上升的力量——工人们。这成为我们的“理想”——我们聪明地靠拢未来的老板！诚然，我们仍然往往保有奴性，愿意提供我们的效劳，希望被人需要，希望有所贡献。我们已被培养成为有效的奴仆，从主人那里得到我们最终的意志！

一幕幕往事再现眼前，我浮想联翩。数年前，有人——也许是斯蒂芬斯吧？——问我，我从生活中最想得到的是什么。我沉思片刻，回答说：“我希望得到完全的使用。”……他不禁高声叫道：“多么可怕的字眼！你不是这个意思。”……我想使他高兴，力图作一些解释。不过，这是我的原意。我这样说时，是十分虔诚的。当然，他也是对的，这是很可怕的！深深地、无意识隐藏在我身上的是一种奴隶的心理。我是怎样看待婚姻的呢？“只有当我找到一个值得我唯命是从的人，我才会委身于他。”只有找到一位了不起的当家人，我才会结束独身生活！

我甚至以这种奴隶的心理来对待党。多少年来，我把它看作是我的终身老板，时而崇敬它，时而畏惧它。有时，我这样说：“我比大多数党员更热爱党。他们太实际了，把党同工作或一个组织同等看待，但是对我来说，党把我青年时代的所有上帝都揉合、协

调到一起了。党的伟大使我不在乎自己的失败，同志需要我的帮助。一种类似我、又高于我的思想意识在设计 and 建设着一个世界。它甚至容纳了那荒唐的《两个世界的罗曼史》——过去和将来的情投意合者、天狼星上的情投意合者。它甚至容纳了那种想成为一千个人、有一千个生命的怪诞愿望，还容纳了这样的设想：在几十年前在花园中的丁香树丛旁开掘的无法通过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然而，正当我认为靠得很近时，我却发现我离得更远了。我突然产生这种想法：“不，这根本不是上帝；这是一个蚂蚁堆，在那里，人人都受管束。”

一年前我找到一位专门研究宗教历史的共产党员。我对他说：“假如我说我对俄国党的看法常常如同我儿童时代对上帝的看法，我想他们是不会让我参加的。”他吃惊地说：“不会的！这种想法使我们厌恶！”我黯然认识到，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的这些早期上帝，我是如何愉快地崇敬这些上帝啊。他们十分清楚：他们憎恨我那种盲目屈从的思想。他们的组织结构排除消极被动的人们。

现在我这样认为：他们憎恨的不是我青年时代的渴望，而是讨厌使我奴性十足的那些复杂的信仰和感情。他们满足这种渴望的办法不是诉诸感情，而是进行使人奋起的理性分析。这个党不是人们生死以之的上帝，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机体，通过它，一个人实现自己的深沉意志。它不是无所不能的，所以它爱护和指导工人创业者的正在兴起的伟大力量；它不是完整无缺的，所以它确定新的善恶标准，永远同过去的奴隶性作斗争；它不是英明无比的，所以它从千百万党员的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依靠他们的意志和愿望共同前进。它通过同种种黑暗进行斗争，向着能够规划和创建自己前途的境界前进，关怀每个人的生活和地位。

当我们团结起来，就能够征服北极，把小麦移植到北方的时候，为逃避人世而躲到高山丛林中是显得多么幼稚可笑啊。我们的目标是征服同温层及其最大秘密，我们的目标是首先统一地球以后，再去征服星际空间。尽管战争的制造者把人类的前进变成了毁灭的竞赛，但我在工厂和农村各地，不是看到可以创造奇迹的人类的意志吗？烈日炎炎的萨马拉平原上，一位粗野的人在战争的废墟上建立一个小工厂；在华中的一个村庄里，一位短发姑娘在士兵的拷打下英勇就义；在倾盆大雨中颠簸前进的卡车上，一群人使莫尔维季诺的播种计划取得胜利，在加利福尼亚山谷里，罢工者为生存权而进行斗争——世界上到处都在奋战，他们越来越自觉地团结在一起！不是上帝，不是某些神秘的“共同意识”。是人！他们正在摆脱他们自己性格中黑暗的过去，学会获得自己正在觉醒的意志！

对我自己的被动性进行的剖析启发了我对美国共产党的看法。我曾视它为没有效率的老板而加以躲避。人们因为俄国共产党所取得的成就而崇敬它，但是，美国共产党不是这样！如果我必须有一个终身老板的话，那么，它应当是一个伟大的老板，就象古老的犹太部落需要有一个全能的耶和华一样，象一个女人需要一个了不起的丈夫一样。如果这个党不是一个老板，而只是把一个人的意志跟同志们的意志结合起来，那么，人们就不会选择工作最多的地方去工作，如同我的丈夫十分渴望到“我们最重要的战线——农业战线”去工作那样。

但是，那个著名的“党的纪律”又是怎么回事呢？他们称之为“铁的纪律”：你不可能回避它！然而，它同时又是“自觉的纪律”。实际上，我所认识的共产党人并没有对这种铁的纪律感到痛苦，他们似乎做着他们所喜欢的工作。自觉的纪律意味着，你是十分坚定地

选择一个共同目标的,所以你不会等待别人来管你,你会用自己的意志和双手抛弃那些同共同目标发生矛盾的较微小愿望。你面临的最苛刻的命令是:“现在发生了紧急情况,需要你去处理。要么去完成,要么离开党!”但是,这不是在管你,这是崇高的、不屈不挠的选择,是表现意志的行动!

多年来,我仿佛是站在错误的一面编织着花毯,尽管准确地学习着它的线条和图案,但却总搞不准它的色彩和光泽。我记得记者们是怎样嘲笑党员的,这些党员对指出他们错误的同志表示感激。“揍了你,还吻那只手!那是对你实行亚洲式专制主义!”这是从一面来看。但是,从另一面来看呢?假如你对你的共同目标十分热心,那么,当同志们指出你身上存在的妨碍你前进的东西时,你当然会感到高兴。你不会永远坚持认为你是对的,也不会永远承认自己是错的。你要学会何时该坚持,何时该认错,以及如何建立共同的意志和计划。这比崇敬上帝要难,但是,这给世界带来新的光彩!

是的,我总是一会儿企望有个老板,一会儿又逃避老板;我希望有人在行动、感情、思想上,在工作、婚姻、政治等问题上给我以指导;如同美国西部的流动工人,总是在寻求一个容易相处的主人一样;如同数以千计的理想主义者时而陶醉于自由的感情,时而又突然倒进天主教或法西斯主义的怀抱,因为它们使他们的思维器官安息。这些共产党人不会让你安逸,不会给你提供最终的保险。他们使你积极学习,在连续不断的合作中运用科学。假如即使你停止片刻,或者跟不上,他们将以“被动”或“敌对”的罪名把你清除出去,不管你从前做过多么巨大的工作。

但是,我一生受的教育是回避主动作决定,我有意志力吗?如果我知道必须通过不断的选择来坚持自己的立场,我能选择一种

永远投身其中的潮流吗？假如不能，那么，我的生活道路将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日常冲突、微小的感情冲动、变化无常的愿望、最好朋友的劝告以及我没有勇气正视的内在习惯。如果必须如此，那就让我这样生活吧；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生活的。不过，我也就永远不敢侈谈什么“自由”了！

我当时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是在大洋上漂浮旋转的一个旋涡、汹涌的波涛中的一个水泡吗？不，不止于此。我有一种内在的力量，把旋涡卷入更大的急流，形成澎湃的巨浪。在从前的急流中，我是一滴随波逐流、随风旋转的水珠。但是，这些新人正在组成一股新的水流；他们需要意志。他们所珍视的是这种内在力量！

我一开始寻找这种意志，我就发现了它。它并不象我想象的那样糟糕。其实，我的意志还不弱呢。我之所以克服种种困难，坚持留在约翰·里德公社，完全是因为我具有同这个国家融为一体的意志。改组前的《莫斯科新闻》使我变得感情极易冲动，然而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力量，不让我同苏联决裂。我数次不顾生病，努力坚持完成任务，然而并没有人让我去这么做。是什么促使我这样干的呢？我从先前的“乱世创造者”中找到了线索。我的奴性也许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在更深处还存在着某种东西。这就是我要进行创造的意志。

我害怕他们的“理论”，对他们的没有效率感到痛心，孤独地无法同他们共同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支撑我的东西，是对建设未来的人的无比忠诚，这是比任何个人的愿望更加深切的东西。刹那间我明白了，正是这一点使得数百万人团结在他们周围。他们象我一样，处于各个不同的认识阶段。他们来时是幼稚的，带着古怪的清高思想和奇怪的担扰，他们自己并不清楚是什么吸引了他们。吸引他们的是人们进行建设的意志。这种意志受到无数束缚和歪曲，

然而毕竟隐藏在所有人的身上。只有那些掠夺成性的人才丧失这种意志。

这种意志怎样变得更加坚强，直到人们相信它可以征服所有与之对立的感情冲动呢？这并不难弄明白。当我一人孤单地坐在旅馆房间里试图进行选择时，我的意志最薄弱；随后，当要在两列类似的火车之间作出抉择时，它甚至变得很痛苦。通过同共事的人们进行磋商，我越来越看到明确的方向时，我的意志就变得最坚强了。在堪萨斯市，当我们分析了这座城市对待孩子的态度时，我的意志是坚强的；当从西雅图船坞传来的消息和抱怨使我下定决心时，它也是坚强的；在斯大林办公室，当我讲出我们在苏联的美国人的需要时，它同样是坚强的。后来，各种意志发生冲突，它似乎比我更深沉。因为它来自形成我自身和我的一切思想的社会力量。然而，它并没有限制我；我所能思考和想象的一切东西只会有助于它的发展，因为我知道这也是我的意志。可以肯定，我认识的共产党人都不乏个性。他们比其他人更有个性；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个人，然而，他们都坚持一条特定的路线，你无法使他们动摇。他们以无数的方式用自己的个性照亮着、充实着那条路线。

如果我跟我意志相同的人们不断磋商和共同行动，我的意志就会稳步地越变越坚强。但是，自从我下山到西雅图《号角日报》工作以来，十几年中难道我不是一直在这样做的吗？最近数年，我已开始几乎象共产党员那样行动——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党员——总是同别人“商量”我的工作，寻找机会同工厂接触，甚至寻找“下一条战线。”我对他们的习惯学得如此之好，以至鲍罗廷也认为我明白我正在干的事。其实，我并不明白。我的有效率的本能使我装得好象我有觉悟，行动几乎也是同样的。但实际上，它是盲目行动的。现在我同共产党员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他们明白所

做事情的意义。他们分析他们来自的、形成他们思想感情的那些社会阶级。通过分析，我盲目遵循的那种本能在他们身上变成了自觉的意志。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觉悟”。

我越来越惊讶的是，原来这就是自由！无休止地逃避暴君，越过自己灵魂的旷野，越来越孤独地退居日益缩小的天地中，这不是自由。无休止地寻找和失去喜爱我文章的编辑，直到他改变主意或者老板把他换掉为止，这不是自由。自由不是这种琐碎的生活，而是在越来越广阔的领域里，自觉地追求越来越复杂的创造，追求可以共同磋商和共同创造的同志。

这不仅仅是自由；这是永远结束孤独。不是“被选择”，而是同别人一起选择。自由和同志关系总是在不断地加深。组织性的加强不会排除自由，只能使选择变得更加多种多样！

我过去所说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呢？现在我很难回忆了。这如同我已跨越巨大的分水岭，再也看不清下面的山谷了。然而，在一分钟以前，我还看不见这些新的地平线呢。当我在这个区域继续前行时，甚至更难记忆过去了。我曾嘲弄过来自乌克兰的那位男人，但是我现在也讲着他的语言。我曾说过“社会主义的蚂蚁窝”，然而，这种蚂蚁窝在哪里呢？我会不会有一天甚至不再向山对面的老朋友们打招呼呢？而前不久，我还同他们一道行走。

我必须迅速抓住这稍纵即逝的时刻；我必须在山岗上作暂短的停留，以绘制一张我行经路线的地图。无数道路横跨山岭通向这个巨大的关口。每条道路都是新的、陡峭的。送回的每张地图都有助于后来者。我必须记下悬崖峭壁和沼泽地带以及我历尽千辛万苦通过的地方。所以，没有时间回顾走过的路。前面还有漫长的小径和崇山峻岭呢。

附：林肯·斯蒂芬斯 致作者

如果你的读者象我们那样接受你的著作，那就表明你的书是成功的。它将澄清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那就好了。你写本书时，有些地方仍然不明确，看来，你改变世界观的历程还没有完成，然而这些地方，你写得颇令人信服、透彻。

你写的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从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过渡到另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这是历史上任何其他过渡时代从未完成的事，一代人是完不成的。你所经历的过程，我们需要几十年才能走完。你正在加速步伐。

你的报道历历陈述了你是如何从我们的基督教希腊文化逐步走向共产主义文化的。在今后的两千年中，共产主义文化很可能占主导地位。在我所见到的人中，只有一个人似乎完成了这一历程。他是我在好莱坞碰到的一个俄国青年、莫斯科大学的学生。他出生得太晚了，所以不了解我们美国。他沉静、质朴，毫无虚伪之处。他是

言行一致的。他真是一个奇特的人、一个完整的人。你和我是绝对达不到他那种境界的。但他也绝不会理解你所描写的经历，绝不会理解你所谈到的世界观的变化。

你所经历的历史进程改变着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我的大部分自由派朋友看不到这一点；时代确实是一个过程。他们对我说：“对的就是对的，是不是？”我回答说：“那要看什么时代。”依他们看来，这是荒谬绝伦的。现在是在美国，而不是在俄国。判断正确与谬误，时代至关重要。对沙皇的背叛是没有错的，对共产主义的背叛则是一种罪恶。

今后，真理是有时代性的，没有绝对的真理，没有永恒的真理。你的报道是针对这个时代的，是针对我们这一代人的。你所报道的是前所未有的。

作者致读者

这部书给我自己带来的益处超过给我的任何读者带来的益处。一心想着汽车的人时刻想着赶路，而作为作家的我则一心想着写作。只有写下来，我才能深刻地领会我所知道的东西。通过成年累月的写作、反复阅读昔日的许多信件和回忆早已忘怀的往年争斗，以往许多年的纷繁往事连贯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当我提笔写作时，有一些年代，我实在不敢触及，因为那些失败的往事，思之令人痛心。然而它们却不断涌上心头，我置之脑后的年代反而越来越多地逐月逐日再现眼前。其中许多日子是在战斗中度过的。那些战斗曲折复杂，到头来却被证明是错误的，一度使人振奋的希望化为泡影，生活仍然是空虚苍白的。我是怎样从这许多斗争中生存下来，每次总是重新振作起来呢？

但是，当我提笔为文，追述我害怕提及的那些岁月时，我惊奇的发现，昔日的痛苦早已消失许多年了。我很高兴在转向新任务以前，回忆一下往事，以便汲取教

训。

当年的所有岁月都是有收获的，没有一年是虚掷的。但也沒有一年是完全胜利的。既无失败，又无胜利，而是连绵不断的斗争。每个阶段的斗争都会产生一些新东西。当然并非完全是我所预想的，不过我的期望确实也起了一些作用。看到这些，我的干劲倍增，随着年纪的增长而滋生的暮气一下子消失了。我欣然重新投入斗争。我变得年轻了，感到很幸福。

我们在苏联，生活充满斗争和失败，永不停息。对此，别人也许注意到，也许没有注意到。人生一开始，生活就是如此。这些成功和失败成了大家共同的经验，人人从中汲取教益。人类的部分历史就是讲述人类如何不断提高其汲取他人经验的能力。从太古时代动物的嚎叫到人类的语言，从秘传的手艺到千千万万人共同享有的机器，从象形文字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和爱因斯坦的公式——我们就是如此不断前进的。现在，科学技术已成为一切国家的共同财富。在苏联，千千万万人可以享受科学家和工程师的特权，因为后者的成败得失被有计划地变成为所有人的间接经验。

这就是人类进步的新阶段。这种集体力量使这个落后的国度迅速发生变化，从以往的半游牧、半家长制转变为今天的制度，使得将来有可能实现社会主义。在苏联，什么东西都不是完全归自己所有，甚至一个人的成功和失败也不完全是自己的事。资本家可以创建一个企业，归自己所有，但在苏联不行。个人不能掌握任何东西来为自己谋求私利，不能随心所欲地予取予求。

莫罗索夫说：“我没有任何东西，所有的东西都是大家共有的。”甚至犯错误，也不纯粹是自己的事。

象旧时代的先驱者一样，我也自我逃避，摆脱复杂的人生斗争。其实，我还是我自己，进行着同样复杂的斗争，只不过面目有

所不同罢了。我更懂得了如何去探索,我体验了更多的痛苦,品尝了更多的欢欣。我获得了难以置信的好机会,生在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整个世界处于产前的阵痛中。

我是以往四千年历史中最幸福的人,否则,生之何益。过去四千年来曾经取得了许多成就,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有所贡献,既有名利和权力,也有朋友和亲爱者,没有这些,世界便索然无味。

这一代苏维埃青年将创造出我们想也想不到的业绩。我曾经非常羡慕他们。而现在,我则不徒羡他人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肯定愿意重新开始人生的征途,作为一个二十岁的青年,在这个兴起的国土上展望前程。但是,我知道,处于鼎盛时期的他们也会面临我们的老问题:同志情谊和忠诚、爱情和工作。虽然他们达到了我所无法企及的高度,但我也有自己的欢欣,而这是他们所无法得到的。我曾经目睹,并亲身经历人间沧桑,既见过混乱,也目睹新社会的形成。

我是历尽千辛万苦,自己选择到这个国度的。然而矛盾的是:我对苏联了解得越多,爱的越深,我就越不愿意多呆在这里。

因为另一个国度的工人会说:我曾经同他们一起进行斗争,不该中途离开他们。我承认他们有权把我召回去,不过,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在多大程度上这样做,尚未决定。我的一生从此以后必须成为这两个国度之间的桥梁。我就是如此做的。

我与之分手的战友们,我的报道是为你们而写的。我离开你们,对你们不为无益,因为我可以把我在这个新的国度里的感受告诉你们。当我们各处一方的时候,你们的斗争发展了,冲突异常激烈,复杂残酷。

当我在大分水岭之巅瞻前顾后的时候,我有一言相告:构成我

生命的一切东西几乎都必须与之决裂，然而我找到了新生活。

真的吗？不！这就是我的看法。

安·路·斯